宣文峋文集

宣文峋

目录

作者介绍

宣文峋，中国著名作家。1957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读书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先在北京市西郊农场监督劳动，1960 年因“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被升级劳动教养。

经过长达 20 年的劳改，终于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回到了人民队伍”，回到故乡，在四川某市某师专任化学系副教授。现在已经退休。

课余时间，偶然写些回忆录，无非记录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个泡沫而已。

茶山泪

题记

他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第一章　纪念品

一条由窄变宽的河流，上游两旁高峰对峙，树木丛杂，绿得发黑的河水显得格外深幽。河水流出峡谷后依然波涛迭起，带着在峡谷中奔腾的那种气势。河面上空架着高峡地区常见

的铁索桥。桥面铺着稀疏的木板。两片木板之间往往有一两尺宽的空隙。河的左岸是较为平缓的山坡。小麦田里镶嵌着小块儿的油菜田。一片片亮黄色，浮在绿色海洋上面，显得格外娇嫩。河的右岸是一块由泡沙石构成的山岗。岗上有几处浅浅的灌木丛，间或有稀稀拉拉的野草在风中摇曳。再往前，就是一连串的土坡了。

四周宁静，凉风微拂，团团云朵安祥地在空中移动，映在河面的倒影时而散开，时而复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好一副美丽的山野图画！

美好的事物总不长久，先是出现了嘈杂的声音：

“走快点儿!”

“急啥子！再打一拐!”

“拐子是亲家，背子是冤家!”

接着出现了一伙儿人，个个衣衫褴褛。如果靠近些，还能闻到一股酸臭的气味。他们身上背着山区特有的也是唯一的一种叫做“背夹子”的运输工具。那上面顶着鼓鼓囊囊的麻袋，恰好和相距很近的瘦削脸孔形成明显的对比。他们右手都提着下端有铁尖上端有横柄的木棍。这种叫“拐子”的东西，可以支在背夹子下面代替负重的人承受重压，好让他们的肩膀暂时休息一下。

稀稀拉拉的队伍相继走上铁索桥，自觉地拉开距离，要等前面的人快要下桥的时候，后面的人才能上桥。因为这种桥走起来摇摇晃晃，摆动又毫无规则：上下晃，前后摇，左右摆。木板相距又远，前脚踏上新的一块木板，就有了新的摇摆规则，而后面的脚所踏的木板还是原来的摇摆规则，上面的身躯就处于两难境地，竭尽全力才能勉强维持平衡。

已经通过了二十多人。正在桥上的是个年过三旬的中年人。他已经通过了一半儿多的距离。正当他专心向前艰难地移动之际，已经过桥的人大声提醒他：“小心！老乡来了!”

这时候，两个空手的赤脚山民在他之后上了桥。他们嘻嘻哈哈地在桥上蹦跳取乐，兴奋地喊叫：

“霉和尚要栽喽!”

“霉和尚要栽喽!”

桥上的中年人一听见“老乡”两个字，立刻站住。他不能回头看。因为最重要的是站稳，而头顶上的粮袋已经晃动得很厉害。他觉得快要站不住了，本能地伸出手去想抓住身旁的铁索，猛然间后面又有人喊：“抓不得！腿叉开些!”

他也明白抓不得，旁边的铁索不是作扶手用的。如果向旁边弯腰，抓住铁索以后虽然暂时不会跌下去，但这以后人就再也离不开铁索，除非有几个人协助他取下所负重物。他当时也只是瞬间失去理智，听到喊声立刻把手缩回，气力都集中在两腿上，连草鞋里的脚趾头都

紧紧地抠住木板，一点儿不敢放松。

整个桥都在晃动。两个老乡使劲儿跺脚，快活地高喊：

“霉和尚要跶！”

“霉和尚要跶！”

几分钟以后，两个老乡见自己的恶作剧无效，知道精彩的一幕不会出现了，才把幸灾乐祸的嘻笑转为失望的咒骂：“狗日的霉和尚！”“背时的劳改娃！”然后从他旁边走过。

咚咚之声远去。剧烈抖动的铁索恢复了正常摆动。他已经是一身冷汗，用颤抖的双腿挪过了铁索桥，也到了右岸的土坡下面。先过来的，已经用拐子斜支着背夹子放在泡沙石岗子上，彻底放松地在休息。一个三十来岁穿着蓝色干部服的人，背着一个制作精巧的小背篼儿，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步。他在这个差点儿跶下河的人面前站住，慰问似地说：“老王，这些老乡硬是可恶，这回把你整惨了。”

老王惊魂未定，两腿发软，一面喘气一面卸背夹子，来不及答话。旁边正在歇气的“霉和尚”们都一个劲儿地骂“狗日的老乡”来表达对他的同情。有的夸他命大，说上个月十九队背粮，就有人连人带背夹子一起被老乡“浪”进河里，连“妈”都来不及喊一声。那个叫喊“抓不得”的人是个小伙子，这时候刚过河来，也凑过来问：“老乡为啥不喊我们劳改犯，要喊霉和尚？”一个老犯人回答：“我们这些人住在山上，一不吃肉二不搂婆娘，不是倒霉的和尚又是啥子？”众人哄笑起来。

那个穿干部服的对小伙子说：“谭志云，把你背的那袋粮打开。”谭志云把粮袋从背夹子上卸下来放在地上。呼拉一下子所有犯人都围了上来。穿干部服的忙放下背篼说：“莫慌莫慌，昨晚登记了的都有份儿。我一个一个喊名字，喊哪个哪个就把口袋递过来。”说完他掐灭了烟，放下背篼，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茶缸，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来，开始喊名字。

第一个被喊到的人欢天喜地地把小布口袋递过去。中年人又笑眯眯地核对一遍：“张全兴，五斤，对吧？”

“洪组长，对头，是五斤。”

于是洪组长用小茶缸舀了一缸子米，把缸子摇了摇，然后用手抓一把米添上。张全兴满怀喜悦地张开口袋，看着米流进口袋里。如此又重复了四次。

“李二娃，两斤。”李二娃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洪组长叹了口气说：“这点点咋够吃嘛！”两缸子米进了口袋，只装了个底，显得空荡荡的。洪组长又随手抓了一把放进口袋，换来了感激的目光。

最后过桥的几个人也都围过来，很快把一袋粮分得差不多了。于是个个都忙碌起来，下河舀水，上坡拣枯树枝，用石头搭成临时锅灶，把茶缸或饭盒放上，再找洪组长借火柴。——现在火柴凭票供应，只有他才有。

洪组长看了看坐着不动的“老王”，然后舀了半缸米，从背篼里取出一个精巧的钢精锅，也加入煮饭的队伍。又取出一块腊肉，约有三四两，解下别在腰间的小刀，把腊肉切成薄片，放进锅里。过了一阵，肉香就伴着饭香四处飘逸。

“老王”是这群人中唯一没有买米的。他没有亲属给他寄钱寄粮票。昨天洪组长来到监舍登记交钱交粮票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叫自己背粮。按惯例，只有家里寄来钱和粮票的人才愿意下山背粮，也只有他们才可能被派去背粮。他们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见识一下久违了的监外世界，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参与就地分粮。他们不愿意在几百名遭受饥饿折磨的同伴们面前分粮。洪组长也只派这些人背粮。因为背粮是个实打实的重活儿，得抓紧时间爬山，越走得慢时间拖得越久肚子就越饿也就越走不动。背一百多斤上坡，对饿得精皮寡瘦的犯人来说决非易事，不像在茶园里干活儿。尽管有被马中队长马靴踢的危险，但却可以磨洋工。

奇怪的是，这次背粮，洪组长却点了他的名字。他也只能服从。这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喘气，经历了负重跋涉和桥上的无声搏斗，他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比汗流浃背更难忍耐。他只好背对大家，不去看煮饭的场面，独自吞咽口水。而饭香肉香却偏偏一阵阵袭来。这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没有长期饥饿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性急的犯人不等饭完全煮好，已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呼噜呼噜刨饭的声音夹杂着咬嚼罗卜条的声音不断地袭击他，闭上眼睛也躲避不了。

突然，一阵强烈的肉香和饭香刺激着他的鼻孔，接着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睁开眼睛，见洪组长端着一碗白米饭伸到他面前。米饭上面还有几片半透明油汪汪的腊肉和一只铝制小勺。洪组长满脸带笑：“喂，老乡，吃嘛!”他犹疑了一阵，理智告诉他：不能吃。他强忍着不伸手，只是小声地说：“洪组长，你自己吃嘛，我不想吃。”

“啊哈！啥子不想吃，背了这么一大截路，又在桥上浪了一阵，肚子里还不是早唱了卧（饿）龙岗!”

的确，他早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可是他想起前几天洪士奎就托人来“编”他的卡基布上衣。要是他伸手接过饭来，这件还有七八成新唯一还穿得出去的上衣可就保不住了。正在犹疑，洪士奎又说：“这才开始爬坡，不吃一点儿东西，人越走越瓤，咋个爬得上去？劳改队哪管那么多，先吃饱了是最要紧的。”

他心一横，但还是有气无力地反问：“我吃了，你又吃啥？”

“这是专门给你煮的。中午我在建阳街上吃了的，这阵还不饿。”

老王终于接过碗来，风卷残云地吃完。洪士奎又把锅里剩下的饭刮干净凑足一碗，老王慢慢就着腊肉吃。这肉真好吃，他有几个月没有吃肉了。

晚上开会学习，虽说是初冬，可是在山上，夜间已经寒气逼人。身上无衣肚里无食的犯人，全仗着烤火才能抗住饥寒。吃过晚饭，就在两排床铺之间的空地上生起火来。生火的方老坎先用刨花发火，再加细柴，最后加上大块才砍下的湿柴，于是滚滚浓烟在监舍里从下往

上弥漫。不久，黝黑的屋梁、笆壁和吊挂在笆壁上的那些破烂的巾巾片片，全淹没在深棕色的黑烟里。浓烟顺着屋顶茅草的缝隙和门缝儿向外面窜出。最后整个监舍都被浓浓的黑烟所包围。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里躲避浓烟。有的人冷得直跺脚。老王咕哝着："真像个冒烟的垃圾堆！"

屋里只有方老坎不动。他是队部指派专门上山砍柴的，生火也是他的事。此刻他一面剧烈地咳嗽，一面向火堆上添柴。火势逐渐旺起来。浓烟渐渐集中在屋子上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而地面附近尤其火堆旁边，烟却渐渐少了。在火光照耀下，可以看清楚用柴棒棒绑在一起构成的大铺。上面的棉被有的折叠整齐，还用塑料布包着，大多数则和怕冷的犯人一样，蜷成一团。长期的烟熏火燎，使它们变成了灰黑色，看不清原来的颜色了。

屋外的烟越来越多，这是室内火已经生好的信号。在外面等候的劳改犯除了老王以外，已经陆续越过烟雾进入大门，再穿过走廊或者说通道进入各组的监舍，然后后来到火堆前。有的点燃叶子烟，有的拿出熏黑的茶缸准备煮点儿什么。更多的人则不甘寂寞，拿起细树枝拔火。这是为了火焰更旺或者只是不甘寂寞。

组长戴建全从队部下来，看见有人还在外面独自闲逛，就招呼说："王自洁！开会了！"于是二人一同进去。

开会先读报，然后传达队部指示，布置第二天生产。组员个个心不在焉。有的闭目养神，有的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茶缸。虽说煮的是烂菜帮子，但只要在煮，就说明有东西可煮。有总比没有好。尽管这年头社会上人人都争着以"无"产阶级自居，劳改犯的觉悟却没有那么高，总希望做个菜缸里"有"东西可煮的"有"产者。王自洁和其它背粮的人一样，在路上煮过饭吃，晚上不太饿，把伙房打来的苞谷馍馍吃了以后，那一瓢水煮菜帮就给了一个军犯。军犯没有说谢，眼神却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专心致志地烤火。他把几根细树技并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树疙瘩放在上面，好把它烧透。谭志云也动手帮他推火，大小搭配，干湿搭配。火越烧越旺，树疙瘩越缩越小。他又把湿柴放在火堆外面慢慢烘烤，把大疙瘩从中剖开，烧成大块的桴炭。到了这个阶段，黑烟散尽，烤起来特别舒服。空虚的肠胃也被火的温暖充满而变得实实在在，以致暂时告别了饥饿。这是劳改犯的幸福时刻。青灰色或者腊黄色瘦得千人一面的脸上，都抹上一层明亮的橙红色，显得油汪汪的。

本工区吴干事的小女子提着火盆过来。火盆是用旧的搪瓷脸盆改成的。盆沿上有三个孔，用粗铁丝穿过孔，就可以用手提了。小女子把火盆放在火堆旁，用竹子弯成的火夹子夹取桴炭放进火盆中。她想多夹一些，为了夹一块较大的桴炭，甚至把整个火堆翻个底儿朝天。组长只好暂停讲话，动手帮她夹。火盆堆满了炭火以后，她提起来就走，不但对戴组长说的"慢走，走好"，全不理睬，而且自始至终不曾开口。大家失望地望着剩下的点点火星。王自洁则往后一靠，两只手缩进袖口，一动也不动。

戴组长刚宣布学习结束，洪士奎进来了。他和戴组长打过招呼之后，对王自洁使了个眼色。王自洁跟着他出了监舍大门，拐到后面。洪士奎说："老乡，米我给你带来了。本当三斤，今天在路上你吃了半斤。你要不放心，再用缸子量一下。那块腊肉算我办的招待。"说罢拿出一个小蓝布口袋来。王自洁接过来掂了掂，觉得份量还可以，就说："量啥子哟，我信得过你。你进去，我给你腾口袋。"

屋里的人差不多都去上厕所了。王自洁弯下身子，从床底下拖出柳条箱，解下拴在腰间的钥匙开锁。洪士奎目不转睛地盯着王自洁的手。王自洁取出放在面上的粗布口袋，小心地把小蓝布口袋里的米倒进粗布口袋里，把洒在旁边的几颗米也捡起来，再用松紧带把粗布口袋扎紧。他翻动着箱子里的物件，旧棉鞋啦，破衬衣啦，半截皮带啦，两本旧书啦，还有一顶鸭舌帽，等等。最后才从箱底翻出八成新的卡基布上衣。

他把衣服拽出来的时候，洪士奎眼睛一亮：还有一条折叠整齐的深灰色斜纹布长裤！他接过蓝布口袋和上衣，顺手把上衣放进口袋，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喂，我们是老乡，我不得亏待你。我们再来编点生意，怎么样？"

王自洁茫然不解。洪士奎又说："劳改队嘛，第一要填饱肚子。马上要过冬了，啥子吃的都没得，那日子才难过哩！我这里还有几斤米，明给你说，想换你那条裤子。我明年满刑，二天回家，身上总得有件穿得出去的衣服。"

王自洁颓然坐下，洪士至接着说："你放心，我们是老乡，不得让你吃亏。要不然你先开个价，要几斤？"看见王自洁摇头，洪士奎也坐下，在一旁耐心开导："这个你要想得开，不要舍不得。身体吃了亏，二天补都补不过来。衣服是身外之物，以后有了钱再买，现今顾身体要紧！"

王自洁承认他的话有道理，可是他不忍心。劳改几年，他的衣服有的磨烂了，有的早换了米和挂面，只有这条裤子一直锁在箱底。这是他唯一的纪念品啊！

上厕所的陆续回来了，看见洪士奎都有意避开。洪士奎就站起来，拍拍王自洁的肩膀："老王，你再想一下，想好了给我带个口信。"

众人目送洪士奎出门。过了一阵，谭志云问："老王，他找你啥事？"

组长瞪了谭志云一眼："有你啥事？"王自洁连忙说："没得啥事，没得啥事。"

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王自洁上了床，想起往年的事。

那时候他还是干部，他们单位的几个人一起下乡劳动。有一天晚上收了工，一个女干部来到他们几个男干部的屋子，屋内几个人都招呼："林主任，请坐。"林主任也不推辞，就坐在他身旁，却忽然惊叫起来："小王，你看，你的裤腿撕破了。你临睡前把它脱下来，让老张带给我，今晚上我给你补好。"

王自洁心直跳，像做错了甚么事似的，脸胀得通红，语无论次地说："我没有注意，今天……我还有一条，不用补……"

林主任笑了："你们这些男同志，做事就是粗心。还有你老李，都结了婚还是那样。"

此后的事他记不清楚了。似乎是第二天晚上，她送裤子过来，屋里其他人都有事出去了。

他们两个相对无言，勉强说了几句就不说了。林主任提议出去走走，他也巴不得这样，就跟着出来。

农村的夜晚难得几家有灯火。竹林茅舍和远处的小丘都化作一团黑色，零落的狗吠和唧唧虫鸣，点缀着宁静的夜。

说是出来走走，其实没有走多远，就在田间水渠边站住了。小路太黑，不敢走。她问他："下乡这么多天，过得惯不？"

"还过得惯，就是蚊子太多。林姐你呢？"

"我最盼望下乡。在城里快闷死我了。这里才是海阔天空!"

他心里想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出来。你是不喜欢那个家!"他自然不敢这样说出来，就改口说："乡下空气倒新鲜，只是农村生活太苦了。"一出口，他就觉得这后一句话有点儿问题，就又说："这话我只敢对你一个人说。"

林姐调皮地一笑："不怕我检举你？"

"不怕，不过你真的检举我，我只有去死了。"

"看你说的! 这句话虽然不好，揭发出来也不是甚么很大不了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想到死呢？"

他的心剧烈跳动。虽然她看不清他的动作，他还是低下头，握住拳头，踢出脚下边一颗小石子，这才说出来："林姐，我是说如果'你'检举我。"他把"你"字说得很重。

她不说话了，似乎听得见她的短促呼吸。他悄悄儿抬起头，尽管在暗夜，还是能看见她那微微散乱的头发和射出柔光的眼睛。她的手臂无意中碰了他一下，立刻又拿开了。她叹口气轻声说："别叫我林姐，叫我婉晴姐，好不好？"

隔了好久，他才用最小的声音叫了一声："婉晴姐。"

她轻轻拉住他的手说："往回走吧！时间久了不好。"

还有甚么？他一时想不起来。正当他搜索回忆的时候，一个粗嗓子打破了甜蜜温馨的意境："人齐了，关大门!"接着是"哐啷哐啷"的声音。他连忙脱衣服，钻进像铁板一样冰冷梆硬的被窝儿。然后是抬尿桶的声音，给各组的小门上锁的声音，病号咳嗽的声音，值班员在通道走动的声音，纷至沓来。随即灯灭了。尿桶的臭味儿夹杂着木材余烬的烟味儿伴他进入梦乡。腰腿的酸痛连同美好的回忆都一齐消失了。

第二章　深山历险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安然无事，照常出工、开会、挨饿、疲倦。洪士奎没有来找他，也没有托人捎话。他明白事情不会就此完结，洪士奎也许在忙别的事，也许是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不主动把裤子送上去，洪士奎一定还会来找他的。但他宁可挨饿，也不会将那把他们两个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纪念品交到别人手里。

第五天晚上，组长通知他，明天接替方荣国上山砍柴，供应全工区烤火。这无异晴天霹雳。他知道事情不妙，忙向组长求告说：自己没有上过山，认不得路，请组长向队部反映另派别人。组长说："这是马中队长点名要你去，你就得去，说啥子都没得用。"他知道这下子完了，马中队长一向说一不二，别说是犯人去求，就是其他干部去说都没用。犯人谁啰嗦几句，少不了赏你几马靴！

组长看他不出声，就把背夹子和砍柴刀递给他，又安慰他说："哪个也不是天生就会上山的，摸熟了就好了。"

他沉默了一阵才问："脚码子在哪儿？"

脚码子是拴在脚上的一种防滑设备，不但雨天要用，就是晴天在山林深处，地湿路滑，也缺它不得。组长的回答是："队部不发脚码子，要用你自己去找。"

上哪儿找？他根本不知道谁有，只知道方老坎方荣国有。过去他不曾关心过这个问题，如今病急乱投医，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这个素昧生平的脚码子所有者。他去六组找到了一脸不高兴的方荣国，怯生生地说明来意。方荣国一口回绝，绝无商量余地。他无奈而回，闷闷不乐，向组员说起这件事。谭志云说："你还蒙在鼓里，你夺了他的饭碗，他心里正烦你，咋会把脚码子借给你？何况你又不是用一天两天！"

王自洁急忙说："我夺他的饭碗？那个背时的才想上山！"

大家都不作声，他赌气睡下，心想去就去，明天再说。反正有两斤米，这是克服任何困难的本钱。"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样一想，也就安下心来，很快入睡了。

心中有事醒得早，一觉醒来，天有点儿麻麻亮，不敢再睡，一骨碌翻身起来，轻手轻脚地穿衣服，穿草鞋，背上背夹子，轻轻地敲门。值班员过来开了锁，又开了大门。他先上伙房。伙夫已经知道他的新身份，上山砍柴的有提前单独打饭的资格，给了他两个苞谷馍馍，其中一个是中午的。至于菜，晚上回来一起给他。他三口两口吃完一个苞谷馍馍，把另一个揣在怀里，就急急忙忙上路了。走出院门，看门的老刘头向他打招呼，想跟他说些什么。他不敢耽搁，含糊应付一句，就匆匆离去。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走出坡地茶园，翻过几座长满刺笆的荒坡，穿过不过一人多高的刺竹林。等到天色大亮，他已经气喘吁吁地进入林区了。

林区有集体林和国有的区别。国有林无人看守，但距离远，山高路险。他也听人说起过这二者的区别，但倒底哪一片是集体林，哪一片是国有林，却分不清。他估计刚进入的林区决不会是国有林，否则砍柴的任务未免太容易完成了。

小路越来越窄，最后竟无路可寻，只能在林间勉强穿行。地面长期不见阳光，起伏很大，又湿又滑，虽然他个心翼翼，仍然滑倒过两次。后来树林越来越密，有高大的，有矮小的，也有枯死的。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经过一条小溪，又上了一座山。山上的树木相对说来要稀少些，估计大概已经穿过集体林，到了可以任意砍伐的国有林了，　　高大的树木砍起来费事，回去后还得用斧头劈开才能烧。小树枝呢？太湿，烧起来光冒烟，要挨众人骂，也不经烧，不如砍枯树。主意定好，放下背夹子歇了一阵，觉得体力已经恢复，看了看四周，确信没有人，于是脱去棉衣，向一棵碗口粗的枯树举起了砍刀。这砍刀还真是一把好刀，斜劈下去，几刀就在树的左侧砍出一个斜形缺口，树皮木屑落了一地，上面的枯枝也摇摇晃晃。等树干缺口处削掉了三分之二，他放下刀用力住右推，树干却不断，他已经是一头汗水，索性连单衣也脱了，又狠命在缺口处砍了几刀再推，整个树枝都晃动起来。猛一用力，树干“喀嚓”一声折断，哗啦啦一声倒了下来，却斜搁在旁边一棵大树上，只好动手去拖。由于砍树把力气用完，肚子也饿了，怎么也拖不动。

隐约有声音传来：“偷树枝了！有人偷树枝了！”

他猛然一惊，又有一个声音：“霉和尚偷……和尚……偷……”

“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连忙穿好衣服背上背夹子，一手提拐子一手提砍刀，一时辨别不出喊声从哪个方向传来，急不择路，只好先往树林密处躲避。那可怕的声音不时传来，时远时近，时强时弱，“偷树枝……”“霉和尚……”回声重叠，听起来既含混又响亮，十分吓人。

他立刻清醒过来，跑不是办法，背着背夹子也跑不快，很容易被善于爬山越岭的老乡发现。万一被他们抓住……不堪设想！

喊声逼近，终于听清，声音竟来自他进入林区的来路。难道老乡一直在跟着他？旁边是一大片刺笆笼笼，有一人多高，他想往里躲，可是背着背夹子钻不过去，只好把背夹子藏在草丛里，抓了些树枝树叶撒在上面，自己小心分开荆棘往里钻。头发扯住，手脚扎破，都无法顾及，衣服就更顾不上了。

喊声停住，他偷偷儿向刚才自己砍树的地方张望，没有发现什么。

突然一声枪响，树林里的各种鸟带着惊叫一齐噗哧哧乱飞。原来老乡还带着枪！接着是一个粗大的嗓门高喊：“狗日的霉和尚，快出来！”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咚咚直跳，默默地祈求：“千万别看见我呀！千万别看见我呀！”

两个老乡走上坡来，前面的拿着火枪，后面的空手，都穿着草鞋单裤，衣衫破旧，冷得微微发抖。这一阵他的快要跳出腔子，闭着眼睛只听不看。

一个声音说：“我听见就是这个方向，咋个不见了？”

另一个声音说：“你又喊又开枪，他不跑等到你抓！”

停了一阵，脚步声似乎渐渐逼近，他几乎要停止呼吸。一个声音说：“看嘛，狗日的霉和尚把树枝丢了才跑的。”另一个说：“这下他空手跑，你咋个撵得上嘛。”

又过了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慢慢儿抬起头，四下窥望，不见两个老乡，仔细听了一阵，也不见动静。他几次想出来，又几次劝住自己：老乡说不定就埋伏在附近，紧防杀回马枪！

过了很久，他觉得也许有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用目光把四周树林的间隙处仔细搜索了一遍，确信无人，才把身边的刺笆笼笼抖动一下。似乎有人喊：“霉和尚出来！”又过了几秒钟，他的血液都不流了，依然没有动静，他才知道并没有人喊，那不过是他的幻觉罢了。这才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同时做好了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准备。

确信没有危险之后，取出背夹子，又到刚才砍树枝的地方，发现树枝不见了。——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

危险过去，肚子却饿了。伸手向怀里一摸，苞谷馍馍没有了。在走过的几个地方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肚子饿得饥肠翻滚，觉得腿脚乏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又发现手上刺破的地方流血已经止住，小腿却痛痒难忍。低头一看，两条旱蚂蝗正在吸血。他又恶心又痛恨，狠命拽出蚂蝗，踩成肉酱。

他在地上坐了一阵，疲乏疼痛有所缓解，肚子却越来越饿。怎么办？空手回去，绝对不行，犯人个个饥寒交迫，全仗晚上有这么一堆火，身上不冷才能勉强对付饥饿。没有柴，大家会把他骂死。队部也不答应，马中队长会狠狠踢他几马靴。但是上哪里去砍树？这里绝不能再砍。上远处？爬不动也钻不动了，砍下来也背不回去。钻出树林来抬头一看，太阳已经偏斜得很历害，脚下一软，下坡又滑，绊倒了几次，腰背都摔痛了。“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他想。

越饿走得越慢，越拖得晚又越饿，好不容易穿过刺竹林来到荒坡上捡了些细树枝，又刨了两个小树疙瘩，忍着饥饿穿过茶园的时候，工地上已经没犯人，进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把背夹子往空地上一放，二工区四、五、六三个组的人都围上来分柴。一看柴少不够分，都露出不悦之色，有的人小声埋怨起来。谭志云一面帮他分柴，一面安慰说：“头一回出去，够恼火的吧？”戴组长也说：“王自洁今天头一回打柴，路不熟，大家将就些。”

几个组的人自己生火，王自洁到伙房打饭。伙房的人也埋怨说：“咋个回来得这么晚？”拿了一个馍馍给他，又将早中晚三顿饭加菜一起给他，舀了一大瓢盐水煮菜帮子，他的大碗几乎都装不下了。王自洁抱歉地说：“今天背时，遇到老乡了，回来晚些，让你久等了。”炊事员却宽厚地说：“没得啥。”

他回到监舍，火已经生上，但是火堆小，火力不旺，烟却不少。大家尽量往前挤，后面的人冷得直发抖。王自洁吃了苞谷馍馍，觉得肚子还是空的，就从布口袋里抓几把米煮稀饭。那一大碗菜帮子，他借尹老头的锅重新煮，还招呼大家吃。大家明白他是借此表示谦意，也毫不客气地吃起来。只有组长不动，宣布开会。

稀饭煮好了，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他稀里呼噜地刨完，组长也把生产上的事情说完，就找人读报。众人默坐着各想心事。他肚子基本上饱了，腰背、手脚各处的疼痛却明显起来，蚂蝗叮咬的地方流血已经止住，却仍有几分疼痛，就用手抚摸。谭志云看见了，说："上山遇见蚂蝗了？山上的蚂煌就是多，要先涂上烟袋油子，蚂蝗闻到气味，就不敢来了。"

第二天早起一看，天阴了。他今天吸取教训，准备走远点儿，务必找到国有林。于是爬山穿林，上坡下坎，一路急行。谁知天不作美，空中朦朦胧胧，似雨似雾，湿气逼人，身上的破棉衣渐渐打湿，坡陡路滑，上坡还好，几次失足都未跌倒，下坡的时候虽然十二万分小心，仍摔了好几跤。

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到了一座山上。山不甚高，成材的树木不多，有明显的砍伐痕迹。剩下的多半儿是烧起来冒大量黑烟而火力却不旺的马桑树。还有一些无名小树，更多的是灌木丛、荆棘、拦腰绊脚的藤条，而对面的高山，则树木茂密，远远看去，似乎高树甚多。但山势陡峭无路可上，只有山洪倾泻的时候在岩壁上冲出的一道浅槽，两边有绿色苔藓，中间寸草不生，露出白色或红色的石壁。看起来，只有从这里爬上去了。

他走了几个小时，肚子饿了，也估计不出准确的时间。于是他放下背夹子，坐在石头上一面吃苞谷馍馍，一面抬头仔细打量对面的高山。突然他发现山涧顶部露出一个人来，那人背着一大捆柴，面对山涧背向自己双手抓住两面伸过来的藤条慢慢儿往下滑。由于相距太远，看不清那人的样子，就站起来起来仔细观察。

那人已经滑过近一半的距离，再往下，两面都有一人多高的茅草。猛然间，几根碗口粗细的木料从山顶滚下，速度极快，木料滚动碰撞石壁，腾跃翻飞，时而凌空而起，一端指向天空，时而超越牵挂顺涧直下。那人躲避不及，与乱木一同滚下，只听见传来的一声喊叫。王自洁还未看清，那堆木料已经没入草丛，茅草被一路压倒，直到山脚。

这瞬间发生的一幕，惊得他天旋地转，坐在地上。又有几声狂笑传来："嗨！霉和尚打死啰！霉和尚打死啰！"接着对面山顶上出现了三个人，因相距太远看不清脸，好像是三个老乡在狂跳、拍手，嗨嗨了一阵之后又不见了。

王自洁一直在地上呆坐，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支起身子，揉揉眼睛，看那对面山上，依旧高树参天，郁郁葱葱，生意盎然。他叹口气，站直了，拖着软绵绵的双腿，在山坡上四处寻找，无奈能作烧柴的树木很少，勉强凑了一百二三十斤，天色已经不早，就往回走。

来时空手，归时重负，也走不快。山高遮光，天色本来阴沉，不知不觉已经黑了下来。正在下坡，远远看见小路上似乎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暮色苍茫，分辨不清是狼是虎还是什么怪兽。他打了一拐，想等那怪物自动离去，却不见动静，像块黑石头似地蹲在那里。他想把背夹子放下，无奈路窄，上面是陡坡，下面更近似悬崖，没有安放背夹子的地方，只好背负烧柴，左手持拐子，右手持砍刀，壮胆而行。蹑手蹑脚来到距怪物较近处，这才看清是一头野兽，一身黑毛，蜷作一团。王自洁一直生活在城市里，除了在公园里见过狮、虎、狼、熊以外，辨不出其它诸兽，只觉得那双眼睛炯炯有光，在暮色中十分吓人。所幸地势稍微开阔了些，就把背夹子立在坡上，用自己的背靠住作为支撑，稍事休息。那怪物竟站起了来，先舒展一下四肢，就向王自洁爬过来。王自洁不敢跑，而且相距太近，心知反正也跑不掉。

天色将晚，孤立无援，只得两手紧握拐子砍刀，睁圆双眼，屏住呼吸，准备和怪兽决一死战。那怪兽又向他左侧而来，似有偷袭之意。他不敢怠慢，也转过身来。怪兽又转向右侧，王自洁又跟着转过来。这样反复了三次，怪兽一溜烟儿窜向坡下草丛深处，不见了。

过了一阵，他见怪兽不再出来，这才放松牙关，长长出了口气。衬衣从前胸到后背全被汗水湿透了，浑身战斜，双腿无力，只得挣扎前行。直到进入刺竹林，还觉得心惊肉跳。进入院门，值班老刘头问他："你遇到啥子了，咋个脸色煞白？"他打了一拐，反问："现在几点了？晚饭过了没有？"老刘头说："晚饭已经过了好一阵了。你到底是咋个了？"他无心答对，只说："二天说，二天说。"就直奔监舍。

有人过来帮他卸背夹子、分柴，有人关心地问他吃过没有。他惊讶为何这些人都喜气洋洋，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还是组长告诉他，明天休息一天。他才明白，赶紧去伙房。其他人有的忙着生火，有的张罗煮东西吃，也有人找针线，更多的是躺在床上聊天或睡觉，没有人计较柴的多少和干湿。他觉得非常疲倦，匆匆吃饭洗脚，然后早早上床休息，很快入睡了。

突然那头怪鲁不知何时又来到地面前，两眼圆睁发亮，张牙舞爪向地扑来。他拔腿就跑，怪兽追来，他跑不动了，就用拐子抵挡，一拐子打在怪兽身上。怪鲁趴下，他正想再打，怪鲁又跳起来扑在他身上。他万分惊慌，就地一滚，两个都从峭壁上滚下，落在软绵绵的地上。他没有跌伤，怪兽似乎摔伤了，站不起来。他拿出砍刀砍去，心想砍不死它也要砍成重伤。谁知却是洪士奎站在他的面前直盯着他。他一惊，刚要问他从哪里来，一根大木头迎面飞来。他吓得闭眼躺在地上，大木头从头顶上飞过去，睁眼再看，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黑影由远处向他走来，走近了才发觉是林婉晴。他正欲上前，背后一阵响动，回头一看，怪兽又不知从何处钻出来。他想拿拐于抵挡，却是空手，想跑，两条腿软得不听使唤，吓得心都快跳出来，叫了一声就醒了。

四周漆黑，只有尹老头的呼噜声，还有不知是谁的磨牙声传来，他的心还在噔噔地跳。他想继续睡，但一合眼，怪兽就到他面前，睁开眼，又是什么都没有。他不敢合眼，半睁着眼躺着，闻着尿桶传来的臭味。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天大亮他才起床。吃完饭，他先把衣服泡在脸盆里用冷水泡着，然后去找洪士奎。洪士奎住的小房间锁着。问别人，都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他只好拿着被刺笆扯烂的衣服和针线去找值班的老刘头，好一边补衣服一边聊天儿。

老刘头人称"老红军"，据说当年在川北苏区当过张国焘的警卫员。负过伤，脾气变得很坏，爱喝酒，喝了就骂人，又没有文化，大字不识讥个。跟他一同参军的都有师级干部了，他还只是个营级。后来酒后打人致伤，判刑劳改，毕竟他有光荣历史，还是有几分优待，五十几岁的人，竟以年老为由免于出工，负责看守中队院门。这时候他坐在院门口的一张小马扎上，正用废纸卷烟，见王自洁来了，忙起身让坐。王自洁说："算了算了，你坐你的，我另外想法。"看见门口有一块半截砖头，就拿过来。老红军进屋取出一张旧报纸，垫在砖头上。他就面对老红军坐下，一面做针线一面把这两天所发生的事细细说了一遍。老红军边听边点头边抽烟，不时插上几句，最后他说："这上山打柴的事，要从小学，你是个文墨人，咋个干得了嘛！这上山，光有气力，吃得苦，还不行，还要懂行道。方荣国方老坎，原先就是这山里的人，认得各种草草，啥子野物药材他都认得，又跟守林子的老乡熟，经常拿粮票、纸烟给老乡，不但可以进去随便砍，有时候老乡还帮他砍好了，只等他背现成的。"

“他跟我一样是犯人，哪里来的粮票？哪儿来的钱买烟？未必他家里常接济他？”

“他是山区的人，有啥接济！是他认得药材，常挖些天麻、一朵云甚么的，交给洪士奎去卖。这回你夺了他的生意，他不安逸得很。”

“老红军，咋个是我夺他的饭碗？我连火门都换不到，是组长大人说的，中队长点名要我去。”

“方老砍干得上好的，队部咋会点名要换人？这里头怕是洪士奎挽的圈圈儿，也许他跟方老坎两个内伙子打架，故意要气他，才换你去。我看你还是找他下个话，辞了算了。”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一早我就去找他，没有找到。”

两人又闲聊了一阵，王自洁心里有事，不顾老刘头的挽留，又去找洪士奎，仍不见踪影，只好回到监舍，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休息天吃午饭，不像往日似的以小组为单位坐成圆圈而，而是各人打饭回到监舍吃。组长不知上哪里去了，大家乱哄哄地发泄对伙食的不满：

“伙房几爷子是搞啥子吃的！菜都不好生切，又不洗干净!”

“伙房几爷子只晓得吃，盐巴都不晓得放，寡盐没味儿的，这菜咋个吃？”

也有人不同意：“一个月才半斤盐，咋个怪伙房不放盐？”

事情关系到政府的供应，大家都不愿涉及。王自洁今年就要满刑，更不敢乱说惹事，只有闷着头咬嚼那些用白菜根切成的片片，一股苦涩之味难以下咽。这时候洪士奎推门进来，众人都低头刨食，有的站起来回陪笑让坐。洪士奎不屑一顾，两眼圆睁向四周横扫一圈儿，又看了王自洁一阵，然后压低声音说：“老王，你找我想必有事？”王自洁看他绷着脸，赶紧把碗放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洪士奎又说：“看来这里不好说，那就到我那里说嘛。”

王自洁跟着他走，心里琢磨如何开口求告，也想不出恰当的话。进了洪士奎的小屋，这间小屋他以前来过一次，原来单人床上在铺盖卷后面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不见了，而床旁边的小桌子上多了一个樟木箱子，上面挂着一把大锁。洪士奎在床上一坐，也不招呼王自洁。王自洁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心情十分复杂，觉得这次找洪士奎的难度不亚于见中队干部。真是“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只好试着说：“洪组长，我从来没有上过山，前天头一次上山就遇见老乡……”

洪士奎哼了一声，打断他的话：“你莫给我绕弯弯，想打退堂鼓？”

王自洁本以为他会用“刚上山没得经验，搞几天就熟了”这一类话来搪塞，不料他竟这样说，只好顺着说：“洪组长，不是我打退堂鼓，这两天的事，硬是不好说。还请洪组长高抬贵手。”

洪士奎冷笑一声：“啥子了不得的事！就是这么个事嘛，你都不管我的事，你的事我也

懒得管，哼！”王自洁几乎要绝望了，他却接着说：“你不说我也晓得，昨天十九队有人叫老乡放木料打死了，你娃怕了。其实这算个啥？劳改队死人是常事，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人死了，衣服也好，东西也好，啥子都没得了。其实放木料打死还痛快些，要是叫老乡抓到，哼，这是啥子地方？解放前就是种鸦片的土匪窝，抓到砍木料的，一不送公社，二不送还劳改队，就在山上……哼！”

王自洁明白了，心也冷透了，好像掉进冰窖里一样，想说甚么，嘴唇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洪士奎看见他还下不了割舍的决心，又加上一句：“想通了就交给老戴，连背夹子砍刀一齐交。想不通，明天照常上山，我这阵还有点而事，失陪了。”

王自洁回到监舍，有的人躺在床上休息，有的打扑克牌，谁也没有理他。他也往床上一躺，用被子蒙住头，把自己和外界隔绝，想用这个办法暂时回到过去的世界。但那个界已经被这两天的强烈刺激撕成碎片。那刺激份外清晰，直逼面前，吓得他在被子里都微微颤抖。

过了好一阵，他才翻身起来，取出那条裤子，用手上上下下摸了又摸，摸到她缝过的部位，手指直哆嗦。那些细密的针脚异常清晰，突然之间又模糊了。他用手背拭去眼泪，然后双手蒙脸，头深深垂下，让带着温馨的布料最后一次接触他的脸颊。

第三章　别有天地

第二天，王自洁仍回到菜园组出工。收工后洪士奎送来五斤米。他收下后，又产生了把米退回去的愿里。这种愿望保持了好几天，他一直忍着饥饿不动那几斤米。一看到那装米的口袋就心痛，为自己可耻的软弱而责备自己。

不久，他又发现自己的软弱还不止此。这几天全队开大会，斗争吴顺庆。吴顺庆和他不是一个工区的，犯人之间不许串组聊天，所以他虽然见过这个穿着一身旧军衣的军犯，却不知他姓名。会上听人揭发，才知道几天前他在工地躲雨，时间长了出来在菜地小便，那块地里插着语录牌，被他尿湿了。马中队长听了汇报，当时一拍桌子：“狗日的要翻天了。”当天晚上下令先开小组会进行斗争。吴顺庆百般辩解，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于是又开大会，马中队长宣布：“给恶毒侮辱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戴刑具，白天晚上都不取下。劳改队里犯人有的是，少一个人干活儿不算什么。”他越讲越生气，朝吴顺庆的腿上重重给了几马靴，以宣泄他的愤怒。最后还大喊：“我们坚决要求有关方面予以严惩！”于是当场给吴顺庆上了背铐。这种手铐是把两只手紧紧固定在一起的土铐子，有别于两只手可以稍稍活动的洋铐子。把双手铐在背后，生活上极不方便。打饭的时候，王自洁看见吴顺庆用嘴巴咬住一只空碗，放到伙房的窗口，伙夫把苞谷馍馍放在他的碗里，再浇上半瓢水煮菜帮子。碗里已经放着一个馍馍，再浇上菜汤，难免要溢出来，因此菜不能给足。他用嘴咬住这只碗，小心翼翼地走到伙房台阶前，选准一个高度适宜的台阶，慢慢松开嘴放下饭碗，然后像猫狗一样把嘴伸到碗里去咬去舔，菜汤和泡软的苞谷馍馍糊满了半个脸，最后再用嘴咬住没有舔干净的碗回监舍去。所有的人都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他，怕碰着他那散发臭气的身体，更怕接触他那哀告无门的眼神。

一次，王自洁在他身后打饭，看清了那双铐在背后的手，手腕上被手铐勒出的血印已经开始溃烂，招来吮血的蚊蝇积聚。王自洁看了，心如刀搅。他很想为他做一点事，可是他不敢。他不敢说为什么，甚至不敢送去一个同情的眼色。晚上他总想，这个人晚上怎么睡？侧着睡就会有一条胳臂被压得麻木，只能脸朝下睡，大小便又怎么办？他无论如何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正如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发明这种办法的人如何会如此残忍。他越为吴顺庆难过，就越为自己的软弱而责备自己，反而把自己的事冲淡了。

半个月以后，吴顺庆不见了。戴组长说，已经把他弄到集训队去，准备加刑。后来洪士奎也不见了。老红军说他因为表现好，已经减刑提前释放，到八队就业了。这件事并未在大会上宣布，老红军也只是听别人说。王自洁满刑本应在王自洁之前，现在却落到了他后面。不过再有一个月，他也该满刑了。虽说刑满后不过留在农场当一名就业人员，但在一般犯人看来，就业人员的身份总比犯人略高一等。他也是这样想的，而且因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似乎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件大事。既然是件大事，就应该有些特殊的地方，标志着这一天是不平凡的一天。他极力压制自己的那点儿激动，做出与往日并无不同的神态，同时又盼望着不平常的事情出现。当然，刚判刑时的幻想已经没有了。那时候他以为满刑的那天全队甚至全场要开大会，会场庄严，主席台上坐着中队、大队甚至场部的领导，宣读他的名字以后，他在其他犯人羡慕的眼光下走到台上，从领导手中接过证明书，握手，然后在掌声中高举证书走下台来。“观众”即同监们纷纷祝贺……经过几年的改造，他知道释放犯人并不开什么大会，也许只是中队干部找他个别谈话，鼓励他继续改造。“可是谁会找我谈呢，可别是马中队长啊！”他最喜欢用马靴和犯人“谈话”，不过宣布犯人刑满释放这件事，他总不至于踢人吧？　　终于到了这一天，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其他犯人也没有问他。他很想问一问管教陈干事，又忍住了。几年都过去了，还在乎这几天吗？忍一忍再说吧。

第二天，他到菜园挑粪，遇到马中队长正在农区巡视，嫌生产搞得不好，把组长叫来痛骂一顿。组长刚辩解了两句，更惹得中队长发火，说他摆“老犯”资格，又用马靴重重踢组长的屁股，吓得王自洁赶紧挑起粪桶就走，把想询问一下的念头吞进了肚子里。

又过了几天，一个晚上全队开会，听马中队长训话。从生产到学习，从组长阳奉阴违到犯人消极怠工，都遭到他的痛骂。直到快散会的时候，语气才平缓了一些，用一句话结束了训活：“王自洁今天晚上把铺盖搬到那边去。”——所谓“那边”，是在犯人住的大监舍外面的一间小平房，是五队刚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临时居住的地方。于是王自洁结束了五年之久的犯人生涯，成了一名就业人员。

住在小平房里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尿桶在屋里，晚上自己上厕所，不再受臭味刺鼻之苦了。

第一次在小平房过夜，他睡不着。他并没有择铺的习惯，而是有点而兴奋。五年来，她离自己实在是太远太远了，比在天边还远。只有在梦中，在幻觉中，她离自己才像过去那样近。虽说过去也只是在办公室见面，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很近很近，只要能看见她，那就足够近了。现在，那无限遥远的距离又缩短了小小的一步。虽说不能离开这里直接到洪江县找她，更不能重新回到办公室对面而坐，但是他可以打听她的下落，能够知道她的一些情况，那就是对他的最大安慰。也许还能通信呢！渺茫已极的希望像星星之火重新燃起，像困在孤岛上的遇难乘客看见海天交界之处有桅杆出现一样。

因此，当队部宣布休息一天，他鼓起勇气找到管教陈干事，说自己想到建阳赶场买点儿

东西。陈干事对他说："你去找中队长请假。"

他非常失望，知道没有多少指望了。可是陈干事既然这么说，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在马中队长卧室门口徘徊许久，始终不敢敲门。直到马中队长出来，他才战战兢兢地说："报告中队长！"马中队长眼睛稍微眯了一下，就有两道凶光射出，射得王自洁不敢正视，心里直发毛，进退两难，只好说："我想请假，赶建阳。"声音小得连自己也怀疑马中队长能否听得清。

马中队长倒是听清楚了，他只哼了一声："你还想赶成都哩！"王自洁以为他要给自己几马靴，赶紧溜了。直至他调离五队，他始终不敢请假。

后来管教陈干事通知王自洁，调到三大队。三大队所在地是玉龙山，下面有六、七、八、九共四个中队，他去八中队，可以搭汽车去。果然午饭后来了一辆给五队送化肥的卡车。化肥很快就卸完了，车厢里洒落的化肥也被马中队长吆喝犯人扫得一干二净。王自洁把柳条箱、背夹子、行李卷和脸盆等放在车厢的一个角落。汽车向山下开去，到了场部的总仓库前面，那里早有几个犯人在等侯。汽车一停下来，他们听从干部的指挥，从仓库里搬出一包一包的尿素往车上装。王自洁犹豫了一阵才加入搬运的行列，惹得司机颇不高兴。

化肥装好了，货车离开场都，向远方驶去，渐渐地场部被甩在后面了。坐在车厢化肥堆顶的王自洁，回头看五队的山坡茶园，只能看见圆形的山顶，队部和监舍都被起伏的山丘遮住了。"啊，别了，啊，再见。"他几乎要喊出来，五年，整整五年，整整五年啊！他怀着复杂的感情，注视着越离越远的元宝山。

汽车在山谷中行驶，山越来越高，汽车在碎石路上也晃动得越来厉害。到了一个四周比较开阔的地方，汽车停了下来，公路也到了终点。路旁有一大群人都背着背夹子在等候，汽车刚停下，就有两个人爬上车，一边一个把化肥袋托起，下面有人背着背夹字等候。王自洁也帮助卸车，不一阵化肥都卸光了，那两个人打扫车厢，把洒落在厢板上的化肥扫进背篼里。其中一个近五十岁的汉子，胡子巴茬，脸上的肉一条条楞起，还带有一块疤痕，他主动问王自洁："你是从场部那边来的？。

"从五队来分到八队。"

"好嘛，我们就是八队的。"

另外一个卸化肥的，有三十来岁，瘦得出奇，脸上灰黄，缺少血色，又像瞌睡没有睡醒，也来搭话："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的赖组长，八队的开国元勋。你叫啥子？"

"我叫王自洁，自己的自，清洁的洁。"

司机按喇叭，三人一同跳下车，背化肥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赖组长背起装了有一小半儿化肥的背篼，招呼瘦子说："廖胖娃，你帮新来的背行李。"又对王自洁说："老王，你拿脸盆、网兜就是了。"三人并排走下公路，上了小径。

王自洁看见这个被称作"胖娃"的人是个瘦子，有些疑惑不解：也许过去是个胖子，劳

改以后饿瘦了，外号却保留下来？于是又看了他几眼。走在中间的赖组长注意到王自洁的眼神，就说：“他名叫胖娃，其实从来没有胖过。六零年过粮食关的时候得了肝病。”

这时候遇到岔路，一条小路向左，另一条小路向右。他们向右走，和前面的人已经拉开了距离，可以看见前面的人正陆续通过山坡上的稀疏的漆树林，向上攀登。

赖组长在三人中靠前，他回过头来继续说：“那时候得肿病的人多，不止他一个。他总爱说：”总有一天老子要吃成个胖娃！‘后来就叫开了。“　　廖胖娃说：“赖组长你莫说，我廖胖娃硬是命大，虽说没有吃成个胖娃，总还是拣了条命。病号组那些人，到六二年只剩下我一个了。”

三个人不再说话，闷起头只管走。上坡路越来越陡，他们负担都轻，而前面背化肥的有不少人已经在原地打拐休息，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不断有人打招呼：“赖组长，走好！”

赖组长也满脸堆笑：“你娃娃又拖到后面了，二天看收拾你！”

有个老头儿同廖胖娃开玩笑：“胖娃，今天又该你吃安胎，这是哪个的行李？”

廖胖娃更高兴：“这是才从五队调到我们队的新同学。”

老头儿的头发已经花白，身材比较矮，脸上皱纹比赖组长多了一倍。他不像别人穿草鞋，而是穿一以半新半旧的解放鞋，裤腿扎得紧紧的，显得很精干。他本来在打拐休息，听廖胖娃一说，马上提着拐子跟上王自洁一行，带着笑容问：“你是从五队来的？”

王自洁赶紧说：“我从五队来，刚满刑。我叫王自洁，你贵姓？”

老头儿说：“我叫邓淑张。”

王自洁没有听清，反问：“邓书章？”

廖胖娃说：“他叫邓淑张，邓锡侯的邓，淑……”

老头儿打断他：“你娃娃就是嘴巴快，二天总要吃嘴巴的亏！”

赖组长也喝斥：“廖胖娃，走快点儿，光顾摆龙门阵！”

几个人继续往山顶走。土路已经没有，代之以乱石堆成的小路，再往上是凿在峭壁上的石径。一面是峭壁，岩石缝中伸出些树枝，似乎在阻挡行人。另一面是不算很深的渊谷，石径上有些小石子，脚下稍一用力就有小石子骨碌骨碌滚下去。石径很窄，不便打拐，走到这里，不但背化肥的人个个提心吊胆，连他们三个负担轻的也凝神屏气。最后连石径也没有了，前面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去路。大石头上有几个深深的脚窝子，每个人两手空着，把拐子夹在背夹子上，手和身体紧紧贴住大石头，步步踩稳，才能翻去。

一上山顶，豁然开朗。山顶上有几块平坦光滑的大石头，旁边又有几棵大树。大家都把

背夹子支在大石头上，找地方坐下，有的还用衣角擦汗。其实根本不必要，山顶上常年有风，初冬的风带着寒意，很快就把汗水吹干，把疲劳吹散。邓老头儿打了一个凄厉的口哨，在空旷的山顶显得份外响亮。

许多人围到王自洁面前，问长问短。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里，难得遇见一副新面孔，一旦遇见就觉得很新鲜。新面孔总能给单调灰色的生活带来一点儿色彩。王自洁能理解这一点，也就尽可能做出详尽的答复。赖组长却不言语，安静地听着，并且掏出纸烟来吸，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一个名叫江又安的小伙子嬉皮笑脸地向赖组长伸手："赖大组长，赏一根嘛，饿烟饿了好多天啰！"

再三哀求之后，得到半截剩烟，小伙子猛吸了几口才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又对正在欣赏壮丽山色的王自洁说："坐下休息嘛，站到做啥子！"

王自洁没有回答，继续观察：前面是凹凸起伏逐渐下降的荒坡，然后是一层一层的茶园梯田，再往前是一座耸起的大山，挡住了视线。他不由得感慨："好大的一座山哪！这茶园怕有一两千亩吧？"一个一直保持沉默的"眼镜"说有一千六百多亩，赖组长说原来有两千亩，后来有些地方距离远，就抛荒了。江又安说："抛了好，难得爬坡！"

休息了一阵，都感到有些寒冷，于是陆续起身。下坡速度快多了，打拐次数也少得多。

黄昏时分，才走到队部所在地。队部的建造形式和五队差不多，最上面是会议室和干部宿舍，还有仓库、小伙房和厕所，斗士清一色的砖瓦结构，石台阶，四周有许多高树。背化肥的人都把化肥背到仓库入库。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吆安排。王自洁随着赖组长和廖胖娃走下十几层台阶，穿过用三合土筑成的院坝，来到就业人员的宿舍，几间大屋子紧挨着，都是茅草为顶，粘土筑墙，赖组长吩咐王自洁把东西放在宿舍墙边，自己上队部报告。廖胖娃放下王自洁的行李。急着打饭去了。

过了一阵，赖组长下来对王自洁说："队部说你就在我们这个组。晚上你到队部去，指导员要找你谈话。"然后就帮王自洁拿行车，向左边那间大茅舍走。一进门，里面昏暗，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阵，赖组长把大铺上的被盖挪动了一番，挤出一片长方形的面积，把王自洁的行李杂物放在上面，然后说："老王，你把碗筷取出来，我帮你打饭。"

趁着空闲，王自洁慢慢端详四周，觉得和五队差不多，仍然是用许多柴棒和篾条绑成床，上铺谷草。这些床在房子里靠墙摆成一圈儿，房子是长方形的，中间狭长的空地上并列着三堆柴火，墙上挂满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破衣服、破斗笠、旧铁锅，等等。茅舍上部也是熏得漆黑。他把行李卷打开铺好，又把床下的杂乱东西如锄头、镰刀、烂鞋、脸盆、木箱、纸箱等整理了一下，腾出地方放自己的背夹子、柳条箱、脸盆等物。这期间不断有人端饭进来，看见王自洁忙于收拾，都不和他说话。

一会儿赖组长端着两个碗进来，一碗递给王自洁，另一碗是他自己的。除了苞谷馍以外，还有一份盐渍的腌菜。这时候邓淑张也端饭回来，就对王自洁说："欢迎新同志，请吃老梭边。"王自洁吃了一口，觉得虽然有点儿盐味，但味道并不比水煮菜帮强多少，就问："你们常吃这个吗？"其他组员都说："那当然！"江又安说："劳改队，不吃老梭边又吃啥子！"

王自洁三口两口刨完了，他惦记着指导员找自己谈话的事，虽说这种谈话大概是例行公事，凡是才调来的就业人员总得谈这么一次，不会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多大影响，但第一次印象也很重要，如果能给队部一个好印象，说不定将来能准他回洪江县走一趟，那就是实现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了。

爬上十几层台阶，到了队部门前，他挺胸站直，理了理衣服，又用右手五指梳了梳头发，然后喊："报告！"立刻有声音传出："进来！"他推门进去，眼睛为之一亮：墙壁雪白，干干净净，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上联是："革命委员会好"，下联是："四川很有希望"。办公桌上的煤油灯把不大的房间照得很亮，和茅草屋里的黑暗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指导员年约五旬，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褪了色的旧军服，满面红光，身体稍微有点儿发胖，开口问：

"你叫王自洁？"

"是。

"上海人？　　"是。

"家里还有啥子人？"

"还有一个姐姐。"

"有没有来往？"

没有回答。

"互相通信不？"

"不通信。"

"你原来在哪个单位？"

"在五队。"

"判刑前？"

"洪江县办公室。"

"犯的啥子罪？"

"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答案他在路上就想好了，他不能按县公安局局长根据县委刘书记的意见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说自己是"强奸未遂"。那样不仅是对自己的侮辱，更是对她的侮辱。指导员并不

深究，转而又问："来到八队，有啥子想法？"

"继续改造思想，听管服教，靠拢政府，积极劳动，争取光明前途。"

指导员显然对这一套改造八股不感兴趣，把话题一转："到了就业队，在新的环境下要特别注意，不要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最近我们三大队就有个别就业人员在这方面重新犯罪受到了惩罚。我们八队也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学习，吸取教训，你要引以为戒。"停了一下又说："你就分在一工区三组，工区干事是周干事，以后有啥子事向周干事报告。"

看来谈话到此为止，要下"逐客令"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而且指导员看来还比较和气，于是壮起胆子说："报告指导员，我有个请求。"

指导员努了努嘴巴，意思是准他说下去。

"我的请求是：如果今年冬天有空，请指导员准我个短假，到洪江县走一趟。"

"洪江县有你啥人？"

他把早就编好的一套说出来："我有两个妈，在上海的是后妈，已经死了；我的亲妈还在洪江县。她跟我爸离婚以后，一直在那里。"说完以后他觉得自己脸红了，他注意观察指导员的表情，想从那里看出他是否觉察自己在说谎，然而指导员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只是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一般不准假，请假的事以后再说。"

指导员似乎并不知道这全是他拙劣的谎言，其实他只有远房亲戚在他的故乡，所谓"亲妈"，不过是他下乡的时候把院子里一个经常照顾他的孤老太婆叫做"干妈"罢了。不要说正式档案上没有记载，而且公安部门一个电话过去，公社革委会马上会据实相告的，幸而指导员根本不打算办这件事，也就不去深究。

晚上开小组会，二十来个人围在火堆前，天气不算太冷，只有几个人把茶缸放在火上。里面或者是挂面，或者是四季豆，却没有煮大米的。

赖组长先开口："最近七队出了一件事，大家都晓得了。"

一个瘦子，脸黑得能刮下煤灰，打断了组长的话："都晓得，咋个我不晓得呐？"

邓淑张劝阻他："刘富义，莫打岔，好生听到！"

组员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赖组长继续讲他的，二者综合起来，王自洁才弄好楚事情的大概经过：七队的孙大旺和附近和平公社的一个女老乡"好"上了，已经有一年光景，终于叫她的男人抓住了，男人和他的几个弟兄先把婆娘捶了一顿，对于孙大旺，则把一个半尺长的木棍强行从肛门深深塞入。孙大旺忍痛爬回队上——他根本无法走路——找卫生员说肚子痛得厉害，送到场部医院开刀才取出来。

众人纷纷表示不满，刘富义唾沫四溅，义愤填膺："这些狗日的老乡，做事太寡毒！"

江又安说："就是，太可恶了。"

黄疯儿也说："狗日的硬是坏！"

连很少说话的韩大学也摇头叹息："咳，太不像话了。"

赖组长接着说："听农区的老洪说，孙大旺住院，那个女的还拿些鸡蛋挂面去看他。"

正在议论，工区干事周干事来了。他是个转业不久的军人，只有二十几岁。他一来，众人都不说话，有的拨弄火堆，有的揭开茶缸盖子看煮的东西熟了没有。煮挂面的索性吃起来。赖组长满脸陪笑，站起来说："周干事，我们正在讨论孙大旺的事，大家都说要和他划清界限，批判他的犯罪思想。"

周干事眉毛一竖，马上纠正他："不是自犯罪思想，是犯罪行为。"

"对，对，犯罪行为，犯罪行为。"赖组长说："就业人员嘛，改造思想为主，嫖啥子婆娘！"

黄疯儿也说："就是，霉和尚要守和尚的清规，还想婆娘做啥子。"

这句话大得周干事的称赞，他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改造，不要一天到晚想找婆娘。老实告诉你们：你们找地富子女，那叫阶级敌人互相勾结；找贫下中农，是腐蚀革命群众！"他忽然发现刘富义根本没有听，而是专心一意在拨火，就指名说："刘富义，说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刘富义抬起头，眼睛瞪圆，牙巴一咬，一字一顿地说："这、些、阶、级、敌、人、就、该、好、生、整！"

众人还没有听明白他在说什么，周干事过了一秒钟先回过神来："啥子阶级敌人？啥子阶级敌人？"

赖组长脸都白了："刘天棒，你又在打胡乱说！"

刘富义从容一笑，振振有辞："他们都喊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不喊他是阶级敌人？"

众人忍不住想笑，又立刻敛起笑容，准备接受周干事的大发雷霆，谁知周干事反而叹口气："刘富义，幸好你是个文盲，你要是有点儿文化，光凭这两句话就可以判你十年八年！"他又对赖组长说："专门开他的会，看他还敢不敢吊起嘴巴乱说！"又补充说："如果态度不好，就给他加点儿温度！"

周干事走了以后，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赖组长说："刘富义，你娃听到了哇？说你是个天棒，你他妈硬是个天棒！今晚上你又咋个说！"

邓淑张也说：“你就是吃嘴巴的亏！”

江又安劝他：“你不赶紧检讨还等啥子？”

赖组长见他仍不开口，脸色一变，眉毛拧起，脸上的刀疤在油灯光照下显得发亮，他历声说：“刘富义！站起来交代！”

刘富义等了一阵才站起来，又偏着头想了一阵才开口说：“这个嘛，我的意识形态是有点儿问题！”

“啊！”众人惊诧地叫喊，赖组长还摸不准头脑，江又安站起来走到刘富义跟前，端详了一阵：“耶，看不出来你娃娃硬不简单呐。”

一贯沉默的赵排长笑着问：“你懂得咕叫意识形态？”

刘富义咧开大嘴笑了：“学习了这么多年，未必还没有点儿提高？”

众人点头称许，韩大学也说：“在这里头关久了，人硬是要变。”

只有赖组长叹气：“刘富义，不是我咒你，你二天不吃嘴巴的亏，我把赖字倒起写！”

第四章　武斗

洪士奎比王自洁早到八队几个月。他觉得很不如意。虽说一来八队就在农业组当组长，可是这个组长没有多大搞头，比在五队差远了：白天要抓生产，分配任务，检查质量，关键农活还得带头；晚上主持开会，还得常上队部汇报生产学习情况。刘中队长学习去了，指导员兼任中队长，什么都抓得很紧，简直得不到片刻休息，心里颁透了。

这天是个休息日，一个组可以准五个人去兴隆公社——文革开始改名为东风公社，但是没有人那么喊——赶场。如果是月初发钱后的第一个赶场天，请假的人很多，五个名额还不够分配，谁去谁不去都由他说了算。他自己往往不去，只托组员们买些东西。其他日子休息，请假的人少了，他才去。这样做是因为赶场的人少了，东西会便宜些。今天他去赶场没有什么事，不过是散散心。出发得晚，走得也慢，刚下到半山坡，在一条小路的岔口附近，碰见一个人从下面上来。仔细一看，还是个女的。从外表看，快奔四十岁了，但肯定不是女社员。女社员都比较矮，而且用布包头，所以她一定是就业人员。她们往往显老，估计不过三十来岁。她背一个背篼，慢慢上来，看见洪士奎，就先打招呼：“你是五队的洪组长嘛！”

洪士奎也认出她就是女就业队号称“一枝花”的刘淑珍，心里一下子涌出些突如其来的欢欣，笑着说：“你是女队刘淑珍嘛，咋个到这边来了？”

刘淑珍没有立即回答，喘着气卸背篼，洪士奎赶忙接过来轻轻放在地上。近处有一块石

头，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刘淑珍乘势坐下，把鞋脱了，这才说："你们这边的路硬是难走，把我的脚都走肿了。"

洪士奎把军干服理了理，站在她对面说："就是，场部那边路要平坦些，不像这边都是泥巴土路。幸好没有下雨，不然才恼火。"

刘淑珍问："你好久到这边来的？"

"我这半年就满了刑，调到八队了。你男人在七队？"

"我们小许一向在茶房，昨年不晓得为啥子把他调到七队，来了就抡大锤打石头，累得吐了血，伤了身子，现在只剩半条命。这阵女队活路不忙，我请了三天假过来照顾他。今天赶场，去给他买了点草草药。"

洪士奎很同情她："我是说嘛，咋个你男人不赶场，你从远处来，倒叫你赶场买药。"

两个人说了一阵，刘淑珍起身说："耽搁不得，我该回去熬药了。"

洪士奎说："我多少还懂点医，我上去帮你看一下，看是个啥子病。"

"这样咋个要得，你还要赶场买东西，这阵还没有散场，还来得及。"

"我赶场没得啥子急事，是赶耍场，还是帮你去看一下病。"说完背起背篼就走。刘淑珍见他如此热情，倒不好硬性拒绝。看他那整洁的军干服和白净的脸，觉得有这么个人陪着走也好。

两个人边走边聊，越说越投机，到七队不过十来里路，竟走了两个小时。

从此两人渐渐熟识，以后每次刘淑珍到七队来，总要顺便到八队来。次日洪士奎必定回访"小许"，帮她熬药或煮饭，顺便捎点儿腊肉或肥皂给她。

有一回洪士奎从七队回来，快到农区的时候碰到了王自洁。虽说王自洁早就知道洪士奎已经先到八队，但由于两个人一个在采茶工区，一个在农区，不论宿舍和干活儿，场所都相距较远，见面机会很少，他又不愿意再见到洪士奎，所以二人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相逢，他感到很尴尬，不知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洪士奎却热情地打招呼："老王，是你呀，现在我们又在一个队了。"

王自洁"唔，唔"地应付着，洪士奎见他态度冷淡，并不介意，关心地说："我们是老乡，原先又在同一个队，今后还要互相多多关照。常言说得好，出门靠朋友嘛。"

王自洁无法再沉默，只得说："那好嘛，二天我有困难一定找你帮忙。"

"那好说，好说。我这个人是最肯帮别人的，你有事尽管找我。那现在在农区当组长。"然后他又把嘴巴凑近王自洁的耳朵，小声说："我现在正在向队部请探亲假。"

王自洁出于本能，把头偏开一些。他是最不习惯交头接耳的，特别是对洪士奎，有一种自然产生的厌恶感。可是“探亲假”三个字打动了他，他眼睛一亮，态度也柔和下来。洪士奎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继续说下去：“可能过了年要准我回洪江县走一趟，办回去上户口的事，劳改队我他妈的硬是呆够了。”他把头离开王自洁一些，声音也大了起来：“婆娘找不到，连娃娃都耽搁了。”王自洁心里一动，冲口说：“二天你要走之前，给我说一声，我找你有点事。”

当晚王自洁很晚才入睡。天快亮的时候，身体不知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猛醒过来，还有几分迷迷糊糊，听得满屋噼啪扑通的声音乱响，震得地动山摇，还夹着大喊大叫以及呼痛的声音、锅盆瓢碗滚落地上的声音，他急忙翻身起来，脚刚踏地还来不及穿鞋，就被重重地踩了一下，听得几条粗嗓子大喊：

“劳改娃娃快滚!”

“打狗目的霉和尚!”

“玉龙山是我们的!”

又有人喊：“滚你妈的!”

“杀出一条血路!”

屋里一团漆黑，他睡的地方靠近窗户，他打开窗户，外面射进一丝亮光，照见屋里人影来往。一个黑影手里不知提着什么东西正照着他打来，他立惊醒，从窗户翻出去，跌倒在台阶上。里面“通”地一声，有东西砸在床上。他顾不得光脚天冷，朝队都跑去。一口气跑上十几层台阶，跑到最近的指导员宿舍，刚要打门，门已经开了，指导员一边扣纽扣，一边往外走，脚上趿拉着一双鞋，腰里掖着一支枪，看见有人，又从裤兜里掏出手电筒照，见是王自洁，就厉声问：“下面有啥子事？”

王自洁一面喘气一面回答：“老乡……打……打进……来了。”

“哪个老乡打进来了？”

“报告招导员，好多老乡不晓得为啥子事情打进来了。”

指导员听了，就去会议室，王自洁也跟在后面。这时候周干事也来了，指导员厉声问他：“老周！你刚才在哪里值班？”周干事说：“我正在上厕所，听见下面有响动，就赶紧过来了。”指导员说：“你赶快下去，叫他们不要打了。”说完就推会议室的门。那门是虚掩着的，指导员举着手电筒进去，拿起电话：“喂，喂，我是八队，要管教股，是，是。”回头看见王自洁还在门口站着，就呵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快下去!”

王自洁无处可去，脚上又没穿鞋，冰凉的，就坐在门前石阶上，把脚轮流捂在腿弯处取暖。

这时候下面所有宿舍里都乱作一团，叫喊的声音、撞击的声音、杂乱的脚步声混在一起，其中周干事的声音特别响亮："不要打！不要乱打！"

大批就业人员跑到院坝里。队部也乱了套，家家都亮起了煤油灯，婆娘娃娃都跑出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干部们纷纷下去劝阻。指导员一个劲儿地喊："不准乱打，我们是公安干部！"管教邓干事也大声呵斥："不准到监狱捣乱，警卫连马上就到！"

五六支手电筒晃来晃去，一场混战逐渐停止，老乡们手提锄头、柴棒逐渐撤退。就业人员纷纷从宿舍出来。有的坐在地上呻吟，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只有刘富义还提着拐子走来走去，到处说："老子今天打得安逸。三个阶级敌人叫老子打得乌鸡呐喊的，硬像在打铁托！"赖组长也说："老子在暗中，一个扫堂腿扫倒好几个人。要依着老子当年的脾气，早用砍刀送他几爷子上西天了！"

这天上午没有人出工。饭前饭后都在用最恶毒的话写老乡，也不断传播小道消息。三大队的教导员来了，大队长、大队管教来了，场部管教股长来了，最后公社武装部长也来了。结果是邓管教叫受伤的到医务室包扎，大家回宿舍整理东西。一个受伤严重的，准备送到场都医院治疗。赖组长自告奋勇，把伤员放在背夹子上背往医院。就业人员见东西有的打烂，有的踩碎，有的弄脏了，都向干部诉苦，说碗打烂了，筷子不见了，锅也踩扁了，没法吃饭了；有的说被盖扯烂了，没法盖了；还有的说茶筐都踩烂了。干部说，茶筐坏了，再编几个就是，闹啥子。指导员对大家说，不要乱闹，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乱哄哄的，直到吃午饭时才平息下来。

下午出工，周干事指定邓淑张临时代理两天组长，搞好生产。邓淑张说："这有啥子，现在翻地，一人一把锄头挖，最后用竹竿丈量长度就是了。"王自洁的锄头有点儿松，邓淑张就帮他修锄头。工地休息的时候，大家自然提起老乡的事，邓淑张叫大家莫提这件事，说是指导员说的。于是改变话题，江又安问赖土匪要过几天才能回来，黄疯儿说："你当面喊赖大组长，嘴巴像抹了蜜一样，背过身就喊赖土匪，硬是个两面派！"江又安说："他本来就是个土匪嘛！"邓淑张笑眯眯地裹叶子烟。众人又说他能当三天组长，也是祖坟上栽了棵弯弯柏树。江又安却说："他祖坟还不知在哪一方哩？要是他祖宗有灵，早把他推下崖了。"廖胖娃看见王自洁莫名其妙，就说："老王，你还不知道我们邓大组长的来历，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指手画脚地说开了。

邓淑张原来姓张，解放前从外地到建阳县这一带做生意折了本，无法回去，连谋生都有困难。为了有个安身之地，做了当地的上门女婿。当时此地风俗，凡是上门的要改姓女方的姓，名字的头一个字要用女方名字的头一个字，自己的姓则成了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他原来姓张，女方邓淑芬，他就根据当地规矩，改名邓淑张。廖胖娃还说，上门的时候，要写卖身文书，王自洁又吃一惊："卖身？"廖胖娃不顾邓淑张的阻拦，一口气背诵："小子无能，祖宗无德，流落他乡，衣食无着，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立约人某某情愿与邓淑芬脚下为婚，上山砍柴，下河背水，如有逃跑，乱棒打死，死而无怨，告官无效。"

话音儿刚落，黄疯儿忍不住笑了起来。众人也笑得前俯后仰。王自洁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刘富义说："好哇，你娃连祖先都骂了，你祖先能饶你？"邓淑张自己也有点儿忍不住，故作正色地说："快做活路，光晓得耍嘴皮子，都说了几袋烟的工夫啰。"于是各人又举起了锄

头。

赖组长从场部医院回来，本来可以直接先到队部报告的，一看时间还早，又有点儿口渴，就先到本组所属的一个设在山坡上的养猪工棚去，想要点儿水喝，歇歇脚，顺便察看一下养猪的情况。

走近工棚，看见一个年轻的女老乡正和住工棚的徐晓丹抓扯。女的说："你丢开手嘛，拉到我做啥子？"徐晓丹一只手抓住背篼不放，另一只手紧握住女的手腕说："你把背篼放下，你们这些人天天到工棚偷菜。你们偷了，叫我们吃啥子？拿啥子喂猪？"女的涨红了脸，一面挣扎一面说："我是在上面九队拿的。"

赖组长走过来，看了那个女的几眼，就说："算了算了，就是几窝白菜。"又说那个女的："李妹，在九队拿的也好，在八队偷的也好，反正不是你自己种的。这回放了你，二回不准再来偷。"那个女的却说："真的不是偷你们的，是九队刘金娃给我的。"徐晓丹问："他给你的，他是你的啥子人？"女的羞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赖组长好说歹说徐晓丹才松手，女的背起背篼一溜烟儿跑了。

徐晓丹气冲冲地回到工棚，拿起斧头劈柴。他劈得很用力，一斧子下去，不是立刻劈成两半，就是木柴弹起很高。他专心劈柴，把赖组长冷落在外面。赖组长随后进来劝解说："老徐，你莫生气，我是为你好。你想，你两个抓扯久了，万一她想横了，给你栽一砣，说你调戏她，你又咋个说得清？"

徐晓丹仍不言语，照旧劈他的柴，过了一阵才说："赖组长，屋里坐嘛。"赖组长说："不坐了，有开水没得，我喝一口。"徐晓丹说："屋里小锅里有。"

赖组长进了右侧小屋，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一大一小。他揭开小锅的锅盖，拿水舀子舀了半瓢温开水，喝完走出来。

这时候徐晓丹的气才消了些，对赖组长说："组长，你看嘛，这些老乡硬是难缠得很。说是上山打猪草，其实只要你不在，她就偷瓜菜，见啥拿啥。尤其是这个李妹，莫看年纪不大，脸皮厚得很，软硬不吃，整死不认账。我在屋里劈柴，听见屋后有响动，走过去一看，白菜少了几窝。她见我出去了，还假装扯猪草，这里又没有另外哪个人来，不是她偷的又是哪个？"赖组长说："算了算了，老乡要偷，有啥办法。队部未必不晓得？他们当干部的都没办法，我们又能做啥子？前几年我在六队，挖红苕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十几个老乡，全是女的，就在你锄头下面捡，硬是不怕锄头把她手挖了。这些人你惹他做啥子？惹毛了，像上回，几十个人打进来，说这一片茶园原来是他们的山，叫劳改队占了，要把劳改队打起跑，咋得了嘛！"

徐晓丹说："我也不想找麻烦，队都喊我守工棚，对老乡我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干部总是说喂的猪长得慢，你想饲料又发得少，猪光吃草草不长肉，总得有点瓜瓜菜菜的才行。"赖组长说："将就将就，劳改队的事能做好多算好多，喂猪的工棚又不止你一处，几个工区工棚里的猪都差不多，不出大问题就行了。"然后又转了个话题："这个李妹经常来？"徐晓丹说："她只来过几回，有时候来要水喝。她常去的一九队。都说他和刘金娃有点儿瓜葛。"赖组长又问了一下喂猪的惰况，就起身告辞了。

第五章　神秘的失踪者

下雪了，茫茫白雪掩盖了一切，填平了小沟，堆满了凹坑，把一行行茶树变成了一条条蜿蜒的白色长龙。偶而有微风吹过，一团团白色绒球就飘然而起，然后徐徐阵落。纷飞的雪花布满天空，白茫茫的，连太阳也显得暗淡无光，简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干部们吃饱喝足，披上厚实的棉大衣，站在队部门口望着四周壮丽的雪景，觉得眼界开阔，心旷神怡，胸内充满了清新的空气，总想喊叫几声来表达内心的舒畅。可是喊叫究竟有失身份，就高谈阔论说明年茶叶会长得更好之类，或者干咳两声。他们觉得在这安静、空旷的山野中，自己的咳嗽声都显得甜美，都有诗意。霉和尚们则早已失去一切美感。这些来自盆地的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雪。他们因劳改而来到这座大山，第一次见到从前听说过的白雪，也曾为它的洁白而惊奇，可是很快就领教了这白色恶魔的厉害，惊讶称赞也就被咒骂所代替了。

全队有一半人去修公路。指导员在会上描述了公路修通以后的美好处境，最后总结说，只要把公路修通，一切都好了。可是刚出发就碰上下雪，多数人没有棉鞋，穿着单鞋甚至草鞋，里面用破布包脚，有的甚至连破布也没有。雪落在脚背上，化成冰冷的水，浸泡着脚尖脚跟。一脚踩入积雪里，立可产生被许多小针扎痛的感觉。脚不像手那样可以揣在怀里取暖，只能把它交给白色恶魔任意蹂躏。雪也落在脸上、脖子上，然后化成细流，流到背部、胸部，让它们也分享一下挨冻的滋味。

稀稀拉拉的一行人在白色背景下排成成长蛇阵缓缓移动。背夹子上面是他们简单的行李，小锅和茶缸偶而碰出叮呤嘡啷的声音，好像为嘁嘁嚓嚓的脚步声伴奏。从前面不断传来提示注意非喊声：“这里有坑！”“这里有条沟！”脚印随即被新落下的雪覆盖。大地除了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以外，只有一片洁白。

队部和茅草宿舍渐渐被抛在后面，茶园间的小路越来越窄。挤过茶蓬的时候，茶树枝桠碰撞腰部，雪团纷纷落下，稍稍露出了茶树的本来面目。队伍蜿蜒而上，向山顶方向前进。风越来越大，挟着雪块向脸向脖子向脚胫向一切裸露的地方无情袭击。渐渐地，胸部、背部、小腿都受到寒冷的威胁。突然，“啪”地—声枪响，一只野鸡惊叫着噗楞楞掠空坠地。大家都知道这是邓管教又在打猎了。枪声没有引起惊慌或注意，只有王自洁抬头搜索野鸡看落于何处。走上山坡不到三分之一处，小路向右侧拐了一个弯，许多人在这里的工棚前打了一拐。这工棚实在太小，无法进去休息。它类似北大荒人所搭的人字型马架子，人在里面只能坐着或躺着。

吴跛子正坐在棚口编篾活儿。他偶而抬起头来看一看，痴呆的目光里没有什么要表达的内容。打拐的人也只是看一眼，停一阵就走了。尽管赖组长稍稍不同，也只是叹了口气，多看几眼而已。吴跛子当年曾是他的组员。他派他去割茅草。那些年茅草长得很深，有一人多高。他正在割草，大队长也正在提着猎枪寻找目标。早晨雾大，看见草丛起伏，以为有野兽出没其间，打一枪。吴跛子的绰号由此产生。以后就派他住这个工棚，编些篾活儿。

通过草棚以后，一行人直奔大垭口。雪天路滑，大家份外小心。赵排长不断招呼王自洁：“脚要打横，莫摔倒了。”结果王自洁没有摔倒，倒是廖胖娃上坡的时候滑了一跤，引起一阵哄笑。

下坡人人小心翼翼，提神屏气，一只脚踩稳了才敢迈另一只脚，还不断用拐子在前面探路，总算都安全下了坡。但没有沿着以往背化肥煤炭的小路一直往前走，而是向旁边拐了一个弯，来到一所住房前。这住房是三大间连在一起，占地面积很大，下面粘土筑墙，上面是瓦顶，房前有棵很大的核桃树，还有几棵不知名称的大树。大家都放下行李休息。

这时候已经是中午，雪也小了。黄疯儿从房子里出来，对大家说：“苞谷馍馍蒸好了，自己过去拿。”于是大家都进了堂屋。往右是间灶屋，馍馍就在锅里，但不是蒸的而是贴在锅边烙的，满满堆了一锅，个头很大，每个人拿了一个吃。不少人称赞说，还是黄疯儿对头，份量是给够了的。赖组长问：“李老三到哪里去了？”黄疯儿说：“他到两面山去了。他侄女到九队去了。”赵排长问：“他的侄女是哪个？”黄疯儿说：“就是你们喊的那个‘李妹’嘛。”

正说着，洪士奎来了。他穿着高腰胶鞋，衣着整齐，行李用尼龙绳捆好背在背上。他是很少用背夹子的。他放下行李，看了看室内，说：“这个地方还是满不错的嘛！放点炸药啥子的还是要得的。”赖组长和他谈了一阵关于修路的事，洪士奎看见周围的人都很注意听，更加兴奋，指手画脚地介绍队部做出决策的经过和今后的打算。说了一阵，大家又背起背夹子上路。只有洪士奎留下。他对赖组长说：“老赖，二天领炸药的时候再过来耍。”赖组长说：“到时候你要办招待呀！”洪士奎笑着说：“一定一定。”

一行人继续前行。山这边天气要冷些，雪积得要厚些，路很难走。小土坡全被雪掩盖，树枝上不断有雪块被风吹落，掉在人身上头上。前边的人不停地用拐子刨开积雪，露出光滑的石头。王自洁尽量降低身体重心，弯腰伏行，小心地保持平衡，无形中和前边的人拉开了距离，一时间他产生了错觉，好像又在重演铁索桥上那一幕。

未来的住地终于出现在眼前。一块平地上搭起临时帐篷——这是“先头部队”三天劳动的成果。仅仅三天，几个人只凭着手里的砍刀，没有其它工具，也没有任何其它材料，就盖起了可容纳上百人的茅舍，还有伙房和周干事的小宿舍。用粗细不等的树干插在地里做成墙，用较粗的树干做屋梁，较细的做椽子，用竹子破成篾条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一起，上面盖着厚厚的茅草。屋里用短木棒做床腿，长木棒当床板，门上挂上竹帘子挡风。屋里虽说黑一点，但不透风不漏雨，还用火把潮湿的土地都烤干了，床上也铺上了草，软软和和。王自洁惊叹了，这些被称作“社会渣滓”的劳改犯，有着多么惊人的才干呵！

头几天的主要任务是清除未来公路上的毛竹、灌木、荆棘、茅草之类，然后转入打眼放炮，要从悬崖上打出一条路来。一箱箱炸药、雷管、导火索，从场部用汽车运到公路终点，少量的背到工地当天使用，大量的就背到李老三那里，由住在那里的洪士奎负责登记、保管、分配。要用的时候由周干事开条子，洪士奎见条子发货，再背回工地。打眼放炮都是两个人一组，王自洁和赵排长分在一起，轮流掌钎和抡锤，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有一天快到中午，负责整个打眼放炮工作的六组组长魏兴贵跑来告诉他们，要他们躲一躲，前边正在装炸药，准备在中午点一炮。于是二人躲进附近的一个岩洞里。按规定，炮未放响要过半小时才能去查看原因，炮放响了，要过十五分钟才能通行。过了一阵，炮响了，

乱石纷纷从天而降，大石块之后接着是较小的石子从高空呼啸旋转而下，过了一阵，不见有小石子落下了，大家都没有手表，不知道过了十五分钟没有。赵排长说没事了，该走了。王自洁说再等一等。又过了一阵，赵排长说："我要先走一步，今天廖胖娃和我说好打平伙，昨天他从李老三那里买了一把挂面，还有一块腊肉，他工地远，叫我先回去弄菜，说是给我庆贺生日。"王自洁不好再拦，于是赵排长先走了。

又过了一阵，王自洁才从岩洞里出来。走到半路看见围着一堆人，走近一看，却是赵排长躺在地上，旁边有一滩血，脸上搭着一条浸血的毛巾，吃了一惊。不远处周干事正在组织人挖坑。王自洁问旁边的黄疯儿是咋回事，他说不知道。江又安说："一颗很小很小的小石子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正打在他脑门儿上。这种小石子飞得很高很远，下落的速度特别快。"正在说着，赖组长拿了一件旧衣服来，说是给赵排长换衣服。廖胖娃和王自洁接过衣服给死者换上，然后几个人把死者抬过去。王自洁默默地退出人群。

那边赖组长在说，他到了劳改队以后，修了多次公路，每次都得死一个人，路才修得成。有一年路已经修好了，也没有死人，可是头一天通车就翻了车，还是死了一个人。周干事说："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哪个喊他急到回来嘛！晚走一点有啥关系？看来还要加强安全方面的教育。"众人点头称是，只有廖胖娃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不断地说："这是咋个搞起的嘛！这是咋个搞起的嘛！"王自洁没有听见他的话。他正在擦去偷偷流出的眼泪。

历尽艰辛，公路快修完了，春节也快到了。周干事自然不愿意在这里过年，这很好理解；就业人员也不愿意在这里过年，就没有多少道理了。他们觉得这里不是他们安身之地，想回到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家"。那是家么？当然不是，那些留在原地管茶园的并不是什么亲人。虽然相处多年，可是众多的斗争会和日常争吵，使他们已经没有外面也早已不提的朋友之爱了。论生活条件，两边都差不多。这边晚上烤火所烧的柴还要多些呢！也许是那里的一切比较熟悉，因而有"热窝难离"的感觉吧。

队部自然更希望他们早点儿回去，要不然，一百来号人在这里过春节，放假三天，出了问题怎么得了。因而下了死命令，春节前必须完成任务，该休息的日子也不放假，所占的休息日以后再说。于是干活儿特别紧张，指导员也过来视察了好几次。

一月份发工资那天，每人领到了十元零七角。许多人去请假，说要赶场买叶子烟。周干事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真实用意是想买黑市粮，不然如何有气力背碎石铺路面？再三考虑，准邓淑张一个人请假赴离这里较近的和平场。说近，其实也有十几里山路。据邓淑张说，他认得那边住在山顶上的一家老乡，因是养蜂的，在那里能买到很好的蜂蜜。周干事托他带蜂蜜，其他人也纷纷找他代买。邓淑张在一张纸上画记号，标明叶子烟、红黄酒、鸡蛋、挂面、猪肉，乃至土儿瓜、四季豆之类。看见塞来的一张张钞票，听见求告和恭维的话，高兴得脸上放光，嘴笑得合不拢，不断说要得要得，看来比代理了三天组长还神气。

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一个大号背篼，放在背夹子上，腰里别把砍刀，在许多"小心点儿"、"早点儿回来"的嘱咐声中，兴冲冲地走了。

下午收工，不见邓淑张回来。天黑了，仍不见回来。别说就业人员，连周干事也着急起来。他叫六组的魏组长和一个组员去和平场打听，还把自己的手电筒交给他们使用。两个人走了以后，大家都无心学习，纷纷议论，托他代买物品的更是焦急。有的猜测说大概是喝醉

了睡在老乡家里，有的说恐怕买黑市粮让民兵抓走了。多数人觉得不大可能，但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不由得又往坏处想，又怕这样想，谁都不敢也不愿说出来。这种猜想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暗中流传。

有时候，一个本来持乐观态度认为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的人突然改变了脸色，就是受了这种影响。往日煮东西的、说笑的、躺在铺上养神的，现在全都在草棚外面站着，一会儿跑到山坡上看远处有没有手电筒的光亮出现，一会儿到周干事那里看有什么消息。直到十点钟，两个找人的人才回来。大家一看没有邓淑张，脸色都变了。俩人先要了一碗开水喝，周干事也来了，他们用手背抹了抹嘴，魏组长说："手电筒的电部用完了，我们摸了一段黑路才回来的。"

周干事收了手电筒，又问："你们两个是咋个打听的？"魏组长说："我们一路小跑到了场上，天都黑尽了，街上一个人都没得，家家都上了门板。我们敲门问了几家人，有的说不晓得，有的说快散场的时候看见他在面馆吃面。又找到开面馆的沈婆子，把情况说了。她说是来过，当时人多，那个霉和尚要了一碗面，背夹子就靠在面前，上头一个大背篼，里面装得圆鼓鼓的。我们又问他吃酒没有，她说没有。我们还问：他吃完了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她说是往西走。外面又到最西面那家代销店，叫开了门，买了几尺鸡肠带，才好开口问店主。他说是看见一个霉和尚，背着一大篼东西往西走了。问他是好久的事，他说快散场了，也就是三点不到的样子。我们想往西走也就是往我们这个方向走，就往回走。一路照电筒，没有看见啥痕迹，四下也没有啥人家，只好回来了。"

周干事阴沉着脸，过了一阵才说："这么说，他早就动身往回走了？"周围听的人都说："乡场一般都散得早，三点钟人都走完了，他不走还等啥子。"周干事忽然想起来："邓淑张不是认得养蜂的人吗？也许是买蜂蜜，回来晚就住在那里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都说一定住在那里了。养蜂的都住在山顶上，上下一趟很不容易。

直到第二天中午，还不见邓淑张回来，周干事吩咐赖组长带领出工，又布置了下半天的生产任务，然后自己去了和平场，也是天黑尽了才回来，自言自语地说："糟了，怕出事了。"几个组长先过来，周干事说他找了大队民兵指挥部还有街上负责治安的联防队，都说不知道。问明了养蜂人的住处，请他们带路，他们不肯去，只好自己去。好不容易找到了，养蜂的说，老邓一早来过，买了两斤蜂蜜就走了。这时候旁边已经围满了人，个个顿脚叹气，赖组长说这个年怕不好过了。

尽管不见邓淑张的踪影，活路还是要做，而且要赶时间。早出晚归，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虽说有些粗糙：路面极不平整，两侧水沟有些不通，陡坡处没有防护墙等等，但总算是完成了。一声令下，不过半天工夫，人走得精光，只剩下茅草棚还在风雪中守候着，默默地等待赶场人的归来。

盼望已久的春节来临了，大年三十儿照常出工，在山坡上铲草皮烧灰作肥料。光秃秃的山坡上处处冒烟。离收工还差一个多小时，赖组长和他的组员们看见本组工棚的徐晓丹背着背篼往伙房走，知道他是去领年货——猪肉、菜油和挂面——去了，也都往回溜。赖组长走在最后，回到宿舍，队部传下话来，叫各组派人到仓库领取烤火的焦炭。公路修通以后这才第一次领到焦炭，都很高兴。不过队部又说，要到明天大年初一才准烧，又叫组长上队部开会。组员们有的开箱子取出像样一点儿的衣服换上，有的张罗着借锅借切菜刀，也有的找出

扑克、象棋，打算厮杀一番。只有韩大学还是躺在床上看《工程力学》。王自洁觉得头发长了，就去理发室理发。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洪士奎穿着一身崭新的服装也来了。由于他是农区的组长，就有人问他今年杀的是哪个工棚养的猪，一个人能分多少肉。他没有回答。六组的傅莽娃问："今年过年，该不会知青又来比赛篮球吧？"洪士奎说："你放心，今年知青都回成都过年去了，没得哪个来分你的肉吃。"傅莽娃说："我就怕像过国庆那样，说是一人四两肉，结果只有三两多，几个知青假巴意思说来赛球，其实专为赛后那盆肉。"黄疯儿说："三四百人两口猪，一人也就半斤，最多六两。"洪士奎冷笑一声："要想吃好，怕还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理发理得很快，一个人也就是十来分钟的工夫。王自洁理完，就去伙房打饭。六个人一盆米饭，伙夫先把它切成六块，一人给一块，这叫做"牙牙饭"。菜不是老梭边，而是熬白菜，上面浮着几颗油珠，用筷子刨了一下，倒是没有菜根什么的。回到宿舍炭火已经烧旺，照得人人脸上红通通的。韩大学也不看书了，起来烤火。王自洁问赖组长："指导员不是说明天才准烧吗？"赖组长笑而不答。江又安说："队长这阵忙着打扑克，才没得工夫下来查呢，反正今天又烧不完，明天上午查的时候有炭火就行。"王自洁说："那我们就提前享受了。"众人都笑了，说劳改队一年到头就盼过年；过年再不享受，还有啥想头！

吃完伙房给的饭，趁着炭火各人纷纷开小灶。下挂面的最多，还有炒素菜的，也有煮腊肉的、包汤圆的。他们把几个月忍饥挨饿省下的钱全用在过年这几天上了。只有托邓淑张赶场带东西的人很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煮的。王自洁也是其中之一。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快活地忙碌着。不过眼睁睁这句话对王自洁不大适宜，他此刻正在床上半靠半坐，闭着眼睛回忆从前的美好时光，这也是一种过年方式嘛！

黄疯儿开了一瓶酒，和赖组长一起喝，还用二两菜油炒了两个素菜下酒。刘富义一个人占了往日学习时用来记录的长桌，把煤油灯推在一边。他煮了一块腊肉，用它下酒。他喝一口，吃一点而，再喝一口，又吃一点儿，喝着喝着，他开始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后来他又"哦哦"地哼叫。赖组长问他腊肉的味道好不好，他也不理，又猛喝了一口，像自言自语又像在回答赖组长："不……不，"他摇摇头，"这……啥子，那年……才好吃，老子……杀了一口猪……全家……吃……吃，那才好……吃。"他越说声音越，最后全身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韩大学叹了口气，说他又喝醉了。猛然刘富义站起来，指着韩大学厉声说："你狗日的……说……哪个？"众人一惊，王自洁也从甜蜜的回忆中醒来，望望刘富义又望望韩大学。韩大学却安坐烤火，纹丝儿不动。赖组长和黄疯儿也停止喝酒，回头张望。刘富义又偏偏倒倒地坐下，嘴里还在叽哩咕噜："是……老子杀的，又……啷个嘛……"然后又哭起来"饿慌了……妈耶……妈……唔……唔……"最后颓然倒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咕咕，只是声音太小听不真。赖组长说："硬是喝醉了。"

吃完喝完了，都去上厕所。外面开始下雪，地上铺了薄薄一层，屋顶茅草上也开始积雪。队部灯火通明，肉香随风飘来，伴随着吆喝划拳之声。回到室内，炭火渐渐熄灭。寒气从门缝逐渐深入。大家纷纷钻进被窝，时间还早，睡不着，都眼睁睁地望着桌子上那盏煤油灯发呆。那灯焰渐渐缩小，越来越小，终于熄灭了。然后又亮了一下，立即又灭了，然后又亮一下，如此明灭相间，分明是灯油将尽。韩大学若有所思，说了一句："这灯倒像我们的命运。"众人听了，默默不语，后来灯不再亮。一片漆黑中，从窗户映入的淡淡雪光，映出室内高高

低低团团黑影，似人似鬼。

大年初一，人们起床以后，都出门呼吸新鲜空气。雪已经停了，天色依然灰暗。在院子里站了一阵，身上寒冷，心里无聊，只好回宿舍，闲坐一阵。室内没有生火，仍觉得冷，又到院于里闲站或在门口张望。肚子饿了，咽咽口水。每逢休息，只开两餐，是老规矩了。直到九点半，才通知开饭。饭是六两一块的牙牙饭，菜是凉拌三丝：胡萝卜丝、白萝卜丝、白菜丝。莱切得很细，平日看不见的酱油、醋、花椒、红油海椒都放齐了，只是饭凉菜更凉，伙房说："饭早就蒸好了，罗事务长叫晚一点开饭，不要和下一顿相距太久。"许多人饿急了，端着碗就在雪地里吃开了。

回到屋内，队部通知生火。室内有火，才有点儿生气。昨晚没有把过年食品吃完的，又开始张罗煮东西。吴跛子拄着根棍子进来，众人很惊奇，问他咋个也来了。他脸和耳朵冻得通红，坐在床上烤火，过了一阵才说："我一个人在工棚闷了一年，平日也难得和大家说句话，今天过大年，反正老乡也不会来，我就一个人踱过来了。"说完又问："赖组长呢？"赖组长听见是找他，赶紧过来，满面春风地说："我在这里。"原来他正在二组看人下棋。吴跛子说："老组长好？"赖组长说："好、好，你过年好？"吴跛子说："有酒没得？我抿一口。"赖组长说："还有一点。"把小酒瓶递过去，吴跛子喝了一口，说酒硬是不错，掏出一包蜜蜂牌纸烟，给赖组长一支，自己拿一支在炭火上点燃吸起来。其他人围上来要烟，一会儿一包烟全散尽了。

吸了几口烟，吴跛子才说："你们最近听到邓淑张的事么？"大家都吃了一惊，问他听到了啥消息，他说："昨天下午有个老乡从我那里过，向我要水喝，外面两个人闲谈。老乡说，最近在和平场那边竹林里发现了一个霉和尚的尸首，看样子年龄比较大，颈项上砍了几刀，旁边还落的有挂面。你说不是他又是哪个？"这时候全工区的人都围过来打听，后来连二工区、三工区都有人过来听，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也说不请更多的事。有人向赖组长简易赶快向队部报告，赖组长说现在不是时候，还是等值班队干部下来巡查时再说。

大家纷纷议论，都说邓淑张死得惨，连年都没有过成。六组的魏组长说："唉，这里从前就是出鸦片出土匪的地方，杀个把人不当回事。"他们组的傅莽娃说："这回总要理麻一下，虽说是霉和尚，总是条人命嘛。"赖组长说："劳改犯，死了就死了，填个表就了事，他又没得家属，就是有家属又有哪个理你！今年到我们队打人的老乡，又有啥事？还不是算了。"众人听了都泄了气，摇头叹气，不再言语。

王自洁自始至终不吭一声，他想了很多。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想起早死不过一两个月的赵排长，也许两个月就算很久了，所以就把他忘了。再过两个月，大约这邓淑张也将被人们忘了吧。人为什么总是很容易忘记别人呢？这是人的本性还是劳改队的特点？

第六章　打平伙

春节过了不久，洪士奎请准探亲假的消息就传开了。劳改队本来生活单调，稍微有点儿新鲜事就互相传，何况这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还没有人请准

过短假呢。

韩大学一反过去的沉默，说这是个信号：不只是短假开始解冻，也意味着政策比过去放宽了。有家可归的人纷纷打听、议论，刘富义更是喜形于色。他从一九六四年满刑以后，就不断请假，干部说现在正搞四清，等过了四清再说。四清还没有结束，来了“文化大革命”，又说得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现在“文化大革命”说不定已经结束了，要不然洪士奎怎么能准假呢？他等了九年，也该快了吧？王自洁心里也很激动，他想找指导员说一下，又想这次只有洪士奎一个人，情况有点儿特殊，还是先找洪士奎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到了农业组宿舍，没有见到洪士奎，那些组员都说洪组长这几天忙得很，很晚才回来。他只好向副组长说明来愈，副组长说：“我原来不知道你们是老乡，也没有听老洪说起过。既然你们是老乡，我又跟老洪合得来，我就替他作主：明晚你们两个在你们组徐晓丹的工棚见面，有啥话当面商量。老徐这人我晓得，他平日不多言不多语的。要是在我们的工棚，这几天找他的人多，说话不方便。”王自洁说：“那就让你费心了，务必请洪组长明晚一定抽空来。”副组长说：“你放心。”

第二天他晚饭也没有吃，向赖组长请假。赖组长问他有啥事，他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出是约洪士奎打平伙。赖组长一听就明白了七八分，打平伙就不学习，这叫啥话，本待不准，看在洪士奎的面子上，就改口说：“早点儿回来，莫耽搁久了，学习中间周干事是要来检查的。”他说最多耽搁半小时，然后他就提着小口袋到了徐晓丹的工棚，看见徐晓丹正在给自留菜地施肥，就问候说：“老徐，这么晚还在种菜？”徐晓丹说过年耽搁了几天，莱也该浇水施肥了。“他又问：”这回你老婆来了住了几天？“徐晓丹说她们队只准了她三天假。说完忽然想起来，说：”你看我光顾说了，快进屋坐.“领王自洁进屋以后，王自洁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说烧柴和水是现成的，盐巴也有。王自洁看这工棚外面虽然简陋，里面却很干净，墙是用粘土筑成的，屋顶才换了新草，一共三间，左面是他睡觉的地方，中间堂屋堆放劈柴、工具、箩筐等杂物，还有几条长凳。右面是灶房，一半是切猪草的地方，铺设着菜板，另一半是灶台，上面有一大一小两口锅，墙上挂着肉、辣椒、葱之类。徐晓丹烧火，王自洁把口袋里的东西取出来，然后淘米、煮饭、切肉。饭焖好了，洪士奎也来了。他脸色白净，显得比王自洁还年轻。他见二人忙碌，也要插手。徐晓丹说：”只炒两个菜，不用那么多人，有我就行了，你们先到里屋坐下摆谈。“　　两个人进了里屋，里面只有一张方凳，洪士奎让王自洁坐，自己撩开蚊帐坐在床上，二人闲聊起来。王自洁先提到赵排长和邓淑张的死，发现洪士奎对此没有兴趣，想起“莫对得意人谈失意事”的古训，就转移话题，讨论起过年吃肉的事。王自洁说他不明白为啥今年每个人分的肉这样少，洪士奎笑了：“这你当然不知道了。这肉不但霉和尚吃，干部也要吃。过年三天顿顿要吃不说，每个人还要分肉。老徐灶屋里那块肉，就是指导员放在那里熏猪肉的。”看见王自洁有点儿惊奇，他又说：“其实元山茶场各队都一样，你在五队呆过，五队干部分得更多。马中队长每次要分一个猪头。”

“他爱吃猪头肉？”

“那倒未必，你猜一个猪头多少斤？”

“十来斤吧”

“告诉你，十八斤!”

“哪有那么大的猪头？”

“那要看你咋个下刀了。猪头价格便宜得多，在事务长那里结账的时候当然合算得多。”

王自洁笑着说：“那不成了大头猪了？”

洪士奎忽然正色说：“莫乱说。谭志云就是说了大头猪，马中队长赏了他几马靴！”

王自洁却不在意：“按说也是，建阳县每个月给他们发两斤肉票，比县上的干部多一倍。每次杀猪都要多吃几顿，还要另外分肉！”

洪士奎说：“不过他们开销也大，不但家属娃娃要吃，还要送些给犯人、就业人员吃。”

王自洁听了摸不准头脑，这时候徐晓丹进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口木箱当饭桌，从灶屋端出两盘菜：一盘辣椒炒土豆丝；另一盘是青菜炒腊肉，又取出碗筷，从堂屋拖来一条长凳自己坐。王自洁又拿出一瓶红苕酒，打开瓶盖说声请，三个人就吃喝起来。

洪士奎看见油汪汪的一碗肉，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酒下了肚，话也多起来，先说这回请假不容易，现在不要说一般组员，就连组长，甚至小厨房的炊事员都没有哪个能请准假。又说指导员托他买冰糖，罗事务长托他买奶粉，邓管教又托他办啥子事，他要办的事多得很。在洪江县的亲戚朋友多，这次都要去拜访。劳改队没有啥子好带的，木料、生漆不好带，只能带点儿茶叶、竹笋、天麻，才好开口求人办回家上户口的事。徐晓丹静静地听着，只是张罗添饭，王自洁不断点头，有时插两句，酒喝得差不多，王自洁站起来说：“我还要回去参加学习，赖组长只给我半个小时假。”洪士奎说：“这个老土匪硬是抓得紧。那我也走了。组里还有些事要安排。”徐晓丹也不挽留，只说二天有空又来耍，就去收拾碗筷。

两个人走出工棚，洪士奎问：“你到底有啥事尽管开口，我们又不是外人。”借着天黑看不清表情之便，王自洁鼓起勇气说：“我亲妈在洪江县，所以当年我主动要求分配到洪江县工作。我亲妈早和我爸打脱离，后妈在上海，上海又回不去，我想回洪江，当然这件事办起来有很多困难，好在我在洪江县还有个远房亲戚。”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端详一下看看洪士奎的表情，在暗夜中仿佛看见了那双怀疑的眼睛，这又使他犹豫了一阵才接着说：“她叫林婉晴，她男人就是县委书记刘卫国。”洪士奎插嘴：“刘书记我认得。”其实他不过在大会上见过几次罢了。王自洁又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解放了没有，托你费心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尤其是详细地址和工作单位，我再设法联系。你从旁打听就是，不要直接找本人。你懂得我的意思不？以你现在的身份直接去不好。”洪士奎说：“那是，我咋会直接去找他？”心里想，打听这点儿小事还不容易？用得着直接去找吗？看来这顿肉吃得松快。王自治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那两个人的姓名和从前的职务，洪士奎没有看，就直接装进衬衣口袋。王自洁嘱咐说：“揣好，莫整掉了。”洪士奎说：“老王，你放心，我们这些人做事情把细得很。”说完就走了。

王自洁正要走，徐晓丹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赶来，对他说：“老王，你刚才把啥子给他了？要小心，这个人狡猾得很。”王自洁说：“我晓得，不过这件事情没得啥子关系，老徐你放宽心。”徐晓丹说：“反正你当心就是了，莫看他当面说得好听，背后不晓得下啥子烂药，听说农业组几个人都遭他打了小报告的。”

他看着王自洁走远了，才回到工棚。

第七章　女儿国

春节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徐晓丹向队部请假到女三队看望他老婆郑言华。指导员准了他的假，叫他把假条给赖组长看，找人代守工棚。赖组长见了假条，觉得还是黄疯儿可靠些，就叫黄疯儿代管两天。徐晓丹交了钥匙，又嘱咐了几句才放心离去。

他沿着小径往大垭口走，指望碰上从九队返回的货车。经过吴跛子的草棚，坐了几分钟。吴跛子要给他烧开水，他说："不必了，我还要马上走，到大垭口看有没有货车。"吴路子说："这两天怕还没有车来，往年送化肥要到四月初。"徐晓丹点点头，又问他腿上的伤口怎么样，还痛不痛。吴跛子说："你给我的那些药酒我经常擦，现在平常不大痛，阴雨天还是痛，卫生员不肯开药，说没得啥子药能医。"说着说着眼圈地红了。徐晓丹安慰了几句，又说："转来我有空再来看你。"才与吴跛子告别。

快到大垭口，他特地转了一个弯，去看赵排长的坟。坟上已经长了一层小草，较陡的一面被雨水冲出一条小沟，写着"赵万胜之墓"几个字的木牌还插在上面，只是木牌的颜色已经开始发灰，心想该培点儿土，换成石碑才是。想起来心里难受，站了一阵，无可奈何，只得离去。走到大垭口，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吃自己烙的玉米饼子，边吃边等。不见有汽车经过双，就顺着新修的公路一直走。到了场部，天色已经昏暗，而且开始掉雨点儿。他不敢休息，赶紧爬山。到了女三队的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值班的夏婆婆正在纳鞋底，看见他就说："你来了？你们郑言华天天盼你呢！"他笑着反问："你咋知道？"夏婆婆说："这几天她有空就到我这里来，说是陪我纳鞋底，还不是估计你快要来了，专门来张望的？就是不晓得今天为啥子没有来。"徐晓丹说："那我走了，不打扰了。"夏婆婆叹口气，说："快走吧。"又自言自语说："还是有个家好喔！"

他进了院门，眼花缭乱：女就业人员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挽起裤腿洗脚，有的搛些枯枝在煮什么。几个小男孩儿跑来跑去，说着脏话。宿舍门口两个女的在吵架，也是满嘴下流话。旁边围着一群人。从宿舍里面也传出争吵喊叫之声，或者沙哑，或者尖刻。从外貌上看，个个身体瘦削，脸色黄黑，衣服虽不露肉，也都补丁摞补丁，除了头发长以外，看不出和男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里的女人，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又要做苦工，已经使她们把刚做犯人那时候还保留着的一点点女人味儿消失殆尽了。他走不多远，就有人招呼他："徐大哥，你过来了？"他一看，是刘淑珍，就问："看见郑言华了设有？"刘淑珍说："她在打农药，要等一下才回来。"说完就走了。徐晓丹只好耐心等，看见满院子的人个个粗野的样子，想着郑言华每天就生活在这种气氛之下，真是太不幸了。怪不得女犯队没有男干部，女就业队却有男干部，而且是主要干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也许会有男干部在这"女儿国"里犯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殊不知一般男人到了这里，根本不会有进了"女儿国"或"大观园"的感觉，只会联想到疯人院。每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都会引发争吵、告密、开会、打架，告密之多，告密内

容之琐碎可笑，甚至连一贯提倡靠拢政府的干部也都感到厌倦。他正在乱想，郑言华来了，未等他开口，她先说："你再等一下，我先到队都说一声。"就匆匆去队部了。

徐晓丹理解，她是去安排住宿的。女三队有几间屋子，专供就业夫妻临时居住，男的来了，俩人就在小屋里同住几天，如果许多人同时来，住不下，就得找外工棚的人换铺，和男人搬到工拥去住。

不久，郑言华满脸喜悦地来了。她手拿一把钥匙，说："分配我们住在一号房。"把钥匙交给徐晓丹，她自己回宿舍投行李。徐晓丹上楼开了门，进去以后先关好门，挡住看热闹的小孩，把背篼放在地上。门后面有扫把，把地扫了，把背篼里的东西取出来放在床前的小桌上，再将背篼塞在床下。听见有敲门声，赶忙开门，果然是郑言华来了，旁边是她的同伴范秀英。郑言华两只手各端着一个脸盆，里面是毛巾、肥皂、热水瓶及锅碗瓢盆之类。范秀英抱着被盖床单枕头往床上一放，徐晓丹说："谢了，每回都是你帮忙。"范秀英脸红了，低头走到门口，转身对郑言华说："郑姐，明天我还要求你一件事情。"郑言华问啥事，她说明天再说。徐晓丹问："你们老蔡没有来？"她说上星期才来过，说毕匆匆而去，连门也没有关。

郑言华又快铺好床，把晾衣服的绳子挂好，把毛巾都晾起来，把脸盆中的碗筷取出来想放在小桌子上，无奈上面已经有一团塑料布。他刚端了一盆水回来，见状赶忙把塑料雨衣挂在绳子上。郑言华说："塑料雨衣你留着穿嘛，下雨天割草，淋湿了要感冒的。"徐晓丹说："雨下大了我就不割了，不像你们采茶，下再大的雨，还是得采，那才容易感冒呢。"郑言华说："其实我很少感冒，要是淋点儿雨就感冒，三队怕全都成了病号，没有人出工了。"

说笑之间，郑言华取出小锅，从脸盆底取出些细柴准备烧水。你晓丹要插手，郑言华说："你走累了，还是歇会儿吧。"徐晓丹说："你出工更累，还是我来。"他把郑言华拽到床上去坐，自己取出挂面煮。郑言华坐在床上也不闲着，一面注视徐晓丹的动作，一面唠唠叨叨地指点。面煮好了，郑言华取出一小瓶泡菜，又拿出一个罐头盒，舀了一勺肉丁炸酱放在徐晓丹的碗里，自己碗里只放了一点点。徐晓丹问："你哪儿来的炸酱？"郑言华说："春节我在你那边过的，回来以后伙房把我那份儿肉给我，我就把它做成炸酱。这罐头盒还是胡玉兰送给我的。"徐晓丹边吃边问："胡玉兰现在还偷人吗？"郑言华说："咋个不偷！原先只偷茶房和机修队的，现在连基建队、机砖厂的人都偷。有人说她是'见人倒'，只要给钱，认不到的人都要乱来。"说完叹了口气，又说："其实这个人不坏，就是偷人的毛病改不了。"徐晓丹说："也难怪她，男人叫老乡放木料打死了，丢下个十来岁的女娃儿，一个月就那么十元零六角，不偷人拿啥子养活娃娃嘛！"郑言华说："三队有娃娃的不止她一个，也不是个个都偷人，就是偷也没有她那么凶。"徐晓丹说："各人有各人的情况。"

两个人刚吃完面，就有人来通知开会。郑言华说："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吗？"那人说："马中队长说的，要提前开。"说完就走了。徐晓丹问："哪儿来的马中队长？"郑言华说："春节后才从五队调来的，原先的陈中队长调场部了。"徐晓丹说："咋个女队净弄引起些男干部来当领导？"郑言华说："可能男的要歪些，管得住人。这个马中队长就歪得很，比陈中队长还歪，好些人都怕他。"徐晓丹说："听我们队王自洁说过，说他爱用马靴踢人。"

两人议论了一阵，郑言华就拿起小板凳出去了。徐晓丹把碗筷洗了，又在宿舍后面小山坡上的水池旁洗衣服。衣服上沾有牛粪，很难洗，肥皂很珍贵，不敢多用，又不敢用力搓，怕搓烂了，只好多用几盆水洗。这时候不断有喊叫声传来，他想去看看是什么事，又惦记着

没有开水喝，就去烧开水。

会虽然提前开，还是到往日散会的时候才结束。郑言华回来，脸色很不好看。徐晓丹说：“你今天气色不大好，琨是累着了，早点儿洗脚睡吧。”郑言华沉默了一阵才说：“都是女人，何必那么凶嘛！”徐晓丹问她说哪一个，她说：“还有哪个，张干事嘛！把胡玉兰弄来跪在高板凳上，叫她自己打自己嘴巴，骂自己不要脸。”徐晓丹吃了一惊：“自己打自己嘴巴？”郑言华说：“马中队长还骂她臭卖 x 婆娘，贱货，又嫌她打自己嘴巴打得不重，说‘我教你’，使劲煽了她一个嘴巴，人滚下板凳，脸都肿了。”徐晓丹听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弄得地板咯咯地响。郑言华要他轻一些，他也不理。过了一阵，气才消了些坐在床上，低着头，两手捂住脸，郑言华只好先睡了。

第二天出工，郑言华要到石灰窑出石灰。徐晓丹说：“这是个苦活儿，还是我来吧。”郑言华说：“我一个人在屋里也没有啥事，不如两个人一起去，早完早休息。”徐晓丹说：“还是你在屋里补衣服吧。”说完就捡起背夹子和背篼去了石灰窑。已经有两个女的在装石灰，都穿草鞋，里面衬着水泥袋纸，见他来了，都说：“老徐，你来了？”他说：“我替郑言华。”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说：“要是我们老张今天也来了，就好了。”徐晓丹在一旁等候，觉得叫很痛，知道这是石灰烧的，嗓子也呛得干痛，又咳不出来。那两个女的走后，他装石灰，眼睛被蛰得直流泪。离开石灰窑以后，才好一些。背到一个专门堆放石灰的草棚里，一个老婆婆一面记数，一面用锄头把散铺在地上的石灰归成大堆。到了中午收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一大半任务。两个女的因为走得慢，中间还要打一拐休息，才完成一半。

在回去的路上，他把衣服脱下来，把石灰抖净，把鞋上的石灰擦净。到了住处，郑言华已经把伙房的饭菜打来。有苞谷馍，有米饭，菜是煮南瓜。郑言华说：“饭是我拿米在伙房蒸的。”两个人你推我让，结果是各样各吃一半。郑言华见徐晓丹眼睛有点儿红，问他咋回事儿。他说可能是石灰蛰的。郑言华说：“把上衣脱了我看一下。”徐晓丹不让，说：“脱啥子，快吃饭。”郑言华过来，不由分说，动手解开他的上衣，见他背上红了一片。她的眼睛潮湿了，久久抚摸着他的背。徐晓丹说这样会着凉，才给他穿上衣服。

这时候有人推门。郑言华去开。进来的是范秀英。她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和一支钢笔。徐晓丹说：“你就坐在床上吧。”她说：“我站着就是了。我来打搅你们，想请郑老师帮我写一份状子。”然后就诉说起来。

她说话带着浓厚的山村口音，又颠三倒四，有时候还抽泣。郑言华不时插言安慰，最后说：“你这些情况以前也听你说过，不过没有今天这样详细。你先回去，我再整理一下，明天拿给你看。”

范秀英千谢万谢，又对徐晓丹说：“郑老师对我最好了，简直就是我加大恩人。又有文化，又肯帮人，心肠又好。”郑言华连忙拦住：“快莫说这些，快莫说这些。大家都是一样的。该帮忙就帮忙。”范秀英又谢了几遍，才走了。

徐晓丹说：“到底是咋回事，我听得倒懂不懂的。”郑言华说：“她是农村人，十八岁那年遭大队书记强奸了。她去告，反倒得了一个诬陷党员干部的罪名，判了三年。去年场部要放她回去，她父母来信喊她莫回去，说那个大队书记现在升了公社书记，她回去还要遭他夹磨。她想申诉自己的冤情，所以找我写。”

徐晓丹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你又不是不晓得，共产党从来不准翻案。五八年划你右派，你要是不向上申诉，还不得来劳教。"郑言华说："她老是哭哭啼啼找我。她确实是冤枉的，我咋好不帮她？"

一番话勾起徐晓丹的心思，低头沉默不语。郑言华见他后背在轻微起伏，也就不再言语，紧紧地挨在他身旁，握住他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似乎有股凉气从他身上传过来，一直凉到她心里。

两个人不收拾碗筷，呆坐了许久。郑言华说："老徐，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又有啥办法？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徐晓丹说："我看见范秀英，就想起我自己。那年我才十九岁，参加工作才两年，就遭冤枉了。这一冤枉就是二十年，人都老了，到死还得背个贪污犯的罪名。我硬是想不通。我要是贪污了一分钱，都不冤枉。"他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慢慢地感觉到肩膀上热呼呼的。他知道她在掉眼泪，接着是她断断续续地抽泣，终于引得他也哭了。轻轻的哭泣，把两颗受伤的心溶化在一起，直到出工的哨声把他们从带着些许温馨的痛苦里唤醒。

徐晓丹嘱咐她："我上工去了，你帮着范秀英写好。我们总要尽心嘛。"

他到了石灰窑，里面已经不像上午那样烫人。背了两次，任务就完成了。看见那两个女的离完成任务还差得远，又帮她们每人背了一趟。

回来的路上看见上小学的娃娃已经放学，正从公路上往院门走。其中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穿件新衣服，边走边吃糖果，旁边几个男都很羡慕，喊她她也不理。他认得这是胡玉兰的女儿，叫王永玉，就问她为啥不理同学。她也不回答，跑到夏婆婆那里，拿出一颗水果糖递给夏婆婆，还说："夏婆婆，你吃嘛，甜。"夏婆婆没有接，换了摸她的脸，问她："是你妈前天给你买的？"正在问，看见徐晓丹背着背夹子过来，就笑着说："徐老师回来来了。"又对王永玉说："快喊徐伯伯，拿糖给徐伯伯吃。"王永玉扭扭身于，嘟起嘴说："我不喊。我妈说男的都是坏蛋。"夏婆婆说："不准乱说，你徐伯伯是好人，不是坏蛋。"王永玉说："我妈说男的都坏，叫我永辈子不跟男的耍。"徐晓丹有点难堪，转念一想，自己这么大岁数了，难道还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就问她："那你们学校里的男老师、男同学都坏？"王永玉说："就是坏，男老师罚我站，男生问我要糖吃，不给就骂人。"徐晓丹说："你给他们，他们就不骂了。"王永玉说："我就不给，他们骂我也骂。我的糖给狗吃也不给他们吃。"徐晓丹笑了，又问："那你说，我哪点儿坏？"王永玉低头小声说："不晓得。"再问就不言语了。

徐晓丹辞了夏婆婆，回到屋里，把这件事当作一则笑话对郑言华讲。她听了脸色变得很严肃，眉毛几乎拧在一起，过了很久才开口说："我早就觉得奇怪，现在才有点儿明白。"徐晓丹要她说个明白，她说："先莫说这些，你今天累了，休息一下，我去弄饭。"

徐晓丹躺在床上，觉得背、脚都很痛，知道这是让石灰"烧"的，也不介意，只是想着王永玉一个小孩子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叫人寒心，也难以理解。

稀饭煮好，两人边吃边谈。徐晓丹要郑言华有空多劝一下胡玉兰，郑言华很为难："你

叫我去跟她说？现在队上哪个人理她？连小娃儿都晓得她是个卖货，见面就骂。就是队上那几个卖货也见不得她，卖石灰的见不得卖灰面的。”徐晓丹说：“我是叫你劝她，又不是要你和她同流合污。身正不怕影子斜，哪个又能说你个啥。”郑言华说：“那我试一下看。”徐晓丹说：“我发现这个人虽然男女关系上不检点，其它方面还是不错的，从来不打小报告，也不占别人小便宜。别人整她，她也不记恨。”

正说着，张干事来了。两人忙起身让坐。张干事看也不着徐晓丹一眼，却严肃地说：“郑言华，你出来一下。”徐晓丹一下变了脸色。郑言华无奈地看了徐晓丹一眼，只好跟着出去。过一会儿，郑言华回来，满脸愁容地说：“要我今晚上到二大队走一趟，送点水果给申大队长。”徐晓丹说：“大队部没得好远，你莫要不高兴，这说明张干事对你还是信任的。”郑言华说：“其实她对我还是不错的。原先王干事在的时候，我经常受批判，这半年张干事来了，再没有整过我。你晓得为啥嘛？”徐晓丹摇摇头。郑言华说：“她要我带书信给申大队长。你晓得有啥子好事！他们两个网起，我给他们传书带信，二天事情戳穿，我还跑得脱！”徐晓丹说：“那你找个借口推脱嘛！这些事情染上了要倒霉的。”郑言华说：“我也想推，又怕她不安逸，二天找我的岔子。今天先答应，以后我要想法推脱的。”又拿出一筒牙膏，说：“这是张干事给的，上个月还给过一块肥皂。牙膏你拿去用吧。”徐晓丹说：“不用，我用盐水漱口。”

郑言华背起背篼走了。徐晓丹在室内坐卧不安，总怕出什么事。一会儿觉得时间已经过得太久，一会儿觉得好像已经出了什么事。他想象她正在申大队长家里卸水果的时候，申大队长的老婆突然回来看见水果，问从哪里来的？说不清楚，申大队长就得挨骂，郑言华也得挨一巴掌，或者场部正好来人碰上了，追问一番，她能顺利地过这一关吗？一阵子想遭遇祸事，一阵子想遇难呈祥，出门望了几次不见踪影，急得直跺脚，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的稀饭还没有吹冷，管这些人的事做啥！”想起“这些人”的事，不由得联想他们平日总爱说就业人员思想腐朽，灵魂丑恶，堕落犯罪，不晓得这个通奸又算个啥？未必通奸还分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成？　　正在胡思乱想，郑言华喘吁吁地进来满脸笑容地说：“等急了吧？你自己先睡嘛！我迟早是要回来的。申大队长留我吃饭，我说吃过了，他拿了一包饼干给我，还有一块香皂。”徐晓丹说：“女人就是贪小便宜，二天总要吃亏！”郑言华收起笑容，正色说：“我不是占小便宜，如果我只带信，不要东西，她两个会咋个想？”徐晓丹说：“你这叫自愿下水，免生疑心，二天还是要设法摆脱。这些事，纸里包不住火！”

第八章　飘落的玫瑰花

开始采春茶，洪士奎才满面春风地回到八队。指导员看在五斤白糖的份儿上，没有追究他超假的问题。但是邓管教托他办的事情，却没有办成。他讲了一大堆困难，邓干事面带微笑听他说完，也没有说什么，就让他下去。他回农区，路过茶园，见王自洁背着喷雾器给茶树喷药，就走过去。王自洁老远就放下喷雾器迎上来。两个人就在给农药兑水的池子旁边站着说，不等王自洁开口，他先谈起回家的见闻感受。说自己很快就要回家了，大约是采了春茶就会放他。王自洁问：“你有那么大的把握？”洪士奎说：“那当然！我爸请派出所所长吃饭，所长在饭桌上满口答应。还说我也应该有个家了，你想这还有啥问题？”王自洁说：“那该恭喜你了。”他又问起自己托他办的事，洪士奎迟疑了一阵，才说：“事情有些不妙。我为

你的事，打听了许多人，才把情况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卫国叫造反派整得惨，又关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揭发了他老婆的三反言行，才解放出来，结合进了领导班子，现在是县革委会副主任。他老婆给剃了个阴阳头，挂牌游街，后来跳水死了。刘卫国现今又接了一个，是县剧团的演员。喂，我说老王，你咋个的，该不是打农药熏的？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下。”王自洁就地坐下。洪士奎说：“回家的事你莫怄气，格外找门路嘛。我回了洪江再帮你想办法。”说完就走了。

王自洁坐了很久，想不出个所以热，也可以说他根本啥也没有想，头脑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他问自己：“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他站起来看看，远处有几个人在忙着。他四顾茫然，又复坐下，回头看见喷雾器，提起来把农药倒了，然后呆坐着看那远山。

夕阳下坠，浮云不动，队部被几株高树遮掩，只露出屋顶。那是什么地方？洪江县还是建阳县？也许是上海？他一直呆坐着，直到有人收工路过招呼他，才跟着别人往回走，问他他也不理。

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才渐渐有些明白过来。他想象后来林婉睛的模样，想不出来，回忆过去的她，也只有一些连接不起来的残片。正当他为此而苦恼的时候，她却来了。

“小王，你好吗？”

“你在哪里？我看不见。”她的脸出现了。“看见了，是你。”

“你病了？”他睁开眼，是另外一张脸。“我帮你打饭，找卫生员”

“林姐，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这里冷得很。”

“你等着，我来暖你。”

没有声音。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还是没有回答。

“老王，饭来了，你起来吃。”

“我要找……”

“卫生员马上就来。”

“林姐，我在这里！”一切沉寂，她走了。

啊，她还在这里。她的手按在前额上，暖呼呼的。

他不敢说话，他知道只要他一开口，她和她的手就都没有了。

手还是不在了。

“哪里不舒服？张开嘴巴。”

“唔，这是谁？　　“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她又要走。

“林洁，你别走，你等等我。”

“我等你，你快来。”

“我一定来”

“快来！快来!”

“来了，林姐!”

呵！这是什么地方？这么黑！黑暗中，只有几团鬼火闪烁，鬼在哭在笑在吵在叫，鬼火又灭了。

“林姐，你喊我呀，喊我呀!”

没有回答。

“林洁，我这里也冷得很，又黑。林姐，我没有了，没有头，没有脚，没有身子。”

一个极低的声音：“小王!”

“你在哪里？”

“在你身边。”

“我怎么看不见你？”

“你没有了，怎么看得见我呢？”

“对呀，我没有了。”

“小王，我走了。”

“林姐!”

不知道什么碰了他一下，一切都没有了。他醒来，四周还黑，后来稍微有点发亮。他挣扎着爬起来，穿上鞋，穿过黑暗，开了房门。外面亮多了，路迹很清楚，凉气袭人，走快一点就不冷了。

“我这是往哪里走？”他问自己。几粒极小的雨滴落在脸上。

“别找了，你的林姐已经不在了。”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

“我就是那个叫王自洁的人。”

“那我是谁？”

“你谁也不是。”

“我才是王自洁。”

“你是林婉睛的影子。”

“影子？”

一颗石子绊了他一下，他差点儿跌到。

“你连她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

“所以才要找她呀!”

“她不就在你心里吗？”

“心？我的心在哪儿？”

“老王，这么早你走哪里去？”这是上山砍柴的人向他打招呼。

天亮了，可是雨也逐渐越下越大。他心里像有火在烧，烧得难受，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别人看见一定以为他是在找躲雨的地方。下了山，走上集镇的泥泞小道，突然被裹进一群奔跑的人群中。被他们推动者，簇拥着，身不由己地到了一辆拖拉机面前。他前面的人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拉的拉，拽的拽，后面的人拼命推他，挤他。他刚被稀里糊涂地拥上去，拖拉机轰隆轰隆开动了，在泥泞的土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所有的人都东歪西倒，互相挤轧，弄得他头昏脑胀，站立不稳。好不容易到了建阳县长途汽车站门口才停住。乘客们呼啸蜂拥而下，等到他最后下来，发现脚被踩伤了。

不大的候车室兼售票厅里挤满了人。烟味儿和汗臭味儿熏得他昏昏然。他弄不清楚自己

来这里做什么，只隐隐约约觉得这和“她”有关。在这些晃动的陌生面孔中他茫然不知所措。突然，他的手腕被一只有力的铁卡卡住，一个粗暴而又带着嘲笑意味的声音将他的幻梦震碎：“看你往哪里跑！”

徐晓丹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王自洁，简直不能相信：老王竟然会逃跑！他本来打算问问他想跑到哪里去？也许他会讲给自己听，反正工棚里现在就他们两个人。转念一想，如果没有隐情，他在大会上早就交代了，何必受那么多皮肉之苦？那么多人质问他，干部还用绳子捆他，要他回答，可他就是不张口。强迫没有效果，又改为诱导：“你想回上海是不是？想到上海享受是不是？”这样问几乎没有人响应，都知道他的老家虽然在上海，但是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什么人了。也有人问：“你想回洪江县找原单位上告是不是？想翻案是不是？”这也没有多少人附和，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过对判刑的不满，也没有写过翻案材料。最后还是周干事提出：“你狗日的想投敌叛国是不是？想偷越国境是不是？”由于这个问题太大，又是干部提出来的，没有人敢流露出怀疑，于是纷纷响应：“你老实交代！”“你装哑巴不得行！”“你跟林彪一样，都想当叛徒！”

他依然沉默。

由于正值春茶开采之际，要早出晚归，会没有开得很久。但是徐晓丹做梦也没有想到，周干事会把看守王自洁的任务交给他！周干事要王自洁和他同睡一张床，临睡前给逃跑犯戴上反铐，第二天一早开铐子。赖组长出工把饭带上来，然后安排他在组内采茶，晚上开完斗争会以后再由赖组长把他押送工棚。他接过钥匙以后很想问问周干事，为什么不像以往那样把批斗对象放在组内由小组来监督？但又不敢多嘴。后来想想，也许是怕他和同屋的人串通搞什么阴谋吧。按以往的逻辑，凡是想投敌叛国的人，很可能有同谋者。他死不开口，更说明他怕涉及这一点。那么，进一步必定要追查同谋者了。想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冷战。王自洁为什么一言不发？承认想回洪江县翻案或者回上海找亲戚不就行了吗？又没有真跑出去，承认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他真想偷越困境？　　二人相对无言，在黯淡的煤油灯下，他双目无神却又很平静坦然。问他喝不喝开水，他摇摇头；再问他要不要解手，他点点头。相跟着解手回来，再和他说什么他也不开口。徐晓丹累了一天，想早点睡，可是那样就得给王自洁早带上背铐，他又不忍心。又坐了一阵，自己呵欠连天，见王自洁也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就说：“时候不早了，早点儿睡吧。”王自洁没有什么反应，又说：“天气冷，你就莫脱衣服。你睡里面，晚上要起来解手，喊我就是。”于是把他的被子铺好，给他戴上正铐——反正也没有人来检查。这才吹灯脱衣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王自洁不想睡着。但他折腾了一天，实在太疲倦，还有些发烧，也很快进入了梦境。那些毫不相干的人物事件纷至沓来，光怪陆离，千奇百怪，却始终没有她的影子。后半夜他冷醒了，听着徐晓丹的鼾声，一个早已存在的念头成熟了。他悄悄儿爬起来，小心跨越过旁边那个疲倦的身躯，又小心地把脚伸进鞋里，轻轻地走到门前，慢慢开了门走出来，回过身去把门掩上。

外面雨还在下，但不是毛毛雨，也不是瓢泼大雨，而是山区极为常见的那种“日轻夜重”的雨。四周很黑，地面上的水洼反射出极弱的亮光，使远处的群山和树木显示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雨滴落在头发上、脸上和已经湿透的衣服上，冰凉冰凉。裤腿紧紧绷在腿上，很不舒服。他想扯一扯，可是手被铐着，只好作罢。为了防止踩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摔倒，他专门踩水坑走，反正鞋已经湿透了。

往哪里走？他当初没有想过，他只想离开，离开工棚，离开八队，离开“这里”而并没有同时想过要去“哪里”。现在他很容易地离开工棚以后，倒有点儿为难了。但他不能停下来，虽说徐晓丹决不会突然醒过来找他，他还是觉得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会降临。他只有不停地走，越远越快越好。

慢慢地，他发觉自己是在上坡，这是自然的事，比起走下坡路，上坡时滑倒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总是“人往高处走”。既然大脑没有就这个问题发出指示，两条腿就自然而然地作出了合理的选择。两条腿一直引导他走过了最后一片茶园，前面出现分岔，继续往上走，是许多比较高的土台阶。这是那些上山砍柴破竹子的人挖成的。往左侧，是青草封埋的小径。他刚往左走了几步，就滑了一跤，摔得不重，手铐碰在地上，因为是软土，也没有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立刻被雨声掩盖了。他挣扎着爬起来，还没有站稳就又滑倒，半个身子连同手铐都糊满了泥。他咬咬牙，忍住肘关节和膝盖的疼痛又站起来。可是鞋掉了一只，陷进泥里了。他索性光着一只脚走。雨还在下，小径越来越软，脚踩下去陷得很深，手腕被手铐勒得很痛，胳膊和肩膀被捆引起的剧痛和刚才摔伤引起的疼痛一齐发作，他终于不得不停止艰难的跋涉。

回头望去，队部的那一排屋顶完全看不清楚，但似乎又有点儿轮廓。他竭力睁大眼睛想看清周围的环境，可是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只好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擦眼睛，发现远处似乎有一棵大树。对，是棵大树，以前他曾经很偶然地去过那里，还记得大树下有一块黑色巨石蹲踞在悬崖上，下面就是黑水河的上游。大树的模糊身影给他以希望和勇气，他又聚集起力量继续行进。陷进泥里的脚要拔出来很吃力，但现在这样不会滑倒了。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来到大树下面，摸了摸石头，到处都是湿的，只有紧靠树干的部分比较干一点儿。他坐下来，任凭水珠由发梢顺着脸颊往下淌。雨好像下得更大了，但这也许是雨滴落在树叶上发出响声造成的错觉。天空还是那样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宁静，在密集的雨声里夹杂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他以为是幻觉，然而他仍然被这声音所吸引，站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本能地停住。那分明是奔腾的水声。

啊！黑水河！他稍稍弯腰，审视从水面反射回来的幽光，似乎有一股寒气沿峭壁而上渗透遍了全身。

他就这么安静地坐着，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觉得过了很久，也许并不太久，现在一切都说不清楚。发稍上不再满水了，伤病也稍有减轻，但他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过去”那里，而把“现在”忘了。自从他决心离开这个名叫“现在”的世界起，他就进入了那个名叫“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像“未来”那样虚无缥缈，至少对于他来说，那个世界非烟非梦，而是实实在在的。他的心到了那个世界以后，就把疼痛、潮湿、寒冷乃至于恐怖之类的问题交给身体去处理了。

黑暗里逐渐闪出亮光。光亮就存在于暗夜之中。不是并存，不是交替，连光亮自己也带着阴影，而阴影也有光亮的柔和。暗夜没有退去，光亮中不断出现各种影像，有时明显，有时模糊，时而定格，时而飞逝……

欢迎新同志的会上，第一次见到穿着列宁装留着短发的她。面对伸过来的手，既激动又害怕。他站起来觉得自己在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神情一定很可

笑。她果然大笑起来。她的握手很有力，握得他的手有点儿痛。她当时的面貌却记不清了，也许就是普普通通的吧。

忘了是谁提议新同志唱一首歌。这个本来往往令新来的人感到为难的事却帮了他的忙。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个歌咏爱好者，略加推辞以后他唱起了一首民歌：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赛哩玛利亚……

一唱起来，不自然的心态很又快就消失了。他唱得感情奔放，明快流畅，引得听众中也有人小声哼起来，夹杂着一个柔和的女低音。掌声过后，有人提出老同志也唱一支歌欢迎新同志。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她身上，变成了有节奏的鼓掌和口号："林主任，来一个，林主任，来一个……"

林主任大大方方地站起来，扯了扯衣服："唱就唱!"

你送我一朵玫瑰花，　　我要深深地谢谢你……

在王自洁听来，唱得不算很好，可是歌声带着淳朴的气息，令人想起大草原的开阔优美。听众受到感染，许多人小声附和，忘记了在这个继续跃进的年代唱这些歌是多么不合时宜。

后来他曾问她："你喜欢玫瑰？"

"喜欢"

"为什么？因为她的香味？"

她微微偏着头，微笑着，想了一阵才说："她的颜色典雅、高贵，还有，她有刺。"

后来他在自己的单身宿舍的窗台上放了一盆玫瑰花，尽管不少人提醒他不该搞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他始终不肯把她取下来。

他也去过她的家——当刘书记不在的时候。他发现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玫瑰花，也没有其他的花。问起原因，她摇摇头，后来说了一句："老刘不准。"就不再说了。

一起下乡的时候，他还为她唱了《得克萨斯的玫瑰》，她很认真地听，还要他教，于是在乡间小路上，响起了轻轻的歌声：

多么轻柔多么美，　　田野上的玫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雨不下了。极弱的风轻拂树叶，不时有水滴落下，悄然无声地湿润着石头。云层依然密布，只是在间隙中微露一丝月光。

回忆是美好的，一切都已经消逝，唯有歌声依旧。再为她唱一次吧。

多么轻柔多么美，　　她的微笑，她的眼睛……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赛哩玛利亚……

玫瑰花盛开，又逐渐凋谢，花香四散。

坐累了，唱累了，他扶着大树站起来，忧郁的、凄凉的歌声向四面传去：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正在孤独地开放……

花瓣低飞，越飞越低，歌声远去，越去越远，溶化在夜之深处。

再也没有一朵鲜花，　　陪伴在她的身旁……

音符休止了，花瓣滑落了，落在日夜不停的黑水河上，流进了扬子江，最后流到江和大海的交汇处，遇到了一直默默等候的玫瑰。她们依偎着漂向大海深处。一路上，她不断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我永远是你身旁的一瓣玫瑰花。"

第九章　美人计

王自洁的消失，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连他的老乡洪士奎也是听了就算了，并不在意。他心里正盘算着一件大事呢。听见邓管教叫他，心里很高兴，估计多半是那件事有眉目了。从洪江县回来以后，他就向队部递了请求放回家的报告。按正常渠道，要经过队部向场部汇报，场部向当地派出所或公社发函，当地回函这些手续。这些手续办起来可慢可快，如果办得快，计算时间也该差不多了。看来请派出所吃饭没有白请。

到了邓管教屋里，邓管教笑咪咪地叫他坐下。他坦然坐在那张方凳上，面对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笑容。邓管教并不急于张口，身体向后仰，用力压在椅背上，又呷了一口茶，细细品味。面对着这张笑嘻嘻的脸，洪士奎逐渐感到有些难堪。过了一阵，洪士奎终于坚持不住了："邓干事，找我有事么？"

邓管教开口了："洪士奎，你好久结的婚？队部咋个不晓得呢？"

洪士奎莫名其妙："结婚？好久结婚？"

"我在问你呢？"

"我没有结婚。判刑那年我就离婚了。"

邓管教依然不慌不忙：“你没有结婚，咋个派出所说你结了婚呢？”

“派出所？”洪士奎下意识地重复着，一下子明白了，急得站起来，两只手抓住衣角住了扯，说话都有点儿语无伦次了：“误会，简直是误会。派出所把事情弄拐了。”

“派出所弄拐了，还是你弄拐了？”

“邓干事，没有的事。我一个人回洪江县，那个女的是路过洪江。派出所就以为她是我的啥子……”

“那你又说一下，她是你的啥子人？”

“啥子也不是。原先不认得，路上才认得的。”

“哦，路上才认得，就在你屋里睡了半个多月？”

洪士奎的嘴巴一下子被堵住。僵了一阵，突然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邓管教，我错了，你原谅我这一回，我……”

邓管教仍然笑嘻嘻地：“起来起来，莫把我才扫过的地跪脏了。”

洪士奎又立刻站起来，全身笔直：“报告邓干事……”

“报告邓干事？迟了！你带刘淑珍回家过夜的时候，为啥不报告邓干事？”

洪上奎什么也说不出来，也的确无话可说。看来队部已经查得一清二楚。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

邓管教没有再为难他，一板一眼地说：“派出所回了函，同意你回家。”

这一下更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嘴巴张大得合不拢，简直要怀疑自己的耳朵。邓管教接着补充一句：“就在你结婚的地方落户，不用回洪江县了。你看这件事又咋个办？”

洪士奎这个时候也清醒了：“邓干事，这怪不得派出所。是我自作自受。”

这回邓管教不笑了：“你能有这个认识也不错，下去好生反省，组里的事就不要管了。”

洪士奎走出那间屋子，又慢慢走下十几层的台阶，已经基本冷静下来，不再暗暗咒骂：“笑面虎”，而开始考志新的打算了。他相信自己的才干，坚信自己会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多少令他有点儿担心的是刘淑珍的处境：“马中队长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女队，她咋过这一关呢？”

其实这一关并不难过，马中队长知道刘淑珍的事以后，骂了一句：“他妈的卖×婆娘！”就把这件事交给张干事处理，而他自己正忙于找人上山砍木料。这边木料的质量比五队的好

得多，砍树、做床都由女就业人员去干，再通过张干事的一个“关系”运到成都，每架床至少要卖一两百元。场领导曾打算调他到场部当生产股长，他不去；又要他当大队教导员，他也不去。他的理由是在基层呆惯了。他老婆说：“升上去有啥好处？现在提级不提薪，权大责任也大，离开中队，不用说砍木料，肉都要少吃些，烤火只有那点焦碳，够啥？找犯人理发、看病、做家具、修电器，都不方便。”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不但他老婆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确地意识到的。

张干事对刘淑珍也很客气。她在斗争会上作了交代以后，并没有捆、打、罚跪，张干事只是声色俱厉地宣布半年之内不准假。会后她也没有戴手铐。这不仅使全队的人莫名其妙，连刘淑珍自己也感到以外，但不久她就明白了。

过了几天，张干事把她叫到自己屋里，要她在向茶房送茶后回队的路上顺便到申大队长那里走一趟。她受宠若惊，嘴唇直哆嗦唤：“张……干事，你，你……放心，我……”

从张干事屋里出来，她连走路都特别轻松，身体轻飘飘的，像充足了的气球。张干事这么原谅她、信任她，把最隐秘的事情托付给她，她要对得起张干事，要把事情办得漂亮些。在路上她一直很激动，那封信温暖着她的心胸，使她有幸福感、神秘感，还有不能宣泄的光荣感。至于七队的那个病号，去他的吧，不去正好，省得爬坡！

送完茶往回走，路过二队，男犯们正在学习，四处静悄悄的。到了申大队长住的地方，亮着灯，门关着。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于是壮起胆子上前。忽以背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是哪里的？”虽说声音很小，可是着实吓了她一跳。回头一看，这个男人有四十多岁，衣着和神态都不像干部，可是白白胖胖的，更不像二队那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犯人。正在疑惑，那人又问：“你是三队的？”

她含含糊糊地点点头。那人说：“我叫张成思，场部干部小厨房的，到二队来看肥猪，要调一头到场部。你找大队长？”

承认不是，否认也不是，她浑身不自在。可是既然来到这里，只好承认，幸而张成思转了话题：“听说你们三队最近有个刘淑珍出了问题，你晓得不？”

这一下她倒坦然了：“那就是我嘛！”

“你是找大队长来检讨还是来申诉？”

她正找不到台阶下，想不到张成思给她出了个难题又替她解了难题，就说：“情况有些出入。”

张成思不便再问，也说：“我要到工棚去看猪，失陪了。”

等张成思走远以后，她才去敲门。申大队长开门出来，见到她颇感意外，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三队的？”

她连忙回答：“是。我叫刘淑珍，有封信张干事喊我转交给大队长。”她刚想从怀里往外

掏信，大队长转身往屋里走，她只好跟进去。进屋之后，大队长先关上门，然后自己坐下，才问："信呢？"也没有叫她坐。虽然旁边有凳子，她不敢擅自自坐下，只能站着把信取出来，双手递给大民长。她猜想大队长一定会喜形于色，先把信塞进抽屉里，再嘱咐几句，最后给她一点儿赏赐。然而大队长是当着她的面拆开信，取出信纸看，边看边皱眉头，看样子不太高兴。看完了，随便往桌子上一放，对她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张干事，这些问题可以直接向场部反映，不要找大队。"

她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情绪一落千丈，只好答应一声："是。"

"你走吧。"

回来的路上，她觉得很疲倦，腿也酸，腰也痛，连空茶篓也很重。等她闷闷不乐地回到三队的时候，想起了洪士奎。要是他现在在这里，准能帮自己拿个主意什么的。可是现在想也是白想，他来不了。说不定八队正在开他的斗争会，他正在交代和自己的关系呢。

其实洪士奎的处境比她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组长当不成了，却当了大队的电工，直属大队部管。不仅可以往下属各队跑，还常常要到附近的公社大队去安装喇叭，查线路，修电动机，借此之便，又到李妹家去了几次。后来就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文革"前就业人员和公社社员结婚还是允许的，但那时候这样做的人不多，只有家在贫困山区不愿回去的人才提出申请。"文革"后看来回家无望，有这种想法的人才多了起来，而当地政府一概不准：都嫁给霉和尚，贫下中农咋讨老婆？但这次是由场都出面，公社看在洪士奎多次出力的份儿上，破例批准了。

侄女出嫁，李三爸在离三大队最近的地方找了一间房子作为两个人的新房，离大队部、八队都不远。

婚后李妹首先提到的，就是要洪士奎实现他的诺言：把她带出这个鬼地方，到他从前经常说起的成都。洪士奎说："我是洪江县的，咋能回成都？根据目前的政策，没有哪个人能够回成都。就是回洪江县，也要使出浑身的劲，这么多年，哪个霉和尚能回县城？连短假也只有我才请得准。"

"洪江县城有好大？当得到建阳县不？"

"怕有十个建阳县那么大，街都有十几条，热闹得很，人称小成都。"

"那你满刑好几年了，咋没有放回去？"

洪士奎不想谈这个问题。他转一个话题，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句："李妹你听我说，劳改队的苦日子，我是受够了。你莫看我当个电工要好耍些，其实也就是在外头跑，诓顿饭吃，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一个月十块零七角，顾得了吃顾不了穿，顾得了穿又顾不了吃。下雨也得干，出门就爬山，硬他妈不是人呆的地方！"他越说越气，唾沫四溅："你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当社员，一天到晚面朝黄土背朝天，弓起腰干修地球，连肚子都胀不饱，对不对？"

"就是就是，我硬是饿怕了。六零年要不是三爸家那棵核桃树，我早就像我爸我妈我哥

一样饿死了，我是……”

洪士奎连忙打听她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诉苦经：“听我说，其实往年你跟刘金娃，还有为一份儿肉跟郭大个子的事，我都晓得。”他故意停下来仔细看李桂枝的神色，她果然脸羞得通红，低着头，手抓住辫子不放。洪士奎猛吸了一口烟，又说：“这个我不怪你，还不是因为穷，才这么干嘛！不过，”他沉吟了一阵，才又说：“我們现在还是穷，要过好日子，天天吃大米干饭，就得离开这里回洪江。洪江县城里我有熟人，回去不愁找不到饭吃。不过现在想回洪江，谈何容易！”

李桂枝不懂“谈何容易”是啥意思。光看他的神情，好像连回洪江也没有指望。她可真急了，回不了洪江就得呆在农村。她这一辈子本来没有什么奢望，她不想穿花衣服，不想嫁个好男人，更不指望有人真心爱她。她只知道肚子饿了要吃板，只希望苞谷馍馍能胀饱肚子，最好能吃白米饭，要是有一碗肉，那就是过年了。她就是不想吃荞子，不想吃红苕藤，不想喝南瓜叶子汤！可是，现在没啥指望了。

洪士奎猛地站起来，把烟头一扔，大声说：“现在关键是找钱！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给派出所送礼。上次我回家，光晓得请客，东西送少了，事情就整拐了。现在只有找钱，找钱！我钱！”他激动得在屋里乱走，差点儿把小板凳踢翻。

李妹也知道钱的重要，她问：“找钱，哪里有钱？”

洪士奎更加激动：“现在只有不惜一切去找钱，只要给钱，卖屁股我都干！”说完把李桂枝的肩膀一拍，吓了她一跳：“现在只有靠你了。”

“我？我咋个找得到钱？”

“得行，你得行！只要你听我的话，找到钱，送了礼，我们两个回了洪江，啥都有了。”

李桂枝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洪士奎说：“我去煮饭，把那块腊肉也煮了，几天没有吃肉，嘴馋得很！”

李桂枝有些犹豫：“只有这一块了。”

洪士奎不耐烦：“要想吃肉容易得很，你这一阵就去找刘金娃，叫他今晚上过来！”

李桂枝打了个冷战：“洪哥，你咋个又提这件事？那是往年没办法，才做这没脸的事，你又……”

“往年没办法，今年就有办法？啥子没脸？脸要到有啥用？能当饭吃？你不干，二天这苞谷馍馍都没得吃！现在只有走这条路！”

李桂枝死活不肯去，洪士奎只好亲自出马。刘金娃怕这又是洪士奎设的圈套不敢来，郭大个子又调到十九队去了。想来想去，想到了江又安。这个小伙子年轻力壮火气旺，胆子又大，就先从他开始。

八队正值采茶高峰，中午的时候，宿舍里人不多，许多人怕完不成规定的任务，已经提前出工，只剩下几个人。这时候洪士奎夫妻二人突然在一工区的宿舍出现。李桂枝还着实打扮了一番，头发上插了一朵野花，黑瘦的脸上抹了一点爽身粉，衣服鞋袜倒是新的。天气已经不冷，空地上只生了一堆火，有人在煮东西吃，看见他们来了都打招呼。有的人色迷迷地看着李桂枝。这也难怪，山上全是清一色的霉和尚，难得看见女人，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女性。突然来了个新媳妇，使他们空虚的精神得到一些满足。除了江又安，其他人都没话找话，问长问短，弄得李桂技更加羞愧难当。洪士奎拉着李桂枝坐在江又安的旁边，自己又坐在李桂枝的另一边，三个人挤在一起。闲扯了一阵，赖组长进来招呼大家出工。其他人都恋恋不舍地离去，只剩下这三个人不动。

江又安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觉得李桂枝这么紧地挨着他很舒服，使他隐隐约约产生一种冲动。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冲动了。忽然洪士奎把李桂技搂过来亲嘴，当着他的面！他想避开，但身体不听指挥；他想闭眼，但眼睛睁得更圆。剧烈的心跳和翻腾的血液没有妨碍他对洪士奎的动机做出正确的判断。去他的！果然，洪士奎把李桂枝往他身上一推，她顺从地倒在他的身上，他就势捧住她的脸吻那两片麻木的嘴唇。洪士奎站起来端了个小板凳坐到门口去了。

江又安解开她的上衣的一个扣子，把手伸进去。李桂枝一动也不动，木然呆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洪士奎忽物回过头来说："有人回来了。"江又安万分勉强地把手缩了回来。洪士奎说："明天下午你到我屋里来。"李桂枝匆匆把衣服扣好，随着洪士奎走了。

江又安下午发疯以地抓茶，超额完成任务，晚上开会受到周干事的表扬。第二天他更是急不可耐，上午心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两只手疯狂乱抓，中午就完成了全天任务，急忙吃完午饭，乘人不注意，一溜烟儿跑下山去，推开贴有大红喜字的门，气喘吁吁进了堂屋。屋里没有人。左面灶屋里洪士奎喊他，过去一看，洪士奎在煮稀饭，对他说："走累了，先到里屋睡一觉。"他问："李妹呢？"洪士奎不回答，埋头添柴。他很失望，但确实也有点儿累了，就进了里屋。屋里光线很暗，过一阵才看清有一张大床，床上挂着蚊帐，揭开蚊帐，一个一丝不挂的裸体凸现在他面前，倒吓了他一跳，惊慌失措地跑过灶屋来。

洪士奎问明原故，大笑一阵，才说："你又不是没有玩儿过女人，去陪李妹睡嘛！"说得江又安面带愧色，埋怨自己少见多怪，又赶紧回去。

过了半个小时，洪士奎喊："起来吃饭了。"这时候江又安已经把无名火发泄干净，软软地躺在床上。旁边那个略带汗臭的僵尸依然睡得四平八稳，似乎和他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

喝了稀饭，江又安要走，从怀里掏出五元钱递过去，心里盘算着如果嫌少是否把剩下的五元也拿出来，不料洪士奎不肯收，说他现在不缺钱，只要江老弟看得起他，不妨经常来耍，还说像他这样的小伙子，李妹一定很喜欢。

第十章　在雨中

采春茶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进入高潮以后，尽管就业人员个个“东方发白，做到擦黑：两眼一睁，忙到熄灯”，队部又给勤杂人员像卫生员、理发员、木工以及工棚里喂猪放牛的都派了任务，农业组也抽人采茶，还是忙不过来。邓管教提出向场都反映，要基建队、机修队派劳力支援，但指导员反对，说人多了容易混杂生事，还得安排吃住，不如安排家属采茶好些，她们吃住都在家里，当然省事很多。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中队长外出学习未归，自然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于是指导员就安排家属在三组采茶。这里离队部近，出工收工方便，三组自从赵排长、邓淑张和王自洁死了以后，还没有补充过人，人手特别紧张。指导员把赖组长找来，拿了一份儿名单给他，要他找一个思想好、能干活儿、做事认真、头脑清楚的组员带领家属采茶，一定要严格保证质量，啥子“剃光头”、“鸡毛腿”之类少来，最后又讲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政治意义。

赖组长看了名单：全是干部的老婆！只有一个是卫生员的老婆，这些人都是三四十岁，相当难缠。他本来打算像去年那样自己亲自出马，可是指导员分明说的是找一个“组员”。这也许是因为去年有什么闲话传到指导员耳朵里的原故吧。数来数去，能够上这四个条件的实在不多，光“思想好”这一条就不好找：都当了多年老光棍儿，能像自己那样掌握分寸的就不多。韩大学去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是知识分子思想复杂，万一露出些反动话更不好办。刘富义更成问题，不出三天反动话就是一大堆。最后觉得只有谭志云还可以，就把名单交给他，又把指导员的话重复了一遍。

第二天一早，几个家属背着茶筐来到院坝等候。谭志云拿着名单一一核对。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人只是过去面熟，却不知道姓名。家属们个个谈笑风生，一口一个“谭组长”，又问他老土匪为啥不来。谭志云被喊得不好意思，忙说：“莫乱喊，我不是组长，是我们赖组长叫我临时带两天。”中队长老婆王嬢嬢笑着说：“那你就是临时组长嘛，大小是个官，正好管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以后还要请谭大组长多照看。”谭志云忙说：“王婆婆你咋个这样说嘛，论年纪你是长辈，论身份你是革命群众，以后我有啥错误，还请王婆婆批评，也请其他各位婆婆嬢嬢多多监督。”话刚落音，家属们已经笑个不住，邓管教的老婆说：“这娃儿的嘴巴真甜。”事务长的老婆笑着转过升把躲在后面的姑娘推了一把：“小玲听到没有？这一下你也成了嬢嬢了。”谭志云这才看到了这个姑娘的脸，想起名单上没有这个人，就问：“这名单上咋没有你的名字呢？”于小玲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卫生员老婆介绍：“她是指导员的女子，叫于小玲。”谭志云在名单上添了名字，又看了她一眼，自觉不妥，脸一下子红了，又怕细心的家属看出，赶紧说：“现在大家跟我到一面坡采茶。”

一行人到了地方，王嬢嬢伸手就抓。谭志云说：“王婆婆稍等一下，先说断，后不乱，大家依照轮次，一人占一行，车纪大的先占，采完一行再接着采下一行。”这样，于小玲自然在最后一行。她以前只是见过别人采，以为很容易，真动起手来，眼花缭乱，下不了手，动作又慢，谭志云就手把手地教，讲要领，作示范。他既要教于小玲，又要称每个人所采茶的重量，检查质量，还要完成自己的采茶任务，路上跑下，累得一头汗，越忙事情越多，不久又发生了争吵。

事情出在王嬢嬢身上。，她采茶完全不顾质量，伸出五个指头满把抓，俗称“五爪金龙”，所过之处，或留下半截残叶，或留下半截残梗，不该采的抓得只剩下“鸡毛腿”，影响以后发芽。谭志云看这样不行，又不好说她。只好在她后面收拾，她一看有人给她“善后”，更

放胆乱抓。她觉得自己现在所采的这一行茶叶长势不佳，而下一行却长势喜人，就抛下正采的这一行，抢先占了下一行。这时候事务长的老婆采完了一行正好该来这一行，于是二人争执起来，越吵越凶，互揭老底，什么话难听骂什么。引得大家都来看热闹。由于平时都怕王嬢嬢三分，没有人敢出面说她不对，反倒劝对方让步。于小玲着不过，刚要开口，谭志云暗暗拉她一把，她才没有做声。后来还是谭志云东劝西劝，只差磕头作揖，才达成协议。二人共采一行，各占一半，纠纷才告平息。

经过谭志云几天的耐心教导，于小玲的技术逐渐熟练，采茶数量已经达到一般水平，只是还赶不上王嬢嬢。于小玲不服，背后说她太不顾质量。谭志云说："家属来采茶，不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吗？中队长家里人口多，生活有些困难，她才这样，就是脾气不好爱和别人吵，也是缺钱心里烦引起的。我经常为她善后，也是想到这一点。"于小玲看着他，不由得点点头。

家属们采了了十来天茶，谭志云也忙了十来天，帮手脚慢的采茶，排除纠纷，化解矛盾，家属们人人心悦诚服。于小玲更是钦佩，觉得他和自己过去心目中的"阶级敌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后来她对谭志云讲了自己看法的变化，谭志云笑了。说自己可能受王自洁、徐晓丹他们的影响，你过去太不了解他们了。于是对她讲了许多事情，于小玲听得入了神。

这一天很早就开始下雨，家属们有的穿着雨衣，有的像于小玲则披块塑料布。卫生员老婆也有顶草帽，谭志云却干淋着。雨越来越大，雨水顺着发梢指尖流，流到腰部、腿上，指尖长期被凉水浸泡，都不听使唤了。大忙时节，没有干部发话，霉和尚谁也不敢去躲雨。家属们呢？是躲雨还是为采一斤鲜叶五分钱在雨中坚持？两种想法斗争着，不断有人跑回家，当然谭志云不能走。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他也得为那个人称茶。可是于小玲也不走，谭志云劝也没有用，直到连王嬢嬢也坚持不下去了跑回家，这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他们所在的位置比较靠上，和王嬢嬢不在一起。这个地方叫"望天坡"，离宿舍和队部太远，回去要走下坡路，坡陡路滑且不说，还得经过悬崖边的羊肠小道，雨小的时候还能勉强走，现在雨大了，万一滑下去，可得粉身碎骨！于是二人把茶筐藏在茶行内，往上面跑，准备找个岩洞躲雨。坡太陡，于小玲上不去，谭志云就把她拉上去。她对这一带地形不熟，只有让他换拽着跑，最后二人一起进了一个岩洞。

这洞不深，里面很窄，洞顶也不高，人在里面坐着可以直起腰，但没法站。地面前半部分已经被飘来的雨淋湿，只好尽量往后躲。于小玲想用塑料布挡住洞口，但无法悬挂，谭志云说算了。

雨越来越大，从洞口往外看，白茫茫一片，回头一瞥，于小玲把湿得流水的蓝布上衣脱了放在地上，里面的的确良衬衣也湿得紧紧贴住身子，显得轮廓分明。他的目光一接触到，立该闪电般收回，转而去看洞壁岩石的纹路。于小玲说："谭哥，你把上农干脆脱了吧，湿淋淋地贴在身上多不好。"谭志云说没有关系，不肯脱。

雨还在下，俩人就这么挨着坐着，越坐越觉得无聊，于小玲脱了鞋，光着脚，两只胳臂抱在胸前。谭志云捏紧拳头，又咬牙又用手摸自己胳臂上隆起的肌肉。于小玲问他冷不冷，他不回答。于小玲生气了，说："你是哑巴呀？"谭志云反问："你冷不冷？你冷我就冷，你不冷我也不冷。"于小玲说："我这会儿真冷啊，要是能缓和暖和就好了。"谭志云说："没有木头，也没有火柴，咋生火？"于小玲生气了，说："你就是个木头，啥也不懂！"谭志云默

默无语。过了很久，他小声唱起了《敖包相会》：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　　海棠花儿不会自已开……

于小玲一直安静地听着，听完了才说："这歌真好听。"

谭志云说："这是王自洁教我的。他会唱很多歌。唉，可惜了。"

于小玲受了感染，沉默了。过了一阵才说："你教我好不好？"

"我只会唱，不会教。"

"那你再唱一遍，我跟着哼。"

唱着唱着，于小玲靠得他更紧了。谭志云往旁边让，歌声也停了。那拉开的距离如此之短，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觉到。于小玲觉得很别扭，就用茶树枝在地上乱画乱写，又用脚擦去，最后剩下一个"云"字。谭志云就用瓦片画了一个"玲"字。刚要擦去，于小玲说："莫擦，你的字写得比我好，名字也起得比我好，叫谭志云。"谭志云说："还是你的名字起很好。"于小玲说："就是这个名字起得不好，老师说没有一点儿革命味道呢。"

一阵风起，洒进来一片雨，两个人本能地往后躲，无处可躲，一瞬间又贴紧了。亮光骤然闪过后，黑暗里响起一声炸雷，吓得于小玲死死抓住谭志云的胳臂不放，连连说："谭哥，我好害怕。"谭志云说："不怕，一个人怕，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了。"

雨仍在下，不时从远方传来隆隆的雷声。俩个人依偎着，倾听似乎正在伴奏的雷击雨鸣。渐渐地雨小了，时有柔风悄来，但他们一无所知，专意感受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时间已经停止，洞外世界也不存在，他们就这样一起坐着，但愿直到世界的终了。

第十一章　痛苦人生

徐晓丹和郑言华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按说春茶大忙已经过去，可是郑言华没有过来，也没有托人带信过来。本队除了徐晓丹没有谁的老婆在三队——女三队的人嫌八队路远，一般不肯嫁过来。七队的小许住了医院，刘淑珍不再过这边来，也就无人可托。他向指导员请过假，可是指导员总是不准假。正当无可奈何之际，黄疯儿到工棚来了，说："邓管教有话，叫你去三队一趟。正好场都有送农药来的车子，可以搭空车去。这几天让我替你守工棚。"他喜出望外，赶紧把钥匙交给黄疯儿，背起早准备好的背篼就走。

出了工棚以后，他觉得如此匆忙地通知，似乎不大对劲儿。但赶车是第一要紧，晚了就不行了，也顾不上多想。赶到院坝里，几个人正在卸农药，大队电工洪士奎站在汽车前和司机谈笑，见他来了，递了一去支烟给他。他说不会抽烟。说话之间，农药已经卸完，二人正想钻进驾驶室，指导员的老婆女儿也来了，他们只得让座，爬上了车厢。

车子开动了，车厢上颠簸得厉害。洪士奎先是骂修路没有修好，徐晓丹说这不能怪修路的，时间本来就仓促，修好以后又没有保养过，路面坑坑包包的，不颠簸才怪。洪士奎又埋怨家属占了座位，说她们有事没事就往场部跑，不像他是到场部领材料的。涉及干部家属，徐晓丹不便多言，洪士奎却满不在乎地说："家属算什么，不过是仗男人的势力。男人不在了，还不是现惨相。就说场部的陈桂花吧，原来是生产股股长的婆娘，乔股长在的时候，好多人巴结她，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喊得巴巴实实的。乔股长病死了，丢下四个娃娃，想再嫁也没人要。好说歹说，哭哭啼啼，场部一个月才给三十五元补助，熟人见了都躲起八丈远，唯恐她开口借钱。要不是小厨房的张会恩着她寡母子造孽，打饭的时候多给几瓢稀饭多抓几个馒头，只怕肚子都饿扁了。"徐晓丹说："你听哪个说的？"洪士奎说："场部哪个不说？都传遍了。"徐晓丹说："张会恩这么干，场部就不晓得？就不管？"洪士奎说："晓得是晓得，只是一时也想不出啥子好办法，张会恩早晚要调出小厨房，只是他的手艺实在好，全场也找不出第二个，只好暂时放一放。"

两个人一路谈论，多少冲淡了徐晓丹的焦急不安的心情，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场部。一下车，洪士奎去了总库房，他背起背篼上坡。说也凑巧，正碰上张会恩。两个人原来有一面之识，互相打了个招呼。徐晓丹问他上哪里去，他说到二队，那里有花椒树，想问他们队要点儿花椒，再要点辣椒。两个人同走了一条路，徐晓丹本想劝劝他，一来二人关系不深，二来看他喜气洋溢的样子，不便扫他的兴，就没有说。

到了二队，二人分手，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总觉得队部的态度变化有点儿突然，恐怕不是好事。难道郑言华在三队出了事？生病还是挨斗？光挨斗怕不会叫他去吧？他不敢再想下去，只好安慰自己说："快到了，到了就什么都清楚了。"同时加快了步伐。

走到女三队门口，值班的夏婆婆一见他就说："你来了？上午就在等你。"他顾不上回答，喘着气往里走。夏婆婆喊他："喂，你到哪里去？"他知道夏婆婆爱和外面来的人闲聊，被她缠住就难以脱身，就边走边回答："到队部报个到。"不料夏婆婆却说："队部通知，叫你不用上去，要我把事情告诉你。"

徐晓丹心一沉，转过身来打量她。夏婆婆把他拉回来，进屋搬出一把椅子来给他坐，她自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又给他泡了一杯茶，看他喝了半杯，这才慢慢儿说："徐师傅，你听我说，你是个大男人，凡事要想开些，莫跟我们女人一般见识。"

徐晓丹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害里，脊背发冷，内衣上的汗水上下凝成一片，冰凉冰凉，连茶杯都蒙上一层冷霜。夏婆婆拿过茶杯猛喝一口，接着说："造孽哟，造孽哟，一个多月，马中队长主持，不是捆，就是打，尼龙绳子是水泼过的，毛竹片是新砍的，一铲一道血印子……"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眼角流进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在那深深的凹痕中消失了。过了一阵，她这才又说："上个星期天，上午还在出工，下午到树林里头。唉，也是在白天，晚上带起反铐，上吊都吊不成。"

徐晓丹眼前一阵阵发黑，心一阵一阵绞痛，过了一阵才看见夏婆婆那哀伤的眼睛。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又说："啥子了不得的事哟，不晓得哪个背时的检举，说她说：男干部到

女队不合适，还有啥子翻案，黑军师……”

他站起来，可是天旋地转，又坐下了。夏婆婆只管说：“我这阵就领你去，就在队部后面的山坡上。”

他神情木然，一声不吭地跟在她后面。但是他竟跟不上，两条腿一点气力也没有了。路过中队部，从里面传出几个女性嘻嘻哈哈的笑声，夹杂着男人粗野的大笑，那欢乐的气氛，差一点把他击倒。

上了坡，夏婆有点走不动了，喘着气指点说：“就在小树林里，一会转来，还到我屋里。东西都在我那里，我就不上去了。”她四下看了看，匆忙画了个十字，慢慢下去了。

他一个人往树林里走，穿过两个小土堆似的坟包，虽说是半下午，太阳还没有下山，树林间隙偶而有一线阳光射入，但是阳光不到之处，阴气逼人，令人全身发冷。他越往里走越是心寒胆怯，似乎有许多多年来在此盘旋环绕的鬼魂从四面八方袭来，抽泣之声由地下、由树根传出。他不明白这声音从何而来，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吧。

当他一眼看见一块白色的木牌，给他猛然一击，再也无力支持双腿，终于在一堆新土前面颓然倾倒。断续的抽泣连成一线。几个月的焦急担心，十几年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都化作喷涌的苦泉，化作刺天穿云的痛哭。他用低沉枯涩的嗓音喊她的名字，期待着她的回应，却只有树叶沙沙作响；他盼望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它却只徘徊于地之深处。

他放声哭了。

“言华，你就这么走了！言华，你就这么走了呀！”他反反复复重复着。他捶胸，他揪头发，让身体的痛苦去减轻心的悲哀。他想到她的一生，想到她这两个月的处境，就大哭起来：“言华，你死得惨啊！你死得冤啊！你没有伤害过谁，你没有招惹过谁，你一生不敢大声说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可为什么落得这么个下场？老天！这是为什么？老天！你在哪里？你把言华还给我！把她还给我！”他要把十几年来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全哭出来。这痛苦，以往它被甜蜜的感情所掩盖，现在那薄薄的一层甜蜜不在了，被利刃刮掉，被暴风吹散，巨大的、结结实实的痛苦就都暴露了。

人！多么卑微！生命，多么低残！一株嫩苗经得起暴日酷晒吗？一朵鲜花经得起骤雨摧残吗？同为女人，有的吃着山珍海味高档补品，有的连苞谷馍馍都不能填饱；有的穿着毛料衣服坐小汽车兜风，有的补丁摞补丁还露着肉却要背起背夹子爬山；夏天有的在海边沐浴，有的在农田里流汗；冬天有的穿着皮大衣赏雪有的赤脚下冷水田；有的五十岁还皮肤白嫩，有的三十出头就有了皱纹白发；有的浑身香味四溢，有的想一块肥皂洗洗都没有。俗话说：“善有善报”，可是郑言华的善报在哪里？　　你的一生是屈辱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受尽折磨的一生，是像虫蚁一样任人践踏、宰割、欺凌、蹂躏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在苦水里泡大，又在泪水里死去。连吃苞谷馍馍老梭边继续苟活下去的权利也没有。除了我还会有谁想起你？你不过是制造茶叶中的一道工序。茶叶被吃山珍海味吃腻了的人喝掉之后，只记得它的茶叶被吃山珍海味吃腻了的人喝掉之后，只记得它的香味儿，谁还会记得茶树下的冤魂？队长们例行么事地在死亡报告单上填几个字，你的痛苦和宽曲、盼望和挣扎，你的凡人之心，那颗曾为孝顺女儿、曾为贤惠妻子只是不曾为善良母亲

的心，都不留痕迹地随着肉体的腐烂而消失了。

他就这样坐着哭着、诉说着，不觉得夕阳西下寒气浸人。眼泪干了，嗓子哑了。昏昏沉沉之中令人窒息的死寂被清脆低微的抽泣所刺破，胡玉兰出现了。

“徐大哥！”见到她，在巨大的悲哀里升起一丝厌恶，这不仅由于平日对她印象不佳，也在于她的出现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无言交流。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她。

胡玉兰跪在坟前哭喊：“郑大姐，你是个好人哪！是个大好人哪！”她侧过身子对着徐晓丹说：“她不该死呀！她对我好哇！她一直劝我，别人都不理我，只有她肯跟我说话。她这下走了，这个发界上再也没有好人了，再也没有哪个人理我了。”她哽咽着，一时说不下去了。

徐晓丹倒渐渐平静下来，想听听这个被人骂做“烂货”的女人要说什么。胡玉兰停了一阵，又说：“郑大姐呀，我也是没得办法，才做这种不争气的事啊！场部机修队的，茶房的，还有各队小厨房的，外工棚的，他们的钱要多些，有些人坏得很，专门打小女娃子的坏主意。买些糖果点心就把小女娃子骗了。我们队上好几个，七八岁的，十来岁的，都遭了。当妈的没得钱，连娃娃的口粮都买不起，靠偷个把野男人才养得活娃娃这条命。男人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哪有钱给娃娃买肉买糖啊！我就横了心，我要养娃娃早晚得烂，偷一个是烂，偷十个也是烂，我烂不能让娃娃跟着栏，我要保全她呀！不然对不起死了的男人呀！他生前爱春春得很，那是他的命根子呀！”

她边说边哭，眼泪流成了河。徐晓丹想动，竟找不到一句话。最后还是她自己掏出手绢擦眼泪，又对徐晓丹说：“你们老郑还算有福气，有你这个男人哭她。我死了怕没有哪个男人哭我。”说完又哭起来。

徐晓丹反而为她难过起来。想到过去自己也背后说过她是烂货，就起了歉意，想了一阵说：“胡玉兰，你其实是个好人，以前我错看你了。”胡玉兰又擦了擦眼睛，说：“徐大哥，我也是忍不住才哭的。我不该引你伤心。你是个男人，要挺得住。她走了，也好。她受罪也受到头了，不晓得我的罪哪天才受到头喔！”她站起来，向郑大姐深深地鞠了一躬，踉踉跄跄地走了。

徐晓丹心情很乱，没了主意，只好也起来，回到值班室。夏婆婆引他进屋，指着床上一个大包袱说：“她的东西都整理好了，你清点一下，我去给你煮碗面。”

他打开包袱，眼泪又不住地掉，只因为在别人屋里，不能不极力克制。大体看过一遍，把被褥、盆碗和她来八队常穿的一双鞋还有几件衣服放进背篼，其它分做两包。夏婆婆端了一碗煎蛋面送来，他也不推辞，一口气吃完，起身告辞。把两个包都交给夏婆婆，说一包给她，一包给胡玉兰。夏婆婆先是一惊，随即说：“好、好。”手颤抖着接过去。两个人都不说话，静默了一阵，徐晓丹就走了，夏婆婆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徐晓丹出来，不看院子里的一切：高大的树木、杂乱的建筑、乱跑的小孩，和几个好奇的女人。他一直快步向前，直到公路拐弯处才回头望了望。一切都在苍茫的暮色中淡化了，稍为明显一点儿的，只有夏婆婆那略带弯曲的身影。

回到八队，他重新仔细整理遗物，还是没有发现稍微好一点儿的东西。衣服、袜子，都是补过的；床单和棉被都很旧，也褪色了。脸盆、热水瓶、茶缸、瓷碗、小勺、筷子、剪刀、镜子、梳子、刷子、针线包，都是他常见到的，上面都有她的痕迹。他摸一件，心痛一回，摸另一件，再痛一回。痛得受不了就去挑水、劈柴、切猪草，好一点儿了再回来——实在太想见她了，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就这样，他发现了她的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可以看出她那时候比较丰满，自然也年轻得多。

当初是怎样认识的？又如何悄悄来往，后来又怎样到建阳县登记？都记不清楚了。在女三队举行了婚礼，有三天婚假，那三天是如何度过的，也不太想得起来，只觉得那是美好的，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现在，都远了、远了……青春是美好的，但它太短太短，短得只有三天就飞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仔细寻找她，寻找她的一切。当初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都变得万分宝贵。因为它们不会再增加或者改变了。他终于在小本子的塑料封皮里面，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两行潦草的字：

晓丹：我走了，　　字迹一下子模糊了，过了一阵才看清接着是：

为了我，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言华　　他用手捂住眼睛，不让泪水浸湿纸条，又默默地背诵了好几遍，坐在床沿默想了很久，把纸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入内衣口袋，然后到灶屋给猪喂食。灶门口有个小板凳，凳面光滑，他马上想起，过春节的时候她曾坐在上面向灶膛添柴草，那熊熊的火光照红了她的脸。喂完猪他到桌旁坐下休息，又想起她曾坐在这张桌子旁飞针走线，而他则在她旁边看着他那粗大的手指是如何变得异常灵巧的。啊，她的背明显弯曲了，头发开始花白，岁月无情啊！睡觉前他铺被盖，这被盖还是过春节的时候她拆洗过的。被头磨烂的地方，她找出块蓝布来补好了。用的是藏针，外面看不出痕迹。她说这样线就不会磨断了。短短三天她做了多少事情！白天采茶组有些人来耍，要开水喝，她烧了一大锅开水，喝不完的，叫他们洗脸洗头。看见有的人衣服破了不会补，就帮他们补。晚上做了针线活儿，白天又帮他煮猪食、切猪草、浇菜。尽管他已经把许多事情提前做了，她还是能找到许多“漏洞”。女人家就是细心，他到女三队也干活儿，可是没有她来这里干的那么多。

在以后的日子里，干完了活儿，他多半呆在工棚里和她在一起，无言地陪伴着她。但是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就出来在门口徘徊，等待她的身影出现。有一次她真的来了，像往日一样背着背篼慢慢走来。他满怀喜悦往前迎上去，才发现是李妹，于是失望地回到工棚。对于奇迹的盼望，一次次破裂又一次次重合。他相信她会再来，她会从那远方的群山深处走来。他一直等到暮色苍茫。

她就在工棚里，她已经来了，带着微笑和倦意，安静地坐在他身边，含情注视，默默不语。谁说她已经不在了？谁说她现在只是一个幽灵，只能在梦中相会？在梦里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因为她就在他的身旁，在他的心灵深处。

第十二章　三队风波

事情并不像外表那样简单。

女三队自从刘淑珍以请假到七队看望照顾生病的丈夫为名，跑到洪江县和洪士奎同居以后，曾经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局面就被搅乱了。队部知道这件事以后，先是对女三队的管理和松懈提高到"右倾"的角度来批评，把原来的陈中队长调到场部财务股，另外调了一贯政治立场坚定、资格很老、人称"老革命"的马中队长接任。马中队长本来不愿意离开他工作多年的五队，但架不住组织上的再三劝说，就抱着大干一场，彻底克服右倾思想，彻底改变女三队管理软弱无力的雄心壮志上任了。

到了以后一接触，才知道事情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他被告知女队的种种特点，尤其是对男性干部的各种限制：如男干部不能和女就业人员有身体接触，不能搜身，夜间不能进入她们的宿舍，所有这些，都得由女干部去做。他多次抬脚想踢，都勉强忍住了。忍一次两次尚可，时间长了，这简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看见干活儿慢的，他想踢。在工地上说话吵闹的，他想踢。组长到队部汇报净讲些芝麻小事抓不住要害的，他也想踢。但踢了就是身体接触了，那可是个纪律问题。他忍了又忍，直到忍无可忍的一天。

张干事和申大队长的事情暴露了。据说是陈桂花说出来的。先是在场部的干部家属中悄悄儿流传，然后传进场领导的耳朵里。场领导正忙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对这类事情本来不想管，可是流言不胫而走，最后传到申大队长的老婆任干事那里。她在女犯二十一队当干事，扔下工作不管，跑到女三队找张干事大闹。先是乱骂，然后抓脸扯头发，若不是马中队长瞪圆了那对杀气腾腾的眼睛，这个泼妇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后来她又到大队部去闹，引来一大群劳改犯和就业人员围观，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领导只得出面解决。经过紧急开会，决定给申大队长以降职降级处分，调到五队当中队长，补了马中队长调走后留下的空缺。张干事地位低，无法再降，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还责令写书面检讨。于是虽说女三队中还有些议论，但事态总算平息了。

正当这个时候，王秀英的翻案材料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交到场部管教股，又转回到女三队。马中队长下令开王秀英的斗争会，要这个农村文盲说出代笔人是谁，以将功补过。王秀英是个顽固脑袋，顽抗到底，死不开口。于是马中队长又转而搞政策攻心，要代笔人主动坦白自首，保证不予以追究，结果也无人出头认账。最后核对笔迹，这才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狗头军师兼黑高参的郑言华。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三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郑言华"自绝于人民"之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连王秀英的事也不提了。倒是马中队长自己提出调动申请。他的意思是回到五队，但是申中队长已经在那里任职，一回去以后工作不好安排，就调他到八队。因为八队原来的中队长调去学习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就接任了中队长。至于女三队，则正好由新分到农场的农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贺某担任领导之责。据说她原来是个劳动模范，在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由于初到公安部门，资历不够，只给了个副中队长的职位。

贺某带着简单的行李到了女三队。起初她很少说话，只是到处走走看看，态度也很和善。

大会小会，个别谈话，都以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因此颇得女三队就业人员的好感，不久就得了个“活菩萨”的称号。也有人说是“贺菩萨”，反正“贺”、“活”发音相近，也就不必分别了。还有人说，如果她早来一个月，郑言华就不会死了。

不久她发现女队干部的宿舍里都布满了高级木料打制成的家具：双人床、大衣柜、床头柜、箱子、圆桌、办公桌、靠背椅、方凳、洗澡盆、脸盆架等等，非常吃惊。她在就业人员全体大会上讲话，号召就业人员检举干部盗窃国家林木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曾经上山为干部砍过木料的人，本身就参与了犯罪活动，更应该主动老实交代，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如果执迷不语，继续和干部中的不法分子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妄图抗拒到底，那就是罪上加罪，绝对没有好下场！她一反往日的温和形象，口气十分严厉，不仅在场的干部吓出一身冷汗，还得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轻松模样；不在场的干部中也引起不小的震动。女就业人员则大惑不解，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上过山砍过木料的都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胆战心惊，左右为难，只有刘淑珍有些不一样。

她以前曾为张干事砍过木料，后来又为她带过信，事情暴露以后，她也紧张过一阵。谁知阳差阴错，郑言华代地受过，她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郑言华一死，那块石头变成深深刻在她心上的烙印，无论如何也抹不掉。几次做梦，都梦见郑言华吐着舌头站在她面前，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她。惊醒以后还是冷汗不止。那影子好像还在面前，拂之不去。贺菩萨讲话以后，张干事比她受了处分更加小心翼翼，说话也少了，更不训人骂人了。刘淑珍心想：“你也有今天！你整死了郑言华，你也该挨签了。”怀着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她写了一份检举材料交给贺中队长。贺菩萨收到全队唯一的这一份材料，十分高兴，鼓励了几句，又嘱咐她不要对旁人说，要“防扩散”。

材料交上去之后，她耐心等待着。她知道上面要组织人进行调查，处理得有一个过程。看样子张干事还被蒙在鼓里，仍是一副小心谨慎但求平安无事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但始终不见有人找她核对材料。再过几天，贺菩萨也不见了。小厨房的炊事员说，贺中队长到成都开“积代会”去了，会后还要到外地参观，传经送宝，要过半个月才能回来。她顿感不妙，很可能自己要成为郑言华第二！果然，有一个要好的组长向她透露，明天要开她的斗争会，说她和洪士奎非法同居的事还没有完，当时是给她一个反省的机会，她以为滑过去了，没事了，是打错了算盘。

当晚她就做出决定：事不宜迟，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十三章　江又安

女队有人跑，男队也有人跑。

江又安一有空就偷偷溜下山去寻欢，因为常去，连狗都不叫了。一个月十元钱只够去两回，没有钱买烟买挂面。他到处借钱，钱一到手就往李妹都里跑，很快就没有人借钱给他了。于是他就偷别人的财物去卖给老乡。老乡出的价又太低，担惊受怕偷几回卖得的钱还不够去一回，自己又早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最后他晚上偷队上的鲜叶拿到洪士奎那里，

用手工炒成野茶，以两元一斤的价格卖给外地来的司机或采购员。可是采茶期一过，无茶可偷，于是他开始赊账。但是第二回李妹就不依了，吃了闭门羹不说，洪士奎还天天追欠账。

这一天洪士奎又怒气冲冲地来讨账，心想天底下竟有这种人：没有钱还想玩女人！赖账赖到我头上来了，真是活见鬼！他对江又安说："李妹这些天身体很差，要吃点有营养的补一下。"

江又安居然不冷不熟地顺着说："是该补一下。"

"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钱呐？"

"哎呀洪哥，这几天我手头紧，等发了工资……"

"这个月你娃娃早赊了帐，一发工资，你们赖土匪还不把钱扣了，你还看得到钱？"

江又安拿定主意：你不仁，我不义，你请我吃早饭，我就请你吃中午。"那我有啥办法？反正我早晚要给。"

"你娃娃想赖一天算一天？我不管你想啥办法，反正你今天拿不出来就走不脱。有了钱，李妹那里随你的便，没得钱，老子找几个人收拾你！"

火烧眉毛且顾眼前，江又安好说歹说，洪士奎答应宽限三天，说好以后，江又安走了，洪士奎倒犯愁了。现在等着钱用，李妹已经半年不出工了，没有工分，平日从江又安那里弄来的钱，还有从其他队的一些人那里零星搞来的钱，都用光了。两个人下馆子，给李妹买衣服，自己抽烟喝酒，哪一样不要钱？连买口粮的钱都没有剩下，李妹应分的口粮还放在粮库里，等着用现金去取，可是看来江又安三天之内未必能弄到钱：他借也借不到，偷也偷不到。得另外开辟财源才行。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徐晓丹：他婆娘才死不久，没有女人的日子肯定过不惯，以往他有点儿钱就往女三队送，现在不送了，总会剩点儿钱。于是当晚他就去拜访。

徐晓丹听见有人敲门，出来一看，见是洪士奎，感到很意外，也只好请进来。洪士奎进屋坐下，看到工棚虽然简陋，但一切安放得整整齐齐，显得很清爽，对比自己的屋："简直像个狗窝！都怨这个烂婆娘好吃懒做！"

徐晓丹端了碗开水放在洪士奎面前："洪组长今天查线去了？"

洪士奎喝了开水，闲扯起来："老徐你一个人闷在山上，有空咋不到我那里走走？"

"哎呀，工棚一天到晚离不得人，猪儿张起嘴巴要吃。"

"那阵有空下来耍嘛。"

"要得，有空一定去。"

洪士奎想：像这样闲扯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得谈正事，干脆单刀直入："老徐，你是

结过婚的人，这打单身的日子不好过吧？”

徐晓丹警觉起来：他来做媒？以前他听王自洁说过洪士奎的为人，他总会别有所图，不会白做媒吧？　　“其实，劳改队成啥子家哟！有点儿钱，快活一回算一回，老徐你说对不对？”

徐晓丹觉得他越说越不对劲，联想起队上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一时冲动，就直言开导：“我说洪组长，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些。李桂枝毕竟是你婆娘，明煤正娶的，还是安份守己的要好些。”

洪士奎看他一脸正经，判断他是故作姿态试探自己，心一横，就说：“啥子婆娘？啥子明煤正娶？我根本不认她是我婆娘！原本就是个烂货，给大金娃耍烂了的，我咋会要她？二天我回了洪江县，未必还把她带回去给祖先丢人？”

徐晓丹吃惊得张大嘴巴，只说得出两个字：“那你？”

“她是个啥子人？哼！大家耍，我拿她当个摇钱树……”刚说了“摇钱树”三个字，马上想起一开始就提钱不妥，改口说：“哪个都耍得，莫看是个农村人，毕竟人年轻，老徐你要是不嫌弃……”、　　徐晓丹气得发抖，站起来用手指着洪士奎：“你，你不是人，是他妈是个畜生！畜生!”最后两个字他用了那么大的力气，使洪士奎吃了一惊。但他不是江又安那样的毛头小伙子，他是个能屈能申的人，犯不着和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生气。他强忍怒火，也站起来说:“生意不成仁义在，不干就算了，我是好意看你打单身造孽，你倒咬我!”

这下可把徐晓丹气得浑身冒烟，只能一个劲儿地喊：“滚！滚!”

洪士奎愤怒地离开，但没有走多远就心平气和了：“老子一家不成走二家，这么大个玉龙山总有人干，未必离了你这头红萝卜就做不成席!

他没有料到的是，第三天八队于指导员到大队部走了一趟，把从徐晓丹和江又安那里得到的材料汇报上去，没有几天大队长就把洪士奎送到场部集训队交代问题。再过几天，李妹也进了公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江又安才高兴了两天，也被叫到队部。他一进屋就觉得这里面热得很，直想出汗。邓管教仍和往常一样，笑眯眯的。他越笑江又安越害怕。邓管教说：“做好事要做到底，不能光揭发洪士奎，自己的事也要说一说。”

“我的事都交代过了。”

“你交代的都只是洪士奎的事，这就不对了。你跟徐晓丹不一样。你的事不少，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江又安用手揩了揩头上的汗，然后说：“我好生想一下，把问题全部交代。”

“那也好，写个书面材料。写不起，可以找人帮着写。”

“我找韩大学帮我写。”他只想赶快离开这间令人浑身发热的屋子，不等邓管教发话就赶快逃离。

第二天一早赖组长到队部报告：昨晚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还看见江又安在睡觉，今天早起就不见了。指导员断定他不会跑多久，这里离建阳县城还有四十里，老乡的拖拉机不会半夜开，步行的话这时候也就是刚到建阳，早班车要到九点半才开，于是连忙打电话通知场部。场部一方面派人去车站守株待兔，一方面派摩托车沿路追赶，防止他半路搭货车逃脱。结果都没有效果：在车站守候的直到下午也不见人影儿。显然江又安不是王自洁第二；摩托车赶出上百里，沿路询问所有被超越的司机，都说没有见过。一时间江又安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江又安后半夜悄悄儿爬起来溜出宿舍，不慌不忙地向山下走。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没有遇到什么人。一直走到村西头，绕过几家农户的时候虽然碰到狗叫，但他不理会。再往西走，在知青的小平房前停住了脚步。天色已亮，他轻轻敲门，没有反响，再重敲，仍不见动静。压低嗓门喊了几次“王哥”，才听见里面有人哼了一声，又过了好一阵子，门才开了，出来的却是段哥。

“段哥，是你呀？王哥呐？”说着就往里走。

段哥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也随着进来，顺手关上门。屋里还黑，江又安一屁股坐在床沿，闻到一股在劳改队宿舍常能闻到的气息。床上还躺着两个人，江又安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也说：“江哥，你来得早哇？”江又安问：“王哥呢？”

外号“懒狗”的唐哥说：“王哥昨晚到太平公社去了。太平公社的田哥要回成都，王哥给他送行。”

“田哥是哪个？我咋没有听说过。”

“我们原来也认不到，只听王哥说过，是他的邻居。他下乡晚，当过一段时间的‘赖青’，平常也不大走动。哪晓得懒人有懒福，这下子要回成都了。”

“他啷个又回得到成都，家里有啥关系？”

“没听说有啥子关系。他老爸遭车祸死了，喊他回去顶替。”

几个人对他的幸运啧啧称羡，说他时来运转，才摊上这样的好事。

段哥催唐哥、戴哥起床，两个人懒洋洋地把被子掀在一边，一骨碌翻身起来，穿上衣服，从水缸里舀出一大瓢水，倒在各人的脸盆里，用毛巾擦了一把，算是洗过了。三人洗脸之际，江又安无聊，在他们的床上乱翻，翻出一本《海涅诗选》。他识字不多，就专门看精美插图。

段哥问他：“江哥，你洗不洗一下？”

“算了算了，讲究那些做啥，快弄饭来吃。”

唐哥说：“江哥，还是你去煮，你弄得要巴适些。”

江又安说要得。他揭开放粮食的木柜，苞谷面装得满满的。他舀了满满一大碗出来，笑着问：“吃苞谷汤圆要得不？”

大家都说要得，唐哥往床上一趟说：“还是你们劳改队安逸，早晨一起来就有人把饭煮好了。”

江又安端起大碗进了灶屋，过了半分钟又出来问：“段哥，有辣椒面没得？”

“啥子都没得，就只有盐巴。”

“菜都没得，咋个下饭嘛？”

“本来还有一把瓢儿白，前晚我跟王哥跳丰收舞弄来的。昨天王哥提起给田哥送行，这阵还有啥子菜嘛。”

“自留地里没得菜？”

“原先种萝卜，没有浇水，都干死了。后来种南瓜，幸福村的几个知妹来耍，炒了嫩南瓜丝办了招待。这阵自留地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景美的图画。”说毕三人轰然大笑。

江又安先是莫名其妙，仔细一想，才明白他们说的是解大便，也不禁大笑起来。

笑归笑，饭还得做。他再进灶屋，向锅里舀了几瓢水，开始生火。先把谷草点燃，再添细柴。段哥和戴哥进来看他煮饭，他很得意，不断向灶膛里塞柴棒，称赞说：“这柴干透了，硬是好烧。你们在哪里捡的？”

“队长那里捡的！王哥找李队长估倒要，李聋子就把他屋头的柴背了一背过来。”

“你几爷子也该上山捡儿柴，总问人要也不是个事！”

“捡的柴太湿，难得阴干。爬那么高的山，再背上几十斤，哪个遭得住？”

水咕嘟咕嘟开了，江又安把苞谷面用冷水调好，再用筷子夹起，一块一块往锅里丢，一会儿漂起一大锅，溢出一股香味儿。几个人用勺子舀在碗里，撒上盐巴，段哥边吃边发牢骚：“这他妈的也叫汤圆？比起成都赖汤圆差远了。”戴哥说味道还不错，要是有点儿白糖就更好了。只有唐哥躺在床上不动，江又安喊他，他说一天三顿苞谷面，看到看够了。后来看见锅里所剩不多，才爬起来扫尾。

饭后江又安刷锅洗碗，三个知哥讨论今天干什么。戴哥说今天和平场逢场，大家去赶场。段哥说身上一分钱没得，赶场有啥意思。戴哥说反正设事，与其在家里清耍，不如出外走一

转。唐哥也赞成，说运气好也许能发点儿外财。又问江又安去不去，江又安心想：虽说就业队今天不放假，可是打猪草的人万一偷空去赶场，碰上就麻烦了，就说不去。

三个知青走了，江又安估计他们下午才能回来，现在没有什么事，出门看了看阴沉的天色，看样子晚上要下雨，远处间或传来几声狗叫，听来无聊得很。他仔细打量屋里的陈设，比起上次来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墙上那张领袖像熏得比以前更黑了。还有那张写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红纸已经褪色，字迹也淡得若不仔细瞧还以为上面什么也没有写明。床上一片凌乱，被子大概从来没有叠过，地面桌面也到处乱糟糟的。“红卫兵”，这也叫“兵”？他瘪瘪嘴，表示对这些知青的鄙视。百无聊赖之中，又想起了李妹。对于这个曾经给过他短暂欢乐又榨光了他钱的农家姑娘，不知道是该爱还是该恨。他在屋里转了几圈儿，感到有些疲倦，就上床睡。上了床，感觉又不一样了，李妹要是现在睡在身边就好了。过了一阵才昏昏睡去。

醒来已经是中午，三个知青把他吵醒，嚷嚷说肚子饿了。他明白他们赶场没有啥收获，所以早早回来了。起床一看，原来王哥也回来了。刚想发问又觉得不妥，毕竟自己在这里是临时避难，再说还比他们大两岁，也不属于同一层次。至于谁高谁低，那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于是他不动声色去灶屋煮饭。

从卧室里不断传来谈笑的声音：

“田哥这回整对了。他说回成都一定先‘煽’一个漂亮的‘盒盒’再说！”

“白癞子才从成都回来，说那里的向阳部队才闹得凶，敢跟警司干！”

“魏夫子说台湾广播了，马上要打世界大战！”

“那才安逸，冲锋枪一端，一梭子子弹出去，撩倒他妈一槽！”

“我才不信这一套，说了多少年，还不是空话，又不真打！”

“还是先来点儿真的，先弄个盒盒再说！”

沉默了一阵，不知是谁先开口，接着都唱起来：“不捡烟锅巴呀，不喝盖碗茶呀，也不吃油大。煽上一个漂亮的盒盒……”声音杂乱，严重走调，但充满激情，还用不知道什么东西敲桌子敲盆作为伴奏。江又安受到感染，一边哼一边把烙好的贴饼子洒了盐巴端上桌子来。王哥咬了一口，称赞说：“安逸！江哥硬是有水平！”

戴哥说：“王哥你不晓得，江哥的苞谷汤圆那才有水平。”江又安说：“这不算啥，可惜哥们的手艺不过关，不然搅点儿苞谷凉粉吃！”他边吃边吹，说八队有个守工棚的徐晓丹，他做的苞谷凉粉如何如何好，个个听得入神。

江又安在这里住了七天，这才坦然出门，直奔成都。不出所料，一路畅通。

第十四章　装怪

赖组长主持小组会，大家以为他还是说江又安的事，一开口才知道猜错了，赖组长说："指导员召集各组组长开会，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大家讲清楚：明天中午省劳改局的领导要到我们八队视察，大家要从各方面重视。"他清了清嗓子，咳了两声，以引起重视。"首先衣着要整洁，哪个故意穿得巾巾吊吊的，丑化劳改队的形象，这是个啥子性质的问题，大家都是晓得的。"

话刚落音，李烂王接茬儿说："赖大组长，我就这身烂衣服，到哪里去借整齐一点儿的衣服嘛！"

他这样一说，很有几个人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刘富义还说："这几年布票都没有发，拿啥子买布做衣服嘛！"

赖组长瞪了他一眼："你几爷子听我说完了再说。我是在传达队部指示。还有室内卫生也要好生搞，散了会大家一起动手归整，该捡的捡了，该收的收了。吊起的挂起的破破烂烂都取下来包好放到床底下。实在难看的先在工棚放两天，明天上午韩大学、谭志云两个留下来再彻底整往一下。再有，明天出工做活路的要展劲，不要一个二个要死不活的样子。两个灯笼挂高些，劳改队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不长眼的。还有说话嘴巴也要把稳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莫乱说。哪个装怪，出洋相，惹了祸，后果自负。反正在八队也不是呆一天两天，要想长远点儿，莫只图嘴巴一时痛快。"

他说完了，刘富义说："明天伙食也该改善一下嘛！"众人同声赞成，连赖组长也把绷紧的脸放松了，说："这个不消你几爷子操心，队部还没得个考虑？我們组老徐喂的猪还小，三工区有一头猪已经杀得了。"

大家这才喜笑颜开，只有李烂王还在为他的衣服发愁，对赖组长说："赖组长，我的家当你是清楚的，衣无二件，裤无二条。借衣服嘛，洪士奎倒是乡，可惜他又走了。"

众人都笑，赖组长一本正经地说："这又怪哪个，平日又不讲究节省。这样嘛，明天一早你跟刘富义一路去哥茅草，准备给宿舍上面加点儿新草，中午莫回来，也免得刘富义给老子惹祸。"

李烂王问："那中午的肉呐？"

赖组长说："伙房晓得给你留，他妈的一天到晚忘不了吃！"

当晚全队各组都大搞卫生：扫的扫，包的包，收的收，藏的藏，只是没有扔的。破家值万贯，哪一样破烂都有用。

第二天各组又都留了一些人，给熏得漆黑的竹芭笆墙刷石灰，又在外面贴了许多大字标语，水沟也彻底清理，还喷了不少农药。药味弥漫，蚊蝇绝迹，地面干干净净，连锄头都擦

得锃亮。马中队长下来检查了一遍，基本满意，只是石灰刷得有点儿薄，黑没有全遮住。韩大学说已经刷了三遍，实在没法。马中队长破例没有发脾气。

中午开饭的时候局长出现了，在指导员、中队长、事务长陪同下到了伙房，看着那雪白的大米饭，两大盆油汪汪的回锅肉，衬着红辣椒，洋溢着香味，他拿起勺子搅了搅，翻上来的全是大肉片，一点儿也没有搞表面形式，满意地笑了。然后问两只手不断来回搓的伙夫："你们多久吃一回肉？"伙夫激动得语不成句："经常吃，经常吃……"指导员忙接过去："农闲一个月一次，农忙一个月两次，每次半斤。"局长说："你们的就业人员吃的肉比贫下中农还多。"干部不知道这句话是称赞还是批评，不敢随便回答，幸而局长并不在意。

下午视察菜园，还专门看了徐晓丹的工棚，表扬了几句。晚饭后在院坝里开会，全体就业人员坐得整整齐齐，听韩局长讲话。他从国际国内的一派大好形势谈到党的改造政策，引用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又传达了一段最新指示，然后笑嘻嘻地问："你们的干部不打你们吧？"

下面有几个人回答："不打。""从来不打。"声音稀稀拉拉。指导员皱起眉头。赖组长大声说："干部教育我们很耐心。"韩局长满意地笑了，连平日少有笑容的马中队长也咧开了嘴。突然，在队伍的最后面，外号"天棒"的刘富义站起来大声说："报告局长，马中队长经常打人。前天在六组一下午就打了三个人。"

不论是就业人员还是干部都呆住了，连在一旁看热闹的家属都捏了把汗。局长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脸红筋涨的马中队长：他头稍稍低下，两腿呈现欲走未走之状，嘴后一动一动的，看不出是想说又没有说还是已经说了只是声音太小听不清。局长脸上的筋抽动了一下，经过短暂调整立刻放松下来，亲切地对马中队长说："老马呀，他们有错误好好地教育嘛，不要再打了，啊？"干部们的目光全转向马中队长，他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弄得更加狼狈。局长却轻而易举地把话题转到就业人员思想太坏，惹干部生气这方面去。

第二天马中队长和场部通了电话，得知局长一行已经回成都了。他先把赖组长叫到队部，重重赏了他几马靴，边踢边骂："你这个老土匪！队部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过后又叫才受过他申斥的邓管教通知晚上全队开会。

会议程序极为简单，一切繁文缛节全都省略。邓管教刚说了声现在开会，已经强忍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马中队长就一声怒吼："刘富义你给我滚出来！"刘富义痛痛快快走到前面。仇人相见，份外眼红。马中队长亲自动手，东一勒，西一扣，把刘福义捆个结结实实，绳子直陷进肉里，再把他吊在篮球架上，离地一尺来高。他根本不理会刘富义的叫喊，一边操作一边骂："我叫你装怪！我叫你装怪！"吊了一阵仍不解气，又用装满鹅卵石的茶筐挂在刘富义的脖子上。

叫喊变成呻吟，大颗汗珠一滴一滴落在三合土地面上，不久就湿了一片。马中队长不停地骂："你狗日的去告嘛！你狗日的去告嘛！告到成都我也不怕！告到北京我也不怕！有本事你上中央告去，找毛主席告去！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动我一根毫毛，不信你个臭劳改犯还能翻天！"

他越说越气，来回走动着，指导员看见刘富义实在不行了，就自作主张，叫赖组长把他

放下来。赖组长解开绳子，抓住他的膀子由轻而重地甩动，好让他的血脉尽快畅通。刘富义坐在地上直喘气，吐出许多白沫。马中队长怒气未消，照他的屁股上又是两脚，邓管教不断地小声动解，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字："算了算了。"

第十五章　艳遇

江又安到了成都，白天好混：早在七点到八点到几条公共汽车线路去"上班"。上午在公园或商店闲逛消磨时间，午饭后看电影。与其说在看电影，不如说在睡觉。下午五点到六点再去"上班"。他都是一个人干，不用别人帮忙。这样，既不必把钱分给别人，也避免别人出事自己受牵连。好在他技艺高超，对环境的估计分析能力又强，倒也过得满舒服的。只是晚上不好办：躲在公园里不行，清园的把假山洞子和树林深处都清到了。火车站也不行，经常有各种戴红袖套的查车票和外出证明。没有办法，只好躲在正在施工的楼房里，在硬梆梆的水泥预制板上过夜。再不然到放置在马路旁边的下水道管子里藏身。天气渐冷，尤其下雨的时候冷得发抖。几天下来，骨头硌得生疼。

白天吃喝闲逛以神仙，晚上睡的还不如劳改队的稻草铺，这反差实在太大，得另外想办法。

有一天下午，他正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看见一个穿着颇为时髦的粉红色的确良上衣的中年女人。她左手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右手夹着烟，边吸边穿过铁路线往车站后面走。他心里一动：这样的女人不会是工人或干部，更不会是农村人。再看她的眼神，总在年轻小伙子身上转。根据他多年在城镇混出来的经验，他断定这不是什么正经女人，决定冒冒险。

跟着她穿过铁路以后，他掏出一根烟，上前主动打招呼："大姐，对个火。"

那女人不在意地从嘴角取下烟递给他，很快瞥了他一眼，把脸稍稍转过去一些。

他吸了一口烟，小声问："大姐，你这是上哪里去？"

女人不理他，快步往前走。他紧跟上，小声说："大姐，请帮个忙。"

那女人没有回答，仍然往前走，脚步却放慢了些。

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大姐，我是外地的，在这里做生意，身上的证明遭摸了，现今没得地方住，都是出门在外的，请大姐帮个忙。"

女人露出一丝冷笑，立刻又消失了，随后冷冷地说："这个我管不着。"

他毫不灰心，陪笑说："大姐行个好，我在成都人生地不熟，请大姐多帮忙，我一定知知恩必报。"

女人不松口，边走边说：“少说这些，我不管这些事。我又认不到你。”

“头回生，二回熟，这下就认到了嘛！”

“不行不行，少啰嗦。”

难道看错了人？绝不会。她没有大喊大叫，没有提到治保组、联防队什么的。不能灰心，于是继续进攻：“只住一晚上就走，就一晚上，给一张票子。”——“一张”是十元，是当时的最高面额。

“给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大姐，你也是个外场人，山不转水转，你带了我的大忙，我一定报答你。”

女人不再言语，两个人慢慢走着，保持一定距离。已经到了郊外，人烟稀少。他又说：“明天一早就走，饭也在外面吃，生意做成了，格外答谢你。”

女人松口了：“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做啥子生意的？”

一听有门，他喜不自胜：“我是顺昌县的，做药材生意……”

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头：“我看你像个钳工！”

他毫不惊慌，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话抛出来：“大姐好眼力！不瞒你说，我是干这个的。”说着，伸出两根手指，做了个夹钞票的动作，随着女人进入一个村落。

小路弯弯，到处是灰尘、垃圾，路面不平，坑坑洼洼里积着污水。房屋多数是新建的，矮小零乱，行人稀少。穿过狭窄的街道，进入一个更窄的小巷，来到一个代销店前面，门面很小，还上着门板，侧旁是一个只容一个人通过的通道。女人掏出钥匙开了小店侧门，他跟着进去。里面是个卧室，有门通前面的店堂。房间不大，收拾得倒还算干净，在郊区农村也算可以的了。

不等她开口，他先摸出一张“大团结”给她。她放下塑料袋，安顿他在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床上，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美君，有个女娃儿叫二女子，别个带她出去耍了，晚上八点才回来。你把地方认准了，过了九点人少了再回来。”

他把屋子再仔细打量一番就出来。听见陈美君在他身后轻轻地关上门。他在街上四下仔细观察了一番，确信已经记住了这个地方，才又向城里走去。他对今天的意外顺利有点儿犯咕咕，转念一想：管他娘的，快活一天算一天！反正那里死哪里埋，想那么多干啥！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的“上班”时间。上午他在汽车上就听说一八三厂今天下午发工资，就到十五路公共汽车去“上班”。一出手就得了四十多元，还有几斤粮票。先到大众餐厅吃了一顿，又进电影院看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渔人之家》。他对这种缺乏女人的片子根本没有兴趣，只不过消磨时间罢了。

走回小巷，天已经黑尽。代销店漏出一线灯光。他轻轻推门，门是虚掩着的。蹑手蹑脚进去，灯光下陈美君坐在小板凳上洗脚，上身是件白衬衣，下面一条粉红色短裤，霸出大半截大腿，正在用毛巾擦去小腿上的香皂泡沫。

江又安的魂都被她勾了去，眼睛直直地盯着那雪白大腿的肌肉自然下垂所产生的弧线，想象力却一直沿弧线向里延伸，仿佛看见了白嫩的屁股。他心慌意乱，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了。陈美君发觉后有些恼怒，低声喝斥："贼伙伙地看啥子，还不把水倒了，也去洗个脚!"江又安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弯下腰端起了洗脚盆，陈美君穿上拖鞋站起来说："把水泼在厨房后面的水沟里，炉子上有热水。小心莫把二女子弄醒了。"

他的心扑扑直跳。端了热水回来，女人坐在床沿，问他今天"生意"做得如何。他又给了她一张"大团结"作为回答。眼睛不看女人的笑容却总是离不开她的大腿，马马乎乎洗了，倒了脏水，转来就问："大姐，今晚我睡哪里？"

她没有回答，身体稍微向后仰，靠在显得很整齐的缎面被盖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在白色衬衣下面，丰满的胸部凸现出两个半球。他欲火中烧，饿狼似的扑过去，陈美君却站起来走到门前把门闩好，再把窗帘放下，最后关了灯，屋里顿时一片漆黑。信号终于发出，他再次扑了上去……"　　后半夜他醒来，向她提出了一个在他脑海里盘旋已久的问题："今天下午咋个你听我一说就放心留我住？"

"我一眼就认出你是元山茶场的!"

"啊!"他的手一下子从她的胸脯上滑落，刚要坐起来，却被她按住了："你听我说，你原来是二队的，是不是？"

他也冷静下来，反问一句："你咋个晓得的？"

"我也是元山茶场的，在女三队。有一回送茶路过你们二队，你还招待我喝开水。"

"唔，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不过你好像不姓陈。"

"我原本不姓陈，我叫刘淑珍。"

"哦，是你呀!"他差点儿要说出洪士奎三个字，赶紧打住，改口说："你比原先白了，也比原先胖了，完全认不出来了。"

"要不是我认出了你，我才不得留你。你那几句话，哪个编不来？"

从此他就在这里安心住下。听她介绍说，她在这里有个姓张的"男朋友"，是个"人保（人民保卫组）大爷"。他有老婆，只能偶而以办事为名出来在她这里住。现在出差到外地去了。她还说了她跑出来以后的种种经历和小女子的来历。他嘴上附和着，心里根本不信：逃跑的人能有几句真话！再说也没有必要去想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每天"上班"，有惊无险，晚上还能搂着一个身体丰满充满激情的女人，这就够了。就这样舒舒服服过了七八天。

一天早晨，他出门之前，她说："晚上早点而回来，有事给你说。

"啥子事？"

"回来再说。"

一整天他都在想，他不能断定是什么事，但肯定有些不妙。他的结论是："大不了整烂，整烂就过灌县。老子啥阵势没有见过？"

天刚黑他就回来，她在屋里等他。她开口就说："这几天风紧得很，说要开展突击大检查。我已经把二女子送走了。你这么多天没有失手，久走夜路总要撞到鬼的。"

他全明白了，忙说："大姐放心，我马上走，不让大姐你为难。"

"你走哪里去？"

"没得一定，哪里黑哪里歇。"

"你这身份，到处走，还要找钱，危险得很。这次是全省统一行动。"

"那有啥办法，反正人哪里死哪里埋。就是弹进罐罐里，也不得把大姐供出来。"

"我看你还是先回元山茶场避避风，过了这一阵再出来。"

"回去不得。我们队那个马老霉歪得很。那次收拾刘富义那个阵仗，你是没有见过，吓人得很。我回去，他肯定要收拾我。"

"这个我也替你想过了。你是主动回去的，再认个错，下个矮桩，他不会把你咋样。不过你不要直接回队上，先到场部管教股立点儿功，他们一定会给队上打招呼，不得为难你。"

"立啥子功？"

"前天我去买菜，看到两个人，你猜是哪两个？"

他摇摇头。她继续说："场部小厨房的张会恩，还有原先乔股长的婆娘陈桂花。像两口子一样，亲热得很！"

"这两个我晓得。你跟他们打招呼了没有？"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我。我一认出来就躲开了。"

"你认人的本事真不小！"

“我最怕劳改队的人把我认出来，所以我随时都小心。”

“其实你的样子大变了，又白，也不像原先那么瘦，乍一见硬是认不出来。”

“那也不能大意。吃公安饭的人眼睛尖得很。喂，刚才我说的事，你说要得不？”

“就照大姐的意思办，明天一早我就回去自首。”

“不用那么早，吃了中午饭再走都不晚。我这里有好烟，你带两包回去散给组长。阎王好见，小鬼难防。”

他这才坐下来，伤感地说：“就是有点舍不得你，以后又得一个人睡了。”

“男子汉大丈夫，要提得起放得下，今晚我给你送个行。二女子不在，我们就耍个通宵。来，你帮我脱衣服。”

第十六章　归来

江又安动身，刘淑珍给他买车票的钱，他说他有，就没有接。坐上长途客车顺顺当当回到建阳县，再到场部，进了办公大楼。上二楼的时候，心里已经暗自打鼓，还挺起胸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给自己壮胆。在走廊上刚好碰见管教股的樊干事。樊干事来过八队，所以他认得。他赶紧低头，似鞠躬非鞠躬，恭恭敬敬地说：“报告樊紧干事。”樊紧干事早就注意到这个三类人员，厉声问：“你是哪个队的？”

“报告樊干事，我是八队的，叫江又安。上个月跑出去的。”

樊干事马上想起来，八队于指导员曾为此事给他打过电话，原来是这虾子！他厉声问：“那你咋个又回来了？”

江又安想好的话一下子都吓跑了，正好从三楼下来几个干部，樊干事把声音放柔和了些：“走，到办公室交代。”

进了办公室，樊干事坐在椅子上，拿起热水瓶慢慢往茶杯里倒水，水倒满了，把热水瓶放回桌子上，又慢慢端起茶杯来吹了一口气，慢慢呷了一口，这才对站在门口的江又安说：“进来，坐下说。”

江又安进来，看门口里边有一个方凳，估计是专门为三类人员准备的，就坐了半边屁股。樊干事起身把门掩好，然后向江又安示意：“唔？”

“上个月我违反纪律，偷跑出去……”

“啥子违犯纪律，是重新犯罪，懂不懂？”

“是，是犯罪。我跑到成都，那个日子硬是恼火，没得地方歇脚，白天还好混，晚上住公馆……”

“公馆？啊？啥子公馆？”

“就是马路边安装下水道的水泥管子，是公家的东西，就叫公馆。”

樊干事也忍不住笑了。随即醒悟到有失体统，马上板起脸：“就是你鬼名堂多，起个名字也装怪。再装怪，看老子收拾你！”

为自己的幽默所感染，江又安的口齿开始灵活起来：“报告樊干事，外面的日子硬是不好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联防队、居委会搞治保的，红袖套遍地都是，看到都头皮发麻，一天到晚都在抓人，走到马路上，一听见后面警车响，都以为是来抓我的，骨头都吓酥了。随便看见一个人都像是便衣儿。”

“这就叫人民战争威力无穷，牛鬼蛇种无处躲藏！”

“后半夜又冷，水泥管子梆硬，梗得骨头痛，又怕遇到查夜的，睡都睡不踏实。又找不到钱，如今成都人‘醒’得很，有时候一天都开不了张，只有啃干饼干。过去的熟人也碰不到一个，又不敢去找，怕都弹进罐罐了。”

樊干事冷静地听着，他从不相信任何一个三类人员的任何话。正在此时，管教股谢股长推门进来，樊干事和江又安都连忙站起来，樊干事动作还稍快些。江又安说：“报告谢股长，我正在交代逃跑罪行。”

谢股长在樊干事对面坐下，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这才面带笑容说：“你是自己回来的，这就好，迷途知返嘛。对于逃跑犯，我们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

江又安说：“感谢政府宽大，另外我还要向政府检举一件事。我在成都看见张会恩了，他跟那个女的一路。”然后详细介绍了他的“发现”经过。

谢股长听了只是说：“晓得了，你明天就回队，把逃跑经过，出去干了些啥子坏事，一五一十地交代，不准有丝毫隐瞒。”

江又安立刻换一副可怜相：“报告谢股长，我不敢回去，马中队长最恨逃跑犯，回去他要捆我，求政府给我格外调个队才要得。”

谢股长说：“没得关系，你回去就是，我给他挂个电话。”说完就拨号通话：“喂，喂，是我，管教股，找马队长，哎……喂，老马，是你呀，你们队的江又安，对，江——又——安，自己回来了，现在在场部，……咋个，没得人？……好，好……哎，就这样。”放下听筒，他对江又安说：“你们队上说，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就是了。”江又安一高兴，忘了鞠躬，回身就走。

看着江又安出了门，樊干事试探着问："谢股长，是不是我去成都把他们两个弄回来？"

谢股长吐了个烟圈儿，这才说："弄回来，啥子影响？"

樊干事碰了钉子，有点儿尴尬，就自找台阶下，自言自语说："也好，省得场部他妈的每月补助几十元！"

江又安到了场部制茶房，旁边有一间屋子，是就业人员的"招待所"。值班的雷老头兼管修鞋。江又安报了队名，姓名，在登记本上填了日期，就进了屋。里面并排有四张床，已经先有两个壮汉在那里。互相招呼过，知道他们是才从五队来准备调到集训队当值班的。他们见了江又安，就问他："喂，老乡，你是几队的？"

"八队的。"

那个稍矮一点儿的问他："听说你们队有个刘啥子义的，跳崖死了，是咋回事？"

江又安心里一震，马上又装作一副见惯不惊的神气说："叫刘富义。死了就死了，啥子咋回事。"

那个稍高一点的，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操着重庆口音说："啷个搞起的，死总有个原因嘛，好端端的哪个愿意死？"

"晓得啥原因，他个人要死，哪个拦得住他？劳改队死个把霉和尚又算个啥！"

"我听茶房的人说，是因为请短假回家探亲，没有准他，自己想不通才跳崖的。"矮个子说。

"我听基建队的人说，是因为开会捆了他一绳子，他想不通才跳崖的，不晓得是不是那回事。"高个子说。

江又安说："管那么多做啥！过天算一天，哪里死哪里埋！"

话不投机半句多，高个子转了话题，问矮个子："戴组长，今天晚饭到哪里吃？"矮个子想了想说，找古麻子煮点稀饭就算了。江又安这阵子觉得肚子也饿了，好在身上有粮票，就近有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充饥，边吃边想："老刘可怜啊，这辈子怕连饼干都没有吃过！"想到这里有点儿心酸，长长出了一口气。

回到队上，马中队长叫他还在三组劳动，先在组内交代问题。当天下午一出工就下大雨，啥活路也干不成，于是一人一把刀"砍梯"——茶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坡度较大的山坡上修成水平的带状梯田，在近似垂直的梯壁上长满了杂草，用刀把草砍掉，草落在茶树下可以作肥料，这个活儿叫做"砍梯"。

雨越下越大，就业人员都没有雨衣之类，浑身上下湿透，连赖组长也受不了了。砍梯不

是什么要紧活儿，他四下一望。蒙蒙一片，远处山坡上不见人影，周干事也没有上来，就往附近徐晓丹所在的工棚走。

组长的行动就是信号，盼望多时正在特命的组员也都一溜烟儿溜进工棚。工棚里顿时人声嘈杂，有的找板凳坐，有的脱下湿衣服找地方挂，有的嚷嚷要生火烤湿衣服。但是工棚里柴不多，是徐晓丹自己上山砍的，用来煮饭烧开水煮猪食。他自从死了老婆，性格越发古怪，不通商量。这时候他自顾自地剁助草，对进来的人毫不理会，也不出来和赖我组长打招呼。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谁也不敢动他的柴。赖组长只好说："将就歇一下算了，烤啥子火，拐这时候冒了烟，周干事在队部望到了，就知道你几爷子又去躲雨了。"

大家觉得组长的话在理，就不再提烤火的事，七嘴八舌地埋怨起天气来："他妈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硬是他妈的背时！"

"狗日的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天无三日晴！"

埋怨声中，赖组长想起江又安的事，该在小组会上交代一下的，现在开个小组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躲雨了。于是他招呼大家："都坐好，坐好，听我说个事。谭志云你莫在门口站到，进来进来。你那个地方队部正好望得到。中队长有个指示，江又安的逃跑问题要由小组处理。今天趁雨大，开个会，现在都安静，听江又安交代问题。"

黄疯儿嬉皮笑脸地说："逃跑犯江又安站起来，站好，接受革命群众批斗！"

李烂王反驳："你算啥子革命群众！"

赖组长有些恼怒："少打岔，都莫开腔，听江又安一个人说。"说完在腰里摸了一下："哎呀，忘了带烟了。"

马上有人递过八分钱一包的"蜜蜂"牌纸烟来。赖组长正要伸手接，江又安已经取出一包"绿叶"牌香烟和一盒火柴来，先抽出一根烟送给组长，其他人见状纷纷伸手，江又安给每个人散了一支，又给赖组长划火柴点烟。在一片青蓝色的淡淡烟雾里，个个怡然自得，赞美烟味的纯正，有的干脆闭上眼睛享受。

江又安也点燃一支烟叼在嘴边。他坐在小板凳上，上衣脱了搭在肩上，光背靠墙，一副不怕冷的样子，像讲故事一样交代逃跑经过。他说他是搭货车跑的，对于到成都以后如何"上班"如何住宿，他也全盘托出，只是不说刘淑珍的真实身份姓名和住址。组员们个个听得入神，眼里放光，无人咳嗽出声，连隔壁徐晓丹劈柴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江又安讲他和"那个女的"如何在她家里过夜的时候，就有听众问："她比李妹哪个骚？"

"李妹差远了。"

"哈哈哈……"一阵淫笑。

“你娃娃艳福不浅！”

“咋个骚法？”

江又安非常得意，形容说：“这个烂婆娘花样玩得出色！”黄疯儿还要追问，赖组长大吼一声：“你他妈的少放些毒！”

众人不敢放肆，谭志云问他：“那你咋个又舍得回来？”

“我怕久走夜路总要撞到鬼，就主动回来了。”

赖组长称赞：“看不出你娃娃年纪轻轻，能屈能伸。二天在社会上肯定操练得出来！”

江又安听见组长夸他，比六月喝雪水还痛快，就大吹起来：“莫看老子年纪不大，从十五岁开始混，也这么多年了。没进劳改队之前，那样女人我没有玩过？老的少的，没有开过苞的。不是吹，在八队，我怕要数一数二的了。”

“莫吹，你再行市，总比本上我们老组长！”

黄疯说：“就是，比我们赖组长，你还嫩得流水。赖组长，我说的对不对？”

江又安又点好一支烟送过来，赖组长吸了一口，吐了个烟圈儿，他的兴致被提起来了。再说，他也不能叫一个年轻娃娃比下去，就说：“那当然！老子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弄过的不计其数，啥子俊的丑的女的男的死的话的，都不在话下。”

“死的也弄？”许多人不解，连一直不吭声的韩大学也抬起头。

“说起来吓你一跳！那年我们县城里有个大地主，他有个女子才十七岁，那才叫漂亮，全县有名的一朵花，得病死了，埋在城外一座大山上。山上没得人家，刚埋下去，我们几条烂龙一商量，生前我们看都看不到，死了也要过下瘾。大白天的十几个人在山上架起大铁锅烧开水，打开棺材抬出来，身子雪白……”

韩大学轻轻吐了一口痰，把脸转过去。

“先用热水把身子烫软了，有了热气，就跟活人一样。我们轮流上……”听众屏声静气，猪圈里的猪突然嚎叫起来。徐晓丹一边骂一边打猪。猪叫得更凶，赖大兴的话被打断，只好停下来。过了一阵廖胖娃问：“你咋个这么胆大，我想起来都觉得吓人。”

话题转了，有的说胆子大是天生的，有的说经过的事多就胆子大。李烂王说自己白天胆子大，啥都敢干，到了晚上就害怕，一个人连树林子都不敢进，更不敢到坟地。赖大兴冷笑：“你娃娃还嫩得很！”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听老辈子说，要吃活人心肝，胆子才大。那年我们抓到一个老几，几个烂龙一商量，要拿他开例，就把那虾子绑在树上，嘴巴堵起，衣服剥光，旁边摆上案桌，案桌上放了把明晃晃的尖刀，又架起油锅，清油熬得直冒烟……”

众人有的低下头，有的把脸转过去。赖大兴觉得自己不该忘乎所以说这些，就住了嘴，干咳两声。隔了一阵，黄疯儿才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那咋个镇反运动你又没有遭起呐？"

"还不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好！五一年我遭抓了，关进死囚组。总共一百多人，都关在小学教室里，隔几天就拉出一批去打脑壳。我在里面表现积极，政府委我当死囚组组长。因为人多，手铐不够，政府专门发给我几副手铐，由我掌握。哪个龟儿子哭天喊地寻死觅话，我就把手铐给他戴上。后来因为我那些烂滚龙朋友都上山当了土匪，政府叫我去喊话，要他们下山自新，我总共喊了一百多个人下山，才免我一死，判了二十年。"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也放低了："不过那些下山的，后来还是打了脑壳！"

韩大学盘算了一阵才问："五三年判你二十年，你该今年才满，为啥文化大革命之前你就到了就业队？"

"还不是我在劳改队表现好，当了大组长！那阵我积极得很，哪像现在这样马虎。那阵开斗争会，老于把脸一抹就不认人，说捆就捆个四马攒蹄，说吊就吊个鸭儿凫水，整得一个二个乌鸡呐喊的，这才减了二年刑。五九年过粮食关，有几个人想翻天，我揭发了张王集团，立了功，又减了刑。"

得志云说雨小了，赖组长起来说接着干，小组会也就结束了。徐晓丹出来收拾，把满地的烟头和烂鞋带进来的泥巴统统扫到门外的水沟里。

第十七章　送行

于指导员不停地喝酒。老婆子再三劝，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他根本不理。说烦了他把脸拉下来，拍着桌子瞪着发红的眼睛说："你还有脸说！都是你惯的！"吓得她不敢多防，悄悄儿溜出去找邓管教。他知道老头子还听邓管教的话。

邓管教过来就笑着说："老远就闻到酒香了，一个人喝，也不喊我。"

这个时候的指导员本来谁也不想理，可是情面上又过不去，只好说："老邓，坐，喝一杯。"又喊："老婆子，拿个酒杯来。"

邓管教拉了把椅子过来在一旁坐下，吃着炒花生喝了两口，然后说："酒是好东西，一醉解千愁啊！"

指导员说："解啥子愁呵！喝是愁，不喝也是愁。"说完又是"咕咚"一口。邓管教说："喝了是愁，不喝是不愁，对不？"

指导员摇摇头，端起酒杯又要喝。邓管教夺过杯子："老于，不要再喝了。"指导员说："老邓，你莫拦我！"他又把酒杯夺回来要倒酒。邓管教不再夺，笑着说："我是说，你不用再喝了。"

“什么？不用再喝了？”

邓管教一脸郑重：“老于，老嫂子都给我说了。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几分。这队上啥事瞒得过我？”

于指导员突然坐直了，望着邓管教：“老邓，不是我瞒你，实在，实在，唉，”他头稍稍低了一点，猛然一拍桌子，花生米在盘子里路跳了两跳，有两颗滚出来，他看着花生米从桌面一直滚到地上，才说：“家丑不可外扬啊！”

邓管教心中暗笑：连就业人员都知道了，几个队干部除了马中队长以外哪个不背后取笑，还怕“外扬”！只好说：“要紧的是想办法，光喝酒不管用。”

“有啥办法？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劝也劝了，好话说了几箩筐，”他苦笑着摇摇头：“可有啥用？老婆子天天守到哭，也哭不转她的心！”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又倒上一杯，咕咚咕咚喝下去。邓管教不再拦他，安静地等着。他轻轻拍了拍桌子：“不晓得前辈子欠了她的啥子情，今生来还她的债，简直是要我的老命！”

邓管教见时机已到，就来了个开门见山：“老于，这事好办，你交给我就是了。”

指导员睁大眼睛：“你？”然后摇摇头：“哪个也没有办法，有啥办法？”

“把他调开，调得远远的。”

“这个我也想过，只是找不到理由。我连放他回家都想过，只要保得住小玲，就便宜这个狗杂种！可是重庆是个大城市，根本不会接受。”

“把他调到二十六队，在尖子山顶，天高地远的，又是张宏均在那里，管得严。理由嘛，在人说。就说队上逃跑犯多，先是王自洁，后来是江又安，谭志云是重庆的，回家没有指望，也有逃跑迹象。我跟场部几个头头都熟，再给老张一说，他们队上有台柴油发电视，谭志云不是会整吗，他还有不要的？”

于指导员觉得可行：“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不要走漏风声。来，我敬你一杯。”

过了一个月，一切安排妥当，邓管教对指导员说，明天有汽车过来卸化肥，老张随车过来接人，临时喊谭志云帮到卸车，车要开的时候再宣布调动，同时另外派人给他捆行李，立马就走，整他个措手不及。指导员连声说好。邓管教走了以后，他把这个喜讯告诉老婆，又说：“赶紧给小玲找婆家，一来断了他们的念头，二来免得夜长梦多。”

老婆有点为难，说小玲那个死女子油盐不进，虽说她哥在部队上，给她介绍一个也不难，只怕小玲一时放不下那个劳改犯！于指导员把眼珠子一瞪，嘴巴咬紧，半晌才说：“介绍对象的事那就暂缓一下，以后慢慢想办法。只要断了她这头总好办。要紧的是我饶不了谭志云这个烂虾子，不能让他白占了小玲的便宜就这么走了。哼，老子要让你知道我马王爷长的是三只眼！”

老婆子从来没有见过老头子生气的时候这么吓人，不敢再多嘴。

指导员找马中队长，没有找到。事务长说中队长到一工区去了。指导员到一工区去找，没有找到。赖大兴说马中队长是来过，可是又到二工区去了。于是他又到二工区，看见他正在发脾气，抬起马靴踢一个名叫傅保全的屁股，骂他偷懒，耍死狗。等他发作完了，才对他说有事商量。两个人回到队部，指导员把事情一说，马中队长说前几天老邓就告诉他了，昨天也通知了二工区周干事，只是太便宜了这个狗杂种！指导员问："那咋办？"他说："得好好地给这小子送送行！"于指导员乘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马中队长一拍大腿："行！就这么办！"然后两个人又嘀咕了一阵。

第二天早上出工的时候，周干事叫谭志云留下。马中队长过来对谭志云说，公路旁边有间小平房，原来是堆放石灰的，现在里面没有石灰了，要打扫一下，将来养路可以在这里放炸药。然后带着谭志云沿公路走，到了小平房前，他叫谭志云进去打扫。谭志云刚进去，在里面等候多时的于指导员猛地将他按倒，马中队长随后进来，掏出绳子捆住他的手。谭志云大声喊叫，指导员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巴，然后动手打。谭志云极力挣扎，在地上翻滚。于指导员一个人还按不住。马中队长插手，把他翻过来脸朝下背朝上，又使劲压住他的腿。于指导员这才放开手脚，猛挥老拳，一边打一边咬牙切齿地骂："你个狗日的！你个狗杂种！"

谭志云已经挣扎不动了，马中队长出来守住门口，听见里面不断传出撞击声和骂声，他的脸上露出狞笑。后来里面没有声音了，他进去看。见谭志云躺在地上不动，指导员站在墙角喘气。他把谭志云翻过来，弯下身子查看他的脸，除了灰土之外没有伤痕，这才放心。指导员努努嘴示意，他就又出来，隔了一阵从里面再次传出打骂的声音。

接近中午，远处响起汽车喇叭声，马中队长叫指导员去拦车，自己留下来照看谭志云。于指导员拦住了汽车，随车到了院坝。周干事组织了几个人卸化肥，于指导员吩咐赖组长把谭志云的行李捆好放进车厢里。赖大兴吃了一惊，又不敢多问。指导员却主动说：何志云先调到场部，准备联系放他回家，人已经先走了一步。他一直在旁边守着，直到行车装上了车，才和张队长招呼。张队长刚收好邓管教交给他的副档，两个人寒暄了一阵。于指导员最后说："本来要留你吃饭，时间紧，就不留了。老马在前面等你，他说在场部请你。"张队长说："好，我和老马也有一年多不见了，路上正好摆谈。"邓管教也说了几句，于是三人握手告别。

汽车开到小平房前，马中队长在门口招手示意。汽车停下，马中队长进屋把谭志云扶出来，张队长见谭志云弯着腰，手护着肋下不断呻吟，吃了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马中队长微微一笑："先把他弄到车厢里，回头再给你说。"两个人把谭志云高举过车厢板，然后猛地撤开手，谭志云痛极大喊。两个中队长随即钻进驾驶室。汽车跟着发动，呻吟声就被车轮碾过石子路面所发出的轰鸣声淹没了。

第十八章　堕落

江又安回到队上虽然已经有些日子，却仍然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苞谷馍馍老梭边难以下咽且不说，恼火的是还得出工。

这段时间的任务是割草，每人每天的定额是五百斤。赖组长亲自掌秤收草。这个活儿要早起，早晨露水大，草才压秤。找到草原，先割一大堆放在背阴处，这样草不容易晒干。然后往回背。上午三趟，下午一趟，三点多就能完成全天任务。早一点回村补睡一觉。这个活儿他以前没少干过，完成任务没啥问题。可是经过那十几天的特殊生活，他对于干了好几年的农活甚至对整个劳改队的生活突然间很不习惯起来，似乎那几年还不如这十几天长。

晚上睡在铺上，眼睛仰望着上方，黝黑的屋顶没有雪白的蚊帐漂亮；铺的稻草再厚也不如那张双人床软和；周围打呼噜的声音令人想起她的甜言蜜语；汗臭加烟味儿哪比得上香粉的气息。有时候他故意闭上眼睛，好让她的音容笑貌再次出现。但是出现的只是雪白的大腿，面貌却模糊不清。他幻想着能拥抱一个温暖柔软的身体，身边却是一床破旧棉被。这样一直要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当凄厉的哨声把他惊醒的时候，全组的人都早已走光。他浑身困乏，无精打采地拿起割草刀，越割越没有劲儿。尽管所割的草带有过多的泥巴，一天下来也只有二百来斤，不及定额的一半。

头两天赖组长看在“绿叶”牌香烟的份儿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两句，后来看他总是如此，就渐渐地把脸色沉下来，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气，赚数量太少，长草根上带的泥巴太多，连他递出去的“蜜蜂”牌烟也不肯接。

草长得没有割得快。头几天还好一点儿，几天之后，近处的草都哥光了，要到远处的山上去割，而队部的定额却一斤不少。路远了，背草的时间就长，连一些割草能手也要到下午五点才能交差。江又安上午割了不到一百斤，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他找到一个坡度较大的陡坡，把背夹子靠在坡上，啃着带来的冷苞谷馍馍，没有菜，连口开水也没有。心里冒火，骂了一句：“这哪里是他妈的人干的活路！”于是索性在一个平坦的荒草坡上睡倒了。太阳晒得他暖烘烘的，倒也满舒服。一直到下午三点多，他才起来，干脆把草倒了，背着空背夹子回了宿舍。

赖组长的主要任务是过秤，顺便也在沤肥坑附近割些草。现在上午来过秤的人少了，下午才多起来，而自始至终不见江又安的影子。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看见。他心里纳闷：难道这虾子又跑了？到了下午五点半最后一个人交了草，有的勉强完成，有的差几十斤甚至百把斤，他也不好说什么。这几天草不好割大家都清楚。但仍不见江又安的踪影。直到六点仍是这样，只好回来。一进屋就看见江又安躺在床上，被子蒙住头，只露出乱发。

“江又安，咋个了嘛？”

回答他的是“哼哼唉唉”的声音。

“病了呀？”

“哼哼唉唉”的声音似乎稍微明显了些。

他想：“他妈的！说你胖你就喘！”嘴上却说：“早起还好好的，咋个一下子就病了？”

这回开口了，只是声音小得很：“我身上难受得很。”

“找卫生员没得？”

“等一下我就去。”

“吃饭没得？”

“才吃了。”

赖大兴冷笑一声：“饭吃得，活路做不得？”然后去打饭。

饭后他爬上那十几层台阶，先我马中队长，没有找到，就向指导员汇报。指导员说：“他不是说还没有找卫生员吗？看卫生员咋个说。”

“是。”他转身要走，指导员说：“你转来。”他回过身恭恭敬敬站住，静候吩咐。

“你下去喊卫生员给他看一下，看有啥病。另外今晚上二工区要开会斗六组傅保全，恐怕火力不强，你们组今晚支援他们，把六组的反改造气焰压一下。只要傅保全能低头就好办，如果他顽抗，就给他加点儿温度。今晚我和邓管教都有事，会由二工区罗干事掌握。我马上给他打招呼。”

会在院坝里举行。哨声一响，六七十个人稀稀拉拉地坐满一坝。有的坐自制的小板凳，有的找块砖头或石块，上面垫着报纸，也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罗干事喊：“现在开会，把与开会无关的东西都给我收起来！”

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只有柴死狗还在稀里呼噜地刨稀饭。于指导员突然从全场的最后面出现，来到柴死狗身旁：“散了会再吃！”柴死狗只好把药罐——他常用药罐熬稀饭——放下。正在看“工程力学”的韩大学急忙把书收起来；抽烟对火的也赶紧分开，个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只有两个在地上摆棋盘的还在楚河汉界之地厮杀得难解难分，指导员到了面前还浑然不觉。随着一脚猛踢，棋子乱飞，哄笑四起，才茫然不知所措地抬头四顾。指导员一言不发迳设自走了。

罗干事正式宣布开会解决博保全的问题。话音刚落，赖大兴一声吼：“傅莽娃站出来！”三组的几个人立刻响应：“出来！”“站出来照个像！”

二工区尤其是六组，几乎无人响应，傅保全安坐不动。赖大兴恼怒了：“你娃娃还要人请啊？”他走过去拉着博保全使劲一拽，傅保全冷不防几乎摔了一跤。赖大兴又使劲按住他的头往下摁，傅保全一面挣扎一面说：“你要做啥子，政府都没有说要我低头。”罗干事发话：“傅保全站好！”傅保全把昂起的头略降低一些。赖大兴洋洋得意：“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傅保全回头反唇相讥：“老子就不吃你赖土匪这壶酒。你算哪把夜壶！”

这句话惹恼了三组的许多人，黄疯儿先说：“你狗日的要骂人是不是？”还有几个人也

谴责他。面对汹涌来势他毫不在乎，反而火上加油："耶，耶，我这两天硬是背时，妻嫌子不爱的！"

二工区的人都偷偷地笑，三组的人恼羞成怒："哪个是你的妻！""说话真伤众！""你娃娃要带大家的过是不是？"罗干事也怒喝："傅保全老实点儿，今天是开你的会，你要弄清楚！"傅保全才住口。

接着由本组组长魏玉贵讲了他的问题，有赶场不请假，买黑市粮，还有劳动消极、怪话连篇、说就业是无期徒刑等等。组长介绍完毕，罗干事问他以上几条是否属实，他说：不请假是由于组长不给他往上面递假条，买黑市粮确有其事，买了吃是为了多劳动搞好生产，最后说："吃了黑市粮，就是多屙屎也都肥了元山茶场的田嘛！"底下又是一片哄笑。

罗干事板起脸："严肃点儿！"不知道是说傅保全还是说听众。底下有人小声称赞："傅莽娃还是有两把刷子！"魏玉贵转入正题："既然你承认不请假赶场是去买黑市粮，昨天搜了那么久，咋个没有把那几把挂面搜出来？你藏到啥子地方去了？"

"说！""说！"几个人同时喊，有三组的也有本组的，大约是出于对挂面下落的好奇。

任凭怎么喊，傅保全就是不开口。

赖大兴把脸一沉："狗日的你装哑巴！看来得给你加点儿温度！"说着把早准备好的一根绳于取出来，抖了一抖。看见绳子，六组的人见势不妙，都不言语了。罗干事趁势进逼："你说不说？"

"我说就是。"

"赖大兴你不忙收拾他，给他一个机会。"

傅保全不言语了，仿佛在考虑该如何交代。静默了约有一分钟，罗干事不耐烦了："你到底说不说？"

"你叫我说啥子嘛？"

"啊！？"罗干事惊叹："叫你说啥子？未必你耳朵摆在烧腊摊子上了，在这里打王匡匡？"

"收拾他的态度！""对！"三组几个人连声叫喊，赖大兴把绳子套在傅保全的脖子上，他纹丝不动。

罗干事怒喝："说！那天把面藏在哪里了？"

傅保全似乎很害怕，连忙说："我说，我说。"

"说！"

“说!”

“耶，咋个又不说了？”

“哎呀，我不敢说!”

赖大兴十分得意：“啥子不敢说，现在就要你说!”

傅保全看着罗干事：“报告罗干事，散了会我到队部交代要得不？”

大家都不做声，单等罗干事表态。罗干事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啥子了不得的事！就在这里说!”

几个积极分子配合：“对，就在这里当着大家说!”“你莫想搞缓兵之计!”

“哎呀，当真我不敢说!”

“有啥不敢说的，说出来队部给你作主，没得哪个敢打击报复。”

“说！到底藏在哪里？”

傅保全欲言又止，张口却又无言。

被折腾得不耐烦的赖大兴把套在傅保全脖子上的绳子一拉：“你狗日的再不说，老子就不认黄!”

几个积极分子连声催促，一叠遙声叫“快说，快说!”其中黄疯儿的声音最响。罗干事也厉声催促。

傅保全叹口气，用手指了指赖大兴，小声地说：“就藏在他那里呀!”说罢低下头，一副深刻认罪的样子。

还是赖大兴首先反应过来，他气急败坏地叫嚷：“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狗日的血口喷人!”他见罗干事正注视他，就说：“罗干事，他打胡乱说，还赖我，我咋个会给他藏东西嘛!”

下面的人立刻分成两派，一派以黄疯儿为代表，大声叫喊：“傅莽娃你真乱咬，倒打一钉耙，那个斗你斗得凶，你就给别个栽!”另一派人则低声议论：“也难说，这里面的事真真假假，莫看表面上斗得凶，晓得他们背后搞啥子名堂!”

罗干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任下面乱哄哄。傅保全更来劲儿：“今天要不是政府干部追得凶，我也不想说。他说只要我承得住，他包我无事。我要是把他拱出来，二天他不饶我。”

罗干事这时候似乎清醒了些："傅保全！你莫东拉西扯，诬赖别人是要罪加一等的！"

傅保全死不改口："我今天交代的全是事实。"

罗干事只好转个话题，问他："那你劳动消极又咋个说？"他说吃不饱没有气力做活路。辩来辩去，惹得罗干事怒气大发："就凭你劳动消极，老子今天也要修理你！"赖大兴刚想动手，罗干事挥手示意要他退下，自己动手捆，边捆边骂："我叫你嘴巴嚼！我叫你嘴巴嚼！"傅保全开始求饶，赖大兴说："罗干事莫轻易放他过关，这虾子狡猾得很，不让他喝点辣子汤他不晓得劳改队的锅儿是铁铸的！"又转过身去挖苦傅保全："软索套猛虎，都说你是二工区的一只虎，咋个连四两绳子都背不起了？"傅保全头上汗珠直往下淌，江又安看见心里直发凉。

第二天赖组长找卫生员了解江又安的病情，卫生员看在江又安两支烟的份儿上，支支唔唔说了些，夹杂着不少医学名词，赖大兴听得奖名其妙，只好直截了当问："他做得活路不？"卫生员只好说一般活路还是可以做，太重了不行。赖大兴就向指导员反映："卫生员说他没有啥子病，能出工。"指导员说："内科不吃饭，外科经得看，他有啥病？思想病！毛主席说：反动派不愿意劳动，人民政府就要强迫他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赖大兴又问："如果明天他还不出工又咋个办？"指导员不耐烦了："咋办咋办，你当了这么多年组长还不晓得咋个办？咋拌？凉拌！"说完愤然进屋，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又是一天，组员们为了抢个大露水，一早就走了，只有黄疯儿在收拾背夹子。江又安懒懒地起来，拿起碗出了宿舍，端回饭以后，一小口一个口啃包谷馍馍，啃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放下了。黄疯儿正往外走，赖组长说："你莫忙走，还有点儿事。"江又安放下包谷馍馍喝稀饭，才喝了一口，就停下来向早已不热的稀饭吹气。在一旁静观的赖大兴冷笑："再吹怕要吃到晌午了。"

江又安不理他，心想老子今天就来个装蟒吃象，做个病号的样自给你看。他一边喝一边呻吟，喝了一半就翻身上床往里一滚，把后背晾给赖大兴，嘴里哼哼唧唧不停。

赖大兴把桌子一拍，倒惊了黄疯一跳："江又安！少在老子面前演戏！老子是搞啥钢的，你未必不晓得。你娃娃现在马上给老子出工，老子就发个慈悲饶你这一回，不然，哼！"

回答他的是哼哼唧唧的声音。

"黄疯儿过来，拖他的死狗！"

"是！"黄疯儿早就看出赖组长留他是为了江又安。他上前一把抓住江又安的胳膊死劲儿一拽，江又安连人带被盖一齐落地。江又安大声叫嚷："哎呀，黄疯儿，你要做啥子嘛！哎呀……"

"做啥子？老子要估倒你出工！要拖你的死狗！"赖大兴抢先搭话，上前把他的烂棉被扔上床，拽着江又安的另一条胳膊，和黄疯儿一起把江又安往门外拖。江又安不叫喊也不挣扎反抗，他二人边拖边喊："拖死狗喽！拖死狗喽！"引得没有出工的病号除了柴死狗以外都

过来看热闹。

看着江又安光着脚倒在地上被拖着走，专门负责打草鞋的七十多岁的朱老头捋着白胡子直叹气："搞啥子哟！搞啥子哟！"

拖到院坝里，黄疯儿问："往哪里施？"

赖大兴想：往上拖太费劲，就说："拖下坡，死狗哪有拖上坡的？"两个人又并力把江又安往下拖。卫生员、做家具的郑木匠，还有家属们，都出来看热闹。马中队长的小男孩儿拍着手跳着喊："快来看！拖死狗喽！劳改犯耍死狗喽！"

拖到坡下面的茶行里，江又安的脚已经被瓦片划破，流着血。黄疯儿松了手，赖大兴也放开手，对江又安说："你娃娃放明白些，让你出来晒晒太阳，去去你的霉气，你给老子把茶行子的草扯了。明天再不出工，怕没有今天这么松活！"又对黄疯儿说："你到工棚把喷雾器检查一下，裂了缝的焊一下，快孩喷农药了。"

江又安闭着眼睛不动，赖组长看了看他白白净净的脸，就到沤肥坑旁过秤去了。

江又安眯着眼睛躺在茶行里，依然哼哼唧唧，脚上滴血他全然不顾。等赖大兴走远了，才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地回到宿舍，继续躺在床上做他的白日梦。

上午来过秤的人不多，赖大兴有点儿空闲，就胡思乱想起来，眼前又浮起江又安白净的脸庞。中午江又安端着一碗牙牙饭慢条斯理地吃。他一面刨饭一面斜眼偷看赖组长的神色，盘算着如果赖土匪一脚把自己的碗踢翻，自己该如何对付。哪知赖大兴毫无动手之意，弄得他心里倒有点忐忑不安。

晚饭后赖大兴到队部汇报，于指导员不在，是向邓管勒汇报的。邓管教问："他到底有没有病？"

赖大兴说："有没有病也难说，要好生检查一下才晓得。"

"卫生员不是说他没得啥子病吗？"

"卫生员也只是说眼下还查不出来，医务室没有啥子仪器，卫生员也不是科班出身，不过在场部医院进过几个月卫训班，水平有限。"

"你是说还要到医院检查？"

"我想这个星期六队部准他一天假，到医院检查，星期天晚上回来。"

邓管教想了一阵说："要得，那就写个假条来。"

"另外，我想跟他一路去，免得他搞鬼。"

“也好，对他就是要提高警惕。不过他才回来，不至于马上又跑，队部已经通知了各组组长，注意他的行动。你走之前把星期六的生产安排一下。今晚发工资，通知各组来领。”

每个就业人员都领到十元零七角生活费。赖组长说不是生活费而是工资。还说邓管教和事务长也是这么说的，表册上写的也是工资表。大多数人对此报以痴笑。韩大学说：“啥子就业人员，以前还说是‘就业职工’呢！有布告为证，布告上把放回去的都叫‘劳改释放犯’。我们不过比一般犯人多发八元钱。”廖胖娃说：“犯人还发衣服呢！”

大家议论了一阵，都睡了，只有赖组长和江又安各想各的心事。

星期六全组出工以后，赖大兴很和气地对江又安说：“江又安，队部照顾你，准你个假去赶建阳。”

江又安装做没有听见，心想：我又没有请假赶场，哪来的假？你少来哄老子。，你是试探我，要我起床。老子偏不理你这条老狗！赖大兴又说：“这种事情哪个哄你，我帮你写了个假条，队部批下来了。”说完拿出假条给江又安看。江又安揉了揉眼睛，看清上面写的是到场部医院检查，就又蒙头大睡。赖大兴说：“到场部还是要经过建阳，起来，我我们一起走。”

江又安仍然不理，问急了，他就说浑身发软走不得。赖大兴说：“小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咋个一时又转不个弯？事在人为，只要你老弟遇事放灵活点儿，我保你过医院检查这一关。”

江又安在床上翻过身来，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看了看赖组长的表情，见老土匪昨天还凶神恶煞的，今天咋个又和善了？怕是要挽个圈圈儿叫我钻！赖大兴看了江又安一阵，带笑说：“你起来，把钱带上，我和你一起去。只要你听我的，事情好办。你要不去，就说明你没得病，心里虚。再要耍死狗，队部是有决心的。你逃跑的事还没有完，洪士奎一案你也有份儿。你是有前科的，比不得傅莽娃捆一绳子就算了。你自己想好，话点到为止，去不去随你。”

一番话说得江又安睡不安稳，自找台阶下：“赖组长，我也没有说不去嘛，不过身体有点虚，走不快。”

赖大兴耐心等他起床穿衣吃饭，也不催他。两个人一路走，赖大兴背了个空背篼，边走边说，和颜悦色，问长问短。他说据他看你小老弟是有些病，他也向队部反映过，但队部不信，说没得凭据，他也没有办法。又说人要随和，火烧眉毛且顾眼前，不让皮肉受苦是最要紧的，有些事情莫太认真。说着说着就把手搭在江又安肩膀上。江又安见他粗糙的脸上那条隐约可见的疤痕，胡子巴茬，皱纹里挤出的笑容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但已经出来了，只好跟他走，走到哪里算哪里。猛然想起他说过“男的女的都弄”，心里直打战。赖大兴察言观色，见他的神气有点儿不对，又把手从他的肩膀上取下，然后说：“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的人不识时务，也不看看现在啥阵仗，劳改队里讲啥子面子哟，里子都要扯烂。”

江又安问他在医院里有啥子“关系”，他不肯实说，只是说事情好办。江又安沉不住气，说：“赖组长，只要你保我过了这一关，我总要对得起你。”赖大兴喜出望外，连忙说：“小老弟，你我的事好说，只要有你这句话，你的事保在我身上。”

到了中午，来到建阳县城。说是个县城，其实只有一条街，外搭两个小巷。这条街人称半支烟街，抽一支烟就可以走一个来回。这天正好逢场，街上人不少。街沿两边，卖蛋的、卖瓜豆蔬菜的、卖叶子烟和各种药材的，虽然不吆喝叫卖，但讨价还价，熟人招呼，倒也显得很热闹。只有供销社的收购门市部十分冷清。

赖大兴在人群中穿梭，看见认得的老乡就主动招呼："王队长，来赶场啊，买啥子？"

"买点儿煤油盐巴。老赖你还在八队？"

"在八队，你咋个不上来耍？"

"这阵学大寨，不得空。"

"有空上来耍，我再给你炒盘嫩南瓜丝丝。"

"要得，二天来。"

"二天来，二天来。"

他专门买鸡蛋，在三处一共买了五十个蛋，都是江又安拿钱。两个人进馆子吃饭，江又安守桌子和背篼，赖大兴排队买牌子，排队买饭，排队买肉。钱和粮票也都由江又安出。吃完了，赖大兴说，你到二旅舍写号，再买把挂面晚上吃。我先到医院打个招呼，转来再喊你一路去。说完急忙背起背篼走了。医院在县城和场部之间，距离不远，又是平路，半小时就可以走到。

江又安去写号，王婆婆问他写几个，又问他要手续，他才想起假条在赖组长手里，当时他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向他要，只好说那得等赖组长回来。王婆婆安排他们住楼上一个角落。这种老楼房，是木板地，木板墙，屋里比较黑，有两张老式单人木床，挂着打了补丁颜色发黑的蚊帐。不论冬夏都铺着草席，还有养麦皮做枕芯的枕头。他走累了，坐在床上休息。摸了摸钱包，只剩下三元多。他算开了账：买蛋五元五角，两份肉八角，一斤饭三角，写号六角，一共七元二角，还剩三元五角。幸而在成都"上班"所得的钱还剩了一点儿，不然这日子不好过。虽说这些天不出工消耗少，可是苞谷馍馍老梭边实在太难吃，需得买点儿副食品才行。

休息了一阵就出来逛街。这时候不过下午两点，赶场的人已经陆续散去，饭店已经关门，百货公司正在上门板，只有两家代销店还开张。走了一圈儿，实在无聊，又回到二旅舍。王婆婆在门口坐着纳鞋底，听他说要买碱水挂面，就说："碱水面买完了，有上好的蛋青面。"

"啥子蛋青面，莫要麻广广，晓得有没得蛋。"

王婆婆自顾自说："蛋青面煮出来筋道得很！"

"好多钱一斤？"

“八七角。”

“少点嘛，六角五。”

“这一阵碱水面都要卖六角五。”

“好嘛，要两斤一把的。”

“要几把？”

“一把就行了。”

王婆婆进了自己的小屋，拿出一把面来。江又安接过又问：“有清油没得？”

“没得。”

“等一下煮面要点儿盐巴。”

“要得。”王婆婆收了钱接着纳鞋底。

赖大兴背着空背篼转来，气喘吁吁，不等王婆婆开口，就把证明给她。王婆婆看了证明问：“住几天？”赖大兴说：“今天一个晚上。”卸下背篼，就喊江又实快走。

两人出来以后，江又安问：“赖组长，你今天找的哪个？”

“找的白医生。”

“哪个白医生？咋没有听说过？是新来的？”

“啥子新来的，就是人称医院一枝花的白玉芳。”

“我没有见过她，我听说那婆娘不是啥子医生，是个化验员。找她管球用！”

“你晓得啥？那女子长得水嫩，人又年轻，好些医生都想她。”江又安明白过来，就不再言语。赖大兴又说：“开始我试倒说，她打官腔，说她不管这些事情，要找就找王主任阮医生，又说他自己为啥不来。我把鸡蛋拿出来，说两个医生脾气毛，你不敢来，好话说了几箩筐，她脸色才变过来，说这几天正想吃鸡蛋，还假巴意思问价钱，说发了工资还。我干脆明说是你求他办事，白送的，她答应了，叫你下午四点去。这阵也差不多了。”江又安说：“这倒辛苦你了，连跑两趟。”赖大兴说：“现在看来问题不大，只要你老弟满意，我跑点路又算啥子。”

到了医院化验室，赖大兴一个人过去，江又安在外面等候很久。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赖大兴才出来，又带江又安去找王主任。王主任不在医务室，别人说他在病房，两个人又去住

院部，进了院子，见一个犯人全身脱得只剩一条裤衩，躺在地上，身边围着几个人，一个人提起一桶水往他身上浇，另有一个人用扫院子的大竹扫帚在他身上来回乱刷，那个犯人在地上滚动叫喊。江又安觉得奇怪，问赖组长怎么回事，这个人是不是疯子。赖大兴说这些人成年不洗澡，又脏又臭，这是给他“洗澡”。江又安才明白。

赖组长看见王主任在这里，就上前喊“报告王主任”，王主任见到赖大兴，点头说“赖大兴你来了，那个江啥子呢？”

赖大兴忙拉了江又安一把，江又安弯了弯腰，也喊了“报告王主任”，王主任就往医务室走，二人紧随其后。到了门口，王主任掀起白色布门帘先进去，两个人又跟着进去。王主任往椅子上一坐，开口问：“介绍信？”赖大兴忙说：“有，有。”掏出信双手递上。王主任看过，就说：“那个江啥子你过来。”江又安过去，王主任先叫他在桌旁的一张方凳上坐，然后叫他解开上衣。王主任拿起听诊器进行检查，不断挪动地方，嘴里发出“唔唔”的低音。过了一阵收起听诊器，奋笔疾书，把写好的诊断书交给赖大兴，叫他们到隔壁找阮医生。赖大兴说声“谢谢王主任”，江又安也想照样说，嘴巴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到了隔壁，喊了“报告阮医生”，里面说：“进来。”进去后，阮医生坐在桌子后面，侧面凳子上坐了个犯人。阮医生问那个犯人：“啥时候觉得胃有点儿异常？”那人说：“阮医生，你听我说嘛！我原来身体好好的，就是那一年……说着说着把凳子往前挪了挪，身体前倾，脸也往前凑。阮医生把身体尽量向后仰，说：”离远点。“那人说：”我怕阮医生你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是那年……说着说着嘴巴又往前凑。阮医生忍无可忍，抬手给那人一耳光，那人立刻捂住了脸。阮医生厉声说：“回去把口漱了再来!”那人捂住脸走了。

江又安有些害怕，不敢开口。阮医生满脸怒色，喝了一声：“你两个是搞啥子的？”江又安一时说不上来，赖大兴赶紧说：“我们两个是八队的，他叫江又安，是来检查病情的。”阮医生看了看江又安，脸色缓和下来，嘴巴一努：“你就是江又安？年纪轻轻的，有啥病？”江又安又说不上来。赖大兴把介绍信和王主任开的诊断书递过去，阮医生仔细看了一遍，掀起后面的白布帘，露出病床，叫江又安脱掉上衣躺在上面，翻来复去地按、摸、捏、敲，一会儿问痛不痛，一会儿问麻不麻，一会儿问胀不胀，开始江又安一律回答：“痛。”“麻。”“胀。”后来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改变语气：“痛。”“有点儿麻。”“不太胀。”后来又叫他挽起裤腿，仍然是按、摸、捏、敲、问，折腾了一阵，才叫江又安起来，自己写了诊断证明，还说要到王主任那里去盖章。两个人道谢过，又去找王主任盖了章，另外开了证明，这才算完事。

下班时间也到了，江又安看天色阴沉，快要下雨，急着要走，赖大兴说不忙，还要找白医生道谢。江又安不耐烦，说要去你自己去，赖大兴说：“也好，你等我一下。”就去了。白医生是单身女性，一个人住在一个僻静角落的一间小屋里。他伸手敲门，等了片刻，里面说“进来”，他进去，发现屋里有一个男人正在桌旁低头修收音机，听见有人进来，就抬起头，原来是洪士奎，两个人都一愣。洪士奎对白玉芳说：“修好了，你试一下，以后尽管找我。”说完低头匆匆走了。

等洪士奎走远了，赖大兴才开口说：“今天的事情多亏了白医生。本来江又安要亲自来道谢，他是个病号，今天检查整累了，就没有让他来。他说二天送几斤白糖谢你。”白玉芳说现在就是白糖不好买，王主任到内江出差，也只给她带了半斤冰糖。赖大兴称赞白医生会办事，又肯帮忙。白玉芳只略笑一笑。赖大兴起身告辞。白玉芳叮嘱团体记住白糖的事。赖

大兴自然是满口答应。

两个人冒着小雨赶回二旅舍，都觉得很累，坐在床上休息。江又安要过证明来看，根本看不懂，就问这上面写的是啥子。赖大兴收了证明说：“管他写啥子，医生写的字哪个认得到，不过‘处理意见’那一行里那几个字还勉强猜得出，是‘不宜从事体力劳动’。”江又安这才彻底放心。赖大兴说：“这阵饿了，煮面来吃。”江又安取出蛋青面，赖大兴从背篼里取出四个鸡蛋，说是特意留下的，江又安接过来说：“没有清油，吃不成煎蛋面，只能煮荷包蛋了。”赖大兴说：“你歇着，我来煮。”于是他找王婆婆买盐巴，王婆婆用一张手纸包了点儿盐巴，说灶下有柴草，锅里水是现成的。收了一角钱的柴火费，赖大兴自去燥房安排。

面煮好了，赖大兴不知从哪里取出半瓶红苕酒，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了一个给江又安，说是照顾病号。吃完面天已黑尽，外面雨已经很大，江又安觉得身上冷嗖嗖的，说：“这个鬼地方硬是天无三日晴，又在下雨了。”赖大兴躺在床上不说什么，看着他微露笑意。江又安找王婆婆开灯。灯亮了，赖大兴张罗洗脚，跑前跑后，找脚益、找柴、烧水，还主动倒洗脚水。江又安见他事事主动，自己享现成，倒觉不安。两个人天南海北闲扯了一阵，赖大兴说：“这荒村野店的，没得啥耍头，不如早点儿睡。”江又安还想找王婆婆借副扑克牌三个人打牌耍，赖大兴却说要关灯睡觉，江又安只好依他。

关灯脱衣，钻进冰冷的薄被窝，一时也睡不着，闭上眼睛，刘淑珍的雪白大腿似乎又出现了，心想这时候要是她在身边多好。就是有李妹也凑合了。正想到有滋有味之处，忽觉得身边有人，刚要惊动，那人说：“小老弟，是我，天冷得很，打伙睡要热火些。”江又安吃惊：“你要做啥子？”

“小声点儿，我给你说个悄悄事儿。”

“啥事？”

“啥事？好事。”

说着嘻嘻笑了，光身子已经钻进来……

第十九章　高干子弟

洪士奎对于突然遇到赖土匪，并不在意。他想劳改队的人到医院看病是常事，并非意外，倒是自己刚判刑就在医院当电工，怕会叫赖土匪感到意外。赖土匪在旧社会当烂滚龙，在劳改队是老犯，都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当个组，长照样得上山淋雨，吃的是老梭边，抽的是蜜蜂牌，还得组员上供才不致断档，要到过年才喝得上红苕酒，哪儿比得上自己。回想这几个月的经历，他对自己很满意。虽说李妹一事不够机密，但看来也是早晚的事，纸里包不住火。从弄到手到败露，从她身上也捞了不少。一个月能玩儿几回不说，这一年吃的喝的虽然比不上队长更比不上原来在厂里当科长，总比一般就业人员强多了。只是这次判的有些重，整整六年，比头一回还多一年呢！

这事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这一辈子算完了。但我又一次穿过惊涛骇浪，要不然咋能得到“红毛犯人”的外号呢？在集训队劳动组呆了一个多月，幸而值班员里面有老戴和方荣国是熟人，方荣国对自己多少还有点儿照顾，因而没有吃很大亏。不久就到三十六队服刑当电工，背起电工三大件到处转。“吊儿郎当是电工”嘛，劳改队流传一句话：“不怕刑期长，只要进厨房。”意思是说当了伙夫能吃饱饭，刑期长短就无所谓了。其实当电工不比当伙夫差，而且还能到处转。不过三十六队地方太偏僻，呆在那里实在没意思。于是在安装喇叭的时候，故意绊倒受伤住院，在医院活动了一番，伤愈后就留在医院当电工。这里接触面宽，认得的干部多，何况又能接近白玉芳。劳改队本来女的就少，一般就业人员很难看见女的，只好当一辈子霉和尚。我先有刘淑珍，后有李妹，虽说一个是劳改婆，一个是社员，但不管怎么说，总是那道菜。而白玉芳却是个黄花闺女，人称医院一枝花。别人晓得了，定要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是要尝尝天鹅肉的滋味，鲜花就是要插在牛粪上！正想到得意之处，王主任派犯人喊他，才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从修收音机开始，他主动接近白玉芳，赶建阳总要问她带啥东西。带来了东西也不主动收钱。到她屋里干活儿以前总要换身好衣服。慢慢地白玉芳对这个身体健壮、脸色白净的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有了好感。他不像那些又黑又瘦满嘴脏话举止粗野的人，从前外表看像是从大城市来的干部。

休息天，白玉芳叫洪士奎给他修理台灯。洪士奎出门之前从床底下拖出樟木箱子，取出藏青色中山服和黑色斜纹呢长裤穿上，自我欣赏了一阵才去。一边干活儿一边没话搭话，却目不斜视。白玉芳也正无聊，就问他是犯什么错误进来的。洪士奎叹了口气，过了一阵才说：“反正是经济问题，生话作风问题。

“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生活作风问题？”

洪士奎颇礼貌地一笑：“都有一点。”

“我觉得不像。”她说似乎满有把握，其实只是试探。

“你咋会觉得不像呢？”

“反正不像。”

“白医生，你既然看出来了，我只好实话实说。我有时对别人说是经济问题。有时候说是生活作风问题，其实都不是。”

“那是政治问题。”

“唔，也算是政治问题。”

“那有啥子，元山茶场‘现反’多得很，这也用不着隐瞒嘛。”

“我的情况又和‘现反’不一样。”

“你这个年纪，未必有历史问题？”

“白医生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今年才三十岁。”他故意少说几岁。“历史、家庭都清白，我的问题是……他四下看了看，用很小的声音说：”泄密。“　　白玉芳一惊，好像没有听明白：“泄密？泄啥子密？”

“军事机密，还有外事机密。”

“你啷个会接触这些机密？未必你在保密单位工作？”

“啥子保密单位，我在厂里当科长，住在厂里，每个星期六回家。我爸有时候把一些绝密文件带回家。他工作太忙，上班看不完，要拿回家看。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又好奇，有一天趁他不在，偷了他的钥匙，打开抽屉看了些不该看的文件。”

“你就拿出去摆给别人听，所以后来就遭起了，对不对？”白玉芳为自己的推理严密而得意。

“哪里是那么回事，要真是那样，我也不得到这元山茶场了。我只看了几份就放回原处，更没有对别人说。后来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我爸还是发现了。他大义灭亲，主动向组织上承认，才免于处分。我因为经查实的确没有向外透露，才从宽处理，判了四年，再有一年半就满了。”

“泄密有啥子了不得，旁人问就照实说，何必给自己扣生活作风问题，哪点光彩？”

“白医生，这你就不明白了。这是我爸我妈的意思。说这里面情况复杂，有些干部出于个人目的，知道我的过去以后，就要来问这问那的，你不回答又得罪了干部，时间久了，难免不漏一星半点，所以干脆不提。反正一般干部又看不到正档，也就信了，这些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莫对别人说。”

“你放心，我对别人说这些子干啥。那你爸在哪个单位？是好大的个官？”

洪士奎摇摇头，叹了口气：“今天我说得太多了，只顾说话，把做活路忘了。”于是埋头干活儿，不再理会那个好奇又有几分天真的少女。

啊！真想不到他还是个高干子弟！父母大概在省军区工作，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他当然不愿意说，反正低不了。能看绝密文件还能带回家的至少也得是个副师级吧？说不定还是个正师级呢！就算是个副师级，哼，元山茶场的场长才是个团级呢！

怪不得他不像普通犯人。一般犯人中也有原来当过科长之类干部的，可是劳改几年之后，那会有他那么多好衣服？再说长得白白净净、饱饱满满的，一般犯人哪能办到？必定家里常接济他。虽说现在在这里受些苦，再过一年半，小汽车接回成都，有个好爸爸好妈妈，还不是要啥有啥。

哎，我咋想这些事？人家的事与你啥相干？总是自己背时，分到这个倒霉的贫山区，又

是劳改单位。别的同学，有的进了成都，有的去部队，有的留在专区所在地，起码也是厂矿医院，哪个不比自己强？这个鬼地方，硬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年到头，阴雨不断，出门就是烂泥巴路，不是上坡爬得满身流汗，就是下坡滑得“连翻跟斗”的。星期天没得公园商店可逛，到建阳吧，不逢场鬼都看不一个，逢场天又尽是些一身稀烂、巾巾吊吊的山民，看到都够了。说起来自己父母好歹也是集镇上吃商品粮的，自己咋个就落到这种地方？看来一辈子只有和这些黄皮寡瘦的劳改犯打交道了。

说起劳改犯，洪士奎也是劳改犯，莫看他现在低人一等，见了干部毕恭毕敬，二天回到成都，那阵……哎，我咋个又想到他身上？还是想想自己吧！在卫校，我是班上的一朵花，追我的人不少，当时想到了单位再说。要说的话，阮医生对我是最明显不过的，人还可以，又是个大学生，可惜家在农村，跟了他这一辈子莫想进成都。王主任对我也有点儿那个。他已经有婆娘，不过他是领导，不能得罪，还得敷衍一下。这回开证明，还不是靠他两个帮忙？我也没有费多大力，说几句软话，做了点儿眼色，笑了笑，他们一动心，几十个鸡蛋就到手了。只是我这一辈子到底该咋个办？难道就在这里找个土干部安家，在山区呆一辈子，还比不上能回成都的劳改犯？　　成都，对，成都！劳改犯哪个看他一眼？可是能回成都的劳改犯就不同了。再说啥子劳改犯，现今是劳改犯，过两年就不是劳改犯，是高干子弟了。成都！高干子弟！成都是啥样子没有见过，可是听别人说过：柏油路又平又宽，还是林荫大道。百货商场楼上楼下，衣服日用品堆得满满的。虽说要票证，高干子弟还怕没得票证？啥子罗马表、小跑车、红灯牌收音机，要啥有啥。星期天还可以逛草堂、昭觉寺，开上小汽车就去了。高干都有小汽车，哪像这个鬼地方，连公共汽车都没有。回到家，洋房带花园，客厅卧室书房大衣柜吊扇，说不定还有护士、生活秘书……

从此一有适当时机，洪士奎就到她的宿舍来。她也去过他的小屋。当然都有借口，得避开人，主要是避开干部，特别是王主任和阮医生。这一段时间，雨水很多，到晚上雨更大。这时候洪士奎就换上好衣服，披上雨衣来了。他很会聊天，擅长讲故事，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啦，董永和七仙女啦，白娘子和许仙啦，白玉芳听得简直入了神，眼睛睁得大大的。尤其是那些爱精细节，她听了脸发烧，心跳得厉害。

场部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年难得看几回电影，所有犯人和就业人员除了重病号以外都被强行组织起来排队入场受教育。其他人除了值班的，所有的干部和家属也都自发地去看。小孩子们纷纷拿出高靠背椅子，抢占有利地形。白玉芳端起椅子刚要出门，见洪士奎来了，又把椅子放下，问：“老洪你咋个来了，今晚放电影，你这个电工该有事干了。”洪士奎进来，关好了门，这才说：“我刚才是忙了一阵。放映员说没得问题，我就放心了。刚才我看你拿起椅子准备去看电影，这阵就去嘛。”

“你来了我就不去了，这片子我在学校就看过。”

“我也看过了。我还看过原来的故事片，也不想看了。这阵清净，我们正摆谈。”

洪全奎坐在椅子上，白玉芳坐在床上先开口：“老洪，我问你一件事要得不？”

洪士奎心一动，迟疑了一会儿，才用很柔和的声音说：“小白，你随便问。”

白玉芳胸部轻微起伏，一朵红云飞上双颊。她倒了一杯水喝了，这才说：“你是高干子

弟，厂里未必没有年轻女工喜欢你？”

洪士奎放心了，坦然地说：“我是高干子弟，这一层厂里只有主要领导晓得，其他人不知道。小白，不瞒你说，我是耍过女朋友。她是个电话员。后来我爸说我年纪轻，应当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不准我耍。我妈也反对，说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其实是嫌她不漂亮。两个人只好断了。那女娃子还大哭了一场。”

白玉芳忙问：“后来呐？后来又咋个了？”

洪士奎心里觉得好笑，只好说：“我后来出了事，一切都说不上了。那年我妈来信还提到她，说她嫁给厂里的保卫科长，一个转哥。”

白玉芳笑着问：“她叫啥名字？”洪士奎只笑不说。“你说嘛，老洪你说嘛！”白玉芳发起嗲来。洪士奎因势利导：“你喊声洪哥我就说。”她憋了一阵，憋得脸通红，眼睛却放亮光，轻轻吐出那两个字。洪士奎忍不住一笑：“她叫吴萍（无凭）。”

白玉芳失去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转而问芭蕾舞为什么非用脚尖跳不可，舞鞋是用什么做的。洪士奎不懂，就半猜半蒙地应付。白玉芳说自己很喜欢跳芭蕾舞，尤其是《白毛女》中喜儿跳的她更喜欢。说着说着脚不由己地在室内旋转起来，分明有意显示自己的才华和美丽。洪士奎把台灯转了一个方向，这样灯光就不会照在窗帘上。白玉芳言在意外地说：“都去看电影了，院子里鬼都没有一个。”洪士奎却故意把话点明了说：“小心无大错。”

白玉芳又旋转起来。洪士奎为了不防碍她的动作，就把椅子挪开，自己坐在床上欣赏她那灰色人造丝长裤衬出的修长身材和纤纤细腰，逐渐入迷，不能自持。

白玉芳转累了，也坐在床上喘气，胸部一起一伏的。洪士奎奎掏出雪白的手绢给她。她揩着汗问：“洪哥，你看我跳得好不好？”洪士奎正在深深呼吸花露水散发出来的香气，随口回答：“跳得好，比那些演员还跳得好，像天仙一样。”白玉芳娇嗔地啐了一口：“就你嘴巴甜，专会讨女人的喜欢。”洪士奎把身体往她身边靠了靠，两个人紧挨着坐，又说：“要是穿芭蕾舞鞋就好了。”又弯下腰摸了摸她的鞋，这样手臂就触着她的小腿了。见她没有挪开的意思，又直起身子靠紧她的腰，轻声说：“小白，你真美，真美。”白玉芳稍稍让了让，把脸转向他，眼睛深情地望着，脸蛋鲜红，张开小嘴，微微露出洁白的牙齿，轻声柔呼“洪哥”。于是“洪哥”伸出胳膊把她紧紧搂住，先是轻轻地吻她，得到相应的回报以后，才深深地吮吸着。她的身体由软化而溶解，彻底消失在温暖的怀抱里。

也许有半小时，也许只是一两分钟。她觉得无限美好，最好就永远这样下去，只是这美好来得太突然了。从门窗缝隙飘进来一阵掌声，新闻记录片和加片《农业学大寨》已经放完了，刚开始演正片。洪士奎先醒过来，松开手，小声喊：“小白！小白！”

白玉芳慢慢清醒了：“莫喊我小白小白了，王主任才一天到晚喊小白呢！”

“那我喊你啥子？”

“喊我芳妹。”

“那我就喊了：芳妹——”

“哎，洪哥——”

“洪哥”说：“时间久了不好，我要走了。”却坐着不动。

“芳妹”说：“才开演，还早得很，再陪我坐一会儿l.”

两个人并肩坐着，都不开口。一个回味着方才的甜蜜，一个憧憬着未来的美好。最后还是洪士奎先说：“以后我们要注意，不要叫别人晓得。现在王主任和阮医生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晓得，我早就防着他们两个，都不安好心。”

拖延了一会儿，“洪哥”还是走了。白玉芳照照小镜子，惊讶自己的脸竟是这样的红，红得这样的美丽。

洪士奎在劳改队混了多年，晓得惯偷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还很文雅，叫做“未虑胜先虑败”。他不是只顾一时痛快的小流氓。他是既要目前舒服，也得有个退路。就算现在无人知晓，过了一年半载，她问起来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先把她弄到手，玩儿痛快了，想法调到别的队，她上哪里去找？她好意思到处打听一个犯人的下落？就是知道了她也不能去找。一个未婚姑娘，总不会不顾脸面去检举吧？还不是吃个哑巴亏，另打主意另嫁人。这就是劳改队的好处，我到了别的队，照样当电工。没有白玉芳，还有女社员，女知青呢！

在这以后，洪士奎表面上竭力疏远她，见了面却非常亲密。他把自己“父母”的姓名、地址、职务都告诉她，还说目前不能让他父母知道他们的事，以后再慢慢告诉他们不迟。

两个人中间这一层纸一撕破，发展就很迅速，不久洪士奎就突破了她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下大雨的夜晚，雨下得特别大，还刮着风。风雨和黑夜是干这种事情最好的掩护，等待已久的他抓住这天赐良机，被上雨衣，摸到她宿舍前，见窗帘透出微弱的灯光，就轻轻敲门。过一阵白玉芳穿着木屐出来，看见是他，一把拉进屋就问：“淋着了没有？”他没有回答，脱下雨衣扔在地上。

“看，裤褪儿都淋湿了。”她取出一条干毛巾：“把鞋也脱了，连脚一起擦擦。”

洪士奎接过毛巾，趁她拣起雨衣往墙上挂的工夫，迅速脱去鞋袜和湿了下半截的长裤。白玉芳转过身来，看见他长着粗长黑毛的两条腿，吓得叫了一声“妈……”洪士奎一只手掩住她的嘴，另一只手关了灯。

“你……她想说又说不出来，黑夜本身意味着恐惧，她浑身战栗。

“芳妹，我喜欢你。”他紧紧抱住她，把她按在床上，迅速解开她的衣服。

风更狂，雨更猛，雨点打在窗户上，玻璃都震响了。树枝呼吁直叫，间或有枯枝折断落地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雷声。白玉芳无力挣扎，嘴被另一张嘴堵住，喊不出来。电光疾闪，一瞬间露出雪白的肌体和一张得意的笑脸，立刻又被黑暗吞噬。一只大手在她胸部疯狂揉搓。急促的喘气和娇细的呻吟都被风雨声淹没，直到鲜花被揉得粉碎。

第二天是星期天。白玉芳一整天都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只对前来看望的王主任说了声“有病”，就继续蒙头睡。王主任坐下问了几句得不到答复，只好失望地走了。阮医生喊了半天也不见开门。洪士奎没有来。他知道得有一段时间她才能恢复正常。

过了一天，他壮着胆子，拿上电工工具，看准了时间去找她。敲了几次门，又轻轻地喊了几声，她才来开门，然后她就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洪士奎掏出一筒红烧肉罐头放在桌上——这是他用公家器材给王主任安装日光灯所得的报酬——然后说出一句极为平常的问候：“好些了吗？”

白玉芳脸朝墙，根本不理他。他拖把椅子坐在她床前，轻声问：“还生我的气吗？”见白玉芳还是不说话，又说：“莫生气了，都怪我不好。那天也不知是咋的，唉，反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罚要打都行，只要你心里好受一点，咋个都行。”

“就是要打你。”白玉芳突然转过身，尖声尖气地说。然后抡起拳头打他的肩膀，打他的背，打他的胸部：“打你打你，打你这个坏蛋!”

“打得好，打得好，坏蛋该打!”洪士奎活像在哄娃娃。

白玉芳住了手，断断续续地哭起来。

“你莫哭，你莫哭嘛！你一哭我心都乱了。我求你莫哭嘛!”洪士奎真有点儿慌了。

“你只图你安逸……呜，不管人家……呜……我这辈子……呜，叫你毁了……呜……”

“好芳妹，莫哭莫哭，都怪我，都怪我。我也是一时冲动……好喽好喽，莫哭了。我也是想，早晚有那一天，就……唉，不错已经错了。只要你原谅我这一回，我以后一辈子对你好，以后凡事我都听你的。”

“还说啥子以后不以后，我现在就要到李书记那里告你，到场部告你!”

洪士奎装做害怕的样子，慢慢跪下来说：“芳妹，你千万莫去告我呀，你一告，我就完了。我一家都完了。”他挤出两滴眼泪，哭声哭气地说：“芳妹，我也是爱你爱得太深，那天才发了狂。你要是还恨我，就把我杀了。反正没有你的爱，我也不想活了。”他取出电工刀来放在桌子上，又补了一句：“你就用这把刀杀了我吧。”

白玉芳双手蒙住脸，又呜呜咽咽哭起来：“我不晓得那辈子造的孽，碰上了你这个坏东西……”

洪士奎膝行半步，抱住她的小腿轻摇着：“芳妹，莫哭莫哭，你有气慢慢出，看气坏了

身子。”

白玉芳终于止住哭，说：“洪哥，你起来。”

“你不原谅我，我一辈子不起来。”

“你起来，这也不全怪你，也怪我没得主见。”

洪士奎起来坐在她身旁，用手绢为她擦眼泪，甜言蜜语地劝慰。

白玉芳说：“洪哥，水瓶里还有点儿热水，倒在脸盆里，我要洗脸。”

洗完脸，白玉芳平静了许多，她说：“洪哥，我现在是你的人了，你二天回成都，莫忘了我。”

洪士奎赶紧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

“不忘又管啥用？再过一年半，你爸用小汽车把你接回成都，那么多成都妹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你哪里会想起我。”

“你要这么想，我就没法说了。要不我给你赌个咒：如果我洪士奎二天做了对不起白玉芳的事，叫我不得好死！”

白玉芳忙堵他的嘴：“哪个要你赌咒？我是怕你父母不同意。”

“我妈最喜欢我，啥子事都将就我。只要我坚持，她就会同意。我妈同意了，我爸好说。你要不放心，明天我就给他们写信，写好了我拿给你看。”

于是两个人谈论起幸福的远景来。

第二十章　破灭

白玉芳无原无效地“病”了一天，引起了王主任和阮医生的警觉。王主任先向医院党委李书记详细汇报了二人的一些可疑之处，顺便把阮医生也捎上了。他说得有技有叶，有很有据，李书记虽然没有当场表态，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他的看法。不过嘴上只是说：“这两天忙，过两天我先找小白谈一谈，要她提高警惕，看有啥子问题没得。”王主任走了。

过两天阮医生也来了，虽说也反映了洪、白二人的可疑之处，重点却放在王主任身上，因为他已经听说王主任在李书记面前“恶人先告状”，下了他的烂药。他对李书记说王主任不择手段地纠缠白玉芳同志，已经在革命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议论纷纷，连就业人员都知道了。

他这样一说，素来对王主任印象不佳的李书记又倾向于阮医生了。他记起有人说洪士奎给王主任办了不少私事，再说洪士奎留医院还是他先提出的建议呢。现在他又主动揭发洪士奎，有什么目的？很值得研究。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挺复杂，涉及四个人，弄不好会扯到派性上去，那才麻烦呢。还是等一等，不忙向场部汇报，和小白谈了再说。至于洪士奎对白玉芳有什么想入非非，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阶级敌人嘛，狗胆包天，癞蛤蟆总是想吃天鹅肉的。但白玉芳再天真，总也不会和一个劳改犯乱来吧？究竟怎么回事情，找她一谈就知道了。

洪士奎对此也有觉察。他想收敛一段时间，等过了风头再说。而白玉芳却有点儿欲罢不能，尽管他曾对她陈述过利害，但热恋中的少女哪有什么理智？她口头上也承认洪哥说的有道理，感情上却难以舍弃。连洪士奎也是这样，不在一起的时候决心要克制自己，见了面就身不由己，色能壮胆，包胆包天，“色不迷人人自迷”嘛！两个人在室外相逢装作不相识，一有空就效鱼水之欢。

洪士奎毕竟多了个心眼儿，他想调回二十六队。那里离场部最远，消息闭塞，白玉芳根本不可能去那里。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没有二十六队的干部到医院，倒是五队的申中队长来过。他对申中队长说他原来是五队的，现在还想回五队改造。申中队长以前当大队长的时候就了解洪士奎，知道他一贯靠拢政府，表现积极，又很能干，五队的几个干部现在还时常念叨洪士奎的优点，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申中队长向李书记说了这层意思，李书记心想，这样一办，事情就简单化了，就是洪士奎有什么非份之想，也就自然化作泡影了。

洪士奎从申中队长口中得到这个喜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知道办手续得有个过程，就抓紧时间和白玉芳尽量多偷欢了几次。

就在这个时候，王主任对白玉芳说，他要到成都联系购买化验药品，问她需要带什么东西。白玉芳灵机一动，提出让自己去成都的请求，唉声叹气地喊了几声“王主任”，甜甜的微笑，加上频频飞来的秋波，王主任心花怒放，浑身骨头都酥了，立刻答应。反正他去成都已经不止一次，而白玉芳还是头一回呢。这件事她瞒着洪士奎，正像洪士奎调五队瞒着她一样。

她到成都，先公后私，公事办完，正好是星期六，按照预定计划去找过去的同学郭小红。郭小红因为有父母的关系，分到军区工作。今年夏天结婚的时候，也曾给她发过请贴，请她参加婚礼。因为路远，请假不方便，她没有去。这欢她提着茶叶和一袋水果，还有一些小玩意儿到了老同学家，进门就嚷：“郭姐，我来看你了。”

正在浇花的郭小红听见就跑了出来，两个人亲热地拥抱了一番。寒暄、问候、倒茶，然后是参观、赞叹，忙乎了一阵。白玉芳问：“你的那位呢？”

“到他爸那里去了。”

彼此谈了谈分手后的情况，郭小红问她现在有男朋友没有，她说还没有，然后转入正题：“你们总院有几个副院长？”

郭小红有点儿惊讶，就说：“有两个，一个姓王，一个姓何。”

“有没有一个姓金的，是个女的。”

“这两个都是男的，另外没有姓金的。”

短暂沉默之后，她又问：“是不是原来有个性金的，后来调走了？”

“没有。听这里的人说，副院长一直就是这两个，没有换过人。院长书记倒是换过，可都是男的，也没有姓金的。”

“军区这些首长你都认识吗？”

“基本上都认识。也有些只听说过名字，没有见过面。”

“有没有一个叫洪显扬的，五十几快六十了？”

“只有一个贾显斌，好像在后勤部当啥子主任。你咋个老是问……”她本来想说“你打听这些做啥”，猛然间醒悟她可能想调到成都来工作，想走她的门路。这些事还是少招惹为妙，公婆都打过招呼的。她只顾盘算如何应付白玉芳的请求，就没有注意到她的脸色。

“随便问问。”白玉芳的话刚一出口，就觉得不妥，只好硬着头皮顺着自己原来的话茬儿往下说：“郭姐你晓得，我呆的那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我认得一个人，他说他认得军区首长和总医院的首长，看样子也是瞎吹的。郭姐，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这回轮到郭小红变脸色了。她扮出一副哭相：“哎呀，你还不晓得，我爸虽说在市革委挂了个常委的空衔，还不是有名无实？原先的当权派都解放了，管事的还是他们。现在和那二年不同了，他在军区原来也有两个关系好的，都调走了。他现在说话都没有人理，连我弟弟参军的事还办不成呢！”

换个话题又闲聊了一阵，白玉芳起身告辞。郭小红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很不好看，以为她大概出差有点儿累，又在自己这里碰了钉子，心里倒有点儿过意不去，再三留她吃饭，留她过夜，都被她坚决辞掉了。郭小红连连表示抱歉，答应尽量给她想办法。又劝她莫灰心，机会总会有的。一直送她到大门外，一再嘱咐她以后再到成都一定要到她家来。

白玉芳回到招待所，同屋的女干部已经走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她心烦意乱，坐在桌前左思右想，理不出个头绪。对着记有姓名地址的笔记本发呆，怎么也想不出答案：难道他编一套谎话骗我？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高干子弟，父母不过是老百姓？还是因为有什么原故，他不愿意说出父母的真实姓名？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往第一方面想，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完了……不，不会的，那又是为什么呢？也许一开始他给父母写过信，他们不同意，嫌调动麻烦，他又不敢告诉我，怕我和他吹，也怕我直接和他父母联系。哎呀，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和他父母联系？那样不一切都明白了吗？只怪自己脸皮薄，不好意思先写信。他不让我写，说不定他和原来的女朋友藕断丝建，想重归于好，本来他们感情没有破裂，分手是不得已的。什么另外嫁人，那是他的鬼话！想起那个未见过面的“吴萍”，她妒火中烧，在屋里走来走去。哼，姓洪的你吃着碗里想着锅里，嫌调我到成都太麻烦，想把我一脚蹬了，没有那么便

宜！她取出夹在笔本里的洪士奎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正在向她微笑，那笑容看起来特别扭：“奸笑！皮笑肉不笑！”恨不得把照片撕破，可是一转念，明天就按他写的地址去见他父母，带上他的照片，把事情挑明，看他父母咋个说！反正只要能把我调来成都就行！最后下定决心“他父母要是不同意，就撕破脸，说怀了他的娃儿！”

下了决心，按说心里该踏实些了，可是自己的思路却不听自己指挥，又转向另一种可能：他说的统统是假话，什么高干子弟，什么泄密，什么过去女朋友，什么科长，全是天大的谎话！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会，绝不会！两种想法展开了拉锯战，弄得她头昏脑胀，一夜翻来覆去，不能成眠，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去。

起床晚了，急忙梳头、洗脸、出门吃早点。她没有给未来的公婆买任何礼品。她今天不是来拜见而是来谈判的，是“单刀赴会”！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全家都在，说不定还有小姑子什么的，而我只有一个人！

红旗街街道不长，来回走了两遍，到头只有 182 号，根本没有 243 号。又去找居委会，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治保主任陆大妈。治保主任用狐疑的目光审视她，冷冰冰地问她找谁。她说了之后，陆大妈说街道上从来没有这个门牌号码，也没有这两个人。又说她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这里从来没有住过军区干部。军区干部都住军区大院，咋会住这种地方！现在冒充高干子弟的人很多，都是为了知青回城。下面还说了些什么，她就不知道了。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身躯是怎样移过大街小巷的，招待所的服务员也只是看见她一头撞进房间，“砰”地一声房门被重重地关上，就再也没有见她出来。

十几天后，场部党委会收到一封公函，附有一封字迹潦草信。

第二十一章　集训队

时间伟大而奇妙：它能使巨大的变得渺小，能把有棱角的磨平，能使欢乐消失，能将丑恶掩盖，而最重要的是它能使痛苦变淡。所谓“变淡”，并不是减少，而是从外向里渗透，于是从外表看，它不具有起初那样鲜明的色彩，甚至使人忘记它的存在，似乎人已经从那致命的一击中恢复过来，和从前一样了。其实痛苦只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等特重新出现的机会。

徐晓丹还和从前一样，看得见的唯一变化是他买了一台最便宜的收音机，是从小厨房炊事员那里用一包好烟的价格买来的。炊事员被放回去了。这样，他就有了新的伴侣，忙碌一天之后，夜幕降临，孤寂袭来之际，有收音机相伴，可以暂时驱散寂寞。

国庆节之夜，黄疯儿买了些肉，准备加工的时候，发现缺乏辣椒和盐巴，不巧的是，同一工区的人谁也没有这两样，万般无奈，他想起了徐晓丹。工棚是不会缺少这两样东西的。虽然天黑看不清路，也只好前往。到了工棚前，里面正播放一个男低音的讲话，忽然变成一个哇拉哇拉的女高音，黄疯儿心一动，站住听那女的说什么，可是听不懂。突然女高音消失了，接着是李玉和的声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他猛然醒悟，向队部跑去。

一工区周干事看见黄疯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问他有什么事。黄病儿喘过气来才说："我找邓管教。"周干事说："邓管教出差了，有啥事给我说。"黄疯儿有点儿失望，只好说："报告周干事，我发现有人偷听敌台！"周干事着实吃了一惊，表面上却镇定自若："你仔细说一下发现经过。"黄疯儿说："徐晓丹有个收音机，我原来就觉得有问题，今天我到工棚想要点儿盐巴，走到工棚外面，正碰到他听敌台，后来才关了。"周干事问："你听见了些啥内容？"他回答："他们说的是外国话，我听不懂。"周干事两眼瞪得溜圆，两股寒光紧紧地逼着他，刺得他心惊胆战，不敢停住不说，就格外加了一句："后头我听见说 u.s.a.，就是美国的意思。"周干事辛冷笑："哼！偷听敌台是反革命，你听也是一样的罪！"黄疯儿害怕了，求饶说："报告周干事，我是无心听到的，不是故意听。再说我也听不懂。"周干事说："这事非同一般，你跟我来。"

黄疯儿战战兢兢地跟在周干事后面，来到中队长家门前。周干事上前敲门，过一阵中队长出来，满嘴酒气，有点儿不耐烦："啥子事？"周干事说："队上有人偷听敌台！"中队长酒意一下子去掉了大半，喝问："是哪个？"周干事回头对黄疯儿说："你老实交代！"马中队长以为是黄疯儿偷听敌台，眼珠子一瞪，两手叉腰，鼻子里哼了一声，吓得黄疯儿直哆嗦，只好战战兢兢地又说了一遍。马中队长厉声说："你交代的可都是事实？"黄疯儿说："这么严重的问题，我咋敢撒慌欺骗政府？"马中队长想了一下，态度也稍和缓了些："现在都到办公室去。"

三个人到了会议室门口，马中队长取出钥匙开了门，三人进去以后，马中队长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白纸叫黄疯儿写。黄疯儿说："我只写得到自己的名字，其他写不起。"马中队长对周干事说："老周，他说，你记录，我去找老于。"就匆匆走了。

过了一阵，马中队长回来，黄疯儿在按手印，这时候赶忙直起腰来说："报告中队长，我交代完了。"马中队长拿起材料看了一遍，对黄疯儿说："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能主动坦白，将功赎罪，这是好的。徐晓丹是个伪装的反革命，平常总会有些反革命活动。你和他长期在一个组，肯定了解一些情况。你下去好生想一下，明天晚上还到队都来写，所有事情一律不准外传。走漏半点儿风声，你有几颗脑袋！"吓得黄疯儿连连称是，退下去了。

马中队长对周干事说："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层了。住在工棚里的人，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我们管得又松，才让反革命钻了空子。队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出自三组，或者和三组有关，说明这件事不是孤立的。老周，你看呢？"周干事说自己忙于抓生产，警惕性不高，也有一定责任。马中队长微微点头，又说："事不宜迟，不要打草惊蛇，赶紧通知管教股，把他弄到集训队交代，切断他在队上一切可能的联系。那年我在十七队，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个首犯彭仙慧，就是一竿子直接送到集训队，根本不在本队批斗。"

周干事考虑了一阵，才说："那就这样办，明天我通知他到场部参加饲养员培训班，明天不是有拉农药的汽车来吗？叫他带上行李，到了场部再叫汽车直接开到集训队。"马中队长说："要得，我现在就和杨部管教股联系。"于是二人分头去办。

管教股赵干事接到马中队长的电话，问明情况，说："谢股长到十六队去了，要过两天才能回来，这件事是不是过两天再办。你们严加看管就是了。"马中队长不依，非要马上送不可，否则他要直接找张书记了。赵干事只好答应和集训队联系，并且要八队赶快把材料交

到管教股。马中队长说，明天带过去一部分材料，还有一些正在整理，很快就可以补送过去，人先过去再说。赵干事只得答应。

第二天，徐晓丹和事务长一道上了汽车。事务长要到场部领工资，就由他押送。周干事还要收集整理有关材料，就不一起去了。汽车一直开到了集训队。徐晓丹一看地方不对，明白出了大事，又猜不出是什么原故。下了车，集训队肖队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事务长办了交接手续，就到管教股去了。剩下徐晓丹一个人。他非常恐惧，不知道将有什么大祸临头。不料肖队长态度很和蔼，只叫他把行李搬进去，由一个姓戴的值班员给他安排铺位，其它什么话也不说。弄得徐晓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

他自然不知道昨天赵干事接到马中队长的电话以后，立即用电话和正在十七队的谢股长联系。谢股长说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暂时把徐晓丹放在劳动组，不要动他，也不要他交代问题，一切等他回来再说。所以徐晓丹安然无事，连肖队长也觉得奇怪。

谢股长连夜赶回来，赵干事作了汇报，把八队送来的材料给他看。他看完把桌子一拍："他妈的，八队这些饭桶，邓干事是他妈的干啥吃的！"赵干事说："老邓出差了，这是大名鼎鼎的建场元老号称老革命搞的！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有问题，又看了先送来的那份材料，全他妈的扯谈！"谢股长火气也下去了些，叹息说："怪不得上级要我们加强政权建设，有些人仗着老资格，糊涂到极点，简直敌我不分。洪士奎那样的人他重用，检举坏人的徐晓丹则成了反革命，什么偷听敌台，简直是笑话！"赵干事问："徐晓丹怎么办？要他回队？"谢股长沉吟片刻，才说："要照顾大局，暂时先在集训队值班。他们现今人手不够。等老邓回到八队再说。"

徐晓丹铺好行李之后，戴值班员走了。他呆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怎么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劳改队里一个人糊里糊涂被关被斗并不奇怪，自己却是头一次碰上。他知道，被人检举了，刚挨斗的时候自然都是极力否认，于是批斗会升温，如果所检举的确有其事，那么只要绳子一捆，手铐一戴，甚至只要以这些相威胁，一般就会立刻承认以免吃眼前亏。所以真正有"反动言论"的，违规犯纪的，倒往往斗得不是很凶。而被诬告陷害的，自然死不承认，队长们抱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加上整错了是你倒霉，放过了可是我倒霉的心态，自然偏听偏信，说被斗者态度恶劣，公然顽抗，非加温不可。遇到这种情况，劳改油子们"光棍儿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先满口承认，等斗争高潮过了，到了定案处理阶段，要在材料上按手印的时候，再行"翻案"。而不幸被斗者误以为在会上承认了的，就是定了案，于是大喊冤枉，死不承认，队长们只好不断加温，无休止地斗下去。最终是被斗者或伤或残或被迫诬服乃至自寻短见，个别的侥幸遇到"某菩萨""某青天"，也不过停止批斗，不了了之，被斗者的皮肉之苦算是白受了。现在看来，得学这些老油条了。

主意拿定，心情平静了许多，就在宿舍里走来走去。他发现这里的宿舍和一般就业队的宿舍不大一样，行李和日用品都放得好整整齐齐，墙壁虽然不能说洁白，倒也干干净净，没有烟熏的震迹。大约这里不许生火。他还想到院子里走走，又觉得自己目前的身份还不宜这样做，只好隔着窗户往外看：院子很大，空荡荡的三合土院坝寸草不生，高高的院墙上并没有电网，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黑体大字。大门上面有座岗楼，不过没有哨兵，估计是值班人员登高俯视的地方。

这时候，那个姓戴的值班员又进来通知他，把刚铺好的行李收起来，搬到隔壁值班室去。这一来，更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缘故，叫他当值班员总是件好事。

值班室是个套间，外面是大间，安放有三张床铺，其中一张床上还睡着一个人。有一张桌子，上面放有热水瓶等日用品。地上放着三个脸盆。里屋稍小一点儿，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只有稻草没有铺行李，地上还有凌乱的稻草和纸片。戴值班员帮他铺好床，叮嘱他先打饭，饭后到隔壁队部办公室，肖队长要和他谈话。

戴值班员走后，他刚把碗取出，又有一个值班员进来。这人个头不高，但结结实实，腿脚粗壮。他看着徐晓丹粗声粗气地问："你是新来的值班？"徐晓丹说："就是。我是从八队调来的。我叫徐晓丹。初来乍到，还请你多指教。"那人说："劳动组的人已经回来了，先打饭，吃了再说。"

于是两个人一同去打饭。饭是大米饭，也是用脸盆装，切成八块，一人一块，再有一瓢熬白菜，菜汤面上浮有一点儿油花儿。菜的数量虽不多，味道还不错。比八队的伙食强多了。

三个人吃饭，戴值班员今晚要值夜班，匆匆吃完先自睡了。徐晓丹和那个值班边吃边谈。其实主要是听他讲。他说："集训队一共有三个干部，莫指导员管全面，肖队长并不是中队长，这个队没有中队长，由指导员兼。还有个严干事管生产，带队出工。三个干部都住场部，白天来上班。不过指导员和肖队长经常来查夜就是了。值班的除了厨房的老杨以外，还有门卫王老五，通知你铺床的是老戴，我们两个原先是一个队的。我叫方荣国，这次放我和老贾回家，我不想回，就留下了。"徐晓丹问："你咋个不想回家见？"他说："我们那里是山区，苦得很，不像老贾家住平坝。生产队看我家里缺劳力，挣不够口粮，要我回去。回去莫说吃米饭，连荞子面也吃不饱。开了春就只有南瓜叶子，回去做啥？"接着又说："这回你来，可能顶老贾那一角。我们这边劳动组有二十几个人，各种人都有，情况复杂。白天严干事带出去，我和老戴也轮流去。晚上我们论流值夜班，一星期一换。这一周该我上夜班。"徐晓丹问："我顶替老贾又做些啥子？"方荣国说："管小监。其实没得好多事情。现在小监只关了两个人。一个彭仙慧，现行反革命，问题严重得很，关过半年黑棺材，早晚是要枪毙的；还有一个叫洪士奎，以前在劳动组呆过，后来去服刑，狗胆包天又奸污女医生。"

听到这里徐晓丹本想插嘴说点儿什么，又强忍住了。方荣国继续说："重刑犯都上脚镣，晚上带正铐。你早晨开铐子，晚上这边下学习，那边就上铐子。一天送三顿饭外带开水，下午放一次风，两个人错开放。"徐晓丹问："刚才你说啥子黑棺材，我咋从没有听说过？"方荣国说："其实我也没有看见过，只是听老贾说过，是用水泥砌成棺材形状，上面有个小扣子送饭，人在里面只能躺不能坐，样子很像死人睡在棺材里。问题严重的反革命又不肯交代的，就关在里面。"

正在闲谈，劳动组那边喊出工，方荣国就过去了。徐晓丹也想起戴值班的叮嘱，就去队部。在门外喊了"报告"，等了一阵，里面才说"进来"。进去以后，肖队长把目光从一厚叠材料上移开，打量了徐晓丹一番，努努嘴示意徐晓丹坐下。

肖队长先说："你调到这个队，是政府对你的信任。值班工作很重要，是政府的耳目。"然后他很仔细地一一交代注意事项，强调要严密监督这两个要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

天认真填写值班日志。最后说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要防止逃跑；二要防止他们和劳动组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三要防止自杀，要时可注意他们情绪的微妙变化，发现蛛丝马迹立即报告；四要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垂死挣扎。他举例说：过去有个吴顺庆，就是乘值班人员不注意，放风的时候在厕所里上吊死了。他又把一串开门开手铐的钥匙交给徐晓丹，嘱咐他小心保管。

徐晓丹听到吴顺庆这个名字，觉得有些耳熟，似乎曾经听谁说过。回到值班室，他才想起是王自洁提起过这个人。

从此他就专门同这两个人打打交道。对于洪士奎，他是熟悉的。洪士奎一见他，总是充满笑容。那不像是故意挤出来讨他的好，而是出于真情。由于有规定，洪士奎不敢主动对值班人员讲话。他就用笑容和眼神传送他的真情。这对于一生从未向谁透露过真情的他，也算得上难能可贵了。

不过这“情”只限于乞求之情，他的乞求也很简单：不过求徐晓丹看在曾经同一个队的份儿上，和他多说两句话罢了。其它可能危及徐晓丹值班地位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妄想的。至于徐晓丹检举过他，他倒是想得开：他不检举别人也会检举，想立功的人多的是，这算不了什么。可是徐晓丹目前的态度他实在想不通：你就是和我多说上一句，也不算划不清界限，也不会砸了你的值班饭碗哪。可是徐晓丹就是不和他多说一个字，连大声吼他都不愿意。那种隐藏在沉默背后的蔑视，真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队长们也骂过他，根本不把他当人看，集训队的几个干部都是如此。可是他们对他的辱骂践踏都是皮面上的，睡一觉就过去了。而徐晓丹的这种态度，却给他造成了无形的伤害。不过他不能明确地说出是什么伤害罢了。

根据老贾和肖队长的介绍，他想象中的彭仙慧，应该是体格高大，相貌威严，充满自信又有几分高深莫测，两眼炯炯有神，嘴角永远挂着一丝冷笑，脸部轮廓棱角分明。他下午开始值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门上的小窗户偷看。他正坐在小板凳上，身子伏在床上奋笔疾书，只能看见他消瘦的背影。

放风的时候他开了门，彭仙慧已经在们后等候。他中等身材，用一只手提起脚镣，另一只手提着裤子。破衣服没有补，发白的鬓角，一双柔和而略带忧郁的眼睛，嘴角似乎有一点而笑意。看见他这副不同于自己的想象的样子。他却没有产生出乎意料的感觉，倒觉得这正是自己所想象的。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彭仙慧往外走，随即响起哐啷哐啷的清脆的脚镣声。

伴着沉重的脚步，每只脚迈一下停一下，然后另一只脚再迈一下停一下。到了厕所前面，徐晓丹犹豫了一阵，结果还是没有跟进去。过了一刻，从里面传出低沉的歌声。仔细分辨，那是他曾经听王自洁唱过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

群山中我们开采黄金……

后来彭仙慧提起脚镣走出来，歌声暂时停止了。见徐晓丹没有什么反映，又接着唱：

他独自在忧郁地歌唱，

歌唱祖国的一些事情……

徐晓丹不懂音乐，只是感觉他的声音不如王自洁那样柔和悦耳，但那凄凉悲壮的气氛，此刻深深地渗入了他的内心，使他全身从头到脚都受到震撼。歌曲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歌唱者的情绪共鸣难以分辨。那种无言的悲哀，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悲哀悄然袭上了他的心头。他忽然想起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她，眼眶湿润了。

彭仙慧停住不唱，注视这个新来的值班员。两个人对看了一阵，彭仙慧提起脚镣走了。

多么奇怪的注视！多么奇怪的交流！许多在一起共同工作多年彼此很熟悉的人，甚至结婚多年的夫妻，彼此之间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都觉得很了解对方的经历、个性、习惯、爱好，隐私；但哪怕这样几十年之后，在心灵深处，还是存在一层隔膜，隔膜是不能逾越的，于是有的人后觉得隔膜后面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层隔膜是故作神秘。但是那层隔膜后面的东西，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时间不会消除它甚至只会加深它。以至于你发出外人听不懂的感慨："我越来越不了解他（她）了。"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一些父母看到孩子长大的时候，往往就有类似的感觉，并且发出上述感慨。这也使许多人得出"人和人难以相通"的结论。但也存在着极少的相反情况，两个人刚一见面，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就能洞悉对方，不需要推心置腹的长谈，连多问几句都不再必要了。如果是一对青年男女，这就是一见钟情。而徐晓丹和彭仙慧并不是青年男女，而是两个素昧平生的囚犯，这就难以理解了。

彭仙慧慢慢儿走到院子当中，嘴微微张着，好像在尽量呼吸清新的空气。徐晓丹受到感染，也深深地呼吸着，似乎闻到了墙外从树梢上传来的树叶的香味。

第二十二章　都是些奴隶

一切都在变，变化有时候太慢，慢得令人心烦；有时候又太快，快得使人怎么也想不到。

洪士奎绝想不到：几天前还在调情偷欢的他，会再一次被送到集训队来，而且是关小监！

记不清了。如果叫他把这几天来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按先后顺序写出来，他根本办不到。乱七八糟的东西纷至沓来，搅成了一锅粥。甚至令他怀疑这些事情是否发生过。只有一件事是真实地存在的，那有他的身体为证。刚一进院子，接和送的干部刚走开，他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哪里来的拳头，雨点般落在他的肩膀、背部、腰部，腿和屁股被狠狠地踢了几脚，脸上也挨了几耳光，打得他跟冒金星，倒在地上，不知该护着哪里才好。耳朵里只听见恶狠狠的声音：

"褪褪你狗日的神光！"

"叫你喝碗辣子汤！"

“狗日的敢奸干部！”

“叫你色胆包天！”

接着他被拖进屋，钉上脚镣，戴上反铐。想抚摸一下伤痛处，手被铐着，只能龟缩在三合土地面上，望着吊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已用铁丝网罩着的灯泡所发出的刺目灯光，只觉得疼痛、疼痛、疼痛。痛得厉害，直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过了几天，伤处已经不大痛了。值班员打人是有经验的，只叫你感到痛，决不会留下伤疤或后遗症。小监的门被打开，赵干事背着挎包进来，厉声喊：“洪士奎！”

他呆住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一下子醒悟过来，跪在地上，抱住赵干事的腿：“赵干事，你饶了我吧，我一定悔改……”

赵干事猛一踢，甩开了他的纠缠：“你看你，什么样子！”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洪士奎，你改造多年，党的改造政策你是清楚的，今天的处境你也是清楚的。从现在起，你要彻底交代一切罪行，不许有半点儿隐瞒。要是胆敢不老实，耍啥子花招，后果你也是清楚的。”然后从挎包里取出一瓶墨水，几页白纸，一支蘸水笔。“就伏在床上写，每天晚上肖队长来取。”又从挎包里取出钥匙给他开了手铐，重重地关上房门，上了锁。

尽管赵干事连着说了三个“你是清楚的”，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清楚。他只清楚一点：这一叠白纸是他和小监外面的唯一联系。如果联系中断了，他就彻底完了。

他暂时放弃一切考虑，专心致志地做这一件事。他明白在这种带有页码的白纸上面，不能有过多的涂抹修改。那样会导致对他所交代的真实性的怀凝，要很自然才行。内容必须绝对真实，尽管干部们没有向他透露一点儿消息，但仅仅从把他送到小监而不是劳动组这━点来看，就说明这绝不是王主任、阮医生或者某个就业人员检举所造成的，而是白玉芳那边出了问题。干部们根本没有提到她。这只是他的估计。如果他的交代和白玉芳所说的不一致，那是通不过的。至于批判部分，尽管对最后的处理并不起多大影响，他也不忽视，尽量上纲上线，把自己说成是政治诈骗犯。

过了几天，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向赵干事试探。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口风，倒也没有受到申斥。赵干事开始不断发出指示：“第五页要重写！”“经过要写详细些！”“光说经过不行，要把内心的肮脏活动写出来！”

渐渐地，他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有些内容已经写过，可是赵干事还叫他写，而口气已经不像刚送来那样严厉。有一次竟然说：“看来你对党的政策还是有顾虑，有关王主任这方面写的太简略。不要有顾虑嘛，我们绝不会无原无故给你戴一顶污蔑干部的帽子的。”他听了感激涕零，几乎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赵干事走了以后，他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恰巧这个时候徐晓丹代替了老贾，使他更觉得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特别是后来赵干事居然说他“认罪态度好‘；说得他浑身哆嗦，连嘴唇也哆嗦得语不成声。

第二天，他置身于劳动组行列，简直有飘飘欲仙之感。弄得劳动组的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这个新成员。他干活儿之卖力，那是可想而知的。众人侧目，严干事则大声责骂除了他以

外所有的人，以此表示对他的赞许。

他当然不知道，一刚关进小监不久，在他的背后就为他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场争吵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场部办公大楼会议室里，有关干部先讨论对彭仙慧的处理。谢股长介绍情况以后，一致通过。而讨论洪士奎的时候，却遇到冷场：有的怡然自得地抽烟，有的低头想心事，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咬耳朵。齐副书记说："莫开小会嘛！"正在小声嘀咕的医院刘院长和李书记都很不自然地咳了一声，然后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再三动员，还是没有人带头发言。齐副书记只好点了李书记的名。事情出在医院，他自然责无旁贷。说轻点儿是警惕性不高，说重一点儿是失职。洪士奎的罪越大他的错误也越大。但他更不敢犯右倾错误。本来想随大流，谁知齐副书记偏不放过他！只好把众所周知的情况再说一遍，连带硬着头皮检查自己。对于处理意见，他抱定宁可叫别人说自己形"左"实右，也不能落个右倾的原则，慷慨激昂地说："这件事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一个刚重新判刑的刑事犯，竟敢搞政治诈骗，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搞到女干部头上，酿成命案，非严惩不可！"说完就坦然坐下。

"具体意见？"齐副书记问。

"无期徒刑！"

众人不动声色。又冷切片刻，二大队的张教导员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了。别看他职务不高，资格却比马中队长还老。齐副书记当年还是他的部下呢。只因为有右倾之名——犯人背后称他为张菩萨——所以多年来不考虑他的提升。他也就干脆倚老卖老起来。他说："这个人嘛，我还是了解的。家庭成分良好，本人是个工人，又是党员干部。几次犯罪，可以说是屡教不改喽。不过都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冒充高干子弟，也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没有造成政治影响。他对党对人民还不是死心塌地为敌到底。在集训队交代还比较老实，能够认罪，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莫指导员也跟着说了说洪士奎在集训队的表现。接着许多人发言同意上述意见。李书记和刘院长松了口气。齐副书记又征求列席会议的樊干事、赵干事的意见："你们说呢？"

赵干事受宠若惊，屁股往上抬了抬，似乎要站起来发言，结果说了一句："同意大家的意见。"

齐副书记正要宣布会议结束，一直冷眼旁观的张副场长使了个眼色，要他等一下。谢股长放下笔记本，淡淡地说："我谈一点意见。"

张教导员鼻子里哼了一声。大家都明白，这是"摆什么臭架子，一个小小的股长还想做总结报告？"的意思。只有张副场长微微点头，表示赞许。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要孤立地去看，要从各方面去看，一进门就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时候开会的人有的上厕所，有的倒开水，有的窃窃私议，乱哄哄的。谢股长

并不在意，继续说下去："洪士奎好像就是那么一个问题。说是强奸，其实也够不上。他是骗奸，没有使用暴力。"他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我们要全面地、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放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新阶段，阶级敌人预感到末日的到来，他们怀着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用各种手段，明的和暗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方式反扑。他们当中有的人赤膊上阵，公开地和人民为故里底，以青面獠牙的面貌出现。像反革命集团首犯彭仙慧、现行反革命分子分子吴顺庆这样的人就是。更多的是变换手法，披着各种外衣，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挖心战，从内部破坏。社会上是这样，我们这个关着几千个活老虎的元山茶场也是这样。"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发现会场已经安静下来，就接着说："他们打着谈恋爱、交朋友的幌子，和干部的子女家属套近乎，妄图腐蚀瓦解他们的革命意志，模糊阶级队伍，把革命人民中一些不坚定分子拉下水。最近八队就有这样的例子嘛。场部也有嘛。还有些人用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和我们作斗争，各队都有这样的事例。从这样的大背景去看，洪士奎的活动就很清楚了。他先从精神上摧毁了白玉芳同志的防线，又从肉体上进行迫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白玉芳同志在临死前有了一定的觉悟，揭发了这个极端狡猾阴险的阶级敌人，那么我们这个队伍中不就少了一个革命同志，多了一个敌人的内应吗？白玉芳同志以她的鲜血唤醒了我们。"说到这里，他为自己的言词和激情所感动，眼眶湿润，声音也有些梗咽："可是有些同志把它看成一个刑事犯罪问题，完全不作阶级分析。敌情观念淡漠到如此程度，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他说完以后，眼光四面扫了一下：医院的两个一脸阴沉，张教导员昂首望天，似乎不屑一顾，赵干事和樊干事张大嘴巴听得出神，其他人只顾抽烟，齐副书记大睁两眼有些茫然，只有张副场长点点头。隔了一阵，齐副书记才问："你的具体意见是？"

"立刻上报，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洪士奎！"他举起手猛地劈下，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没有人表示反对，于是一致通过。

徐晓丹当然不知道这些。他每天照常执行任务。洪士奎则每天从劳动组一回来，就被关进小监。他劳动太累，现在又没有要求他写材料，只是每周写一次思想汇报。于是他就抓紧时间睡觉休息。偶而盘算可能什么时候把他调到劳动组去。徐晓丹每天也要向值班队长作一次口头汇报。

关于洪士奎这方面，他汇报的内容很简单。一来这一段时间洪士奎本来情绪稳定，再说自从他参加劳动以后，两人的接触更少了。

而对于彭仙慧，他在汇报之前则煞费苦心，既要避免可能对彭仙慧造成实际损害和形象伤害，又要符合干部头脑里所估计的"实际情况"，还要树立自己"认真负责"的形象，这样他多往彭仙慧的窗户格里跑几次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当然，每次时间必须很短，不能让人特别是门卫王老五知道他们之间说了话。晚上劳动组开会的时候，他在窗户前决不同他说话，有时候还大声申斥："不准唱！""离门远点儿！"白天在窗口说话也很短，只有放风上厕所的时候跟进去，可以多说一些，反正别人听不见更看不见。

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一个在工棚多年独居，一个长期单独囚禁，形

成了他们沉默寡言的共同性格，即使把他们关在一起，大约也不会整日谈论的。彭仙慧从不提及他所写的内容，而徐晓丹也不问。反正他相信彭仙慧绝对不会写什么交代、检举、认罪之类，大约是写他的政治见解。这也仅仅是他的推测。至于彭仙慧为什么不主动提起，是怕泄密？写的材料都交上去了还怕泄密？那么是怕连累他了？　　半个月以后，一次在放风的时候，彭仙慧问他读过马克思的书没有？他说没有。彭仙慧又问：黑格尔？康德？卢梭？他摇摇头。再问他："那么孔子、康有为、孙中山、鲁迅、陈独秀呢？"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只在高中语文课本上读过鲁迅的几篇。"再问是那几篇，他说不记得了。彭仙慧不再问，说时间够长了。

他不愿意离开彭仙慧，并不是彭仙慧长期单独监禁很寂寞需要他陪伴，而是相反。尽管这里有几个值班员可以交往，他们也愿意同这个能够给他们带来许多新鲜故事和消息的新值班员聊天，尤其是那个颇为健谈的方荣国一有空总爱和他搭话，但自从他见到彭仙慧以后，他就越来越不愿意和所有的值班人员闲扯了。可是和彭仙慧接触的时间又不能过长，这样他就经常感到寂寞，比在八队住工棚的时候更甚。在工棚有郑言华默默地陪伴着他。可是自从他到了集训队，郑言华似乎较少出现了。于是他真正感到了寂寞。

难道她真的不再来了吗？他在心里常常这样问。也常常问自己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否我真的屈服于时间的巨大压力，渐渐地把她淡忘了？还是如有人所说：人不能仅仅靠回忆过话。那么，需要另一个人或事的出现来逐渐代替？他有些困惑了。当他在小窗口前默默注视那奋笔疾书的背影的时候，他觉得充实，寂寞就暂时离开了他。彭仙慧的微弱哼歌和铁链的清脆响声，都在提示和安慰他。可是晚上回到值班宿舍，那巨大的寂寞立刻笼罩着他，再也不肯放过他。不论是应付同屋人的闲扯，绞尽脑汁的口头汇报，还是填写例行公事的值班日志，那寂寞，那无穷无尽的寂寞，便像毒蛇似的咬噬他的心。直到第二天两个人重逢为止。

彭仙慧也许是写累了，他放下笔，提起脚镣在狭小的空间里徘徊，如有所思的哼着：

茫茫的西伯利亚，　　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

他问："你为什么总是唱西伯利亚？"

"我向往。"

他忽然想开开玩笑："不怕我去告你？"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他得到了一点儿灵感，就用王自洁说过的一句话回答："音乐是心灵的窗户。"

彭仙慧示意他走开：交谈的时间太长了。

刘门两个成了好朋友，说了许多：用简短的语言，用低弱的歌声，用眼神和表情。

从彭仙慧那里，知道他原来是大学生，在文化馆工作，读过许多书，只是他不愿提及反革命集团的事。他也说了吴顺庆的死，说了另一个重监犯洪士奎。两个人的交往，严格地限

制在“交谈”的范围内。开始时他曾借送饭之机，把肉、蛋之类带进去，很快被彭仙慧制止。

两个月匆匆过去，天气渐冷，他为彭仙慧过冬的衣被担心。彭仙慧却说，那些不会有用的。听他这样说，想到那个可怕的时刻即将来临，他战栗了，而彭仙慧却和往日一样平淡。后来当他回忆那些日子的时候，他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彭仙慧说：“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些奴隶。”

“这是谁说的？　　“赫尔岑，一个俄国思想家。”

在这之后，无论在院中散步，在值班室沉思，他总是苦苦地想着，品味着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像郑言华留给他的话一样，不大好记，还没有等他想出一个头绪，莫指导员突然通知他卷好行李到场部乘车回八队。催得很急，几个值班员连正在睡觉的老戴也爬起来帮他收拾。，他解下钥匙给莫指导员，匆匆向那个小窗口投去最后一瞥，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地方。

洪士奎累得快趴下了。劳动组在基建队干活儿，往四楼搬砖。他一趟一趟地背，带着小跑，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放慢速度。收工回来，送晚饭的换成方荣国，他有点儿吃惊，但也顾不上多想。他今天实在太累了。

晚饭后不久，监门被打开了。这是出乎意外的。往常要等劳动组散会，徐晓丹才进来给他戴铐子。这是为什么？啊！多日不见的赵干事来了。他赶紧站起来，赵干事微笑示意要他坐下。看了看四周，还看了看床底下的樟木箱，才说：“你这一向干得不错。”

他受宠若惊，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夸奖，红着脸急忙说：“应该的，应该的……”

“干得很累吧？”赵干事的声音更柔和了，简直就是安抚、慰问，真是声声暖人心啊！他感动得快要哭了。

“明天休息，就不要出工了。”看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又补充了一句：“你还有啥子好衣服，明天都把它穿上。”赵干事一面微笑着，一面掏出手铐，很熟练地给他戴上。

天气还不是很冷，可是洪士奎却仿佛掉进冰害，全身冻僵了，耳朵嗡嗡直响，在嗡嗡声中还夹杂着一个柔和的声音。“……还有啥要求……仁至义尽……人道主义……”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柔和的声音设有了。

又过了一阵，他猛然惊醒，紧紧抱住，那像是赵干事的腿：“赵干事阿！你饶了我吧！你救救我嘛！救救我嘛！”他大声叫喊着，随后叫声细渐转成嚎哭、咒骂，那垂死挣扎的声音，穿过紧闭的监门，传遍大院的每一个角落，连关在离他最远处的彭仙慧，也能隐隐约约听见。而此刻彭仙慧正斜靠在床上，谢股长和两个干部——其中一个是樊干事，另一个他不认识——站在他对面，他们还带了两把椅子来，准备坐着过夜。

谢股长脸色十分温和，令人想起幼儿园的阿姨在哄小孩儿。他亲切地喊：“彭仙慧！”仿

佛在招呼自己的女朋友。

“谢股长，有话请直说。”

谢股长身体稍微动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果然聪明。”稍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你写的材料，上面，已经批下来了。”

“批下来”三个字他说得很慢，也很用力。三个干部表情高度一致，都略带微笑仔细地观察他，像欣赏一头关在铁笼里的动物。

他用手掠了掠长长的头发，闭着嘴唇，嘴角现出明显的皱纹。谢股长又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虽然你恶毒攻击党和政府，我们无产阶级仍然对你做到仁至义尽。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是任何剥削阶级所做不到的。”

“感谢谢股长给我机会，我才有可能写十几万字来表达我的观点。”声音是真诚而直率的，毫无嘲弄讽刺之意。这就大大地激怒了谢股长。

“整整十二万六千字！每一个字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污蔑，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他喘了一口气，才又说：“不过，我们还是让你写完了。”他又恢复了微笑。

“还差最后一章：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那，那就不必了。”

“将来会有人写完它。”

谢股长摆了摆手：“算了算了，还是谈点儿实际的。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在耍嘴皮子。你不想给父母留几句话？”

彭仙慧突然大笑起来。这使三个人都吃了一惊。笑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显得特别响亮。他站起来，手提着脚镣，从容地说：“谢股长如此健忘？不记得我的父母都在六零年饿死了？”他转过身，面对墙壁。不再理会那三个人。

不管怎么说，谢股长已经完成了任务。临出门，他说了一句：“花岗岩脑袋！”

剩下的两个干部坐在椅子上，陪这个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彭仙慧旁若无人，尽情地唱着：

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英勇度抛弃了头颅，

……

为了我们的祖国，

你曾忠诚地服务。

虽然你的服务，

并不算长久……

他是唱给朋友听的，包括最后的那一个朋友。

第二十三章　你听见了吗？

邓管教兆徐晓丹谈话，先表扬一番，说他在集训队干得不错，然后说：“你原来呆的工棚，已经另外安排人了。今年冬天要整修公路，现在要做些准备工作。公路旁边原来有个堆石灰的工棚，现在所剩的石灰不多，打算就用来放炸药雷管。你就在这个工棚，先一个人干着，在附近疏通水沟，修整路面。你住工棚多年，规矩都懂得，就不多说了。缺啥东西，可以找罗事务长要。”

徐晓丹没有多说，就把行李搬去。

进去一看，桌子板凳啥都不齐，就去找事务长。罗事务长叫他向郑木匠要，又问他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是自己起伙还是在食堂打饭？他想了一下说：“还是在食堂吃算了。自己起伙，又要种菜，又要砍柴，又要煮，以往反正要煮猪食，就说不得了；现在再自己煮，修路的时间少了，中队长是要说的。”

“对嘛，自己弄难得淘神，不过在食堂吃，下雨天就脑火了。”

“事情难得两全。罗干事还有啥指示？”

“小心烟火。炸药这些东西是怕火的。”

“罗干事放心。”

到了木工房，说明来意。郑木匠正在做双人床，见他来了，放下手中活计，惊喜地问：“你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还在外工棚？”

“不在原来的工棚。现在养路。”

郑木匠招呼他坐在长凳上，又递给他一支好烟。他说他不抽烟。郑木匠自己点燃抽，然后说：“桌子明天修好我给你送过去。长凳子就是你坐的那条。小板凳我给你现做两个，快得很，等到就是。”

于是郑木匠又干起木工活儿来。徐晓丹主动帮忙，递这递那的。两个人过干边聊。郑木匠问他咋不留场部，他说：“这咋个由得自己嘛，领导叫在哪里就在哪里。”郑木匠把话题一转：“今天吃午饭的时候，听那些到场部参加公判大会的人说，判了十几个，还枪毙了两个，到底是咋回事？”

徐晓丹说他没有参加会，不过枪毙的这两个他晓得：一个就是我们队的洪士奎，另一个是彭仙慧，反革命。

“听说洪士奎人都吓软了，走不得路，还是两个人架起走的。说那个彭啥子的，硬扎得很，就是不肯低头，两个人按他，他还挣扎。”

“他喊啥子没得？”

“喊啥子！判死刑的颈顶上都要卡个木箍箍，想喊也喊不出来。”

徐晓丹没有接话，郑木匠又说：“听他们说，那个姓彭的，是条硬汉子。整了几年，捆绑吊打，他都不服软。你在集训队，总了解一些情况。”

徐晓丹说：“也就是你说的那些情况。”

郑木匠知道他一向嘴紧，不好再问。徐晓丹也想避开这个话题，就指着双人床问：“这是给中队长做的？”

“是。”

“他不是有床吗？嫌不好？”

郑木匠凑近耳朵说：“拉到场部去的。前个月已经拉去一架了。”

徐晓丹想起郑言华以前说过张干事找刘淑珍上山砍木料做床拉到成都卖的事，心里全明白了，就说：“怪不得你抽好烟。”

郑木匠笑笑。他见小板凳已经做好，就告辞了。拿着小板凳和长凳，又要了几颗大钉子，回到了工棚。

忙了一阵，安排完了，手脚闲了。他开着门，坐在床上，望着门外的公路，望着路旁的荒坡，望着荒坡后面的大山和大山后面的群山。那里曾经有过她，可是她现在又在哪里呢？她真的永远睡在树林下面的一个小土堆里吗？他不能再往下想，那样他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叮嘱他，要他好好地活下去，可是，那是太难了啊！

八队，乃至整个元山茶场的人都活着，苞谷馍馍老梭边加上黑市粮可以把肚子塞个半饱，夏天不能挡雨冬天不能御寒的破旧衣服，任它年复一年地烂下去，早早起床，在山坡上淋着雨挖掘身体的潜力，在绳子和手铐的威胁下听着呵斥辱骂，最后受够烟熏之苦的身躯进入梦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躲过赵排长、邓淑张、刘富义的命运的，最终成为长年躺在地上的柴死狗或者编背篼的吴跛子。这就是他未来的命运之路。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二十年的事情历历如在目前。一连串的时间镜头都重叠起来，一直叠到昨天。

突然！一个词从脑海跳出来：奴隶！

“奴隶！”他几乎要说出来，可是谁不是呢？上上下下谁不是见？郑言华也和他一样，是个女奴隶罢了。这两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但他不躲避。他想着它、琢磨着、品味着，这样他很自然地想起他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不是奴隶的人，就是那个说出这句话的人。一个奴隶只要肯想这两个字，他就不再是奴隶了。奴隶是不会想到这个词的。即便听见有人说了，他也会千方百计地否认、躲避这两个字的。

于指导员正在屋里洗衣服。听见有人喊，开门一看，是马中队长。眉头一皱，立刻又换上笑容，连声说：“快进来。”又喊婆娘泡茶。见没有人答应，才想起婆娘刚才对自己说，到邓管教家串门去了。于是擦干沾满肥皂泡沫的手去倒茶。马中队长也不客气，自己找把椅子坐下，对指导员说：“你在洗衣服哇？”

本来是一句平常话，指导员听了却耳根发热。好像自己洗衣服不但说明老婆懒而且说明自己怕老婆。于是用衣襟擦了手说：“嘿、嘿，她有事出去了。我没得事，就……”然后说：“老马你有事？”说完他才想起：中队长老婆从农村来，在小厨房吃了半年，粮食一斤未带，粮票一两未交，留下一堆白条走了。自己该“点”他一下，反守为攻才是。可惜自己反应慢，等想起来，别的话已经出口，改不过来了。

马中队长没有看穿指导员的心思。他不是来闲串门的，他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指导员：“老于，你看看这份通报。‘“

指导员知道这是马中队长到场部领炸药时带回来的。既然专门送上门来要他看，那自然非同小可。仔细看了一遍，就说：“这件事和我们队有联系，洪士奎原来就在我们队嘛！老马，你看要不要把老邓、老罗找来，先开个党小组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开队务会。”

马中队长呷了一口茶，并不回答，表情冷淡。好像在想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指导员只好说：“我想，老马你对这件事必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马中队长一反往日的火爆脾气，慢条斯理地说：“会倒不急于开，这个通报对我倒有些启发：我们的认识要跟上形势。现在劳改单位里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对于队上的一些问题，也要重新认识才好。”指导员把话接了过去：“要说八队的问题也不少：劳动消极、偷窃打架、发牢骚说怪话，赶场不请假，这些问题都该好生整整。”，　　“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忽视，但光抓小的不行。”

指导员心里一怔："这个老马咋回事？尽绕圈子，莫非影射小玲那件事？真是哪把壶不开偏提哪壶！你不明说我就装不懂，挑明了说我也不怕。姓谭的已经调到二十六队，都这么久了，咋个联系得上。"

看见指导员似有不悦之急，马中队长赶紧说明以免误会："比方说，徐晓丹的问题。"见指导员脸色平和下来，他才接着说："谢股长说我听见风就是雨，意思说我水平低，连啥叫敌台都弄不清楚。其实敌台也好，对外广播也好，偶然碰到也好，不过是个由头。这个人不简单，他在本队网网宽得很，连干部当中都有人对他认识不清。在本队，弄得出结果来么？只有到集训队，在那种气氛下，两边同时动手，才搞得出重大问题。我姓马的不是吃干饭的，在五队我就弄出了个'现反'吴顺庆。今年全场出了多少重大案件？彭仙慧一案，洪士奎一案，连女队都出了翻案和诬告干部的事情。这个徐晓丹……"

指导员恍然认悟，连忙接过去说："这个徐晓丹，前些年闹翻案没有结果，表面上不闹了，他内心真服了么？昨年他老婆自绝于人民，他又咋个想？他在三组，这个组的问题也最多。江又安逃跑，刘富义装怪……"

马中队长高兴地一拍大腿："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他检举洪士奎是假象，骗取信任，想掩盖一些重要东西。我看，他主要在暗中活动，很可能不止他一个，像韩福临这样的大学生……"

"那是不是找老邓商量一下？"

"不忙，老邓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太死板，开口闭口讲政策，等搞到一定火候再给他通气儿。我看目前先不动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先……"接着他压低了声音说。

里屋的于小玲原先背靠着墙坐在床上，听见外面谈论中有"徐晓丹"三个字，心中一动，光脚下地走到门口，耳朵紧贴住门缝紧张地听到了一些，后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她穿好鞋，轻手轻脚开了后们溜出去，四下瞧了瞧，没有发现什么人，才快步向公路边的工棚走去。到门前，喊了几声"徐师傅"，无人答应。一推门，是虚掩着的，就进去了，里面没有人。既然门没有上锁，想来人必然不会走远。可是等了一阵，仍不见徐晓丹回来。心想自己出来久了容易被发觉，摸了摸身上，出来得急，没有带纸笔。桌子上找到半截铅笔，但一时之间找不到纸，想不出好办法，就在墙上写："他们上亮过些天要整你说是反革命及团。"写完一看，又添了两个字："小心！"掩上房门，沿着原路往回走。遇到砍柴回来的问她："于小玲，上哪里去？"她也不回答，到了家里，心还扑扑直按跳。

徐晓丹提着锄头回工棚以后，忙着打饭去了，坐在桌前吃饭的时候，才发觉墙上有些黑乎乎的东西。点亮蜡烛一看，大吃一惊。忙到门口张望，确信没有人，回屋关好门，又看了一遍，拿起一块木片把那片墙皮刮下，把灰渣扫到墙角，了无痕迹，可是心仍不由自主砰砰地跳，他反复对自己说："要镇静，要像彭仙慧那样，死都不怕，还伯什么？"这样才逐渐安静下来，可是头皮却痒起来，想起已经两个月没有理发了。"就这头发长得快！"他苦笑着，一边抠头皮一边推测是谁写的。上面没有署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这个人太大意了，万一有其他人或者队长先进来看见怎么办？幸好没有其他人来。不会是就业人员写的吧？这内容不是他们所能事先知道的，组长也只能早一两天知道。十七个字中，就有三个错别字，说明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会是谁呢？　　难道是她？　　不管是谁，要紧的是怎么办。

要是彭仙慧在这里就好了。我怎么一点儿主意也没有呢？彭仙慧就决不会有“谁在他身边就好了”的念头。反革命集团，罪名不小！这就是说：要他交代出同伙，交代他们之间那根本不存在的联系、阴谋……交代不出来，捆绑吊打，戴反铐，再就是到集训队关小监，坐黑棺材，还有所牵连的人……

反革命集团！当初郑言华还没有这么大的罪名，就折磨死了……他无法再想下去，在屋内焦燥不安地走来走去，时而抓自己的头发，时而扯自己的衣服，觉得胸口憋闷得慌。开了门，外面天色已黑，队部那边灯火明灭可见，茶园里似乎有一团团黑影，荒坡上的灌木丛朦胧难辨，有如蹲踞的怪兽。抬头望天，既非乌云密布也不是星光灿烂，只看得见一颗暗淡的小星也在看他，　　有如四目相对。那不是她满怀哀怨的眼睛吗？言华，你是化作天边的一颗星，还是依然在地底深处的岩石下呻吟？我的话你能听见吗？我的眼睛你能看见吗？星星一丝不动，像在注视他，又像在审视人间的苦难。他向她说：“言华，言华！你要我好好地活下去，可是我怎么能活下去呢？他们不让啊！他们不让啊！”他轻轻地哭了。

后来他不哭了，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胸部。他狂燥起来，在山坡上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所有的力量都贯注在腿上。他只能不停地跑。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猛然发现，他正在通往黑水河的小径上。当年王自洁就是戴着手铐从这条小路走向崖顶大青石的。自那以后，就很少有人往这边走。放牛的不把牛往这边赶。附近几个组的人割草也躲开这里。荒草如今已经长得很高了。纷纷说这里常闹鬼。有人说，每当风雨之夜，就会从河面上传来凌厉的惨叫，或者呜呜咽烟的哭声。有人说河面上常有点点光亮，是用来诱人的。还有人说坐在大青石上人会无原无故掉下去。

天哪！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难道这是天意？　　王自洁！他几乎要喊出来。他想只要他喊出来，王自洁就会从幽谷深处冉冉升起，引导他前往那充神秘向往之地。让我去吧！让我去吧！到了那里，我就可以看见言华了。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分开了。

“你等着我，等着我!”

他迈开脚步疾行，像一阵风似的。

一个巨大的黑影挡在面前，迫使他停下来。

“你是谁？”他想大声责问，发出的声音却小得听不见。

那黑影拿着一副手铐，在暗夜中闪着惨白色的光。那黑影不出声，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材和那双马靴可以分辨出来。两个人默然相对峙立。

片刻后黑影转过身来，却是彭仙慧！

这怎么会？　　疑问尚未发出，黑影已经逝去，剩下他独自在小径徘徊，顽强地等待黑

影重新出现。可是除了越来越强的夜风，什么都没有。他等到很晚很晚，才带着已经牢牢盘踞于心抹之不去的黑影回去。

他完全安静下来，是过了几天以后的事。这一阵常有汽车来，源源不断地拉来炸药、雷管、导火索、钢钎、二锤等。点清数量后找罗事务长核对入账。他利用这个机会观察队都附近的地形，目测距离。晚上用计数的方法估计时间，看宿舍的灯什么时候灭了，队部和干部家的灯什么时候熄灭，后半夜什么时候厨房的灯开始亮，都记在心里。打晚饭的时候，他和炊事员闲谈，了解干部晚上值班的规律。这样一来，把他弄得很累，身体更瘦了。赖土匪看见他，也开玩笑地说："咋几天不见你瘦了好些？是不是想婆娘了？"他苦笑："赖大组长，莫拿穷人开心。这一阵养路，中队长抓得紧，隔不了两天就要检查。"

赖组长说："你一个人倒自在，百事不管。老子当他妈的这个组长，硬是背他妈的时！前几天，江又安跑了，你晓得不？"

徐晓丹摇摇头。他接着说："他是个病号，又不出工，哪个一天到晚把他看到？邓管教训了我一顿不说，中队长还踢了我一脚，说人跑了一天都不晓得，死人还要守副棺材板板。你当组长是搞啥吃的？"

徐晓丹顺着他说："你带出工在山上，他从屋里跑了你咋晓得？"

"都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现在带出工也不容易，管紧了组员骂，管松了干部又骂。我们当组长的，硬像是新媳妇过门，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得罪公婆!"

闲聊了一阵，赖组长说："我看你气色不好，要补一下才对。我们几个明天在黄疯儿那里打平伙，你也来一个，吃完再算钱。"

徐晓丹答应了。

打平伙是炖羊肉，几个人在里屋灶上忙，其余的在堂屋闲谈。有几个人他都不认识，赖组长介绍说是新来的。听他们讲，徐晓丹才知道今天休息。只是没有看见黄疯儿，说他领饲料去了。屋里肉香阵阵传来，徐晓丹问羊从哪里买来的，赖组长说在太平场赶场现买的。廖胖娃说这样好，预定的虽说便宜些，老乡执命灌水，喂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转不合算。徐晓丹又问多少钱一斤，赖组长说合二角八一斤。又问有多重，说写九十斤，实际有五十开出头。徐晓丹不解。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他解释：你在工棚多年，不跟大家一起打平伙，没有单独买过羊，自然不懂。买羊要上税，官价一角六，老乡当然不干。背后讲好价，公交易单的时候，写上九十斤，每斤一角六，一共十四元四，就行了。徐晓丹仍是不解，他问："五十斤的羊写成九十斤，那收税的未必是吃干饭的，连大小都分不出？"大家都笑起来，说收税的管这些做啥，他连秤都没得，羊他都没有看到，还不是乱写。韩大学插嘴说："那为啥不在单子上如实写，然后另外给老乡一些钱不就行了？"赖组长说原先是那样的，后来有个人只按单子上写的给钱，另外不补，老乡闹起来了，后来老乡精了，写的时候就不肯吃亏。

这时候羊肉已经煮好，每个人拿出自己带来的碗筷。赖组长亲自分肉，也给黄疯儿留一份儿，于是都大口吃起来。个个满嘴流油，吃饱就胡扯起来。先说组里和队上的一些事情，后来就扯到于小玲和谭志云的事。赖组长说，他听小厨房的说，于小玲疯了，指导员把她送

到地区医院去了，所以这阵指导员不在队上。韩大学问："咋个会病了？"赖组长说："她妈对她说：谭志云已经放回重庆郊区当菜农，他家里给他说了一个当地的妹子。还说这是到重庆出差的干部带回来的消息。于小玲当时不出声，第二天就疯了，不吃不睡不说话，两眼发直，样子挺吓人的，都说这是疯。"

众人叹息一番。有的说莫信那些鬼话，重庆那么好回？再说哪个干部出差还去打听霉和尚的下落？有的怪于小玲自己想不开，为啥偏要找霉和尚？赖大兴说："这都怪谭志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害了自己不说，还害了于小玲。"也有人说，这么一个女子硬是可惜了，红颜薄命啊，归根结底，是谭志云没得福气。白白议论了一番也就算了。徐晓丹交了一元二角钱，急忙告辞下山赶场。到了场上，人都快走光了。他在摊子上买了许多中草药，剩下的钱买了一包火柴，刚好把钱用光。走到吴跛子那里，把中草药给他，又详细讲了熬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吴跛子要留他吃饭，还要给他煮荷包蛋，他说他中午吃羊肉吃得太饱，现在不想吃。吴跛子又把新编好的背篼给他，说是专为他编的。他收下了。回到工棚感到十分疲倦，坐在桌前，点亮蜡烛，又一次仔细地看照片和那张纸条，苦苦思索它的含义。

等啊等啊，又过了一周，白天努力干活儿，晚上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每一个细节。要等一个适宜的天气——既不能夜雨倾盆，也不能皓月当空。昨晚下了大雨，今天雨停了，可是云层很厚。晚饭后他又检查了一遍，把东西放进背篼里，装束停当，静坐等待。

时间过得太慢，队部的灯光总不见熄灭;时间又过得太快，留给他的只有这一个晚上了。

他索性躺在床上，利用这几个小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幸福的重年，那已经很远很远了。小学毕业考了第一名，爸爸笑得合不拢嘴，妈妈逢人就告诉喜讯，大家都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刚参加工作那天，大家鼓掌欢迎他讲话。他脸红筋胀说不出来，又要他唱歌，他一开口就走调，唱不下去……再后来，就是和郑言华领结婚证，两个人挽着手走在乡间小路上，稻花是香的，泥土是香的，野草也是香的，一条狗追着他们叫，那叫声也很好听。她穿的是什么？上面是蓝底小白圆点的衬衣，裤子是什么样的记不清楚了，唉，自己太马虎了。她头上有个米黄色的塑料发卡，样式像于小玲常戴的那种……啊，于小玲，多么好的姑娘啊！他想起了打平伙吃羊肉那天的议论，当时只有他没有发言。他觉得他不配说什么。他对不住她。这一辈子于小玲对他的恩，他只能在下辈子报答了。他忽然想起彭仙慧的话，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些奴隶啊!，于小玲和他，和郑百华一样，都是奴隶啊。

时间在思考中过得特别快。猛然间觉醒过来，出门张望，队部和宿舍的灯光都没有了。他又耐着性子等了一阵，才背好背篼走出工棚。外面很黑。他避开通向队部院坝的简易公路，绕着小路上坡。在暗夜里，他睁大眼睛，咬紧牙关，捏紧拳头，血液沸腾，随时准备和意想不到出现的情况作战。开始时他走得很慢，因为眼睛看不清周围的一切，过了一阵才逐渐适应。回头再看工棚，已经被山坡遮住了，看不见了。

夜色淹没了一切。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风，静悄悄的。偶而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点缀着。进入茶园以后，他弯腰在茶行间伏行，尽量避免和茶树枝叶摩擦。细细的一股股茶叶的清香，不断流来，还夹杂着青草的气味，怪好闻的。

快到目的地了，小厕所射出一丝微弱而又刺眼的灯光。他停住脚，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他祈求着：言华，你保佑我！老天哪！你保佑我！在得到回应以后，他双脚点地，疾飘而过

那条干部和家属上厕所的必经之路，这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到了马中队长的住房后面。他把背篼放下，蹲在地上，耳朵紧紧贴住墙，仔细听了片刻，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从背篼里取出预先连接好的炸药、雷管、导火索，把导火索理顺。虽然他早已练过多次，此刻仍紧张得全身和双手发抖，划火柴两次都没有划着。

他对自己说："镇静！要是彭仙慧在这里，他必定会对我说：你要镇静！"这样他的心跳才渐渐平静，用微微发抖的手再取出两根火柴一起划。一瞬间，微弱的亮光照亮了一小段灰色的砖墙。导火索点着了。他注视小火苗约一两秒钟，转身向后面的一个小山包跑去。

小山包不高，刚好遮住大半个身体。他从怀里取出照片和纸条，嘴唇微微颤动着，默诵了一遍，然后划火柴。这次很顺利，一下子就划着了。小小的火光照亮了她微笑的脸和明亮的眼睛，照亮了附近郁郁葱葱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沁人心脾，每一株茶树似乎都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他第一次感到天地是这么广阔！生命是这么美好！

照片放在即将熄灭的火焰上。她的头发烧着了，她仍然笑着。她的脸被火光照得更亮了，纸条点着了。最后，缠绕在他腰间的导火索也点燃了。他全然不顾小小火舌在腰间疾驰。他两腿叉开，挺起胸膛，凝视着前方，双脚用力地蹬着大地，好像准备随时离地而起冲向天空。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奴隶了。

前方，陡然出现红光，映红了大半个天空。紧接着，从地底深处爆发出巨大声响，像沉闷的雷声，大地也在震撼中发抖。他高举双手，用全身的气力喊：

"言华姐，你听见了吗？"

大地轰鸣，群山回应，无数声音从四面八方一波又一波地传来：

"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完）　　2000.3.27.于四川绵阳

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散记

题记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东方大陆制造了552877个"右派分子"。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坛上，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

"右派"是一个政治术语，这顶桂冠，本来只应该奉献给政客们的，但是在"人人关心

政治”的大陆，许许多多与政治不沾边儿的蚩蚩群氓，也被卷进这一政治旋涡中来了。

对“右派分子”的看法，也因各人的观点立场不同而有所不同。五七年坚决反右的“左先生”们，固然不必多说了；在一般人的眼中，多数人认为“右派分子”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也只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不是值得敬佩的英雄；一些支持右派观点的人，特别是七九年右派平反、复出工作以后，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总以为当年的“右派分子”们都是“先知先觉”者，都是“好样儿”的。

据我看来，大部分右派分子特别是青年右派分子们，既无斗争经验，也无政治敏感，人家设下了“阳谋”，居然还奋不顾身地自投罗网，根本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一遇反击，立刻检讨认罪，不敢坚持正义、维护真理，也不是什么“好样儿”的。

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纯粹的事物。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硅提纯，目前也还只能做到小数点后面九个 9.这许多“右派分子”中，有一些确实具有非凡的头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夹杂在“右派队伍”中的“不纯分子”。特别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这些人很快就会裂变，显出了他们的原形。

毛泽东说：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这是至理名言。

这里所记录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记者本着“真实”的原则，如实记录。考虑到其中大多数人都还健在，一者顾及他们的面子，二者也没那工夫与他们打那“名誉权”官司（如今有一些很没有面子的人，却特别顾惜自己的面子），因此仅把有些人的姓名作了“技术性处理”。反正当年在一起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谁，而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的人，只要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也就可以了。但愿文中提到姓名的朋友，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地回顾并总结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历史一个真实。

楔子：“海子”和“四不像”的来历

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禁闲杂人等闯入。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历代帝王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们要在这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这一举措，不但可以让那些在深宫内院住腻了的皇亲国戚们舒一舒懒散的筋骨，吐一吐胸中的闷气，更主要的是要以此显示一“天下是打下来的”，皇族的子孙们不能忘记皇朝“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

“海子”里面，放养着许多供射猎用的獐狍鹿兔之类，任其繁衍生息。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麋鹿。

麋鹿，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因其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所以俗称“四不像”。老北京有句骂人的话：“什么时候海子墙塌了，露出你这四不像来了。”所说的“四不像”，就是麋鹿。

野生的麋鹿，现在已经十分稀少甚至断种了。其稀少的程度，已经比大熊猫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皇家如果不把四不像送进南苑“保护”起来，只怕麋鹿这一温和的稀有动物就真要在地球上断种了。

如今孩子们要看“四不像”，还能够到动物园去一睹丰采。不过这却不是中国人的保护有方，而是外国人的“功劳”。因为今天中国动物园里养着的四不像，正是出口到英国又“返销”回来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巡”西安，皇家子弟们四散奔逃，连命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打猎玩儿？于是南苑猎场墙倒鸟兽散，四不像从此在中

国绝了迹。幸亏英国人有“先见之明”，早在若干年前，他们的传教士就曾经趴在南苑的墙上偷看皇苑景色，发现这非驴非马的东西，不知何物，大为惊讶，后来千方百计求购了一些皮角之类偷运回国，经鉴定，才知道原来是世界上只有南苑才幸存少许的珍稀动物。等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们趁乱中抢了几只四不像，运回英国去，今天方得“谬种流传”。如今全世界最大的麋鹿群就在英国。但是这种中国独有的珍稀动物，不但本国断了种，而且还给起了个外国洋名，叫做什么“大卫鹿”（学名 elaphurus davidianus，意即“大卫发现的一种麋鹿”）。中国动物园中有数的那几只，确实还是从英国“引进”、也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的呢。

据考证，早在秦汉时代，我国野生的麋鹿群数量众多，赵高“指鹿为马”，所指之鹿，就是麋鹿，而不是美化鹿。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指麋为马”。要搞“似是而非”，四不像确实是绝妙首选：既可指为马，亦可指为牛，随意一指，就可以指它个八九种，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既简单，又方便，难怪深受“阳谋家”的喜爱了。可惜赵太师不如后代人聪明，当时如果不“指麋为马”，而说“此非马非鹿，亦非牛非驴，实乃第五类是也”，那么，今天麋鹿的学名，也许就不是什么大卫鹿，而应该叫做“赵高鹿”了。只可惜，这一“冤假错案”，至今还没人出来为其平反昭雪也。

正是：似牛非鹿又像驴，指你为马有何奇；中华自古多奇才，当推赵高数第一！

据著名“歪批家”郁达夫考证：日本那句著名的骂人话“马鹿野郎”（读作 ba ga ya lu ），直译为“马鹿不分的人”，意指“浑蛋”、“傻瓜”，其出典，竟就是“指鹿为马”。尽管这一说法为日本学者所否认，而判定出于梵语“磨芦”（傻），但也总算是有此一说吧。

其实，就“指鹿为马”的原意而言，“能分马鹿的人”，一个个都被杀了，那才真叫“傻瓜”呢；而“马鹿不分的人”，则大多是不愿、不敢、不想分清马鹿的人，他们不是“笨蛋”，而是“装蛋”，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几个“聪明蛋”夹杂其中，在一旁摇旗呐喊，却不置可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内涵精深博大，东洋人吃不透，难怪！

麋鹿性格温和，只吃草，又不像梅花鹿那样身价名贵，所以才会贱到供王家随便猎杀取乐的地步，绝不是什么“宠物”。可见性格温和，并非优点，须知“弱肉强食”，乃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人马众多，自不待言。这一干人马，乘兴而来，倦猎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南面，又专门开辟了一个“团河行宫”，算是“猎场”的配套工程，除了设有“御厨”、“御寝”、“御厩”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塘鱼池，四周遍植苍松翠柏，虽无京西御花园之排场，却也是红墙绿瓦，环境清幽，不失为皇家气派。

自金元以来，数百年间，历代皇族可没少在南苑这块人工开辟的猎场上耀武扬威。特别是“康乾盛世”，团河行宫着实热闹了一番，显赫过一阵子。无奈 1860 年的“英法联军”和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两次打进北京，皇亲国戚们逃命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行猎作乐？再说，即便真有那兴致，热河的北边，不是还有一个天然的、比南苑大好几倍的“木兰围场”可供游猎么？

咸丰皇帝在热河声色犬马，终于寿终正寝，“鬼子六”出面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懿贵妃”带着同治小皇帝驾返京都。经过战乱，正经事儿还顾不上呢，哪儿有那兴趣到南苑去游猎？

到了“同光末世”，妖妇专政，这个刚愎自用的女人除了偏爱面首之外，对骑马射箭根本不感兴趣，加上两个“儿皇帝”一个热衷于娼门嫖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南苑猎场，团河行宫，也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起来。

这时候，就有那聪明人出来“支招儿”，奏请太后：南苑解禁，变荒为田。于是北京建都以来就同时建成的“南苑猎场”，从此消失，只留下一些诸如“大红门”、“西红门”、“旧

宫”、“南宫”之类的地名供怀旧者们追寻了。

猎场废弃，御用的行宫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荷塘干涸，松柏凋零，用琉璃瓦、大方砖盖成的皇家庭院，也被附近的农家所侵占，成了鸡鸭牛羊繁衍生息的乐土。

随着清皇朝的覆灭，盛极一时的南苑，由于土质含沙量过多，被称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宜耕种，逐渐荒芜，成了野兔和盗匪出没的场所。于是北洋军阀政府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军用的“南苑机场”，直到今天。

1958 年“大跃进”，属于大兴县管辖的“团河”地区，成立了“金星公社”，男女壮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秋收过去，严寒到来，一个个硕大的老玉米棒子，还结在玉米秆上，戳在地里，收不回来。为了开发这片“荒地”，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接管了行宫以西直到大兴县县府所在地黄村镇旁边的几万亩土地，成立了一个“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当时的建制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个四方形的“牢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拉有电网，四角有四个由警卫部队守望的岗楼，安有探照灯，关押的是劳改犯，种的是水稻；二大队是五六排平房，外面虽然也拉着铁丝网，但是并不通电，也没有警卫，里面住的是劳改释放和劳教解除人员，单有一个名称，叫做“就业人员”，共有六个中队，种的是葡萄；三大队是一座 I 形四层楼房，尽管四周没有警卫岗哨，可大门口有人值班，每个窗户外面，都钉有很粗的铁条，因为里面住的是已经从少年犯管教所放出来但还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职工”。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量高达六百万斤，正好与当时的北京市人口相等。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北京人每人可分得一斤。其中的“佳品”，并曾空运供应港澳东南亚市场。

六十年代的团河，与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团河史”上的再度辉煌。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具有世界级知名度的团河农场里。

这一时期的“团河史”，牵动着成千上万善良的北京人，决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特殊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我讲的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千百万个故事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第一章 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四不像”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人为地制造了 552877 个“右派分子”。尽管九十年代末期把 99.1％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但是“反右运动”只算“扩大化”，并没有彻底被否定，因为据说还有五千人（占右派总数的 0.9 ％）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不予改正（现在则连“张罗联盟”都否定了，不知道究竟还有几个是真正的“右派”）。因此，“反右运动”本身是绝对正确的。

“左派”与“右派”，本来是政坛上一个常用的名词，一般说来，“左派”指革命的、先进的一伙儿，“右派”则指保守的、落后的一伙儿。每个人在政治上是左派还是右派，绝不是永远不不变的，有时候甚至是经常在变化着的。

但是中国的“右派分子”，却是一个产生于新中国五十年代的新名词，至少也是在旧概念上赋予了新意，变成了专指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向中国共产党提过尖锐意见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就是终身享用不尽“铁帽子”，哪怕你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无法改变你的身份了。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陆有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但是五七年产生的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其身份却有些特殊：既非经济领域中的地主、富

农，也不是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更不是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因此也是一种“四不像”，只好单划一类，称为“右派分子”。从此中国有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通称“黑五类”。

全国近 56 万右派，除了少数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知名人士”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之外，其余的人，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不涉及刑事案件者一个不抓”的决策，分六个等级处理：最高的“行政处分”是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最低的是只戴帽子，免予行政处分，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

1957 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当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先是在某国营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因“坚持反动立场不知悔改”，被“升级”到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1962 年 10 月，我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一个世界著名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劳动，忽然全场大部分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统统集中，被送到了团河农场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度过了漫长的、终身难忘的七个春秋。

清河农场虽然占的是宁河县的地面，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的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的票证。这种外省市县内的“租界”，有一个专门的但却不一定是法定的名称，叫做“飞地”。北京市公安局所拥有的“飞地”，除此之外，远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和西北的青海，还有许多。

到了团河以后，我被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团河农场的最北端，也就是现在的警官大学附近。由于这里从前有过一个小村子名叫“三余庄”，所以习惯上大家仍都这样叫，很少有人叫七中队的。这个中队虽然隶属于二大队，但却不种葡萄，而是种大田。在我到达之前四五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的兴凯湖、白城子等劳改农场（也是飞地）调到茶淀农场来的“教养右派”以及北京市郊各劳改厂矿的“教养右派”们先期集中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一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后找补”的。前后几批人加在一起，总数共有二百三十多人，分编为四个小队。由于所有的“三余庄庄员”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所以当时有人戏说：这里是“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生产单位”，此言不谬也。

这是全农场唯一的一个“教养中队”。正因为它的“唯一性”，人员的文化水平又相当高，最高的有大学教授，最低的也是小学教员，更主要的是当时纷纷传说：这次集中，是中央广州会议和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政策，经过“甄别”，要恢复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工作，因此场部对这些“右派分子”的管理比较松，主要实行“自管”，连小队长也是我们“自己人”担任。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们这一批“劫后余生”的人尽管没在那天天死人的“荒年”饿死，但一个个不是两腿水肿，“胖”得不行，就是皮包骨头，瘦得不像人样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还是从车上抬下来的。第一次集合起来到场部附近的澡堂子去洗澡，一共不过两千多米的路程，一行人像蜗牛似的慢慢儿往前蠕动，居然走了足足两个小时！

七中队的中队长武进文虽然是个大老粗，说话嗓门儿极大，人却颇为善良。他秉承上级“生活管理从宽”的意图，尽量改善大家的伙食，下车伊始，就给大家定了每月 39 斤、41 斤、45 斤的粮食定量。不但粮食是实打实的大米、白面、棒子面，当时菜园里的黄瓜、茄子、西红柿正熟，他让炊事员每顿饭都熬上几大桶，多多地给，一人一大水舀子，足有小半脸盆，光是这一份儿菜，就能吃个半饱。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吃“代食品”的劳改农场来的“饿鬼”们说来，简直人人皆大欢喜。就连不出工的四小队的病号们，也大都吃饱了。武队长是个有心人，右派们一到，他一个个都过了秤，记录在案，三个月以后再过一次秤，然后公布每人“长肉”的数量。说来有趣，也确实惊人：像谭天荣那么大的个子，下车的时候已经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了，三个月过来，居然长到了一百二十斤。也就是说：近一百天时间，长了四十斤肉，平均每天增加四两，简直是奇迹！

指导员高原松，虽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有一次雨后不出工，大家到路边去摘黄花儿菜，有位老兄感慨系之，诗兴大发，说了一句“人比黄花儿

瘦"，高原松正好在旁边，就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那个黄花儿，不是这个黄花儿吧？"我们大为惊讶：这个管劳改的干部，水平可不一般，从此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从来不大声说话，就是批评一个人，话也不多，口气也不重。晚上点名，大声训话的往往是武队长。

右派刚刚集中到这里来，以恢复体力为主，劳动只是象征性的，能干多少干多少，并不强求定额，而且一律由教养人员担任的小队长和小组长分配活茬儿。

还有一个董干事，是场部派来专门管教这批"右派分子"的。他单有一间办公室，而且只代表场部领导队长指导员们做工作，很少直面教养分子们。

队部除了组织大家劳动生产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档案，要大家谈认识、写总结，还曾经登记谁没有像样的服装和被褥等等。

我们到三余庄后没多久，刘祖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 五〇年经历了千难万险主动回国，被分配在新华社当外文编辑，肃反中被怀疑是"派遣特务"，受到审查，并被抄家。五七年提了"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的意见，又被划为右派。七九年落实政策后任上海交大科技外语中心主任)等好几个外语人才被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干校当教员去了。一批还没摘帽的右派，居然能够去当"公安干校"的教员，这本身就说明政策的确要"变"，而且已经在变。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果然有了新的政策，很可能就要放我们了。

大家心情愉快，人人翘首以待，盼望着"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第二章 风云突变迷雾起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1957 年 8 月 1 日，《劳动教养条例》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字公布的时候，"反右运动"刚刚进入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生产了大量的"右派分子"，于是这些"右派分子"们正好赶上了"头一刀"。

劳动教养开始实行的头一二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定。几年来，教养单位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有许多人刚进来的时候，悔改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以清河农场为例：五八年由教养分子在"西荒地"一口气建设起来的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盛大"场面再也看不见了。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清河农场大战七里海的时候，一天要吃五顿饭，最高土方量一人能做四五十方；1960 年 4 月份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的"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多数人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 1961 年 5 月 24 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当然是"最高奖赏"：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你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 1961 年 5 月 24 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 特别是五七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但是身在囹圄

中，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要是这以后真按照新规定认真执行，倒也罢了。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了 1964 年 5 月 24 日，好歹是个“尽头”。糟的是，由于说不明白的原因，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直到 1978 年才摘帽，1979 年年底才得到解放，终于创造了教养十一年、改造二十二三年的“吉尼斯记录”。

我们这一批集中到三余庄来的二百多名“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将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突然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我们适当的工作的。说实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是从思想上承认了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我敢保证：如果当局在这时候把我们放了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的。

但是“中央政策要变”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逐渐烟消云散了。新的小道儿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子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是因为不合时宜，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于是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所有的人，就都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太大的人。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明白地写着“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因为这时候的确已经有“新政策”下来：解除教养的人，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

对失业的人来说，有“就业”机会，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就业”前面一带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就不怎么样了。不说所谓的“就业”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单是“三等公民”（劳改人员的家属成为二等公民）的待遇：下班后外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被检查，没有通信自由；虽然有选举权，但指定只能选场长或政委，不可选别人，弃权则绝对不允许，更没有被选举权，离真正的“公民”，也还远着呢。当时的劳改单位，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是专政对象。“强制就业”是个什么身份，也就不言自明了。

接着，定期一年半、两年的也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 1963 年 11 月 24 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一共只剩下七十二个定期三年的“老号”，人称“七十二贤”。眼看着再过半年，三余庄就将没有“教养分子”了。尽管解除与不解除，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但是关长了的人，哪怕下了班请个假能到黄村小酒店去喝上一盅，能与女服务员说两句俏皮话调调情，也是美滋滋的，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需要哇！

定期三年的教养人员中，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有人是在统一宣布教养期的日子之前宣布教养期的，所以三年到期的人，并不个个都是 5 月 24 日，其中也有个别人略早几天。例如张永贤（原北京工业学院助教，落实政策后出任延庆某厂副厂长，并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就是 196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安分局宣布的，所以到了 1964 年的 4 月 27 日，他准时解除教养了。

到了 1964 年的 5 月 24 日，这天是星期一，大家一早就都在盼望着队部通知不出工，全体留下开会，宣布“教养中队”的胜利结束。到了七点半钟，小队长们得到通知：到中队部去开会。其实这是每天出工之前的例行公事：由主管生产的中队长布置劳动作业。但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与众不同”上。到了八点钟，出工的哨子照常吹响了，小队长们“带

铁锹，集合”或“带箩筐，集合”的喊声也接连响起，各小队的人马，极不情愿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眼角嘴边挂着大大的问号，互相看看，又带着一肚子疑虑慢吞吞地走出大门去。

大家都觉得奇怪：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队部怎么居然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保持沉默呢？有那憋不住劲儿的，就趁工地休息的时候去问队长：“这三年来，我们认罪守法，积极劳动，为什么到期了还不宣布我们解教呢？”队长的答复是：“解教的报告早就送上去了，上面没有批下来，我们执行单位，没有批示，也不能自作主张。说不定再过几天就会批下来的。”

中午吃过饭以后，没有出工，值班员却通知全体带板凳到伙房后面的空地上集合。有人以为这一下很可能是宣布全体解教摘帽了。因为来的是场部的宁干事。但是他讲话的内容，依旧是队长在工地唱过的老调调儿：“解教的材料已经送上去，正在办手续，希望大家安心、耐心、放心。”

这话很可能是事实，当然也是无懈可击的。既然已经报上去，总有批下来的一天。三跪九叩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么？已经被关傻了的人们，依旧在希望中度日。有希望，有盼头，不是总比绝望要强不是？

宁干事讲话以后不久，队部个别通知李喜兰、刘新民、孙本乔三人解教摘帽。这三人，前者是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门市部营业主任，后两个都是大学生。这一来，希望之火又在人们的心中熊熊燃起，都相信“手续正在办理之中”，都以为不久之后就会一个个地解除教养的。奇怪的是：这三人以后，就到此为止，完全打住，“手续”一办就是好几年，再也没有解除过一个人。总不能说：七十几个人中，只有他们三人表现最好或“罪行”最轻吧？

有个叫王玉琦的，原是钢铁研究院的干部，定期也是三年。他爱好京剧，会弹月琴，所以他刚集中到三余庄不久，就被调到团河京剧班去了。由于剧班是从职工、犯人和教养人员中抽调演员或票友组织起来的，不算教养单位，所以王玉琦三年教养期满，居然准时于 1964 年 5 月 24 日宣布他解除教养，连购货证什么的都发给他了。可是三余庄的那一大批人不解除，他也不能例外，只好又把他的购货证之类收回去，并把他也送到三余庄“归队”。

有人自我解嘲地说：“谁叫咱们来到‘三余庄’这个‘绝地’来的呢？就冲这地名，不是明明告诉咱们了：凡是定期‘三’年的，都要‘余’下来么？”

第三章 “积极分子”与“反改造分子”

这期间，七中队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定期三年尚未解除的教养分子只剩下了“七十二贤”，只不过以前一个小队的人数，就把原来由教养分子担任的小队长统统撤销，合并为一个小队，由干部担任小队长，下分若干个小组，每组设两个组长，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学习。同时从二大队调一部分就业人员来，编为一个“就业小队”，住在“教养小队”的后院儿，干活儿分开，但在一个食堂买饭吃。

中队部也有了变化：董干事先撤回场部去，接着高指导员也调走了。但他不是“另有高就”，而是先被调到二大队一中队去当中队长，不久又被调到场部大仓库去管物资，明明是“降级使用”。武队长被调到顺义砖厂去当厂长，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升”了，实际上那是个极小的劳改单位，地方又偏僻，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官儿。

新调来的指导员姓郝，一只假眼珠，年纪已经五十开外，看样子是个老干部。单从人品上说，他作风正派，对党忠心耿耿，提倡艰苦朴素，处处以身作则，应该说，绝对是个好干部。

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两名复员军人，一个姓阎名进财，是个大麻子，在部队里虽然只

是个班长，但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受到过林彪接见的。因为他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所以他的分工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在出工的时候把某个人找去个别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说实话，要讲文化水平，随便拉出一个人来，恐怕都比这个大兵班长读的书多，他所能作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想而知。

有个叫郭东海的，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恶作剧的行家，调皮捣蛋的干将。他发现与队长谈话是一个逃避劳动的好机会，就三天两头借口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在出工的时间主动找阎队长个别谈话。大冬天的，他穿上棉大衣、捂着棉帽子，坐在背风向阳的斜坡地上诚诚恳恳地请求阎队长开导。他的问题也实在多，一个解决了又出来一个。阎队长的修养也实在好，总是耐心地分析、苦口婆心地帮助，不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不算完。一个冬天下来，郭东海没干几天活儿，满心欢喜；阎队长因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久就调到一中队去当上了副指导员，也是满心欢喜。

另一个姓曾，河南人，大伙儿都管他叫“傻曾”。为什么叫他“傻曾”呢？第一，

因为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行动迟缓，说话也慢吞吞、轻轻声的，不像个军人。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有人半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这些“右派分子”们谁也不想跑，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实施严格的户口和居住管理制度，随后又实行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由户口所在的粮店配发当月有效的地方粮票；没有户口粮食的“黑人”，哪儿也藏不住身子，更没有饭吃。只有盗匪和小偷儿能够跑出去“闯荡江湖”，但那也是过一天算一天，或早或晚还是要被抓回来的。三余庄的右派分子们如果要跑，就是十个傻曾也看不住。第二，他老家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天安门，他却想借此机会考验考验姑娘是不是艰苦朴素，一大早的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尽管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两个人愣是不坐，三十多里路上午走了去，在天安门广场吃了馒头，下午又走了回来。他这样一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搞对象的事儿自然也吹了灯。他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

这些干部，尽管各有个性，但就个人品质来说，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比现在这些只知道贪污腐化、只知道“向钱看”的干部强百倍。当时如果让他们去带兵，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作“政治思想工作？，也许都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真正的政治修养，根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与心态，在三余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单凭”对党忠心“是断然不够的。他们的好心与”忠心“，往往办了坏事、铸成了大错。在他们看来明明是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却恰恰是牛蹄子两掰着，错到姥姥家里去了。谭天荣的被”延长教养期“，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谭天荣，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四年级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之一，现在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已经退休。我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儿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样“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好学精神。好学的人在三余庄并不少，像陈海铨，工人出身的北师大历史系学生，一有空闲，不是捧着《盐铁论》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就是拿着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大声朗读。还有个吴越，是个研究语文的学者，曾任《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的编辑，而且是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他身陷囹圄，还孜孜不倦地在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进行浙南某方言的研究，甚至在紧张的劳动间歇，也要拿出用旧书裁成的卡片来“排序”。这些人，研究的是他们的“本行业务”，倒也不足为怪，怪的是谭天荣不是在钻研他的物理

学，而是天天捧着一部《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揣摩。只要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就知道他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并不是只会夸夸其谈地背两句“否定之否定”教条的人。

事情出在讨论读报上。那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发表了观感，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只要四分钱，就能买一斤，而在苏联，是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的。当时的货币比价，一个卢布等于人民币两元、美金四元。读报之后，具有杨修性格的谭天荣发言了，他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卖四块钱一斤，中国农民就富了。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越大，农民越穷，这是常识。但是文化不高的管劳改的干部虽然读过《毛泽东选集》，可没读过《政治经济学》，看了小组讨论记录，听了学习小组长的汇报，晚上点名，就说谭天荣“眼看着中国的西红柿便宜有气”，硬给揞上了一个“右派本质不改”的罪名。谭天荣当然不服，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又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进行辩解。尽管他的“答辩”与会者大都能听懂，但是有的采取“明哲保身”态度，不置可否；有的明知他的论点正确，但为了表示自己靠拢政府，也昧着良心与队长持同样的观点，用“歪理”来进行“批驳”。当然也确实还有少部分“糊涂车子右派”是没什么文化的，是“混杂在右派队伍中”的“半文盲”，他们有的是学徒出身的商店经理，有的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教员，从“货物总是便宜的好”的简单认识出发，也“自以为有理”，居然头头是道地批判起来。于是谭天荣越辩论“问题”越多，又不肯投降，最后队部认定他“坚持反动立场”，是“拒绝改造”的典型，经上级批准，在一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和另三名“反改造”的大学生右派陈海铨、宗国才、郭远年一起被宣布延长教养期一年，并在不久之后就用小吉普送走了。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已经“荣升”，至于究竟送到了哪里去，公安局办事不论巨细一向保密，我们这些人当然谁也不可能知道。直到 1965 年，谭天荣他们四人又与另外三十二名分散在各劳改单位一直未摘帽的右派一起集中到三余庄来“归队”，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去的。

谭天荣的“升迁”，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据说他有一本笔记本被积极分子偷走并上交队部，场部干事为此找他谈话多次。由于此事没有公开批判，具体内容我们不大清楚。可是在学生右派中，像他那样能够被周恩来多次提及，为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大总统所知晓，又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赞扬的，终究是少数。他这个知名度最大的学生右派先期荣升，应该是一种“风云突变”的先兆。但当时能够作如是观的明眼者并不多，八成以上的人依旧相信政府正在“办手续”，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天开眼”上。

“手续”一办就是遥遥无期，只“办”下李喜兰等三个人来。这期间，阎队长倒是说过“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这样的话。但是他的官儿太小，许这种不负责任的愿，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最多也不过作为笑话听听而已。等到阎队长荣升以后，队长们不再唱“正在办手续”的调调儿，更没人来许“有好事儿”的愿，而是换了一副面孔，统一了口径，强调的是“你们还没有改造好”。明眼者开始怀疑政策有变，因为这句话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第一，定期两年半以内的人，怎么就都“走”了呢（其实不过是把铺盖搬到了另一个中队去，教养分子变成了“强制就业人员”而已）？难道这样巧，他们全都改造好了，我们就全都没改造好？第二，现在可不是劳动教养的草创时期，不再说“谁改造好了谁走人”这样的话，而是每人都有一个法定的“教养期”，即便“没有改造好”，右派帽子可以不摘，“解教”手续却不能不办。不然，就是执法机关违法了。

超过了“解教期”进入了“无期”的“右派分子”们，逐渐滋生的茫然、苦闷、不满、焦急情绪与日俱增。一部分人渐渐“觉醒”，放弃了通过“正常改造渠道”求得“光明前途”的念头，不再抱任何幻想，公开发泄不满情绪而不顾其后果。例如杨路（原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大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现在是四川社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著名数学家）就公开地说：“我认为‘右派分子’想通过

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就像蚂蚁不论在地球上怎样爬，永远也爬不到太阳上去一样。”另一部分人数量比较多，他们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不取得“解教摘帽”的合法手续，跑到哪里都一样。他们出于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继续循规蹈矩地一步步走那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完、也许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改造之路”。还有一部分人，也许是真相信队长说的“你们还没改造好”的评语，总想用自己的“良好表现”来取得政府的信任，从而先于众人离开三余庄的恩宠；也许队长有过“你们的表现比较积极”的评语，鼓励过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功亏一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总之是这一小部分人以“积极分子”自居，想采用“踏在别人的肩膀上爬出去”的战术，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右派分子”中间，依旧可分左中右三种人。极“左”的，队部称为“积极分子”；极“右”的，队部称为“反改造分子”。当然，极“左”的“积极分子”是少数，极“右”的“反改造分子”也是少数，多数人总是处于中间状态。

不论是左是右抑或是中间派，大家所最最关心的，都是“前途”问题，都热衷于打听、传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何变化的小道儿消息。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主要是以前陆续解除教养在别的中队就业的“摘帽右派”们；此外，住在后院儿的“就业小队”虽然大都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老反革命”，但是处的时间长了，彼此混得不错，居然也有人跟他们交上了朋友，有了“共同语言”。所不同的是：“反改造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是用来琢磨、研究自己的出路，“积极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除了自己心里琢磨之外，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拿到队部去，以出卖“同类”来换取政府的更加信任。

那时候，当局为了缓和“右派分子”们“过了教养期不解除”所造成的不满情绪，实行了一条“土政策”：只要表现良好，不犯错误，家在北京市的，允许每月回家一次；家在外地的，允许家属前来探亲，队部提供简陋的住处。这样，可就大大增加了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了。

小道儿消息综合起来，不外乎如下几条：

“团河农场的京剧团被大兴县看中了，点着名儿要。弄得不好，恐怕要连团河农场一起接管。”

“社会上的右派，根据‘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原来是由统战部门管的，现在统统交给公安部门管，和地富反坏同样对待了。”

“农村在开展‘四清运动’，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交待问题，哪儿都有‘四不清干部’。”

“关于右派问题，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公安部门只好暂时‘维持现状’，即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已经摘帽的，就算了；没摘的，暂时不再摘。一切等待中央的决定处理。”

小道儿消息，特点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不过人人心里都明白：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出路与前途，凶多吉少！

不久，团河农场也开始搞起“四清运动”来。运动主要在干部中间开展，对于就业人员和教养人员，则进行另一种“教育”，名之曰“拔白旗运动”。

所谓“拔白旗运动”，就是在“三类人员”也就是犯人（包括少年犯）、教养人员、就业人员（包括“少年职工”，也就是刑满释放的少年犯）中开展的一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质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发动“左派积极分子”揭发检举打击少数的“右派反改造分子”，争取最大多数的中间分子，求得在劳改单位的相对安定。其中当然也包括动员“反改造分子”们主动坦白、投降起义。

这个运动在别的部门进行得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仅就七中队的教养小队而言，战果并不辉煌。因为这一批人长的已经在公安局呆了七八年，像我这样的“后进分子”，也已经呆

了五年多，经过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各样的运动，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体会得最深刻的一条，就是“坦白”必然“从严”，知道历次运动，向来都是前紧后松，开始的时候雷厉风行，似乎一场暴风雨立刻就要来临，最后大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何况这“七十二贤人”中，大多数人都对政府说话不算话、到期不解除心怀不满，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这种“反改造”的因素。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认识，使得这一批人“抱团”抱得很紧。因此除了像刘佛生之类极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想在这场运动中“立功”，也曾经粉墨登场，积极检举揭发、坚决打击斗争之外，很少有人主动坦白，更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去伤及同类。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令队长们大失所望。

这里，有必要插空介绍一下刘佛生这个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这不单因为在以后的多本连续剧中，都是他唱的主角，而且在“人”这种动物当中，很少有他这样厚颜无耻的，似乎也很值得“人类学家”们认真研究一下。为此，对于这个不太光彩的人物，我没有在姓名上加以“技术处理”，而是让他以真名实姓出来亮相。

刘佛生本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助教，湖南人，据说父亲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后死在监狱里。他身体单薄，一副病容，说话轻声细语，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总是把“杜高”叫成“豆糕”，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楚楚可怜，但是心地的歹毒、为人的阴险、个性的凶残，却与他的外貌完全相反。他可能得过肺病，原来在病号队学习，不出工。1962 年的时候，杜高也因为患有肺病，集中到三余庄以后，一直在病号队呆着。后来队部发现杜高不但是个“著名作家”，1950 年他还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所写的战地通信，居然有两篇收在高中语文课本里，而且还是个剧作家，曾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过专业编剧，教养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就把他请出来当中队宣传员，每天早上帮助值班员扫干净院子以后，就夹着铁皮喇叭筒到工地去作宣传鼓动工作，下午提前回来，把一天中各班组及个人的“突出事迹”用黑板报的形式写出来。他出工而不干体力劳动，不但粮食定量提高了，肚子吃饱了，身体也逐渐好起来，而且成了队部信任的红人。刘佛生看了眼红，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走湖南同乡杜高的路，也争取一个出工不劳动，甚至取杜高而代之。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靠拢政府”，也就是充当队部的耳目，到处搜集甚至不惜伪造同类们的“反动言论”，向队部汇报，从而取得队部的信任，终于在 1963 年年底把他从病号队里调出来，到值班室值班。

说到值班室，这里又不得不特别交待一下。劳改队的值班室，是一个很特殊的部门，权力很大。队长平时坐在队部，很少到教养大院儿来，所有院子里的杂务，包括看守院子大门、清扫环境卫生、出工收工敲钟、统计出工人数、传达队部命令、购买日用杂物、分发报纸信件、接待探亲家属、处理临时事件、照顾歇工病号甚至帮助食堂卖饭……等等，等等，都由值班员承包。更主要的，每个值班员也都是队长的耳目，看见某人有越轨的行动或听见某人有不妥的言论，都必须及时向队部汇报。

那时候，七中队值班室的两个值班员，值夜班的一个叫程志雄，安徽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早在 1950 年他还在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调查部看中，成了秘密特工人员，毕业后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翻译兼团总支书记，真正的任务是监督部长们的一言一行，定期向中调部汇报。由于他出身富贵人家，受过高等教育，风流倜傥，一表非俗，舞跳得也漂亮，终于跟哪位首长的夫人勾搭成奸，这不但违犯了特工纪律，在当时“通奸”还是犯法行为，为明暗两面所不许。总算部里看在他“工作积极”的情分上，没给严厉的处分，而是开除党籍，一撸到底，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又从劳改处分配到团河农场来，月工资三十六块五角。团河农场不好分配他工作，就让他到二大队七中队来当专职的值班员。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就业人员，这在劳改单位又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外雇职工”，在形式上不受管制，也不参加“三类人员”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与队长们“平起平坐”。

值日斑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吴越，他是个语文工作者，原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于方言研究和汉字拼音化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所有语文研究资料被洗劫一空，改行写小说，愣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儿写成了一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落实政策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近七十万部，八十年代以后成为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是个好好先生，不但跟谁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还很愿意帮助别人，自从 1963 年五一节进入值班室以后，跟程志雄的关系搞得特别好。俩人合着把值班室变成了教养队的“秘密联络站”：按规定，教养分子向外发信是要经过队部检查的，但是只要把信交给吴越，他就能够让程志雄送到大兴县县城甚至市里去发；按规定，教养分子的家属来探视，所带食物，不能超过一公斤，但是来访家属的登记接待工作是由吴越做的，整口袋的食物可以先藏在值班室里，只拿出一公斤左右来装装门面，家属走了以后，被探视的教养分子可以不慌不忙地把食物转移走。1963 年 11 月吴越解教摘帽以后，更其变本加厉：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只要城里有亲戚朋友，他可以在星期日进城去帮你去取回食物来。杜高就是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一个，但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有许多“哥儿们”，吴越就常常到青艺宿舍去找那些导演、演员们，给他背回来面包、饼干、香肠、油饼之类。北京城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只要通知家里把钱汇给吴越，他就可以进城去帮你买到各种食物。例如外号人称“山羊”的吴宏达（原地质学院四年级学生，现定居美国，成了国际著名的人权运动者）之所以老有那么多吃不完的腊肉和罐头，就是吴越变的戏法。——当然，他的服务对象，是有选择的，像刘佛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不但谢绝服务，而且还要对他讳莫如深。

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值班室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有刘佛生之类的积极分子汇报到队部。队部先是找程志雄了解，程志雄的答复是“绝无此事”；接着找吴越谈话，吴越也坚决不承认；队长就批评吴越：“值班员应该是队部的耳目，你值了半年多班，没向队部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不是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我们快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根据动态分析，队部快要撤换值班员了。程志雄是专职值班员，来头大，撤不动，吴越的值班员可是队部任命的，看起来，吴越的地位岌岌可危矣。

果不其然，不久，就以加强力量为由宣布刘佛生到值班室来值班了。总算还好，没有立刻撤销吴越的值班员职务，而是“同时值班”。

值班室里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什么“秘密行动”就都不能进行了。吴越与程志雄商量，想一个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程志雄手拍胸脯：“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不出半个月，我准让这小子滚蛋！”

计谋当然是在暗中策划进行的。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就业职工，程志雄专值夜班，而上夜班做早饭的炊事员只有一个人，必须由值班员帮他搭笼屉蒸窝头，所以俩人关系也非比一般，半夜里俩人炸油饼、下面条吃是常事。这在当时多数人还饿肚子的情况下，就算是很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候教养队买饭采用的是卡片制：早中晚各吃几两事先登记，印在卡片上，吃一顿划一格。程志雄跟夜班炊事员商量好：第二天早上开饭，故意忘了给刘佛生划卡片，且看他是不是来打第二趟饭。

罗网张好了，就等他自己往里撞。

程志雄下了夜班，本该去睡觉的，但他要守住罗网，等待猎物。刘佛生当然不知道有人设下了陷阱，打回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来，发现卡片上居然没划那一道杠杠，高兴极了，来不及先吃这一份儿，拿上另一个饭盆，又去打第二份儿。炊事员说他已经打过了，他指着手中的卡片说没打，俩人戗戗了起来，程志雄是等在旁边的，立刻出面作证，不但指出他刚才打的一份儿还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放着没吃完，还把他拉到队部去。人赃俱获，刘佛生就是再能说会道，也无法给自己开脱，结果队长当时就宣布撤销刘佛生的值班员，让他搬回病号队去。

刘佛生进值班室没几天，就被撤职。值班室这个“秘密据点”，就这样保住了。

第四章 扩大“积极分子队伍”

“拔白旗运动”期间，又从别的劳改单位陆续调来了三十六个同是三年教养期到期未曾解教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前，我们只以为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各劳改队的右派都已经在1962年集中到三余庄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漏网之鱼”！于是，三余庄的“七十二贤”变成了“一百单八将”，一场腥风血雨的连台好戏，就要在这里演出了。

三余庄原来的七十多人，反改造情绪高涨，抱团儿抱得很紧，积极分子太少，运动开展不起来，这些情况，队部其实也很明白，只是力量不足，无法改变罢了。这一回从外地又调来三十多个人，趁他们刚刚来到，不了解情况，与原有人员也不熟，队部计划要在这些人中发现“新生力量”，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些人一到，队部就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动员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要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暗示运动过后，政府将根据各人的表现好坏重新处理。

新来的这些人中，确实有几个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们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过去靠努力劳动应得而未得到的东西，如今想通过运动，重新争取，想趁三余庄“老号儿”们意志消沉、思想抵触、有抗拒改造情绪的“大好时机”好好儿表现一番，以求在教养所这口深水井中觅得一个“干松”的庇护所。尽管他们事实上已经居于亿万人之下，却以为还有可能成为“百人之上”，一旦政府开恩放人，自己就有可能成为“首选者”。他们不了解政策只能由中央制订，如果能放，绝不会只留一个，如果不能放，也绝不会只放他一个人。可惜这样的话没人能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想不到。

简单地说，队部还果然在这些新来的人中发现了几个“生力军”。在这些新上任的“积极分子”们积极配合之下，带动了已经处于疲惫状态的“老积极分子”，“拔白旗运动”立刻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开始遭殃了。

首当其冲的是朱维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教授、著名画家）。他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西洋名画欣赏课的教师，工于油画和素描。他母亲是个留美又留法的大律师，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里蹬缝纫机，替里弄办的缝纫部加工小孩儿围嘴儿，两个妹妹，一个弹钢琴，一个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家子全不务正业”。他自己从小由法国保姆带大，没上小学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划了右派以后，本来并不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递了三份出国申请书、交了十五元人民币，要到法国去开个人画展，公安局才把他“请”了进来，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教养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他是“三余庄八大怪”之一，每逢星期假日，他身穿破大衣，腰里系一根草绳，在背风向阳的墙角一靠，津津有味地读着巴尔扎克原文版小说。“积极分子们”指责他和思想极端抵触但却沉默寡言、不论大会小会从来一言不发的电气工程师王京结成了“联盟”，是抗拒改造的典型，多次进行批判，还把他在劳动工地上画的速写也拿出来作为“罪证”展览。

接着挨斗的是曹克强（落实政策后出任河北省清河县第二中学地理教师，因被毒打落下了癫痫后遗症，1994年发病时身边无人照顾而死去）。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本人长得其黑无比，戴一副白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外号人称“黑皮”。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消极混泡，干什么活儿都磨洋工，从来都完成不了劳动定额，但是一到工地，干了不到十几分钟，就脱光了衣服，满脑袋油汗，装出一副干得十分卖力又十分狼狈的样子，谁看了也无法说他没出力气。斗争会上，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辩论，弄到后来连队长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送进一天只喝两碗玉米面稀粥的禁闭室，用“饥饿疗法”来治他的“顽固症”。

接着进禁闭室的，是被队部认定“言论反动到够枪毙的程度却又极善于检讨”的杨路，以及被阎麻子定性为“专门在背后策划鼓动、煽风点火、特别阴险的黑帮头子”赵筠秋（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落实政策后回北京日报社工作，现已退休）。

还有一个李泰伦，四川成都人，教养前是北京九中的语文老师，父亲是国民党的川军少将，还是个袍哥大爷，尽管解放前夕奉命组织过民革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川西，但是解放后仍作为“叛匪”镇压了。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反改造情绪特别嚣张，写了许多“反动诗”。被谢自愚等“积极分子”揭发以后，又拒不承认，被关进禁闭室后进行“绝食斗争”，饿着肚子大唱革命歌曲，大呼“毛主席万岁”，以禁闭室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为由，要求增加放风时间，表现得相当突出。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弱得连路都不会走了。落实政策后工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北京市劲松五中副校长。

在无数“蹲小号儿”的人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定一（本是一名兽医，“文革”中被捕，下落不明，有传说已经被“镇压”）这位老兄。因为别人进禁闭室都是因为“反动言论”，独有他是因为“打击报复”造成“伤害”关进去的。

那时候正值“龙口夺粮”的麦收大忙季节，日夜苦战，白天晾晒，夜间脱粒，人人都忙得连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一夜，李定一在场院脱粒。这活儿，是人跟机器比速度，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得跟着机器转，谁也别想偷懒，只要一个人或一个环节稍许迟缓一下，就会供不上料。李定一白天干了一天活儿，晚上接着上夜班，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借口大便，到厕所去蹲着抽口烟，喘口气儿。

脱粒机前面少了一个人，供料登时紧张起来，干活儿的人负担增加了。人称“宋老二”的生产组长宋有余见李定一上厕所一去不回，就去找他。进厕所一看，见他还在那里蹲着悠哉游哉地抽烟，就说他有意磨洋工。李定一当然不服，顶撞了几句，宋老二火儿了，不跟他多啰嗦，挥手就给了他两拳，要他赶紧回到岗位上去。

李定一挨了打，本想还手，转念一想，队长多次讲过：别人打你，要向队长报告，由队长处理，不要还手，不然，就变成打架斗殴，双方都没理了。于是他出了厕所，没上脱粒机，却跑到队长那里去告状，要求队长伸张正义，为他作主。

队长正在指挥脱粒，也忙得一脑袋热汗，刚听他说了几句，就不耐烦了，斥责他不该停下生产来纠缠这些鸡毛蒜皮，命令他立刻回到脱粒机前面去干活儿。

李定一挨了一顿打又吃了一通批评，回到脱粒机前，越想越有气，绝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挨打。正好宋老二就在他前面，他一时按捺不住，就用麦叉子狠狠地给了宋老二一下。宋老二猝不及防，一声惊叫，伤并不重，却震动了全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看热闹。队长闻讯赶来，先吆喝着让大家继续干活儿，一面吩咐宋老二到医务室去上药，一面立刻派人把李定一送到设在一大队的禁闭室去反省。——这一来，李定一倒可以真的躺倒不干了。宋老二的伤并不重，第二天还是照常出工。像这种小小的“伤害”，队长为了杀一儆百，虽然把李定一送进了小号，但只要他肯应付性地写一份检讨，特别是在麦收大忙季节中，人手紧张，不难很快就放出来。偏偏李定一是个认死理儿的“杠头”，咬住了是宋老二先打的他，队长又不给他作主，所以他才“以牙还牙”的。他拒不检讨，队长也没台阶好下，总不能承认自己关错，于是倒楣的李定一，尽管躲过了大忙季节的黑白班连轴儿转，却躲不过一天只喝两碗棒子面粥的命运，而且没想到后来还有更好吃的果子在等着他。

第五章 “文革”前的“骚乱”

拔白旗运动一直继续到 1966 年夏天，其间虽然“你刚唱罢我登场”，“运动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但是斗争方式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大字报批判，小组会揭发，大会批斗，

自己交待，拒不检讨的送进禁闭室，如此而已。

这时候，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还没有打出来，但是社会上的“红卫兵”们却已经打着“革命”的旗号在横冲直撞，而且来势凶猛，远非往日的政治运动可比。三余庄庄员中多数人感到来头不对，忧心忡忡，生怕运动会搞到劳改队来，横遭不测。而少数积极分子却以“革命派”自居，感到形势可喜，如果在混乱中认准了苗头，伺机出击，一旦投机成功，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至于相信政府还在“办手续”的书呆子，到了这个时候，恐怕连一个也没有了。

没过多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终于光明正大地打出来了。

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广播中林副统帅的讲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搬掉一切绊脚石，要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要让他们的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不知道自封的“积极分子”们作何感想，反正三余庄的多数人个个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

尽管我们身陷囹圄，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过那年月小道儿消息满天飞，也许早已经是旧闻的“最新新闻”仍能听到一些：

“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天真而无知，到处破四旧、打击封资修，见了古物洋货统统都砸，见了披肩发喇叭裤一律都剪，大姑娘连花裙子都不许穿，长辫子都不许留。谁还敢穿西装、旗袍，就给撕成一条条；穿高跟鞋的，就给脱下来扔掉。”

“城里的街道、商店都改了名，苏联大使馆前面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协和医院改名反帝医院，天安门广场要改名东方红广场，还要把陕北民歌《东方红》定为国歌。”

等等，等等。

不久，指导员正式通知：以后对外写信，不要写大兴县，而要写“红旗县”，不过后面要加一个括弧，注明“原大兴县”。

改名之风也刮到了三余庄。这时候，刘佛生已经调到了我所在的第四组，并且混上了一个学习组长兼中队宣传员的名份。他感觉到自己的名字中带着个“佛”字，迷信的色彩太强烈了，主动改名为“刘复生”。另一个中队宣传员王祖德也闻风而动，立刻宣布改名为“王左德”。他们不但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也改。例如队里有个史镇华，他们就说：“右派分子”，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也太嚣张了，立刻改掉！可是史镇华却说：我这名字是父母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有人感叹说：“现在刮的是改风，什么都要改。”一组组长刘乃元（原新华社记者，落实政策后任新闻学院教授）听了反驳说：“什么都要改？我的脸型能改么？”

有人把他的这句话汇报上去了，指导员在点名的时候公开说：“脸型怎么就不能改呢？要想改，那还不容易？且看红卫兵能不能给你改脸型！”

果然，很快就传来了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城里的五类分子全挂了黑牌，上街也不许摘，有的还游了街、挨了打。”

“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毒打，气得跳湖自杀了。”

“北京六中的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校内毒打，一面打一面问：”这是无产阶级穿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下去，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

这种传闻，不久就由队长来加以证实。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候，中队长宣读了一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印发的传单，标题叫做《告浑蛋书》，一开头就给“牛鬼蛇神”们当头一棒：“前一阶段，红卫兵出于革命义愤，打了你们的人。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虽说这份传单总的精神是打着幌子表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投在人们心灵上

的巨大阴影，是无法抹去的。中队长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为了本单位的平静，用劝告的语气说：“大家要小心一些，千万不要私自外出。要知道，红卫兵可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呀！”——这位公安局的干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威风，而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了。

我和同类汪介尘反复研究了《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句话的含义和作用，一致的看法是：口气太轻，纯系劝告的口吻，而不用“严禁”、“禁止”或“不准”之类的字眼，这且不说，只提“用”与“不用”，已经点明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用了武斗，并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只不过“不能触及灵魂”，效果不佳罢了。我们不能只看其结论，还要看它的理由是什么。如果红卫兵说：“我们就是要触及皮肉，不打算触及灵魂”，或者说：“先触及其皮肉，打掉其威风，然后才能触及其灵魂”，因此必须“用”一下武斗这个方法，反对者岂不是就失去了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么？

不久，一个更其可怕的小道儿消息传来：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都集中起来，然后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的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部是替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的犯人都突突了……

虽说传闻的小道儿消息不太可靠，有夸大其辞甚至纯系编造的可能，但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谣传，至少是个不祥之兆。

人们的心越缩越紧，那个可怕的魔影，似乎越来越近了。

三余庄院墙外面，贴出的红卫兵传单越来越多。所有传单，开头都写着“十万火急”或“勒令”的字样，署名多半是大兴县各学校、各单位的的红卫兵组织。有一张传单上写着：“勒令！商业部门统统搬到农村去！”内容说：原来的商业部门大都在城里，为城里人服务，可是住在城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坏蛋。还有一份传单的标题是“剿灭天主教”，开头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传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最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是一张对“牛鬼蛇神”发出的“最后通牒”，大字标题印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

内容说：“你们的父兄在旧社会剥削压迫我们的先辈，多少革命先烈被你们的父兄屠杀了。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人民的血债，我们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

三个巨大的惊叹号，像三枚扔进了人们心中的炸弹：

血债！屠杀！偿还！

魔影已经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

不久，魔影果然来了，讨还血债的“革命者的后代”，果然行动起来了。从就业队传过来的消息，千真万确：就在大兴县，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革命者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把敌对阶级统统消灭，革命就彻底完成了！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

大辛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一百多的，有说八九十个的。最近看到《传记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透露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可见“复仇的魔影”并不是大辛庄一处有。也许别处的魔影，正是在大辛庄的“带动”之下“群起仿效”的吧。

不过事后听说，也有两个大辛庄的地主子女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部技术员的老婆，她是地主的女儿。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抓回去批斗，场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知道地主的女儿一被抓回去，准是挨斗，就编了个谎言，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中，等本场批斗过以后，再押送回籍不迟。——这一个，是场长做了好事，无意中保下来了。

另一个是黄村一街农民周广银的老婆，也是个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要抓她，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革命造反派的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多少，干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是在贫下中农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的。那时候，从三余庄出去的"摘帽右派"张永贤和吴越都讨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他们就租住周广金、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他们带来的消息，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绝不会传闻失实。

我听见了这样的传闻，简直像五雷轰顶，有如天塌地陷；所有听见这一消息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那种恐怖的气氛，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

当天下午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外号叫"山羊"的生产组长吴宏达加上汪介尘三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小声议论着，谴责红卫兵的残酷作为，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山羊"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绝灭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

我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军，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说是三色俱全，可以鼎足而立了。"——这是我当年的原话，现在才知道，所谓"蓝衣社"，也和所谓的"a b 团"一样，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反革命"团体。

汪介尘忧虑重重地问："红卫兵会来团河农场造反吗？"

"山羊"说："也许不会吧？《十六条》不是规定不许冲击劳改机关么？"

我说："这可不一定。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魔头，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事情果然为我不幸而言中：不久，就有一批大兴县的红卫兵到团河农场来造反，他们问干部：这批牛鬼蛇神中，哪些人表现最坏？这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当然是关在禁闭室里的人表现最坏。于是红卫兵们打开禁闭室，把关在里面的"反省号"全拖了出来，拳打脚踢，往死里打。那时候，三余庄的李定一因为死不检讨，还被关在禁闭室里继续反省。覆巢之下，必无完卵，这一次，他也难逃浩劫，被打了个半死。

也许是为了对付外来的红卫兵，也许是外面的红卫兵到处造反，也激发了干部们的"革命热情"，总之是就在大兴县红卫兵冲击了团河农场之后不久，一批年轻的干部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年纪大一些的，则纷纷成立各种造反、革命组织，也戴上了名目不同的红袖章。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们见是这样的架势，不明所以，吓得心惊胆战，不知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些自封的"积极分子"们，却蠢蠢欲动起来，显得格外活跃。他们认为：农场内部既然有了红卫兵和各种革命派组织，外面的红卫兵大概就不会再来冲击了。队长人数本来就少，如今农场内部也在闹革命，也在斗"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教养分子中间，尽管"拔白旗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队部只有依靠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才能镇住"反改造分子"，保持教养队的"革命正气"。于是，他们到处找碴儿，想仿效外面红卫兵的做法，在三余庄掀起一股"横扫反改造分子"的热潮来。

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先都是得到队部的许可，甚或就是队部授意、布置的。

事情还是从杨路这个"薄弱环节"开始。自从"拔白旗运动"开展以后，"积极分子"们揭露了杨路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几乎已经被认定是个"拔了尖儿"的"反改造分子"，比起谭天荣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几乎已经认定他是必然要"坐小汽车"被送走的了。之所以至今没有"荣升"，可能是"革命形势大好"，"革命派"和"走资派"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这种区区小事。因此，杨路成了死老虎一头，简直人人都可以充一下"打虎英雄"了。特别是还没有当上"积极分子"而又很想"积极"一下的人，都想整他一下，咬他几口，借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已经转到了政府的一边。再说，杨路身材矮小，文质彬彬，

尽管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面对膀大腰圆的打手，还是没有自卫的能力的。于是，“积极分子”和“准积极分子”们就经常突然地对他发起进攻，谩骂、侮辱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动手打人的地步。

这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间，有三个“积极分子”寻衅找碴儿，借故打了杨路一顿，相对而言，打得不算太重，杨路不敢也没有力气还手，打算忍一忍就这样过去算了。

但是杨路肯忍，别人可不肯忍。消息一传开，“反改造分子”们被激怒了。

三余庄自从 1962 年夏季右派集中以来，虽然也经常开批斗会，并不时有人进禁闭室，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可还是第一次。大家认定：此风断不可长。要是任其发展下去，特别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被划为“反改造分子”的人，还有活路吗？

怀不满情绪者起初不过是个别交谈，传播消息，后来火气越来越大，竟三三两两地聚在院子里大声议论起来，以发泄不满。其中以高作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因为为铁托鸣不平而划为右派，又因为与陈独秀的孙女儿谈恋爱不肯割断联系而被送来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在秦皇岛某中学当教员）的嗓门儿最大， 情绪也最激昂：

“凭什么打杨路？有问题可以批判，问题严重可以由政府处理，同是教养分子，凭什么动手打人？”

缪光谦（电影出版社的助理编辑，落实政策后回电影出版社任编辑，现弃文从商）同声附和：“《十六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他们为什么要武斗？”

曹克强一个劲儿地重复：“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就是不对！”

我没做声。我意识到“积极分子”们这次动手打杨路，决不是他们“革命热情高涨”之后的一时感情冲动，更不是单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做出来给队部看的，其中必然有后台，说不定就是队部放的一个试探气球，是一次火力侦察，目的是为了“引蛇出洞”。

“积极分子”们有队部作后台，气焰才会如此嚣张，才敢于动手打杨路。打了人之后，自以为这是干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露脸的勾当，气焰更加嚣张了，简直好像他们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似的。“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竟敢在院子里面大声疾呼，他们一则是怒，一则是喜：怒的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居然还有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反改造分子”杨路鸣冤叫屈喊不平；喜的是“蛇”一出洞，他们这些打手们可就有了再一次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了。于是“积极分子”们也纷纷走出门来，对反对他们打人的“反改造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围攻。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双方全都非常激动，当然不可能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恳谈，吹一阵和风，洒几滴细雨，尽管一方是据理力争，另一方却是辱骂恫吓。“积极分子”们故意用“失控的语言”来刺激“反改造分子”们，希望他们中有人受不了这种刺激，也会“语言失控”，于是他们就有理由像打杨路那样大打出手了。在那个年代，“革命派”打“反革命派”，是一点儿没事的，但若挨打的竟敢还手，这可就是“阶级报复”，甚至是“反革命行凶”！这是只许我打你，不许你打我，与社会上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两派武斗可不一样。

“积极分子”中，最猖狂的是赵家任。这小子本是北京市粮食局的小干部，大概是个粮仓保管员之类，长得其丑无比，皮肤又黑又粗，大嘴巴，厚嘴唇，很像非洲的黑猩猩，说起话来，好像嘴里总叼着个什么东西，含混不清。但是却膀大腰圆，力气很大。今天就数他跳得最高，扯着破锣似的大嗓门儿，唾沫星儿四溅地高声狂叫：“你们他妈的都是跟杨路穿一条裤子的反改造分子。我肏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的十八辈祖宗！”

——赵家任虽然“积极”，但是解教后仍被发配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劳改矿务局所属的劳改矿）继续改造。这期间他在山西农村找了个“老板子”，进门就当“爷爷”。七九年落实政策，他因为在当地有老婆而不得回京，只好到“老板子”的原籍万荣县落户，在国家储备粮库看大门，既无权，又无钱，懊悔不迭，见人就痛哭流涕，诉说“不平”，真可谓“天有眼”也！

其余的“积极分子”也气势汹汹地大声叫骂，唾沫溅到对方脸上，手指点着对方的鼻子，一面还捋胳膊，晃拳头，竖眉立目，跃跃欲试，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来打算据理力争的人，一看对方又要动武，感到来头不对，有的赶紧到队部先告状，有的只好躲进宿舍内暂避其锋。只有曹克强还在发挥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嘛！”

赵家任装出一副不屑于理会曹克强的傲然神态，腆着个大肚子，堵在房门口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正在这时候，队部的几个队长来了。“积极分子”们恶人先告状，有的摆出一副“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气概，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继续破口大骂。郝队长听了“积极分子”们的诉说，也不再问问别人，怒气冲冲地下令：把高作纯等三个“带头闹事的反改造分子”送进禁闭室，事态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第二天开大会进行批判，刘佛生在批判中将这一事件称为“骚乱”。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我相信也绝不是半文盲的队长们所能想得出来的。

第六章 写在心中的诗

队部在初战告捷之后，又乘胜追击。有一天，全队在宿舍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儿。临近中午收工之际，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由伙房送饭来吃，饭票晚上统一收。饭后就在工地休息，不许回宿舍去。

不久之后送饭的小车就推来了。饭菜非常简单：每人一律三个馒头、一块咸菜，这样，就可以不必使用碗筷；要喝水，反正有共用的水舀子。

既然离宿舍这样近，为什么不让回去吃饭？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带碗筷和饭票？

很快就有人根据情况作出了分析：刘佛生等四个“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出工，一定是队长带着他们在宿舍里进行突击搜查！

刘佛生是我们第四组的学习组长，但因为他兼任中队宣传员，大家出工他被留在队里写写黑板报或标语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开头谁也没注意；但是中队里一下子留下四个“积极分子”的事儿却不多，何况今天又有这样的“异常举措”呢？

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没有私藏武器，也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日记”，但我在几年前写过一首诗，是写在一个本子上的。我暗暗叫苦：如果真的进行搜查，我的这首诗一定会被搜走并被扣上强加的罪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但又不敢露出焦急的神情来，只能在心里盘算：万一小本子被搜走了，队部找我谈话的时候，想个什么主意遮掩过去才好。这时候，我恨不得能分身插翅飞回宿舍，抢先把我的小本子收藏起来。

下午收工回到宿舍，果然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有大大小小的包袱都被打开了，有的人用锁锁着的小箱子，也被野蛮地撬开，杂七杂八的东西摊得满炕都是。大家噘着嘴刚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买饭的哨子就吹响了。按规定，教养小队的人要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门口去排队买饭的。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刚到伙房门口，就佯称忘了带饭票，跑回宿舍去拿。这时候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抓紧时间赶紧翻开铺盖寻找我的小本子。这本子，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的，现在是怎么也找不着了。我的心凉了一半儿。

买饭回来，各人坐在炕头闷声不响地吃饭。尽管我不知道吞进嘴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滋味儿，但我必须尽量装得镇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然，就是我心中有鬼了。我一边味同嚼蜡地吃着饭，一边偷眼去看刘佛生，只见他那双老是眯着的三角眼，正在不怀好意地瞟着我，嘴角分明还带着一丝冷笑，意思似乎是在说：“我看你还能稳多久？”

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来。再一想，又后悔自己太大意了，

其实汪介尘早就提醒过我，要我把“碍眼”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我那时候偏偏没有想起这首诗来。现在小本子已经落到了队长手里，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了。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说的就是“想想不要紧，说说有被揭发的危险，可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白纸上落黑字呀”。既然我已经形诸于文字，想不承认是不行的了。该怎么办呢？是主动检讨？还是先置之不理？

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哪怕我跪下求饶，也没有用，队长也和红卫兵一样，是不会大发慈悲之心的。本子既然已经被他们搜走，事情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也琢磨透了：我越软弱，他们就越认为我可欺。反正我写的是诗，不是什么宣言，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是我写的诗，至少应该先听我的解释。强加于我的，给他个一概不承认！

李泰伦就因为在小本本儿上写了许多诗，被积极分子发现并汇报了，他因此进了禁闭室。但他咬定了这不是他写的，而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写的，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报刊上看见，因喜爱而抄录下来，如此而已。问他甚么报刊，则说忘记了。尽管关的时间很长，因他死咬住“口供不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放了出来算完事。他的经验，值得汲取。

那首诗写了些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到了三余庄以后，我先是被编在另一个小组，组长是郑光第。他是浙江象山人，北大学生，有过一个女朋友，1957 年他划右派以后，和他“划清界线”了。但他对“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人民队伍，还有光明前途”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通过努力劳动积极改造就可以摘掉帽子，摘了帽子就算是回到了人民队伍，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地位和生活。

那时候我就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种想法前半段符合实际，即表现好的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由第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但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史反革命一样，你将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所谓党内右派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里来，最多不过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回到人民队伍，则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总之，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决无第二条路可走。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话，不少人认定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没有听信党组织的话，以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信党的改造政策和党组织所说的一切。他们把我的“反动观点”汇报上去，得了教训以后，我就不轻易对人说了，自然也不曾对郑光第说过。

郑光第为了和昔日的女友重温旧好，努力改造，干活儿简直像拼命，带伤带病也坚持苦干，终于在六三年按期摘了右派帽子，从劳教队搬到了就业队。就业人员是人民还是敌人？摘帽右派是公民还是国民？他和其他就业人员、摘帽右派一样，自作多情地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前者。于是他兴冲冲地找到过去的女朋友，说明来意。其结局自然不出当日的我和今日的读者所料。至于那不知该属于悲剧还是属于“喜剧”的场面细节，郑光第不愿对别人细说，也只好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转眼到了国庆节，照他想：虽然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穿着节日盛装参加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了，晚上进城去看看烟火总可以吧？这自然只是他的主观愿望。他不知道，每逢五一、国庆以及外国贵宾莅临首都，各单位的“暗管”分子、“内控”分子和街道上各种有问题的人，都早已被严加监督，更不必说彰彰在目的牛鬼蛇神了。队部对他提出的这种忘了自己姓什么的妄求也不婉言相劝，干脆有话直说，免得以后再来啰嗦。现在我想当时如果队部对他好言相慰，说明摘掉帽子只是走了改造的第一步，今后只要再如何如何就可以完成“由右派到人民的转变”，也许他还会鼓起勇气走上那无尽头长征的第二步的。然而就业队的队长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是什么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个把牛鬼蛇神，算得了什么？何况是个沉溺于反动幻想而执迷不悟的家伙！

国庆之夜，郑光第溜进了北京城，正当天安门广场上火树银花不夜天，革命群众载歌载

舞，彻夜狂欢之际，他在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必须说明一句：那时候的北海公园，一者因为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二者因为江青的死党们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密谋策划，“文革”初期就关门大吉，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估计郑光第是从北海大桥上跳下去的。当时北海大桥只有一米高的石栏杆，由于在这里“自绝于人民”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改建成铁栏杆并加高，想跳也跳不成了也。

死讯传来，人们开始震惊、叹息；事过境迁，又逐渐淡忘了。想争取有个较好前途的，仍然在争取；存有幻想的，仍然用幻想安慰自己，免得失掉活下去的意义。在无可奈何中，且让渺茫的希望继续掩饰自己因求生的本能、因对死亡的恐惧而苟延残喘吧。

听到郑光第死于非命的消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其实我和他相处不久，接触并不多，更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什么，说不上是朋友。但当时我想了很多，感慨万千，要说的话汹涌而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诗。由于原稿被抄，至今没有下落，仅凭记忆，大致如下：

写在心中的诗

你死了，我……羡慕你，
从此，你再也听不见
　　那恶毒的咒骂和刺耳的吼叫，
你再也不必担心
　　那饥饿的手会紧紧地扼住你的咽喉。
灼热的阳光
　　再也不会烤焦你的背，
刺骨的寒风
　　再也不会扎痛你的脸，咬烂你的手。
肩头不会再出现勒红的印痕，
　　腰也不会酸痛得直不起来。
再也没有人用恶狠狠的目光
　　和鄙夷的冷笑抽打你。
你终于得到了宁静和休息，
　　那是对于终生苦役的报答。
你是渺小的，
在屈辱中活下来，
又在屈辱中死去。
当你的苦汁滴在土上还未晒干时，
你已被苦难的人们忘记，
也被制造苦难的人们忘记。
但是，谁肯相信
　　在那弯曲的背影里，
在破烂的衣衫下面，
　　也有一个人的灵魂？
你在悬崖上拼命地爬呀爬呀，
爬向云雾遮盖的山尖，
终于看见了
　　那山尖，只不过是坟墓。
于是茫然地松开了握住荆棘的手……
谁肯相信，

你也有自己的感情，
这样一个奴隶！
你可知道
那横亘在你们中间的冰山
也早已冷却了少女热烈的心？
那湖水是多么透明，多么透明呵！
那里有美好的回忆
　　有过去的身影，
什么都清清楚楚，都还和过去一样。
现在，湖水变得温暖了，
　　冰冷的湖水，变得温暖了……
湖水散开了，又合拢来，
掩盖了最后的悲哀。
我的笔，你在哪里？
我的纸，你在哪里？
我的泪，你向哪里流？
我没有写，没有写，我不能写，
这是一首写在心里的诗呵！
　　只能永远永远地写在心里。

最后三段记不确切了，和被抄没的原件相比，字句上肯定有些出入，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第七章 武斗变成文斗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杨路被打和全队被抄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信号。要想顺利开展运动，必先扫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而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公开大声疾呼反对武斗的缪光谦。不论是在小组会上主动发言，还是在下面悄悄儿地议论，就连队长找他谈话，他总是不顾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基本精神，硬是抓住其中个别字句不放，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继续大放厥词，弄得队长们乃至“积极分子”们十分光火。

于指导员多次在会上宣布：缪光谦故意歪曲十六条的精神！三小队的王队长更天才

地作了关于文斗和武斗的说明：“文斗是对放下武器愿意接受改造的敌人说的，通过文斗帮助他们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而那些不肯接受改造还继续疯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文斗对他们并不适用。他在进攻，你和他讲道理有什么用？”又说：“革命人民并不提倡武斗，这是阶级敌人不愿放下武器，态度恶劣，才激起革命人民的义愤。所以说，武斗是由他们挑起来的。”

王队长所说的武斗，并不是两派的“对打”，而是有实力的一方对无实力一方的痛打。他不仅有理论根据，还进一步付诸实践，连续几个晚上主持三小队的批斗会，斗争对象自然首先指向缪光谦。

第一天晚上，会议开始不久，就由文斗转为武斗，也就是动手打人。号称“积极分子八大金刚”之一的武大德一边打一边叫嚷：“帮助你端正态度。”或者干脆说：“要修理你的态度。”王队长也亲自动手“帮助”——狠命揪缪光谦的头发。

缪光谦也有绝的：第二天，利用中午空闲时间，自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晚上又开会，缪光谦被带进会场。王队长看见他的光头先是一愣，然后微微一笑，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耳朵，

用力一拧，接着脸色也陡地一变："我看你能把耳朵也剃掉不？"

两番吃了武斗的苦头，缪光谦气愤已极，横下了一条心，打算豁出去了。第三天一进会场，他在门口一站，猛地脱掉上衣往地上一扔，光着膀子，眉毛一立，对站在他对面待命的八大金刚厉声挑战："不怕死的，过来！"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们一下子全被镇住了，愣在那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王队长见事出意外，灵机一动，连忙招呼只会打便宜拳的"金刚"们："他想挑动武斗，咱们偏不上他的当。坐下说，坐下说。"

于是，武斗又变成了文斗。

第八章 "俱乐部"周末之夜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紧扣在大地上，锅里面没有一丝风，闷得人喘不过气儿来，人人的心情也像铅一样沉重。树叶差不多快落尽了，露出了鸟巢，间或有一只乌鸦飞过，带着难听的叫声。我们埋头给麦田放水，冰冷的水无声地流进褐灰色的土地，涌起灰色的泡沫。柔弱无依的麦苗，在水面飘摇着。

1966 年 11 月 19 日，又是一个周末。现在是"狠抓革命"阶段，还没提"猛促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可人们干得还挺积极的。这，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用干活儿来暂时麻痹自己也可以。收了工，今晚干什么？照惯例，周末晚上是不学习、不读报，也不开会的。

可是你能在院里到处走动么？——你想进行什么活动？

到别的宿舍里聊天？——你想搞反动串联？

或许你想下盘棋？——你对现实斗争抱什么态度？怀着什么鬼胎？

不约而同，大家都默然地在铺位上半坐半靠地歪着。这是劳教右派们的一种特殊坐姿：把被子叠成厚厚的方块儿，靠墙斜放，人倚在上面，两腿伸直，或把叠好的被子略微打开些，一半铺在炕上，另一半靠墙，背部紧靠着软和厚实的棉被，颇有点儿像是靠着沙发的味道。有吸烟习惯的，再点燃一支劣质的廉价纸烟，缕缕青烟遮盖了四周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自己与现实暂时分割开来，掩护自己进入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是当时劳改队基本上统一的生活方式。

众人都这样坐着，只有刘佛生的位置空着，他又上队部开会去了。周末召集组长开会，会有什么事儿呢？开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仅是四组的学习组长，直接管着十几号人，还和外号王癞皮的王祖德一起当中队宣传员。现在的的宣传员很少像以前的宣传员杜高那样上工地拿起铁皮喇叭筒大声喊叫了。大家出工，他俩多半留下来整理各种揭发交代的材料、撰写批斗会上的发言稿，或按照队部的意思写批判大字报，完成批斗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有时候剪报，分类贴在一间被队部叫做"俱乐部"的空房子里。然后组织这些早已看过报纸的劳教右派们去"参观展览"。他俩说得上是队部的助理和参谋，是名副其实的高等犯人。

刘佛生的父亲是个资本家，五十年代不知为什么关进了监狱，六零年死在里面。刘佛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他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唯一的反应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背这沉重的家庭包袱了——不是背更沉重的“有杀父之仇”的包袱，而是没有包袱可背了。

刘佛生终于从队部回来了。他的脸色铁青，喊了一声：“大家注意！”脸上一副十分严肃的神情，可以预料他将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要传达队部的什么重要指示。他一边翻看小本子，一边瞟视各人的表情变化，慢慢儿地说出一件事情来。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天，大家都在宿舍里休息，在一组宿舍里，闲得无聊的郭允德坐在炕上，在一个翻过来的旧香烟盒儿上瞎写。烟盒是阿尔巴尼亚进口的（改革开放以后方才知道，这种所谓的进口烟，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lux 牌。这种烟是硬盒精装的，价格却比国内产的中下等烟还便宜，只是烟味儿不太正，一般人都不爱抽，却被穷劳改犯们认为是价廉物美的最受欢迎的品种，因此那时候三余庄到处都是这种烟盒儿。也许是那时候大会小会报纸广播上“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许是宿舍墙上到处贴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之类的标语，所以他就漫不经心地在烟盒儿的背面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字句。凑巧坐在他旁边同样闲得无聊的王玉琦和他闲聊起来：

“老郭，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钢铁学院的学生。”

“钢铁学院？哪个系的？”王玉琦饶有兴趣地刨根问底。

“轧钢系。”

“轧钢？这个‘轧’字，怎么个写法？”

郭允德怕说不清楚，于是顺手就把“轧”字写在烟盒上给他看，说来也是凑巧，这个“轧”字，正好写在“毛泽东”三字的上面，不过明显偏在一边，并不在一行上。

当时他们俩谁也没注意这件事情，写完了，就把烟盒儿顺手一扔。但是王玉琦的冤家对头董立（注意：这里用的是他的真名，没经过“技术处理”），却早在一旁密切地注视他们。没等郭允德、王玉琦反映过来，董立就把这个烟盒儿拿了过去仔细端详。一见有这样四个字，如获至宝，当时就举着“胜利品”冲向队部。那时候七中队的指导员换了个姓于的，他虽然也很“左”，不过中队里几次发生打人事件以后，他倒是明确表示过今后不许随便打人。但他最近外出开会去了，中队工作由新调来接替郝中队长的盖某主持。董立就把缴获的“罪证”交给了盖中队长。

董立是琉璃河小学的音乐教师，个子矮小，文化水平相对而言也比较低。他干活儿不行，告密打小报告却是行家里手。王玉琦原是钢铁研究院的一名普通干部，“反右”中因为凑不够 5%的“定额”，只好拉他来凑数。他文化不高，但性格直爽，平素最看不惯董立那些鬼鬼

祟祟的勾当。他的身材虽然并不高大，却也膀大腰圆，前不久就因为董立瞎汇报，王玉琦曾经用拳头“教训”过他，封了他一只眼睛。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因为董立这个坏小子报复引起的。

盖队长把“罪证”拿去给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看，要刘乃元先在组内组织批斗。刘乃元一眼就看出这四个字根本就不是连续写下来的，但是刚一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了盖队长的“驳回”。刘乃元无可奈何，只好不痛不痒地在组内开了几次会，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郭允德心知这件事儿没完，预料到将要大祸临头；王玉琦心里对董立更加厌恶、反感，当别的组有人问及这件事情的经过，王玉琦当然严词谴责了董立，最后还说：“等着瞧，不定哪天我还要封了董立这小子的那只眼睛！”

这句话，又有人报告了盖中队长，今晚上组长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盖中队长布置了今晚开会斗争王玉琦以后，接着动员说：

“反改造分子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对靠拢政府的人行凶报复，就因为以往对他们的斗争太客气了，他们才这样猖狂：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有些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老找队部，说反改造分子如何骂他们，还要打他们。我说，你不用找队部，找队部也没有用。他骂你，那是你愿意听！他打你，那是你愿意挨！

“今晚开会，要狠狠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客气。他要打，咱们就打个样子给他看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检验每一个人究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子一边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晚七点半第一小组在俱乐部开会斗争反改造分子王玉琦。因为他企图行凶报复。郭允德另作处理，今晚主要斗争王玉琦一个人。欢迎其它小组的人自愿参加。”

“自愿参加！”开斗争会居然还有“自愿参加”这一说，这可真是盖队长“主持中队日常工作”以来的新举措！连看电影都要集合点名“统一行动”的劳改机关，开性质如此严重的斗争会，居然不开全队大会而用小组会的名义！既要收敛“每一个人”却又是“自愿参加”！这种会，恐怕没有哪个人竟会糊涂到不“自愿”参加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批五七年的书呆子们，还是估计错了。

传达完了，时间也到了七点半，刘佛生率领全组走向俱乐部。范光东、谢自愚、胡德来等“积极分子”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其它人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

范光东是北京市政协秘书处秘书，山西人，大家都叫他“老西子”。他虽然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但是写起字来歪歪扭扭，真不知他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他划右派以前，因为与小保姆私通，夫妻关系本来就极紧张，一划右派，老婆就跟他离婚了，所以他也成了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之一。他身材臃肿颟顸，干活没体力，老完成不了定额，可是饭量却极大。多亏吴越隔长不短儿地进城去帮他到南小街一个姓郭的女人家里去拿烧饼、点心之类回来吃，一拿就是一面粉口袋。没想到喂出这样一头“白眼狼”来，吴越真是瞎了眼了。——此人现已故去。

谢自愚更是一个突出的两面派。他是北京水利电力学校毕业的技术员，湖南人，个子不高，肚子里并没多少东西，却傲得不行，自称是铁托的干儿子，曾扬言要写一部《续国家与革命》，要与列宁比一比高低。特别是后期，简直像一头疯狗，逮谁咬谁。

胡德来是哈工大的一年级学生。划右派以后，并没有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积极争取：到新华书店去偷书，被抓住以后，才进了公安局的。不过落实政策以后，却数他本事大，如今已经有了两所住宅，还有自己的小车，在“三余庄右派”当中，堪称首富。

所谓的“俱乐部”，前面说过，只是一间空房子，其实里面从来没有扑克、象棋之类的文娱用品。

我们走到俱乐部门口，其它各组也陆续来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木棍。我心里猛地一惊，尽管估计到今晚可能要动武，原以为也不过像打杨路、缪光谦那样，不过打上几拳踢上几脚罢了，现在看来，他们是要“学红卫兵”的“大打出手”了。我不由得为王玉琦的处境担起心来。

进入会场坐下，看见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一百多人把不大的屋子填得满满的，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往日一开会就抽烟，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抽的，连咳嗽也只是偶尔有一两声。天花板上一支五百瓦的大灯泡亮得刺眼，墙上贴着四张方方正正的大白纸，每张纸上写着一个斗大的黑字，合起来是：斗鬼大会

今晚上真的要把人斗成鬼吗？

两个队长早就来了，一个是王队长，另一个是新调来的高队长或岳队长，记不清他姓什么了。他俩一反常规，不进屋主持会议，却像牛头马面似的分别站在两个门的外面，满脸杀气，狠狠地盯着进入室内的人群。看那架势，今天的会场是只许进不许出的了。

尽管今天的会是一组的小组会，别的组不过是“自愿参加”，但是这个“斗鬼大会”却不是由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主持，而是由中队宣传员刘佛生越俎代庖。后来才知道：刘乃元因为感冒，大夫给了假条让他休息三天，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他“躺倒不干”，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第一道程序，自然是援例恭读毛主席语录，众人屏声静气听刘佛生领读。平时开会，往往从队部所挑选的语录就能大致估计到斗争会的火力猛烈程度，这次选的语录却只有两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就是那段全国传诵，使用率极高，牛鬼蛇神们听了都会心惊胆战的著名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刘佛生接着介绍“事件”的经过，刚开了个头，王癞皮迫不及待地领头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人伸直胳膊大声叫喊。在狭小的空间里喊声汇集在一起，显得特别响亮，真所谓“声震屋瓦”。

王癞皮又喊：“把王玉琦揪出来！”

一群“积极分子”一叠连声狂喊：

“把他揪出来！”

“把他揪出来！”

“砸烂他的狗头！”

王玉琦默默地从人堆中站起来，走到会场中间。那里有一小块空地，是专门留给他的。他身材不高，却粗壮结实，选择他做为毒打对象，是盖中队长的高明之处，要是换了瘦小枯干的杨路等人，恐怕挨不了几下打就没命了。

几个“积极分子”站在他身后，按住他的脑袋用力往下捺。

稍稍平静以后，刘佛生以会议主持人的姿态站了起来说：“现在，先由董立揭发。”

身材矮小的董立，一听“主帅”发出了命令，立刻像出阵的战将似的挺身而出，耀武扬威地站在王玉琦面前，指手画脚地说了起来。按说，他的揭发应当属于“控诉”一类，应该以他受到王玉琦“报复”的遭遇激起人们对王玉琦“罪行”的愤慨。但是他又丝毫没有通常控诉者那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样子。因为他实在无法掩饰立功后洋洋得意的心情。当他说到抓住了“罪证”跑到队部的时候，几个“积极分子”高喊口号：

“董立做得对！”

“坚决支持董立！”

但是没有人响应，其余几个“积极分子”也不做声 .有几个早就不耐烦了的“积极分子”冲上来对王玉琦大喊：“跪下！跪下！”算

是对喊口号的呼应配合。他们见王玉琦没动，就上前把他推倒按住，并朝他脸上身上乱打乱踢。董立、刘佛生、王祖德也纷纷挥拳猛打。王玉琦不敢还击，只好双手抱头护住了要害部位，一面“哎哟哎哟”地叫唤着。脑袋护住了，背上又“咚咚咚”地挨了几拳。几个打手早就有所准备，他们模仿红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狠狠抽打王玉琦的胳膊、脊背。但有

棉衣护着，并不太痛，打手们觉得不过瘾，就一齐狂呼：

“他妈的，把他的棉衣扒了！”

“把衣服扒光！”

“叫他自己脱！”

王玉琦当然不会自己乖乖儿地脱了衣服请人家打。于是打手们立刻扑了上去，七手八脚地扒他的衣服。到了这时候，王玉琦想不驯服也不行了，他像一头任人剥皮宰割的羔羊，露出了光光的脊背，一个粗壮结实的胴体暴露在耀眼的灯光下！

蚊子盯住了血，恶狼看见了肉，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打手们争先恐后地抡起皮带向裸露的肌肉抽去，举起木棍砸去。鞭扑皮肉的噼啪声淹没在凄厉的惨叫中，一声声撕心裂肺。我觉得耳膜仿佛要被刺破，连凝固的空气也被劈开了。

“大会主持人”刘佛生想起了会议程序，喊了一声：“大家静一静，让董立把话说完。”

董立三下五除二结束了显得过时的发言。积极分子又喊：“把郭允德揪出来！”

“反革命分子郭允德滚出来！”

所有的目光一齐转向蜷缩在人群中的郭允德，几个打手抢入人群伸出利爪，郭允德直往后躲，他身边的几个人满脸惊恐，一边小声地说：“快出去吧！”一边轻轻推他。

几双魔掌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从人群中拖到了王玉琦的身边。这个身体健壮的大汉，此刻像秋风里的一片落叶，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充满恐惧的双眼不知在向谁乞求。许多人不忍再看，把目光转过一边去或看着地上。我一转脸，看见杨路的脸色惨白，正转过脸来看着我。

刘佛生因势利导，他似乎忘记了盖中队长“只斗王玉琦一人”的指示，竟把斗争矛头转向了郭允德。

一个“积极分子”厉声责问：“你为什么要轧毛泽东？”

一群“积极分子”同声应和：“说！快说！”

郭允德小心翼翼地哆嗦着分辨：“我说的是‘轧钢’的‘轧’……”

“你是不是要造一架轧钢机轧毛泽东啊？”一个“积极分子”狞笑着问。

另一个“积极分子”揭发：“他有个小本子，上面抄了一首诗，写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几个打手跳起来边打边喊："我叫你当鬼雄！我叫你当鬼雄！"

郭允德被打得摇摇晃晃，撞到了墙上，连墙上贴着的大白纸也摇摇晃晃的。打手们又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几下子也把他的上身衣服脱得精光。

先是拳打脚踢，接着皮带木棍，暴雨似的向两堆血肉之躯猛抽猛砸。俱乐部转瞬间变成了行刑室，一幕幕地狱的惨景突然呈现！王玉琦发出痛彻心肺的高声惨叫。郭允德痛得大喊大嚎："妈呀！妈呀！"一个三十多岁的强壮男人居然会像孩子一样哭喊，听起来特别可怕。这是人性在呼救，绝望中求生的本能在呼救！

打手们狞笑："你妈也救不了你！"接着又是几皮带！

木棒和野兽的利爪一起狂舞，皮带刮起的妖风在横扫。一棍子下去，背上立刻一块青紫，一皮带抽来，赤裸的脊背上又添一道血印。墙在摇晃，地在震动，吊在屋顶上的灯泡也在震动，灯光在墙上映出了魑魅魍魉的幢幢鬼影，不断传来连虎狼也不忍心听的惨叫声犹如万箭穿心！

我的心在狂跳，要跳出心脏！我的血在奔突，要冲破血管！如果我现在有枪，我会毫不迟疑地向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开火！如果我手中有刀，我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恨自己是个文弱书生，不会少林武术。我恨自己无权无势，不能除暴安良。为什么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不从天而降？为什么老天爷不睁眼管管这些人间的恶魔！

我的血在往上涌，我的气往上冲，我真想大喊一声："魔鬼们，住手！"可是我不能，不能呵！那样，我们三个人就都会被这些没有人性的暴徒活活打死的！

被人们称作没心没肺的武大德，外号武三蛋——坏蛋、笨蛋、浑蛋——充分发挥了他的第一个特点。他额上青筋爆起，张开大嘴，露出板牙，上面抡圆了皮带猛抽，下面用脚乱踢。嘴里像毒蛇吐信似的不干净地骂着。如果说红卫兵把"革命行动"作为毒打的代名词，他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就应该叫做"革命语言"了吧！

也有些打手不像武三蛋那样一味毒打，他们打上几拳又忙里偷闲地注视着人群的反应，看看他们有何表现。特别是刘佛生，两只小绿豆眼总是骨碌碌地满场上乱转，不知窥探些什么。

按住王玉琦、郭允德的人早已放开手，腾出他们俩的后背来，让更多的打手可以有"用武"之地。他们两个双臂护住头部，身体本能地躲闪皮带棍棒的狂噬。他们的两腿被踢伤，已经站立不起来，只能在地上乱滚乱爬。布满伤痕的身躯爬到哪里，皮带棍棒就追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惊恐地退缩。

这时候，把门的两个"牛头马面"终于进来了。鞭扑皮肉的声音突然停止，尖锐的惨叫声也低沉下来，打手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他们冷冷地审视着趴在地上、两手抱头、不断唉哟呻吟的两个"鬼"，足有几秒钟的工夫，高队长突然厉声高喊："张晓谦！"

张晓谦是目前右派劳教队唯一的一名就业人员，担任仓库保管员重任，是个得到部队信任的高等犯人。为什么突然喊他？

张晓谦连忙上前答应，高队长吩咐："上仓库拿两条绳子，把这两个家伙给我吊起来！"

"是！"张晓谦回转身，一溜小跑不见了。

"这条狗！"我心里暗暗地骂。我平素对他就没有好感，这家伙总是板着脸。好像谁欠他的债似的。他又跑去拿绳子。只要把他们俩吊起来，他俩今天就没有活路了。

趴在地上，胳膊还能护住头部、心脏、肋下等要害部位；一旦被吊起来，且不说捆吊本身造成的伤害，而且根本无法躲闪，打手们想打哪里就打哪里，这个世界又要添两个冤鬼了！

高队长布置完毕就离开现场。一些纯属"表态型"的打手也逐渐住手了。剩下的武三蛋、范北新、张效秦、赵家任等"八大金刚"却更加疯狂起来，那隐藏在人性黑暗最深处的残暴因子也冲破一切限制，毒打早已超出了"表示自己立场有了转变"的范围，变成了兽性的发泄，打手们个个成了施虐狂！

受害者惨叫，打手们狂呼，拳头巴掌早已不过瘾了，木棍皮带轮番猛打，受害者拼命挣扎滚动，用尽全身气力叫喊，众人再也无法保持平静，都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拥挤着、涌动着，像一锅煮沸的开水，全场大乱。当人群涌到了门口，我趁势退出会场，门外已经有十来个被挤出来或被吓得退出来的人，个个脸上极度惊恐，这种场面对谁都是第一次！

高队长却往室内挤，他大概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趁没人注意，我快步走到厕所。我需要找个地方冷静一下，把快要跳出腔子的心捺回去。我已经忍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看着无辜的人遭受长时间的毒打而自己无能为力，看着人性中最残忍最丑陋的兽性在尽情表演施展，这简直是对每一个尚有人性的人的一种惩罚。面对这样的场面，真不得不承认：那些打手乃至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确实已经"改造"得与众不同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这样凶残？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难道也像红卫兵一样，是对"阶级敌人"怀有先天性的"革命义愤"？还是那个名叫"残忍"的魔鬼附身了？人性在呻吟、在退缩、在挣扎；兽性在横行、在飞舞、在疯狂！

冷静！千万冷静！厕所也不是久呆之地，一旦被队长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毒打的恐怖随时威胁着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稍有不慎，不仅无助于受害者，连自己也可能活活被打死！

我定了定神，又赶紧回到会场门口。两个"牛头马面"正把退出会场的人往回赶："都进去！都进去！"我连忙混在被赶的人群中，溜进了会场。

我出去了大约一刻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就在毒打高潮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在我们病号组，也有一个反改造分子，他长年泡病号，不出工。像这样的反改造分子，难道不应该也拉出来斗吗？"

他说的"反改造分子，指的是李泰伦。可是当时大家正盯住了王玉琦和郭允德，谁也没理睬他。要不然，李泰伦那夜晚也非被打烂了不可的。

毒打还在继续，丝毫没有放松。张效秦怪眼暴突，轮起皮带猛抽，一皮带下去，旧伤痕上立刻添上新伤痕。这家伙以前进过公安干校，还到北京市公安局设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著名劳改单位兴凯湖农场实习过。他打人特别凶狠，大约是因为受过特殊训练吧！

赵家任脸上的满脸横肉已经沁出了汗珠，他也抡圆了皮带。在"反骚乱"中，他只发挥了大嗓门的特长，其余的能量没有充分发挥。今晚这里是他们一伙儿的天下，他自然要大显一番身手。还有范北新、陈平，更不用说武三蛋之类，个个挺胸叉腰、龇牙咧嘴、竖眉立目、威风十足。时光似乎倒流了十几年，他们俨然都成了"革命小将"似的，在五百瓦大灯泡的

强光照射下，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吃人面目！

这里附带说一句：打手陈平，原是北京纺织公司干部，落实政策后，爱人已经与他离婚，右派朋友也因为他是个打手而不愿与他交往，日子过得很苦恼。但在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他却有过躺倒在军车前面，阻止解放军去天安门镇压请愿学生的“壮举”，也算是“右派”中积极支持学生的急先锋。他的形象当天就被密探记下，事件后在街上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把他抓进了公安局，问的则是“拦阻军车”的罪名。后来形势有变，由单位出面保释。〗

看！杨学东（原政法学院助教）高举木棍恶很很地砸下来了。他以前对谢自愚说过：“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除非中国也出个赫鲁晓夫。”结果被谢自愚立即检举了。他感到前途凶多吉少，今晚表现得这么凶狠，是想用别人的血来洗刷自己吧？

就连张凯元，一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也得空就上前拧一把、打两拳，借以表现他的“积极改造”！

王玉琦、郭允德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了。他们已经没有挣扎爬滚的气力，皮带木棍打下去，再也激不起尖厉的叫喊，而只有微弱的呻吟、低沉的哀鸣。他们身上早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到处是惨不忍睹的伤痕。时间似乎已经凝固了，不再向前。不少打手已经累得不行，停下来靠墙喘气，有的还发出鄙夷的冷笑，不时用脚踢踢那两个半死不活的“鬼”，边踢边骂：“他妈的，装死！”

大约是听到惨叫声逐渐微弱下来的缘故，高队长进来了。他仔细审视着两个“鬼”，那目光，纯粹是屠夫注视着被宰牛羊的目光，冷静得吓人。

这时候，出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张晓谦，不知从哪里突然钻了出来：“报告队长，仓库的钥匙找不到了。”

保管员把仓库钥匙丢了，就好像做官把印丢了一样。我心里暗说：“算你张晓谦还有点儿人味儿。”高队长却没有理会他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解释，看了两个“鬼”一眼，又看了看那群疲惫不堪的打手，居然什么也没说，竟匆匆地走了。

打手们一时拿不定主意：队长这时候走了，什么意思？可别领会错了。何况大多数打手也实在没有继续再打的劲头了。

突然，八九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人：盖中队长气势威严中带有几分高深莫测的派头，目光咄咄逼人，“牛头马面”则紧跟他身后。这些大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个个手提长条木板，来势汹汹，一个劲儿地喊：“两个坏蛋在哪里？”人群赶紧让出一条通道。我听见有人小声说：“是后面就业队的组长。”哦，原来是部队调来的生力军！

又是一阵腥风血雨，木板狠命地砍下去，向两堆血肉模糊的肉体砍下去，本来已经微弱下去的呻吟声又变成了尖声惨叫，凄厉而嘶哑，惨不忍闻。伤痕上又摞上伤痕，已经不大能动弹的两堆血肉又猛然蠕动起来。这是生命在作最后的挣扎！看了看那两个似乎已经“死去”的鬼，在自己的安排下又受到强烈刺激而“活了过来”，盖队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欣赏了一阵之后，仿佛火候已到，他干咳了两声。

一切归于平静，只有盖队长的声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响：“今晚的会就到这里，各组回去马上讨论，每个人都要联系今晚自己的实际表现，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家要擦亮眼睛，看周围有没有谁对这两个家伙抱同情态度的。”然后又吩咐一组的生产组长：“今晚安排四个人轮流值班，防止他们行凶报复。”

支援队伍洋洋得意地走了。打手们带着喜悦和疲倦，其他人带着恐惧和悲愤，也陆续走了，灯泡还是那样亮，灯光下“斗鬼大会”四个字还是那样刺眼。离开实为“刑讯室”的“俱乐部”，外面的寒风吹冷了我燃烧着的血液。也许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写的那首诗已经落在队长手里，今晚上我的“表现”又是这样，队部会放过我吗？

在劫难逃！

回到组内，大家都在炕沿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没有谁敢像往日那样靠着被子。刘佛生主

持开会，先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这段语录较长，恕我不全文照抄了。

读完语录，他开门见山地说：“今晚开会对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家对这两个坏蛋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想对检举的人进行报复的行为，都非常气愤，可是咱们组内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稍稍停了一下，他把脸转向我，然后喊我的名字。

我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时辰到了。自从听到“大辛庄惨案”的那一天起，我就随时准备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 .此刻，任何胆怯犹疑都无济于事：“事到万难须放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如果也把我抓进”俱乐部“，先把那只五百瓦的灯泡砸烂了再说。然后在黑暗中混战一场，最好先抓住这个刘佛生，哪怕与他同归于尽，不也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么？人活百岁终须死，老子今天活够了。想让我跟他们俩一样白白地叫你们打个半死，门儿也没有！

刘佛生先问：“你对今天的会抱什么态度？”

“我完全拥护。”

范光东抢先插话：“拥护不能光凭嘴说，要有实际行动，看关键时刻敢不敢面对敌人刺刀见红。”

范光东虽然是个中年人，却因为当年养尊处优，缺乏锻炼，落得体态臃肿，步履蹒跚，没有多少力气，在打手中也不过属于“表态型”。在“反改造分子面前”，他是挥过老拳的，算是“刺刀见红”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借用林副统帅的惯用词句来表现自己。

“那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刘佛生还是那副不快不慢冷冰冰的腔调。微弱的灯光下，那对绿豆眼像两粒闪烁的鬼火。

“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敢刺刀见红？”

范光东又抢着问，这头蠢驴一门心思地只想突出自己“敢于刺刀见红”，竟不知道说我退出会场是对大会的抗议！

我立刻回答刘佛生：“我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我马上就回来了。”

“你早不上，晚不上，为啥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静过，立刻反驳：“我每天都这个时候上厕所的，你不是经常批评我学习时间不应该老上厕所吗？”

我说的是实情，刘佛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中，忽然他看见坐在我旁边的王继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立刻把矛头转向这个曾说过“毛泽东连外语也不懂”的“反改造分子”：“王继俊，你为啥中途退出会场？”

王继俊吓得面无人色，坐在炕沿像初冬的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几个“积极分子”的喊声此起彼落：

“站起来！王继俊！”

“王继俊，站起来！”

王继俊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好像不离开炕还有最后一点依靠，但他根本站不直，尽管两条腿紧紧靠着炕，全身还是轻轻地战栗。

“说！”

“快说！”

“说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

“我、我、我……”

“我什么！快说！”

“我害怕……”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看见鱼儿已经入网，刘佛生的声音顿时平缓下来，脸上还带有一丝笑意。

“你怕什么？”

“斗敌人，你有啥害怕的？”“积极分子”们乘胜追击：“你为啥怕斗坏蛋？”

“我……我……”王继俊抖得更厉害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刘佛生还想继续“启发”；胡德来已经不耐烦了，大喝一声：“跟他说不清楚！拉到俱乐部去！”

范光东、谢自愚急忙附和，刘佛生一挥手：“走！”几个积极分子把魂不附体、两腿发抖的王继俊连推带搡地拖出宿舍，其余的人只好不声不响地跟了出来。到了院子当中，范光东对着全院大喊：“都上俱乐部去，斗争王继俊！”

各组的人很快又都出来，一下子涌进了“俱乐部”，把王继俊围在当中。他吓得全身发软，脸色青灰。刘佛生向大家略作介绍以后，经过短暂休息恢复了体力的打手们又都高举木棍皮带一拥而上，劈头盖脸一阵乱打。在王继俊哭爹叫妈求饶命的叫唤声中，突然又响起了打手们的嗤笑声：因为王继俊吓得大小便失禁了，湿了一地。但是打手们仍然不依不饶，哭叫声又一次划破了三余庄的夜空。

刘佛生直接领导的四组揪出了王继俊，又立了一功。六组组长张光不肯放过这个突出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何况前些日子他老婆在城里挨过红卫兵的打，正一肚子气无法发泄。于是他也大喊：“我们组有个反改造分子史镇华，大家开会斗坏蛋，他在一旁蒙头睡大觉！”（此人后来也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由于他有过这样一段颇不光彩的历史，见到当年的“三余庄庄员”们，居然比见到队长还要恭谦三分，连说话都是低三下四的，当年揪斗史镇华的“英雄气概”，已经荡然无存了。）

“怪不得刚才开会没有看见他！”

“他这是对斗争不满！”

“这小子一贯反改造！”

几个“积极分子”七嘴八舌地喊叫着，有人提议：“把他抓来！”

一伙儿人放过了王继俊，由张光带领去抓史镇华。很快，史镇华被他们推进“俱乐部”来。他上身光着，下面也只穿条裤衩。直到这时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组里派他给麦田放水，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书呆子还像往日一样拼命地干活儿，搞得很累，又受了些风寒。今天是星期六，按以往规矩，晚上本该休息，何况盖中队长下的动员令说的就是“自愿”参加，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宿舍里“自愿”睡觉。那料到“蒙头房中睡，祸从天上来”！一群凶神恶煞迎面向他扑来，他见势头不对，两臂又被几个大汉抓住，动弹不得，连什么事儿都还没搞清楚，忙说：“我认罪！我认罪！”

早已打上了瘾的这伙儿人岂肯饶过他？二话没有，上前就是一顿皮带木棍，不知是谁一棍子打在他额角上，顿时鼓起一个青紫色的充血肿块。史镇华的大声叫喊，立刻盖住了王继俊的哀嚎呻吟。打手们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睡觉！我叫你睡觉！”

这时候又有人喊：“还有黄克疆，今晚上跑哪儿去了？”

打手们纷纷附和：“对，对，还有黄克疆，他也没参加会！”

“这小子一贯反对毛主席！”

“找他去！”

“把他抓来！”

于指导员以前在一次会上透露：黄克疆曾向指导员说过，他对毛主席的某一段语录有不同意见，不但说说而已，还真事儿似的的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队部代转中央。至于内容，指导员没有说，他也从来不在下面散布，因而无人知晓。

几个人分头去找，很快都回来说：“这小子跑了！”

“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抓回来好好儿收拾他！”

刘佛生、王癞皮，另外还有几个人赶紧上队部汇报这个新情况，暂时放过了王继俊和史镇华。

盖中队长很快来了，满脸惊恐的黄克疆跟在他身旁，后面是几个“积极分子”，向大家解释：“原来这小子跑到队部去了。”

盖中队长咳了一声，打手们立刻安静下来，只等一个暗示，他们就又可以过足打人的瘾了。然而盖中队长心里明白：逮捕黄克疆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万一打伤打残，不好向上面交代。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气说：“都回去吧，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出工。”

他只叫两个宣传员留下，其他的人纷纷走出“俱乐部”。路灯似明似暗地亮着，勉强能看见地面。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嗖嗖地吹，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有弥漫四周无孔不入的寒气，冷到了人们心里，直到走回宿舍，也没有人说话，都默默地脱衣，默默地上床。后来有个人低声问“山羊”：“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过了。”

然后又是沉寂，死一般的沉寂，简直像一座坟墓。往日这时候早应该有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没有了。王继俊的呻吟声，却听得格外清楚。还有不知是谁的一丝轻微呼吸声，偶尔也有很轻的翻身的声音。但在这出奇的静寂中，细微的响动，都像狂风、闷雷似的，响得惊人。

我突然涌现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吸烟的欲望，虽然我从来不会吸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念头，而且这么强烈。也许我需要的不是烟而是烟雾，它可以遮盖那一幕幕显现在眼前的惨剧，使它不那么清晰逼人吧？

这是真事儿吗？真的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过吗？

这个漆黑的夜晚，在北京，有多少人遍体鳞伤，在痛苦地呻吟，还有多少人被极度

的恐怖吓疯？……

王玉琦、郭允德，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无法想下去，我觉得我的神经已经疲倦了，麻木了，不能正常运转了。

啊！

一双双血淋淋的魔爪伸出……

一根根皮带在舞动……

一张张惊恐的脸闪过……

一条条青紫的伤痕凸现……

是幻觉，是现实，是恶梦？

我睡不着，也不能睡着。此刻也许会有一些“不愿睡着的人”，如果我在梦中惊呼，他准会听见；如果我的叹息或频频翻身被他发现，盖中队长很快就会知道——他也许会微笑，也许会冷笑，也许会大笑，笑得让我牙齿打战。

一夜过去，天快要亮了，我才有几分迷迷糊糊，但恐怖感一直紧跟着我。

我记得，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三余庄不寻常的一个周末。

头昏脑胀地迎来一个新的早晨，看见组内其他人也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大约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好，我想。

去伙房买饭，门口竖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贴着大白纸，赫然几个大字：

昨晚向反改造分子发起总攻击，获得巨大胜利!!!

买饭回来，正碰上几个打手从宿舍旁边的医务室出来，有的手腕上贴着胶布，有的手上涂着药水。他们“总攻击”时用力过猛，扭伤了筋，这是缺乏经验的打手“光荣负伤”了。

干活儿的地方就在宿舍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家不声不响地走着，到了地头，又不声不响地散开。往日，在出工路上，总有些人闲得无聊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或争论某一个问题以排遣心中的寂寞，或互相取笑以寻求苦中作乐，但今天只有沉寂了。

抬头望天，天还是深深的铅灰色，像倒扣的锅底。

低头看地，地还是那样浑浑噩噩，没有知觉。

王玉琦和郭允德，也都出来了，远远掉在队伍后面。他们想不出来也不行。他俩每人身边都紧贴着两个人，因为相距太远，看不清是挟持着还是搀扶着，只见俩人一瘸一拐地踉跄而行。

分给他俩干的活儿，就是在草堆上躺着。脸部已肿得变形，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身上脸上都没有纱布绷带之类。我干活儿的地方离他们很远，但是还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社会上红卫兵毒打阶级敌人不叫毒打而叫“采取了革命行动”，或者在“批斗”一词前加上“狠狠地”三字以别于一般批斗。三余庄的“积极分子”们鞭打“反改造分子”也从不说“打”，而是说“帮助”或“端正态度”。既然没有打，又何来的伤呢？被“帮助”的人自然没有理由上医务室包扎或在宿舍里养伤。他们只能照常出工，哪怕是躺在草堆上呢，总算是“出工”了。

城里被打伤打残的牛鬼蛇神，医院不是都“奉命”或自觉拒收，任其在死亡线上自行挣扎吗？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必须坚决批判！

不久之后又听说，就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是就业人员的一中队，也开始了类似的批斗会，毒打了一个闹翻案的摘帽右派白多明，据说打得比三余庄还厉害。这个白多明，是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美学的留学生，也是从三余庄解教、摘帽后“出去”的；而策划指挥这一场毒打的，就是在三余庄当过小队长、后来荣升为一中队副指导员的阎麻子。

这两处的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先“串联”好了的？也许这是个永远的秘密了。

开“斗鬼大会”时于指导员不在三余庄，据说是外出开会去了。他回来不久，就宣布教养队大搬家，我们终于离开住了五年的三余庄，搬到原来的劳改大队、即一大队的大院子里。大院儿里原来的犯人已经全部调走，统统换成了就业人员，只有那高高的围墙和已经没有哨兵守卫的岗楼，依然每天对进进出出的就业人员显示往日的威风。

我们这批劳教右派住在大院儿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与就业中队之间砌有隔墙，真是院中有院，墙内有墙。这个小院儿，就是我们新的栖身之地。小院儿门口有值班员把守，收工时进了大院儿门再进小院儿门，门禁比以前森严多了。

搬家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就实行军管了。军管以后第一件大事，是召开逮捕大会，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队也有三名：一个是躲过了“俱乐部”毒打的黄克疆；一个是在禁闭室墙上乱涂乱写、“恶毒咒骂”红卫兵的李定一；还有一个是平时不言不语的邢劲松。——这个邢松劲，六五年在小组会上，就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发言，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只是调门还没有“文革”时期那么高。他却居然发言说：“自古读书要读百家之书，不能只读一家之书。”队部要他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材料，他也傻呵呵地立刻照办。召开逮捕大会之前，有人得到风声，劝他赶紧逃跑，他不但不跑，还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邢劲松被逮捕以后，被押往山西听候处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后，他又随同一大批“恶攻”要犯押回北京。这些人都是准备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的。只因为人数太多，要分批执行，还没有轮到他，就发生了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事件，枪毙一下子改成释放，他才幸免一死。——这是后话。

这次没有抓郭允德。我还猜想：也许队部会本着“打了不罚”的精神放过他，可是到了1968年，当局还是按原定计划把他弄上小汽车，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该抓的抓了，不够逮捕资格的还得继续批斗，名单可以排一长串：老牌“反改造分子”曹克强；一贯坚持反对武斗的缪光谦；闹翻案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刘少奇的原“积极分子”谢自愚……其中还有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的王玉琦。

这次斗王玉琦的起因很简单：部队给每个劳教右派——包括挨打的“反改造分子”在内——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挂黑牌而戴像章，本来是对正在服罪改造的右派以极大关怀，

北京城里的右派如果知道了，一定会羡慕得要死。不过那时候像章热刚兴起，像章不大，做工也比较粗糙。王玉琦看了说：“远看像颗铜扣子似的。”这句话成了不大不小的“新罪状”。按惯例批斗要联系他过去的罪行，于指导员在会上说：“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开会打了你，你就心还不满……”

既然提到那件事，主持其事的盖中队长觉得有必要公开谈谈他的看法。他认为责任全在挨打者身上：“我们本来不想打你，但是你一定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给你捧捧场，不捧场好像不合适……。”

奇怪的是，这次对他的批斗却很平和，连“喷气式”也没有用。而对其他“反改造分子”则没有那么客气。但也只是充分发挥“喷气式”的威力，并未重演“俱乐部”那一幕。据说这是因为于指导员回来“主政”了，而于指导员是反对“武斗”的云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批斗的人个个态度恶劣，公然顽抗。

曹克强一如既往，依旧坚持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虽不像以前挨斗那样高呼：“这事情竟发生在六十年代！”但仍然死不低头，又一次被送进禁闭室。

缪光谦是个大滑头，采取的是“小丑”式的“诙谐战术”。他一上台，“积极分子”就请他坐“喷气式”，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这是桃园经验！这是桃园经验！”“积极分子”发言，他又不间断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弄得发言者说不下去。于指导员踢了他几脚，叫他闭嘴，他又喊：“过去我犯错误你不踢我，现在我喊‘毛主席万岁’，你就踢我了。”弄得指导员也不好再踢，只得由他去，结果会开得一塌糊涂。

谢自愚在俱乐部打人立功以后，就以“造反派”自居，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对刘少奇，应该是“革命左派”。指导员说他闹翻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就说：“你先前不是还表扬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他后来被关进禁闭室，又从禁闭室里提出来批斗，指导员刚说了一句：“今天开会批斗反改造分子谢自愚，……”话还未说完，他就喊：“大家不要听他乱说，昨天《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派人来看我，要为我翻案。”“积极分子”们听了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又犯了攻击“革命造反派”的大罪，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指导员才说：“来人了解确有其事，但只是了解情况，不等于为他翻案。你们继续发言，有问题我承担责任。”会才得以继续开下去，但气势大减，匆匆了事。

谢自愚后来出了禁闭室，案也没有翻成，但他仍以“劳教所里的革命左派”自居，时刻不忘表明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到“斗鬼大会”，他说：“我认为郭允德出身贫农，不会反对毛主席，所以那夜晚我只打王玉琦一个人，对郭允德我没有碰他一指头。”

时刻不忘表现自己的范光东，又有他的一套，他对我说：“对俱乐部那件事，我分析队部现在的态度是：不能说打错了，但也不提倡，以后也不再搞了。你以后发言如果涉及此事，要掌握这么个火候。”后来斗争其他“反改造分子”，他总是把喷气式搞到极端程度，好给队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以此沾沾自喜，作为傲视其他“积极分子”的本钱，说别人不能像那样做到“刺刀见红”!

“斗鬼大会”的主持人刘佛生则不同，他从不提此事。他知道队部对他的“表现”了然于心，不用像范光东那样念念不忘。有一天，“反改造分子”章亚航悄悄儿对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是我从地上捡来的。”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我接过来一看，是从日记本上掉下来的一页，一看笔迹就认得出是刘佛生写的，内容大意是：“昨晚开了斗争王玉琦、郭允德的大会，大反多年来对反改造分子的姑息迁就，大反了斗争中的温情主义，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改造气焰，真是好得很！”

打手们既然是对反改造分子敢于“刺刀见红”的英雄，理当论功行赏，至少也应该将今日毒打之功，折当年右派之罪才是。可是这“赏”却姗姗来迟。绝大多数打手——不论是表态型的还是残忍型的——都有足够的耐心，相信队部对他们在“俱乐部”的立功表现，尽管嘴上不说，但必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极个别的人，如袁庆全（本是北京某砖瓦厂的工作

人员），则耐心不足，功败垂成。他在“俱乐部”之夜也曾挥棍猛击，颇受队部赏识，后来委以“值班”重任，不出工专司门卫之责。但他觉得老不解教摘帽，未免功大赏小，似乎靠政府有点儿靠不住，不如脚踏两头船为是，于是又主动找一些“反改造分子”联络感情，对他们说：“队部对我还比较信任，你们要搞‘秘密集会’的话，可以在值班室里进行，我这里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个点。”

六九年右派队撤销、人员分发之际，他的两面派被揭发出来，结果虽然从宽处理，毕竟只能解教而不给他摘帽，并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不过此人生存能力极强，不但对反改造分子曹克强、王玉琦等人赞不绝口，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似的，而且在王庄十年，外逃五载，利用十元钱一大瓶的兽用性激素，配置“祖传秘方神药”，居然成为“神医”，在张北一带（当地生活困苦，男性中患性无力者颇多）专治“阳痿早泄、举而不坚”之类的性功能病，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子过得满不错。——此事是他被抓回来后自己当众交代的，在王庄几乎尽人皆知。

值得一提的是周成雨，他属于纯粹的“表态型”。事后他发表高论：“我打他们是很轻的，如果我不打，我站的位置就要被另一个人所占，就会打得很凶。我站在那里别人就无法靠近，实际上起了保护他们的作用。”

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为代价，既保护了挨打者，又表现了自己的“积极”，这个账应该怎么算呢？

再看看另外一方面。

蔡辉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最可爱的人”，他后来对我说：“俱乐部那晚上，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看见打人会打成这样。原来我和董立私人感情不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不知道人家对他的反感，还来问我为什么跟他疏远呢。”

“山羊”和杨学东吵架，当着许多人的面，“山羊”指着杨学东的鼻子说：“你在俱乐部用大棍子打人；许你用大棍子打人，就不许别人打你吗？”杨学东支吾其词，不敢回答。

张志华在工地向武三蛋借工具，武三蛋有不允之意，张志华就以此为由，突然打了武三蛋一拳，武三蛋猝不及防，连连退让，张志华穷追不舍，后来被人拉开，但武三蛋已经挨了好几拳。事后我问张志华：“你从来不跟人打架，今天为何如此反常？”他说：“我哪里是为工具的事，这小子在俱乐部打人是最狠的一个，下手特别毒。我打他就是为了这个，借工具不过是借口。”

张志华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四年级学生，文笔在三余庄堪称一流，许多人都说：他不文笔，比起许多“著名作家”来，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个同班的女同学，上海人，是个大资本家的女儿，也是个右派，是按“退学自谋生路”处理的。回上海后，还时常通过“地下渠道”给他来信，估计是他的恋人。她那文笔，可比他还高一筹。后来当然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了。他本来是二小队的小队长，不知为什么忽然逃跑了，仅靠一水壶从火石厂廉价买来长短不一的“下脚料”火石，在新疆逛了大半年，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流浪到江南，终于在杭州“落网”。因其“主动认罪”，态度好加上检讨书写得好，既没有关禁闭，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只不过把他的小队长抹下去就算了。看起来，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进了劳改队，也不吃亏的。后来他写了一部逃亡新疆的回忆录，但被别人检举，终于作为“罪证”被队部没收了。落实政策以后，从维熙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他曾经有一篇小说寄来，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部回忆录的二稿，但被从维熙所否定了。从此他看穿了世态炎凉，不想当作家了，只热衷于追求“财色”二字。好在他有“两手空空跑遍中国”的本事，干起贩运走私物品来，倒也能够驾轻车而就熟路。八〇年，他提着一旅行包走私的手表和电子计算器，带着一个不是他老婆的女人，到北京来跑单帮，住在王玉琦家里，东西却寄放在从维熙家中。结果事情败露，“赃物”被公安局搜走，连从维熙也吃了挂落（此事曾上过《北京日报》）。他说：做走私生意，哪怕十次中有九次失败，只有一次成功，也有钱可赚，何况跑十

次买卖失败九次的可能性终究比较小，所以他也就乐此不疲了。

他有这样好的文笔，却没走上中国文坛，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不过这也是右派中的另一种类形。人各有志嘛。

三年之后，在紧急战备疏散前夕，对我们队一般的劳改右派全都“落实了政策”。打手们除了谢自愚、袁庆全外，全都解教摘帽，“荣归故里”。但对“反改造分子”，则各有千秋。善于检讨的杨路不仅免于逮捕，还解除教养，只保留“右”帽。挨过打的除了郭允德已被抓走之外，都和其它“反改造分子”一样，或押到原籍省份的劳改农场，或戴帽到农村插队，接受群众专政。我写的那首诗，可能不宜开会公开批判，但无疑是挂在账上了，我因之而被押到四川省西部二郎山脚下的一所劳改农场，继续我的改造生涯。直到 1978 年，我才成了最后一批摘帽者。

年华已逝，往事如磐。1984 年我有所感触，又写了一首诗。

遗忘
一切都被遗忘了。
人们把一切都忘了。
渐渐地、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忘了。
应该忘记的，人们忘了或者没有忘，
那些不该忘的，
那些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们总是偏偏把它忘了。

也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回到京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的“反改造分子”陈端昭碰见了当年“俱乐部之夜”打手之一的张凯元，张已经相当苍老了。一见面，没有寒暄，张凯元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当年，我的那些都是假的！”

“你那不是假的，你打人是真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现在才是假的！”

会面就此结束。

说得真好。你现在才是假的！

这个张凯元，平反改正以后，似乎已经得了神经病，经常站在大街上骂共产党和毛泽东，公然诅咒共产党的天下早日完蛋：“六四事件”中，还公开发表演说。也许是改革开放，政治空气变了，也许因为他年事已老，不过是个棺材瓤子，官方居然也充耳不闻，任其漫骂。要是倒退三十年，恐怕划他十个右派，也足足有余了。

后记

写这篇东西有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纪念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二是为了纪念王玉琦。

听说许多右派都在写“回忆录”。有的已经出版了，例如从维熙的《走向混沌》；有的还没有结集出版，只在报章杂志上零零碎碎地发表了一些；而有的则因为写得太真实，至少目前“暂时”还不可能在大陆出版。

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是客观地、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不是存心粉饰或故意歪曲，历史就是历史，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清王朝修《明史》，还敢于如实说出当年设下的阴谋呢，五七年的既然是“阳谋”，难道还没有这样的雅量承认一下吗？

我写的东西，正因为太实在了，目前当然不可能在大陆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因为当局总是“闻过则忧”，喜欢的是马屁精，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不过复印几份，分赠当年的“同窗”好友，以作共同的回顾和纪念，恐怕还是既做得到，也无伤大雅吧？

今年 10 月 25 日，王玉琦因患癌症，不堪其痛，毅然决然地自我了断，噩耗传来，令我十分悲伤。关山阻隔，未能亲赴北京向遗体告别，当成为我终生的憾事。

现在把他在“俱乐部周末之夜”挨打的故事如实地写出来，分赠故友，作为一种怀念，想来大家一定能够谅解并支持的。初稿我写了大约三万多字，寄到北京，在打字复印之前，许多当年三余庄的窗友对稿子进行了补充修改，打印分发窗友们之后，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又进行一次修改，方才成了现在这个近六万字的稿子。因此，此稿只有一半儿是我执笔的，其余的一半儿，则是大家的“集体创作”。

一个人的记忆总有淡忘或记错的时候，经过多人的校正，其正确性方面，总会更加可靠些了吧。

但也有非“我辈”中人持相反的观点。一个好心的朋友看了我的初稿，就这样劝我说：“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其实，我经常听见有人说这句话，只要有人提起当年那些事情，就有人这样说。好心的人和自称好心的人都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里，不少人在斗争会上抓住别人所谓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过去的事”不放的时候；许多人因为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过去的事”而被诛连九族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因父亲乃至祖父的历史问题也都是“过去的事”而被打被关的时候，要是当时有人能说：“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那该多好哇！

经历过那些日子而现在常说这句话的人，你们当时在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用各种方式提“过去的事”的人还少吗？不过他们提的不是那些日子罢了。

北苑熔炉的洗礼

第一章 劳动教养收容所

一九六〇年四月初，我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命运之神把我和曹克强、徐仁声揪到了农场场部食堂兼大会场的土台子上，正在低头接受批斗。会场上的人并不很多，后面显得有些稀疏。在农场接受监督劳动的右派们当然全都到了，此外只有几个农场的职工、下放干部以及留校改造的右派们所派来的“代表”。

批判者们陆续上台，站在台子中央背发言稿，其水平远不能和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盛况”相比。“批判家”们发言以后，既没有人鼓掌，更没有群情激愤、高呼口号的“壮观”场面。一切全都平平淡淡，以至于我这个被批斗者有时候竟会忘掉自己的主角身份，居然怀着平静的心情“在一旁观察”起来。

最后发言的是一名农场职工代表。他显然没有来得及把发言稿背熟，又要竭力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结果是说话结结巴巴，更显得语无伦次了。我隐隐觉得，这些发言其实都是虚应故事，只不过为精彩的最后一幕作铺垫罢了。果然，当最后一个批判家脸红筋胀地走下土

台子的时候，“听众”们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响起清脆而急促的一阵脚步声。等我把目光从台下收回来，看见四个民警已走上土台子，正在向欢呼的群众举手敬礼。

掌声停下来，大会主持者，也就是负责对右派学生进行管教的干部宣读学校的决定书：说我和曹克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现决定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决定书中没有提到徐仁声，他大概免于处分了吧？　　民警拿出两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大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叫我和曹克强签字。我几乎未加思索就签上了，不签又能怎样呢？难道不签就能不去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虽然不是好汉，可也不愿吃眼前亏呀。当时我也顾不得想：既然劳动教养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都得去，为什么还要本人签字呢？难道这样做，就说明我是自觉自愿了么？但是曹克强却没我那么听话，他梗着脖子，一副不服气的样子。这时候，一群同是右派的“改造积极分子”上来对他推推搡搡，嚷嚷着要他快签。混乱中，曹克强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就喊了起来，说是看不见了，没法签字了。为此，他挨了“改造积极分子”们几拳头。他就大喊大叫，更不肯签字了。民警也不再勉强他，干脆掏出手铐来把他拷上，然后把我们两个一起押出会场，后面簇拥着一大堆观众，伴随着一阵阵高昂的口号声。声音里透露出兴奋，充分体现出观众看到剧情进入高潮时的激动心情。

一辆大客车停在会场门口，四个民警把我们押上了车。车厢内两边的椅子全都空着。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捆好，放在中间的过道上。这自然是管教干部安排“积极分子”们趁开会之机代我们弄好的。我无心检查衣物有无遗漏。管它呢，人都掉井里了，耳朵是挂不住的，衣服多一件少一件，还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是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安然地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休息。说实话，这可比在工地休息时坐在石堆或土埂上舒服多了。曹克强也想坐下，但民警却不允许，只让他在行李旁边蹲着。这也算是“区别对待”吧，谁叫你不肯签字呢，党组织一贯强调“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

大客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缓缓开动了。那的确不能称为“叫喊”或“愤怒”，只能称之为“欢呼”。今天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平平淡淡的劳动生涯有了一点儿震荡，好像一锅白开水里放了盐，有了点儿味道，够他们谈论、开心好几天的了。我的心情却很平静，打量一下四周，见车厢内很干净，司机始终没有回过头来，只能看见他的背影。四个民警都很年轻，站在我们对面，表情似乎也很安祥，只有其中的一个，示威似地掀起他那白色的警服，露出别在腰上的手枪给我们看，很简单却很有威慑力地说了一句：“放老实些！”那声调显得很轻松，听起来不像警告，倒像在安抚。车门口不知何时进来了两个彪形大汉，个头足有一米八五，光看上身，露出黝黑结实的肌肉。下身穿黑色的长裤，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有点儿像是看家护院的教师爷，更像拷打囚犯的行刑刽子手。我琢磨了很久，也想不出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来对付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打手，还是顺路搭车的煤球厂的工人？　　大客车慢慢驶出我曾经劳动过的农场。这里，我对它太熟悉了，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我的苦役生活，都滴落过我一文不值的汗水。想到我终于能摆脱它，不再受它的折磨，尽管用的是这种方式，居然还阿 q 式地颇感庆幸。

我将被带到哪里？会有什么新的苦难在等着我？我今后该怎么办？一连串严重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要求我抓紧在车上的这一段时间去思考，去回答。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这倒不是我面对逆境能够处之泰然，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态度，其实此刻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但大脑根本不听指挥，不去想应该想的迫切问题，却注视窗外，欣赏起落日余辉的美景来。仿佛我坐的不是囚车，而是旅游车似的。

日落多么优美动人！明亮的橙黄色，均匀地涂满了半个天空，红日由镶着金边的云彩托着，正缓缓下沉，把她最后的美丽献给了人间。我凝视着已经失去刺目光芒的夕阳，赞叹自然的伟大。直到今天，多少往事已记不分明，而这壮丽的一幕，却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稍一触动它就在眼前重现。

大客车在柏油路上缓缓行驶，终于驶过了小西天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长长的院墙和稀疏的树木从车窗外一掠而过。久违了呵，母校的院墙！啊，不，那已经不再是我的母校了，我已经被这个学校开除，以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从我被划成右派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从思想上感情上割断了联系，既然它已经不承认我这个学生，我又怎么能以这个学校的学生自居呢？现在则连名义上的一丝儿联系也割断了。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似乎笑了一下。为什么此时此刻居然还会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客车拐了个弯儿，出了德胜门，在一堵高高的围墙下停住，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估计是已经到了劳动教养场所。还没下车，一个民警就过来给曹克强开了手铐，还带着友好的微笑说："小伙子，别再较劲儿啦。"曹克强用两只手互相交替着抚摸被铐子勒出一条深沟的手腕，也苦笑着说："嘿，血脉都不通了。"

两个壮汉先下车，两个民警走在前面，接着我们提着行李走进有哨兵守卫的大铁门，另两个民警在后面押阵。大铁门里面是一片空地，空地对面有一道更高的围墙，有一道比大门稍小些的"二门"，当然也是铁的。墙上拉着密密的电网，围墙的转角处都有一个圆形的岗楼，以居高临下的气势显示着威严。民警叫我们把行李放在地上等候，一名民警走进戒备森严的二门，过了一阵子带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问了问我们的姓名，核对清楚也就是"验明正身"以后，民警们就都走了。

一个干部把曹克强带到紧挨着围墙的一排高大平房里去，另一个干部和我在行李旁边等候。很快那个带曹克强的干部独自出来，又带我过去。

这排平房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不安地猜想：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分开进去？一进门，我就对自己的神经过敏感到好笑，原来这是一间很大的医务室，桌子很多，上面放着一些常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桌子后面坐着穿白大褂的医生。和外面不同的是：医生、护士清一色的都是男性，表情还十分严肃。我用眼睛扫了一圈儿，没有看见曹克强。

先量血压，结果仍和多年来所测得的数值一样：舒张压 78 毫米汞柱，收缩压 118 毫米汞柱。又问我有什么病，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随口回答："没有什么病。"医生就示意我退出。出门后看见曹克强已经在行李旁站着等我了。

至此我才知道这就是犯人进监所必须例行的体检，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如此之简单罢了。

两个干部把我们押进二门，迎面看见的是一座大型砖窑的遗址，长方形。砖窑的门不一定朝南开，因此一时间我辨不出方位，不知是南北长还是东西长。二门和砖窑之间也是一片空地，砖窑左侧是广场，右侧是空地，但要狭窄一些，再往右是一片菜园。砖窑大而矮，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间更矮的小平房附着在它的侧面，成为砖窑的微小凸出部分。每间小平房的外面，都坐着一群人在吃饭。我们提着行李走过，听见他们小声地说："又来了两个！"

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确实是一座劳改砖厂，是关押改造国民党的俘虏军官的。后来俘虏军官们判的判、杀的杀，砖厂停办了，正好一九五七年“劳动教养”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加上五八年的“大跃进”，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要把北京治理得像水晶玻璃似的透明”的口号，各区县公安分局纷纷往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输送“教养分子”，五处所属的监狱和看守所早已经人满为患，没有地方可以集中容纳这如潮水般涌来的“社会渣滓”们，现盖房屋又来不及，只好因陋就简地把这座废弃的旧砖窑利用起来，对外挂一块“地方国营北苑农场”的牌子，对内则称为“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直属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管辖。

我们一行在一间平房前面停下。这间平房是独立的，比其它附着于砖窑的小平房要稍微高大一些，门上的木牌上写着“中队部”字样。那干部叫我们把行李放在门外，人随他进去。室内有点儿昏暗，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照片，旁边贴着用特大号铅字印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陈设简陋，和农村的生产大队办公室差不了多少。我和曹克强分别被带到两张办公桌前，队长先简单询问一下情况，按例像背书似的拖长了声音打着官腔背诵了一篇事先背熟了的“训词”，那是根据教养分子的不同身份来源，可以临时“组装”的，例如对学生右派，就说：“你一个大学生，党和政府培养你们，供你们吃，供你们穿，那一点亏待你们了？怎么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是干部右派呢，就说：“你也是个国家干部，党和政府培养你们，信任你们，甚至依靠你们，只希望你们为党、为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共产党那一点亏待你们了？怎么还想资本主义复辟，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

训话完毕，队长取出一份表格，指着一大片空白之处叫我摁手印。这件事对我来说，好像还只在电影《白毛女》中见过，此刻不免有些迟疑。队长见我对这件事情不太积极，也懒得进行说服动员了，干脆抓住了我的手，先捏住一个大拇指，在一块涂有油墨的玻璃板上沾足了印油，使劲地往纸上捺了一下，还不肯就此松手，继续用力捺住拇指先向左侧翻转用力捺，再回过来向右翻转用力捺，于是纸上就留下一个扁平形的指纹展开图。这种按指印的方法，就连当年穆仁智抓住杨白劳的手指捺指印，也不会这样的。心想：大概只有抓住了江洋大盗，要存他的指纹档案，才用这种方法。可我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小偷儿流氓，要用这种方法留取我的指纹干什么！如果说当年杨白劳按手印是被迫出卖亲生女儿，那么我今天按手印，被迫出卖的是我自己的身体！

当年杨白劳在女儿的卖身文契上按手印，只按一个，也就够了；如今我在自己的卖身文契上按手印，按了一个，事情还不算完，“穆仁智”又不辞辛苦地将我其余九个手指一一如法炮制，白纸上就留下大小不等的十块墨迹，真所谓“劣迹斑斑”了。十个手指头都印过，还把我的两个手掌连手指头都用油墨涂黑，又在一张大纸上留下了两个清晰的“全掌手印”。“穆仁智”这才把我的卖身契收起来，对另一个干部说：“把罗××，×××叫来，一块儿照相。”

不久，那个干部带进来两个十几岁的小流氓。这两个人的名字，当时我是记得的，如今事隔多年，记不起来了，只得一个姓罗。

照相用的是手机，每次两个人一起照。照我想，既然我是和曹克强一起来的，总应该让我和曹克强一起照吧？尽管这张照片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可总算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留

下的特殊纪念。我的这个愿望，当然不能说出来，只不过在心里这么企盼着罢了。可是干部们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罪恶用心”，偏要把我们俩分开，叫我和姓罗的小流氓“合影留念”。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个类似布告牌的浅蓝色大木牌下面，用作摄影的“背景”，再把预先写好姓名的白布用别针别在我们胸前。“咔嚓”一声，我和小流氓并肩而立的“丑恶形象”在那类似耻辱柱的木牌下永远凝固了。

接着曹克强和另一个小流氓合影。曹克强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咧着嘴微笑着，一点儿也不在乎。

照完相，干部对两个小流氓说：“把曹建纯给我喊来。”

两个小流氓答应着走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一高一矮，还有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人，年纪约摸五十开外，头顶微秃，脸上已有明显的皱纹。我忖度着，这个人大约就是曹建纯了。看他的样子，过去大约是个领导干部，后来犯了错误，现在留场就业帮着公安干部做些工作的。

干部没再说什么，只叫我们跟他走。他们三个人领着我们顺着砖窑往前走，没走多远，就在一间小平房前停了下来。曹建纯问了我们姓名、年龄、籍贯、犯罪类型、哪个分局送来等等，一一记在小本子上，就进小平房去了。留下两个年轻的继续问我们：“有虱子没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虱子联系起来过，一时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反问：“什么虱子？”矮个子说：“你犯什么傻？”这是北京下层社会流行的土话，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犯傻”，更加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无法回答。高个子大概看出来我确实不懂，就问我：“从哪个分局来？”我说：“我们都是从西郊农场来的，没有到过分局。”他就对矮个子说：“是直接从单位来的，没有经过分局，可能没有。”矮个子说：“别管它有没有，先消消毒再说。”他到小平房拿出一个手推式的小型喷雾器出来，高个子叫我们把衣服全脱光，只剩一条内裤，然后对准了我们上下前后猛烈喷射。一场药物浴，直到雾滴流成小溪才罢。

穿上衣服，矮个子又问我们吃了晚饭没有。他这一问，我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晚饭，已经有点儿饥肠辘辘了。曹克强连忙说“还没有”。他叫我们等一下，他们两二人进了小平房，一会儿端出晚饭来：两个土碗，各盛着半碗白菜汤；两双筷子；还有一个土碗，放着四个类似窝头的东西。我拿起来，觉得很软，表面布满了褐色的斑点。试着吃了一口，嘴里觉得像塞了一嘴沙子似的，粗糙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估计这大概是在玉米面里掺了大量麦麸的原故。本待不吃，又怕它们说我搞绝食抗议。见曹克强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就效法他，也就着白菜汤慢慢儿吃着。白菜汤里还有点儿盐味，油自然是没有的，碗底却沉着一层黑泥。勉强吃了一个窝头，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饭后，两个人分头检查我们的衣物，光看行李皮箱，大件衣物一一清点，造册登记。我上衣口袋里有几元钱，给收走了，说是教养所里不许私藏现金，要买什么东西每月登记一次，谁要私藏现金，那就是企图逃跑，查出来轻饶不了。还有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也要交出来由政府代为保管。我们说我们是穷学生，没有手表。他又说各种证件，如学生证、工作证之类，还有奖状、奖品、纪念品等等，都应当交出来。“你们不配拥有这些东西。人都劳动教养了，留着过去的东西对你们的思想改造不利。”我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他们不信，仔细翻了一遍，找出我的几张照片，有我自己的，也有别人送的，也不仔细看，就一律给没收

了。我明白：这是要你知道你的过去除了对党对人民犯了罪以外什么也没有，要你逐渐忘记过去的生活中一切值得怀念的东西，这样你才会专心投入改造，除了赎罪以外，什么也不去想。

这时候曹建纯出来了，他并不检查我的东西，却对我带来的书籍感到兴趣，一本本慢慢地翻阅着。结果大部分还给了我，只扣留下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看完了就还给我。我还敢说什么呢？这套书是我最心爱的，那里面还有我写下的感想，记录着我内心世界的秘密，记录着我的思想感情，我一直把它当作日记对待，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那隐秘的内心世界被别人窥视，纯洁的感情角落被外人闯入，但现在它却落在陌生人手里，而且是类似狱卒之类的人手里！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像处理日记本那样把它埋在土里，以致于她现在蒙受羞辱！

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检查员”最后竟然把我吃饭用的小勺和缝补用的针都没收了，还要我把腰带也解下来。这样，裤子就全靠扣子维持着才不掉下。它们见我迷惑不解，而且似乎很反感，就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你们自绝于人民所采取的措施。”

听到“自绝于人民”这类胡话，我的不满情绪腾地冒了上来，却又理智地被强压了下去。是谁硬把我从“人民”队伍中开除出去，成了人民的敌人，却不说这是“绝”我。明明是逼得我走上了“绝路”，却说我是在“自绝”！好像在这之前，我还属于人民似的！

该收的收了，曹组长又说：“里面地方小，除了被子和漱洗用具，其他东西都放在外面堆起来，由值班员集中保管。随身东西自己一定要带好，这里小偷儿多得很哩。”我听了一愣，小偷在这里面还敢偷？东西都登记了或者没收了，他们还能偷什么？偷了放在哪里？又怎么出手？那时候，我对小偷儿接触得太少，不了解对于惯偷来说，偷东西已经不只是为了享受，而是一种职业习惯，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惯偷都是为了偷而偷，不管有用没用，先偷来再说。这一点，也许有的读者不相信，但这是我以后从许多小偷儿在会上交代、在会下聊天时听他们亲口说的。

两个人把我们带进了小平房，里面有两张单人铺，有人正在睡觉。小屋东左侧有小门通向砖窑。曹组长最后嘱咐我：“以后不许和曹克强来往，一切服从值班人员的安排，有事报告值班员处理。”说话时态度非常严厉。于是两个值班员带我们从小门进入砖窑。

尽管砖窑里面开着电灯，但仍然很昏暗，人影模糊不清，只看见窑洞的地面比门外略低些。过了几秒钟，这才大致看清：它像一个大洞穴，横看有十几米，进身只有几米，中间靠墙是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离地面不过一尺多高，铺上密密麻麻地坐着三排人，铺下的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子。窑洞内，两端的地面比中间略高，与中间的板铺成直角也搭着板铺，但面积小些，铺上也坐满了人。所以三面的板铺，有点儿像是压扁了的 h 形。

曹克强被值班员带到了一端稍高的铺上去了。我站在铺前，不知所措。一个值班员过来向我下了命令：“脱鞋，上炕，把被子靠墙放好，坐最后一排，不许靠被子，两条腿盘好，手放膝盖上，坐端正了，不准东倒西歪，换腿要报告值班。到这儿要守这儿的规矩，不守规矩把你打到严管组去！”

我脱鞋上炕，炕上什么也没有铺，是光木板。站在木板上，头可以接触到窑洞顶。我分

开人群，在最后一排坐下，仔细打量四周，根本没听读报的内容是什么。

窑洞顶是用红砖砌成的圆拱，有几个小小的透气孔，顶上吊着几个 25 瓦的小灯泡，都用铁丝网罩着，灯光极为暗淡。墙壁虽然用白灰刷过，但不太白。由于这是废砖窑，根本没有窗户，所以室内没有阳光，全靠电灯照明，而灯的瓦特数又很小，很可能电压也不足，在昏暗的灯光下，五步之外就连人的眉目也看不清。因为室内人数太多，有一股汗臭和霉味儿的混合体直呛鼻子。铺上的人都盘腿而坐，上身挺得笔直，眼观鼻，鼻观心，有如老僧入定。除了在门口椅子上坐着的两个值班员外，刚才带我们进来的两个值班的还在屋内来回走动巡视，却不见组长曹建纯的影子。我偷偷儿四下张望，发现曹克强在另一端坐着，正转动着脑袋四处张望，神色怡然自得。

读报结束，值班员说："现在上厕所，赶快下地排队。"于是人们纷纷下地穿鞋，在铺前站好，鱼贯而出。一个值班员在前面开路，一个值班员在旁边监视。一行人在厕所前站定以后，以十个人为一拨，由一个值班员带领着轮换入厕。厕所有东西两个门，第一拨人从东门进去，从西门出来，第二拨人才能进东门。上厕所也不许说话，偶而听到一个人喊："报告，我解大便。"值班员说："要快点儿！"然后大声向外面的值班员传递信息："出来九个，还有一个在里面大便。"于是又换一批人进去。

排队回到砖窑，在值班员的督促下又都重新上炕坐好，静默了几分钟以后，队长来点名了。从组长曹建纯点起，点到谁，谁答应"有"，队长迅速看一眼，然后点下一个。点完了名，队长问："有什么事么？"曹建纯说："没有。"队长就转身走了。值班员喊："开始睡觉。"于是各人纷纷找出自己的被子，卷成一个狭长的圆筒，迅速脱去外衣，卷起来当枕头，在值班人员的指挥下，间隔着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侧着身子钻进被筒，还必须躺得笔直。由于许多人学习时间已经不短，训练有素，熟悉自己的位置和朝向，因此不到一分钟，多数人已经就寝，只有少数人需要值班员的指导或对其朝向进行调整。

我还在原地发愣：我从小到大，一个人一张床睡惯了，素来没有和别人同床睡过，十分不愿我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接触，哪怕隔着衣服、被子也感到极不舒服。可是今晚怎么办？我迟疑着，是否要求先坐一晚上再作道理。还未等我开口，一个值班员走过来，他叫两个人各自往两侧移动一下，腾出一条狭窄的缝儿来叫我头朝墙睡下。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好上炕，沿缝爬行，取出被子也卷成狭长圆筒钻了进去。这时候另一个值班员大声喊："新来的听着！不许蒙头睡，翻身要报告值班，解手也要报告，值班准去才能去！"

躺下以后，左右四只臭脚，就在我鼻子附近，虽说有被子盖着，但传过来的脚臭味儿仍然使我恶心。我尽量把身子往上提，头紧紧顶住墙，好离臭脚远点儿，但效果不佳。本想蒙头睡的，可是值班员有言在先，不敢违反，心中难过极了。这一夜怎么过呀？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胡风说的一段话："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我把这段话默述了好几遍，似乎得到些安慰。是啊，这不过是头一个晚上，将来不知道还会遇到多少比这厉害百倍的难堪和折磨呢！要是连这么一点儿苦楚都不能忍受，今后还怎么活下去呢？　　上半夜，"报告，小便"之声不断，但没有听见"报告，我要翻个身"的。我猜想他们大约在小便回来后就自动换了侧身的方向了。于是我也照样喊起"报告"来，值班允许后，我就下地小便，并故意把动作放慢，一则躲避脚臭，二则观察情况。门口的地上摆着大尿桶，两个值班员在两行板铺之间的"过道"上来回走动，特别注意人们睡着了没有，如果发现有人用被子蒙着头或遮住了大半个脸，他们就把被子往下拉，使那人的脸

部表情准确地暴露在灯光之下。

撒尿回来，上炕以后，我换了个侧身的方向。电灯就在头顶上，那灯光虽然昏暗，却也很刺眼。我这个人毛病多，既排斥两人睡一床，也排斥开着灯睡觉，因此久久难以入眠。于是白天发生的事儿，就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重现。看着满屋黑压压的人头，听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一会儿昏昏沉沉地似乎进入了梦乡，却又被脚臭熏醒了……

第二天早晨，值班员大喊"起床了"，于是人们都迅速爬起来，把被子叠好，靠墙堆成高高的一摞。然后集体洗脸，一盆水十几个人同时洗。我怀疑不洗也许还干净些，因此没敢参加这一"共和政体"。洗漱之后，每个人发一双筷子、一只土碗，值班员把一桶麦麸窝头抬进来，先每人发一个，说明谁吃完了不够吃可以举手再要。又给每人的土碗里舀一勺麦麸面做的糊糊，外带一小撮咸菜。麸子面窝头又松又散，极难下咽，我勉强吃了一个，就不想再吃了。比较起来，倒是麸子面糊糊似乎好进口些。也许这种糊糊中玉米面的含量比较高吧。

这时候我才知道：坐在窑洞左端铺位上的，是附设于学习组的严管组，一共有二十来个人。这些人，都是"不认罪"或"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分子"，因此必须"从严管教"，限制其行动自由。曹克强拒绝签字，当然是"不认罪"，因此也光荣地入选了。照我想，凡是进入劳动教养收容所的人，行动自由立刻失去了，还能怎么个"限制"法呢？我冷眼旁观，只见他们每人只发给一个窝头，不发筷子，喝糊糊只能端起碗来往嘴里倒，最后用窝头或食指把碗底抹一遍，再把指头舔干净。为什么不发筷子？是否故意出他们的洋相？我一直迷惑不解，直到后来我到了病号组，才听到有人解释说是为了防止自杀，和学习组里没收小勺的目的一样。但用小勺和筷子怎么自杀，到今天我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想死，办法多得很，根本就防不胜防的。

早饭后大家又集体上一次厕所。这时候我经过小平房，看见组长曹建纯吃的饭菜原来和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这才一下子明白了：他还够不上当刑满释放的留场就业人员，他的身份原来跟我们是一样的。他那身呢子衣服，只不过表明他原来的社会地位较高罢了。后来我听说，他原来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的司长，虽然也是右派，却是因为"好男风"，被当作"流氓罪犯"送来劳动教养的。据说还是用体委主任贺龙的小汽车把他送来的呢。来头大，怪不得派头不小。

上午学习，由一个姓吴的副组长掌握。此人年纪很轻，穿着整齐，态度和蔼，颇有风度。学习的是三篇文件，头一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文件内容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三项：一是教养所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合办；二是送劳动教养完全由各单位的领导决定，想送谁就送谁，不需经过法律程序，被送的人连申述、辩护的权利也没有，也没有提到期限；三是发工资，还要扣一部分作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可见数目还不少，比起监督劳动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可能要强些。第二篇是《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提到《决定》正式施行前曾在党外人士中征求过意见，遭到后来划为右派的谭惕吾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没有说。第三篇是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张所长的讲话，讲的只要是教养人员的认罪问题。他提到有些右派不认罪，还说："我不过说了几句话，就把我反成右派了。"但是他着重讲的是关于"无理取闹"的问题。他说：有些人把自己的"无理取闹"行为说成是"有理取闹"。他接着解释：所谓"取闹"，指的是群众向单位的领导人取闹；但领导人是代表党的，党是永远正确的，绝不会错的，因此各单位的领导人必然永远处于"说服者"的地位。被领导者、被说服者如果不能被说服，还想反过来说服领导，妄图颠倒领导

和被领导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无理取闹”。反正按照他的逻辑推理，负责说服你的领导，也就是判定你是否“无理取闹”的领导，也就是有权送你去劳动教养的领导。

事实上，“无理取闹”是各种“教养理由”中最最说不清道理、分不清是非的一种罪状。若干年后重新甄别当年的劳教分子，得到平反的人中，除了右派，以无理取闹者为最多，什么叫做“无理取闹”，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记得五八年我刚到西郊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正碰上农场处理“窑场事件”。所谓“窑场事件”，其起因是因为农场办了个砖瓦厂，工人大都是农业社派来的临时工，工资一般只有二十多元，是发给本人还是由农业社统一领取后再给本人记工分则不得而知。这待遇比农场的一般工人要低得多：农场的工人，一进场每月就拿十八元，六个月以后转成一级工，每月就拿三十二元，活儿还没有烧砖累。砖厂有两个转业军人：一个叫朱斌，一个叫李锦遂，在部队上都是搞无线电的，转业后安置在砖厂，每月工资二十八元。他俩嫌工资低，联络砖厂的一些人到农场场部去“闹会”，也就是场领导筫的时候集体去请愿。这一闹，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场部说他们借干部开会之机聚众吵闹，是“妨碍公务”，要处分他们。他们就说：劳动教养所办的清河农场，也有个砖窑，那里的教养人员一个月能挣四十多元，他们情愿去劳动教养，也不想在这里干了。农场领导就说他们俩组织小集团，是坏分子，是无理取闹，给的处分就是劳动教养。至于是否去了他们想去的清河砖窑，则不得而知了。

三篇文章读完，吴副组长讲话。他说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然后安置就业。劳动教养分两个阶段，在学习组学习是第一阶段，通过认罪学习交代自己的罪行，认识了罪行才能转入第二阶段，那就是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如果劳动表现不好，说明认罪这一关还没过，就要打回学习组重新学习。那样，以前的改造就算白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期间如果不认罪，不服从管教，和政府捣乱，有的人态度恶劣，大喊大叫，大吵大闹，甚至撒泼打滚，专政机关是有办法的。如果闹得太凶，就给你强行穿上一种特制的“和平衣”。它是用消防队做水龙带的那种厚帆布做的，有夹层，强行穿上后往夹层里打气，人就只能躺在地上，手脚伸开像个“大”字，一动也不能动了，时间一长，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就是放了气，脱了和平衣，也得过几个小时才能缓过气儿来。任你怎么厉害、怎么会闹，只要穿上几次，就不再闹了。还有的人用绝食来威胁政府，这也好办：头几天不理你，等你饿了三天，没有劲儿了，来几个小伙子把你按在地上打一针。打了这种针以后，人就口渴异常，想喝水不给水，只给一碗稀粥，看你喝不喝。只要你喝了稀粥，等于就是吃了饭，自然就不算绝食了。一席话，说得教养分子人人哑口无言。我心里也十分钦佩我国无产阶级科学家的脑袋好使，出的主意，实在高明，应该得诺贝尔奖金。

吴副组长讲完了这一席开场白，接着就要求新来的人主动自觉地交代罪行。于是立刻就有不少人纷纷举手响应，表示愿意主动交代问题。在这样的大势所趋下，我犹疑了一阵子以后，也举起了手。既然人人都得交代，这一关早晚得过，躲是躲不了的。与其让组长指名交代，何不自己主动交代呢？拒不交代，很可能会被送到严管组去，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再说，自从被划为右派以后，写检讨书也就是认罪材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只要第一次撕破了脸，自己污辱了自己，以后不再把自己当人，那颗知道羞耻的心也就被自己写的厚厚一摞“认罪书”给压得麻木不仁了。

指定头一个交代问题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农村小伙子。他身材高高的，显得特别瘦，于朴实之中稍带几分诙谐乐观。他原来是农村的一个团支部书记，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从小

时候讲起，一直说到入所之前，翻来复去地说了那么久，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饿！解放前他家里穷，经常挨饿；解放后实行统购统销，仍然是饿。于是他对粮食政策不满，一直发展到率队请愿，结果可想而知。他只讲事实经过，并未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批判。听众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几个值班员发言表示不满意，但也没有说他“借交代问题为名继续向党进攻”。吴副组长作总结发言，先说他对所犯罪行缺乏深刻认识，然后又说他没有文化，出身又好，归根结底是觉悟不高，不过总算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也都如实交代了。

我一边听一边盘算自己怎么交代的问题。一个半文盲的农民，还是个团员，只因为种粮食的没粮食吃，要求吃饱肚子，却不知道这就是犯罪。他只提事实经过，没有任何批判，居然就过关了，看起来这里的关并不难过。回想我以前在大会小会上作认罪发言或写认罪材料的时候，如果对自己的“罪行”严重性程度认识不够、形容不够，就会招来一片斥责声讨，更不敢用“严重错误”这一类被认为是“轻松”的字眼来代替“罪行”一词。其实我内心深处和所有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并不觉得自己当真犯了什么罪。我现在之所以敢说“所有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是因为这些人中，尽管当时确实也曾经有许多人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沉痛忏悔，而被领导认定“对自己所犯右派罪行有深刻认识”；但在一九七九年复查改正时，却没有一个人坚持说自己是“罪行严重”、“罪有应得”，只接受摘帽而不要求改正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承认自己有罪，并不是我的思想扭过来了，立场有所转变了。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接受了两个我感激、敬佩、甚至崇拜的挚友的劝告，为他们的真诚——对党的真诚和对朋友的真诚，主要是对党的真诚——所感动，而且以为承认一下就没事了，像肃反中被斗的人一样，运动一过去，依旧可能读我的书。没有想到的是：一旦承认了自己有罪，以后就越陷越深；既然已经自污，也只好顺着原来的轨道滑下去。第一次为第二次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又为第三次提供了理由。每次交代之前，我都对自己因软弱、犹疑从而造成的自污感到羞耻、痛苦。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比别人写的批判大字报更加百倍地刺痛了我的心。但最后还是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之类的遁词为受伤的心灵进行包扎，然后再寻求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

这一次，我又随大流地举起了手。事后，我也为自己的又一次动摇而自责，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是怕不主动交代会被打入严管组，会从第十七层地狱落入第十八层么？是，又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实际上，人最怕的是被孤立，在一个环境中如果感觉到被彻底孤立，是很难过日子的。周围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友好的和一般的，都把你视为敌人，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有那么多相同遭遇的人都在主动认罪以求避免被彻底孤立，如果一个人继续抵抗下去，压力该是多么大呀。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不主动认罪，也是要被彻底孤立的。人的本性在于合群，不管一个人性格如何怪僻，独来独往，思想上如何反潮流、反现状，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需要朋友、同志、知音的同情和理解，至少是容许。群众运动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人人身不由己。都生活在巨大的强迫你认同的压力气氛之下，而这种压力却主要由个人组成的“群众”所提供……

还没有等我想好，第二个人又开始交代了。他是一家国营工厂的青年学徒，不知为什么，思想却很反动，暗地里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甚至“恶毒诬蔑”毛主席。领导找他谈话，他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领导也就满足了他这个很容易满足的要求。

终于轮到我了。在这样的场合，我的心情竟比哪一次交代罪行都轻松。我心中有数，这是“走过场”，只要我主动交代一些“罪行”，说明我是早就认罪的，在座的这些人，绝不会

追问、批判、声讨我。我只需把以前说过的话重说一遍就行，规格和调子再降低一些也无妨。我暗暗感谢吴组长，他没有让我第一个发言，而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使我有时间有机会去观察、思考、仿效。于是我把自己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大致说了一遍，性质定为“反党”、思想定为“反动”，只在最后才表示“低头认罪，决心悔改”。果然，安全过关了。

第二天仍是交代罪行，改为由几个小流氓唱主角。小流氓一般都兼小偷儿，单纯的小流氓其实并不多，而单纯的小偷儿倒有。之所以要在“流氓”一词之上再加个“小”字，一则他们年龄小，大都只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年龄稍大点儿的，大都已经“进来”了；二则活动范围和规模也小，一般不过是偷钱包、打群架、与女流氓鬼混等等，不然就会要送劳改了。他们大多按地区形成团伙，当时以二龙路一带的流氓组织最为有名：男的称“龙”，女的称“凤”，团伙的名称就叫“几龙几凤”，如“九龙一凤”、“七龙八凤”之类。还有些流氓没有形成团伙，只是互相熟识。他们每个人都有个“镇关西”式的外号，如“镇东单”、“镇西单”之类，相互之间则以“哥儿们”“姐儿们”称呼。“姐儿们”一般穿毛蓝布长裤，这是她们的服装标志。“凤”是她们的自称，“哥儿们”背后称她们为“圈子”。他们称警察为“雷子”；在社会上混叫“晃”，男女在外面过夜鬼混叫“刷夜”，可能是从四川话“耍一夜”音转而来；掏钱包叫“浮”（音 fou），专干这一行的小偷儿叫“小浮爷”——“浮”是形容其动作异常轻飘，发音近乎“浮”和“否”之间，和拂（fu）不同。有些报刊写作“拂爷”，甚至写作“佛爷”，似乎有违原意。专在火车上偷的叫“吃大轮儿”；打架则叫“练”或“练练”，做爱则叫“拍”或“拍拍”。小流氓交代问题一谈到“练”，往往眉飞色舞，绘声绘色，欲罢不能，还需值班喝止。交代如何“浮”时则有点儿勉强，似乎此举不够英雄。最不愿交代的是和女流氓鬼混的经过，往往一语带过，吴组长对此倒也罢了，而听众对此却极感兴趣，往往穷追细节，先问：“奔圈子没有？”回答：“奔了。”又问“动一部没有？”一部指接吻。回答：“动了。”再问：“动二部没有？”二部指摸乳房，回答：“动了。”再问：“动三部没有？”三部指和女人做爱，也就是“拍拍”，小流氓大都连声说“没有没有”。他们认为动三部有判刑的可能，故一般都矢口否认，听众往往还要穷追不舍，吴组长就加以制止。当然也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流氓，一说起与女流氓如何鬼混来，绘声绘色，描写得无微不至的。

还有一种流氓，最为人（也包括其它小流氓）瞧不起，他们也不抱成团伙，都是一个人在电车上或公共汽车上活动。尤其是夏季，趁天热人挤之时专门在穿得单薄的年轻女性背后做动作，甚至把人家的裤子或裙子弄湿，受害者即便觉察，但人挤躲僻不开，嚷出来又怕脸上不好看，传出去也不好听，往往忍辱不言，致使他们屡屡得逞。这种人，“氓界”也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老顶”。此等恶习究竟是如何养成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那时候还没有色情文学，更没有黄色录像之类。从医学角度看，也许是一种性心理变态。但在那时候统统称之为“流氓”。这种人在领导看来不算什么大问题，又形不成“集团”，所以处理很轻。但他们恶习难改，往往在拘留后回家的路上就故态复萌，还未到家就又“二进宫”了，次数一多，也就被送来劳动教养。

小流氓们交代完了问题，从此就算了结，没有谁来对他的偷盗或流氓行为进行批判。批判，只严格地用于“反动思想”包括小流氓对改造生活的不满在内。当然更没有谁叫他们去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分析其犯罪本质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像对思想犯那样。小流氓交代罪行，也只此一次，不像右派那样没完没了地天天认罪。这样，他们在右派和各种思想犯面前就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会下会上经常说：“我不就是偷点儿摸点儿的生活问题吗？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倒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似的。尽管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怠工、逃跑之类的行为也颇感头痛，但上级领导却很不在意，在里面偷

盗也好，打人骂人也好，消极怠工也好，说怪话也好，都安然无事，期限一到，留场就业就是。难怪他们当中极少有人会痛改前非，收容所能够拿出来的对策，也不过收容起来让他们干活儿而已。因此劳教场所，也就成了他们交流经验和切磋技艺的场所了。

看起来，这些人将是我今后的终生伴侣了。我为落到这个大泥潭里而自悲。以后能否不被染黑，也只有靠自己了。其实，这些小流氓的种种丑恶事迹，与我以后在“西部地区”遇到的奸尸犯、兽奸犯以及吃活人心肝的土匪相比，又差得远了。

某天，一个小流氓正在交代问题，值班员领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家伙来。开会的时候值班员带新号进来的事儿，每天都要发生几起，所以并没有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流氓的犯罪情节上引开。但是这孩子刚刚坐下，突然像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喊“妈呀”。听众们顿时目瞪口呆。值班员却仿佛司空见惯，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进行恫吓：“不许哭！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老实点儿！你想干什么？”

“这儿不是幼儿园!”

但他并不害怕，依然大哭不止。曹组长走进来，用很沉重的口气说：“再哭，送你到严管组!”他当然不了解严管组是怎么回事儿，但说话的人和听众的严肃表情可能激发了他对这个难以猜度专门用来吓人的严管组的恐怖感，像没有见过狼的幼儿听到“狼来了”一样。莫明的恐惧感使他很快从嚎啕大哭转为间断性的低声抽泣。

有个值班员还在挖苦：“这会子知道哭了，早干嘛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管组忽然骚动起来，一个被严管的组员突然从床上站起来高声大叫：“……”。但只喊了两个字，大家还未听清他喊的是什么，早已经在旁虎视眈眈的两个值班员一下子扑上去把他按倒在炕上，严管组顿时大乱。学习组的人也不顾规定纷纷掉头张望，有的还小声地互相打听。吴组长和值班员连声高喊：“不准动！都坐好！坐好!”半分钟以后，秩序已经恢复，原来是一团臭袜子塞进了叫喊者的嘴里，手腕上也多了一对锃亮的“镯子”。他却满脸怒气，两眼直冲冲地瞪着……几分钟后，一个穿呢子衣服的中年干部由曹组长陪同走了进来，曹建纯大声说：“现在祖干事给大家讲话。”祖干事轻蔑地看了那个叫喊者一眼，并没有谴责他，却转过身来对学习组的人说：“既然开饭店，就不怕大肚汉。我这里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我不管你是几龙几虎，我这儿是逢龙去角，逢虎拔毛。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趴着。社会上把你们没办法，才弄到这儿来。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专政机关，专政机关都治不了你谁还能治得了你？不是想闹吗？谁想闹谁就闹，你只管给我凑材料，凑够了我就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去。你着什么急？慢慢儿凑，离枪毙还早着呢。”说罢缓然而去，砖窑内静默了许久。

次日早上从厕所回来，就看见严管组的人正在捆行李，值班员在旁边不断地催促，一会儿他们都拿着行李出去了，只剩下几张空荡荡的木板铺。晚上起来小便，听见两个值班员小声议论，才知道这些人都被弄到兴凯湖改造了。一提及兴凯湖，两人都压低了声音：“知道吗？兴凯湖!”“啊？”那口气，畏惧中又带有几分神秘。直到以后我遇到从兴凯湖生还的人，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谈湖色变。也才明白严管组为什么能起到镇唬教养人员的作用：严管组

者，通向兴凯湖之桥梁是也。

我一共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学习了九天，就开始发配了。曹克强比我先走一天，发配到辛店农场。他没有主动要求交代罪行，照样没事儿似地发配了，这说明我主动举手要求交代纯粹是自受其辱的多此一举。回忆这九天，曹克强要比我老练得多，稳重得多，相形之下，我显得怯懦、犹疑、动摇……我们两个人的差别，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二章 北苑化工厂

我被发配，不但没离开北苑，而且没离开窑洞，只是把铺盖卷儿从窑洞的这一段（一座砖窑分几段隔成好几间）抱到了另一段。对内称为“化工队”，对外叫“地方国营北苑化工厂”。因为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地址就在北苑，而“化工队”是属于劳动教养收容所的，故以此命名。

我听说到化工队，既然是个工业单位，肯定比劳改农场强，甚至比西郊农场还好些。何况又和我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有联系，因此心里暗暗高兴。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会想到，我的“升级处理”竟是因祸得福。这也许是送我来教养的校领导和右派改造积极分子所始料不及的吧？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糊里糊涂地随着队长走到化工队宿舍。其实就在学习组的隔壁，距离不远，几步就走到了。我提着行李到了小平房门口，大组长尹子仓正在那里组织学习。我和另一个一起分来的唐冠军向他报了到。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来历，就向我俩介绍这里的情况。化工队的人员分两种：一种是劳动教养人员，一种是劳改分子，生产上是混合编组，统一调配，学习和居住则是分开的。干活儿两班倒，分白班和夜班，不定期调换，早晚六点交接班。又嘱咐我们：到了这里，思想上、行动上都要靠拢政府，要好好儿劳动，接着就叫小组长带我进屋。屋内并不大，和学习组的那个小平房相似，旁边也有个侧门，可以进入砖窑也就是宿舍。里面有许多张板铺，不过比学习组要小得多。引人注目的是：侧面的墙上钉着一个大铁钉，下面用粗麻绳吊着一块大木板，木板上堆满了箱子、手提包之类的东西，全部重量都系在那根绳子上。小组长说上面已经放满了东西，叫我把皮箱放在铺下。又说现在天气快热了，不用盖被子，行李就别打开了。我这才注意到铺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未打开的行李。于是我也把行李卷往铺上一放，跟小组长出来学习，唐冠军则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学习内容是报纸上关于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报导，它说城市人民公社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便于组织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进行生产；另一个是合理分配商品：因为“资产阶级”的家属不劳动，人家上班她逛商店，也有时间排队购物，紧俏商品都让他们买了去，工人阶级尤其是双职工就买不到了。成立人民公社后，所有的闲散劳力全都组织起来参加生产，谁也没有时间闲逛，商品也就可以合理分配了。我听了心里暗暗佩服：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领导，果然想得周到！再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穿得极其破烂，无精打采地听着读报，心不在焉，和学习组大不相同。

报还未读完，尹子仓说：“准备吃饭吧。”原来是去打饭的人已经回来了，挑着两个桶，一桶装着窝头，一桶装着麦麸糊糊，另外有一碗咸菜。我的小勺已经被没收，又不发筷子，

吃饭的工具就发生了问题。只好仿照严管组的办法，一只手拿窝头，一小撮菜倒在糊糊上，另一只手端起碗来扬着脖子喝下去。窝头虽不定量，可也实在不想多吃，吃了两个就饱极了，然后上夜班。上班队伍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两路纵队，每组由挑饭桶的打头（他们是积极分子，有比较多的行动自由），小组长在后押阵。组员们个个都穿得极破烂，破衣服上又都不打补丁，任其千疮百孔，奇形怪状，看上去还不如叫花子。生产场地距离宿舍不远，在紧挨围墙的一角，墙外似乎有些高高的土堆，像是古代城墙留下的断壁残垣，隔墙还可以看见几棵树的树冠。生产车间只有少量平房，大部分是简单而杂乱的工棚，石棉瓦作棚顶，土陶管堆成一米多高充作棚壁。队伍停在靠近平房的一小片空地上，先听队长训话。

训话的队长姓邱，矮个子，四川口音。他先讲有人不服从劳改小组长领导的问题："有的人反映：我们是劳教人员，为啥让劳改犯当组长管我们。这样说就是不认罪的表现。犯人改造得好，政府信任他，安排他当组长，你们就得好好儿听他的安排。不管劳改劳教，犯了错误都得好好儿改造。"然后他又提及组内发生的打人骂人事件，批判说："打人，是侵犯人权！骂人，是侮辱人格！"多年以来，除了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时能听到"人权"、"人格"这两个词以外，早已没有人敢提它了。如今在劳动教养收容所里，居然还能从队长嘴里听到这样的话，犯人居然还有人权和人格！简直使我惊奇不已！钦佩不已！同时又担心他早晚怕有成为右派的危险！他又说："你们犯错误，政府干部都没有打骂你们，劳动改造是改造思想，不是改造肉体，我希望你们好生改造。你们改造好了，回到社会上，我也好去干点儿别的，我不是非当这个队长不可，我不怕失业！"一席话，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

训完话，各自散开，尹子仓带我走进了挂着"化验室"木牌的平房，见了化验室的两个负责人，一个叫张世敏，是个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人，样子很有风度。他自我介绍说原是宣武区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另一个是姚天白，比较年轻，样子很潇洒，是北大的助教。尹子仓介绍完就走了。张世敏对我说：到了这里，要好好儿干活儿，要遵守纪律，不要进行不法活动。他说化验室原来有个大学生，也是右派，因为搞小集团，已经被抓走了，你务必要注意。我连忙点头称是。他指着工棚外面空地上一口大锅说："你分到化验室工作，先下到直火组，具体工作是生产氯化亚铁，把铁屑、铁刨花分批倒进锅里，加入盐酸，用锅下面那堆烂木头生火加热，有人来舀产品就用大铁勺舀给他，随时补充盐酸和铁屑。"他说话的时候不断有人来问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都是姚天白在旁解答。

这活儿倒轻松，可是过了十二点，吃了夜班饭以后，倦意不断袭来，到了三四点钟，更是昏昏欲睡。偏偏这一段时间，两个大组长：尹子仓和信天太，还有一位队长，不断前来巡视，不敢打个盹儿，只好硬撑着。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唐冠军来接班，心想这下子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但是还不行，吃过了早饭，队长还要集合训话。这个队长说："夜班有的人打盹儿，有的人都睡着了，我走到他跟前他也没醒来，还在打呼噜。我把他的搅拌棒拿走他都不知道。我上去把他推醒，他还问我有什么事。"接下去自然是一顿训斥。这时候我有点儿迷迷沉沉的，也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心中只盼他快点儿训完话好回去睡觉。谁知事情并不算完，队长又分配下来新任务：搞环境卫生。其实就是清理旧木箱和工业废渣。大组长给各组划定区域，我所在的直火组由一个姓钟的犯人组长领着干。组员们对于这项额外的负担是既不愿干也确实没有力气干。我问一个组员是偶然干这么一次还是经常有，他说每天都这样。

你愿意干也罢，不愿意干也罢，队长不管也不来催，反正不干完不收工。拖到九点多各组才先后完成，统一检查完毕，大组长报告队长，队长才准许我们回去。队伍偏偏倒倒地走

回住处，各组分别统一上厕所，然后才真正到了睡觉的时间。

这一天我还没有洗脸，我的生活习惯，再忙也得洗把脸。我问大组长尹子仓哪里有水，我想洗把脸。他说："大伙房旁边有个水管子，你跟伙房说一声就行。你一个人去好了，不用小组长带。注意走路要离墙远一些，不要到处跑，离墙一米之内是警戒线。"我谢谢他的信任，急忙进屋拿脸盆毛巾。屋里的人都已经和衣躺下，横七竖八地蜷在行李包之间，有的就躺在行李包上，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有些人喉咙里还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我抓紧时间洗好脸回来，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估计这时候大约有十点钟了。说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说九点、十点等等，完全是凭感觉或说是直觉。我没有表，这里面只有干部能戴表，教养人员包括大组长在内是不准戴表的。我原来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就已经炼出一种不看表也不看太阳而能估计时间的本领，误差不会超过五分钟。

我赶紧找个空档放倒身体，立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没多久，不知是梦是真，恍惚觉得有人用力推我，我懒得动，不理他，他却拼命地推。我终于醒了，耳朵听得见，眼睛却睁不开，脑子里也是迷迷糊糊的。只听那个人恶狠狠地说："起来，起来！该你值班了。"我揉了揉眼睛坐起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不想动也不想说话。那个老号把一个座钟和一个小本子放在我面前，又说："你从十二点值到一点半，喊×××值班，谁说梦话记在小本子上。"我拿起钟一看，才十一点五十五分，就问："还没到点嘛？"他也不回答，回头一看，他已经倒在铺上，打起呼噜来了。

四顾茫然，只好坐在床沿，打起精神来值班。翻了一下小本子，上面也没有记什么梦话。过了几分钟，又觉得实在困得不行，身体不住地往后倒，但又不敢靠在行李上打盹儿，因为我估计过一会儿队长、大组长准得来查班。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大组长信天太来检查，问了几句就走了。又过了一阵，队长也来了，翻了翻那个专记梦话的小本子，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这时候时针快指向一点，按说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一觉，不会有人来查了。但是不行！这一躺下，一点半绝对醒不过来，误了交班，被查出来怎么办？只好硬撑着，还得离行李卷儿远些，免得一挨着就想往上靠。好容易挨到一点二十五分，问题又来了，这时候叫下一班还是到点再叫？如果那人一叫就醒来，看时间不到，准会臭骂我一顿。可是如果到一点半才叫他，老叫不醒岂不又吃亏？事情虽小，可是两难啊！这五分钟对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的人来说，是多么珍贵呀！最后我还是到一点半才用力把他摇醒，然后放松身体，一下子瘫倒在行李包上。

尹子仓的大嗓门儿终于把所有的人都喊醒了，一个个呵欠连天，在小平房外面围成一圈儿坐下学习。这时候座钟时针正指三点。他说："队部决定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开展一个交代余罪的运动，凡是过去在社会上犯的罪行没有交代，隐瞒下来的，这次要统统交代出来。政府的政策是：凡是自己主动交代出来的罪行，不论多么严重，哪怕比政府已经掌握、已经处理过的罪行还要严重，只要主动交代出来，说明有悔改表现，政府一定从宽；如果继续隐瞒，拒不交代，对抗运动，一旦查出来就要加罪。队长说：”你们不要想隐瞒过去，以为政府查不出来，许多坏事儿是几个人一起干的，现在社会上也在搞运动，搞检举，你不交代别人还不交代？你不进步别人还不进步？‘"他停了一下，用一种倚老卖老的口吻接着说："我到这里面时间比较长，情况晓得一些。这里面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坦白交代运动、揭发检举运动、交代余罪运动、认罪守法运动。过得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他叫大家讨论一下，可是谁都默不作声。我想这倒未必是在回忆自己有什么未交代的余罪，恐怕还是没有睡醒之

故吧。尹子仓等了一下见还是无人发言，就发纸给每个人自己写。

上夜班、听训话、搞卫生、值班、交代余罪。每天周而复始，余罪尚未交代出来，斗争矛头就有了变化。有一天下午学习时间，全所集合开大会，伙房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临时会台，下面密密麻麻坐了上千的人，有学习队、有农业队、有女队，化工队上白班的也暂停生产来参加。大会一开始，就喝令把罪犯押上来。两个人飞跑着不知从哪里把罪犯横拖竖拽地拖上台去，一个女审判员厉声宣读罪状，大意说反革命集团首犯袁××，原系归国华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一九五七年趁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教养期间，仍不思悔改，坚持反革命立场，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纠合劳教人员和留场就业人员中的反改造分子，组成反革命集团，企图逃跑并策划逃往国外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现依法将反革命分子袁××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话音儿刚落，各队“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四起，一辆黑色小汽车驶入会场前侧，袁××又从台上被押下来推进了汽车。我心里一动，这个袁某人，大约就是张世敏所说的那个人了。

所长接着讲话，号召检举揭发。说检举有功的，犯人可以减刑，劳教的可以提前解除劳动教养。我听了一愣，劳动教养没有期限，哪儿来的提前？既然说提前，那么就是有期限的，只不过由政府专政机关内部掌握而不公开宣布罢了。那么在学习组为什么又说劳动教养没期限，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解除呢？所长又着重批判了逃跑的行为，说有些人不好好改造，想逃跑，还对旁人说这里有围墙电网不能跑，到了农场就可以跑。最后要大家分组讨论。

由于所剩时间不多，所谓小组讨论就是尹子仓一个人讲话。他说：“谁想逃跑那是自找倒楣，不要说这么高的围墙，还有岗哨，跨过警戒线一步就可开枪，光说那电网，通的是三千伏的高压电，人到了附近就被吸上去了。要弄清楚，这里不是别的地方，”他突然提高嗓门儿，一字一顿地说：“这儿——是—北—苑！”接着他又说：“今天抓的那个人，勾结就业人员想跑，还在策划就给发现了。这不，先关了两个多月的禁闭。禁闭室，那是什么地方！没床没被盖，夏天喂蚊子，冬天钻草窝，一天吃六小两，用不了一个月，保你圆脸进去，长脸出来！”听那口气，关禁闭比判刑劳改可怕得多。想想也是，每天只吃六小两（一市斤是十六小两），吃上几个月，谁受得了哇。后来我在伙房旁看见管禁闭室的值班员从伙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碗，碗底有点儿玉米粉，他捡了点儿刨花在墙角煮那一口玉米糊糊，才清楚这是煮给关禁闭的劳教分子吃的，证明尹子仓所言非虚。

熬了几天夜班之后，我每天必须洗脸漱口的“良好习惯”早已无法坚持，能多睡一分钟是一分钟。最苦的还是值班，和组长关系好的能值两头，尤其是九点到十点半这一班，实际上大家上床就已经是九点半左右，只耽误一个小时的睡眠，而且还能睡个整觉，其次是值一点半到三点那一班。而我却总是被安排在中间，总共不过四小时还得分两次睡。睡眠严重不足弄得人整天昏昏沉沉，软弱无力，不想吃饭。

过了一段时间，丘队长调走了，犯人也全部调走，包括姓钟的组长在内，换了个新的组长。他不叫我烧铁锅，调到工棚内和全组一起干，改上白班。白班下午六点下班，吃饭、集合、训话之后也搞卫生，但时间不太长，这倒不是因为天黑了不好搞，而是它占的是晚上学习时间。晚上九点半就停止学习开始睡觉，直到早晨五点为止，除去值班时间，可以睡六个小时，我暗自庆幸。

事实却打破了我的迷梦。往往我刚值完班才躺下，又被喊了起来，原因是装着材料的货车到了工棚，工棚里上夜班的人都有自己的活儿，卸车就成了上白班的人的事。货车晚上行驶当然比白天强，专门安排卸车的人在队部看来根本无此必要。于是大组长一叠连声地催喊，穿上鞋急急忙忙赶到工棚，队长已在那里"恭候"，汽车上装满了漂白粉之类的木箱，一股刺鼻的氯气味儿呛得人不敢呼吸，眼泪直流。卸完车，马马虎虎抖了抖衣服，带着未抖净的白粉和怪味儿，再去睡那为时不多的觉。

有天晚上卸车回来刚睡下不久，忽然一声巨响，肩膀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接着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我从熟睡中惊醒，被强烈的恐怖感包围，似乎大祸临头。仔细一看，原来是头顶上那根把木板挂在大铁钉上的绳子断了，木板箱子、手提包都猛地砸下来，人们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等事态平息后，又该我值班了。窑内灯光暗淡，窑顶和墙壁似乎都在下坠，重新结好的绳子似乎在吃力地喘气，抱怨着沉重的负担。横七竖八的行李箱高踞在木板上，像吃人妖怪似的虎视眈眈。我逐渐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置身在妖魔盘踞的洞穴里，我就是那根绳子，被拉着往下拽，越拽越细，细得只剩一根游丝……

上白班的早晨起来，也没法洗脸，窑内是没有水的。虽说吃完早饭离出工还有几分钟，也没有人上伙房去接一盘水，都想抓紧时间再靠一会儿。我有些疑心，难道这些人都成年累月不洗脸么？我偷偷儿注意，发现有的人悄悄儿把毛巾之类的东西带进车间，趁无人注意之际赶紧洗上一把，如果不慎被小组长、大组长发现了或者被同组的人检举，挨一顿臭骂不说，还要被队长在集体训话时"点名"，小组会上还得检讨。因为这属于"上班时间干私活儿"，是违反队规的。有的老号比较有经验，难得被发现，我虽然看到过几次，但我是不会向组长报告的。尽管我也很想学着偷偷儿洗脸，却又不敢轻试。因为我不知道谁有向组长打小报告的习惯，自己上班干私活儿的人未必就不检举别人干私活儿，也许为了掩盖自己还要更多地检举别人。所以我只好让脸一直脏着。

虽说度日如年，时光还是在逐渐逝去，也不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给家里写短信也乱填日子，但天气确实是逐渐热了。中午吃完饭走出工棚，猛一抬头，围墙外不知何时起竟然桃花盛开，花朵繁密，挤在一起争先恐后地向外伸展，有些竟然接近电网边缘，似乎在表明她没有忘记我们。粉红色的花朵，在这个灰褐色的世界里，在这个寸草不生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活泼热烈，充满生机，好像要唤醒一颗颗死去的心。我看见她，觉得自己又有了蓬勃生长的力量，有了青春的火焰。可是花朵旁的电网，正是一种无言的警告，目光一碰到她，刚冒出的火苗就熄灭了。这一辈子我恐怕再也不会回到大自然的环抱，再也不可能"赏花"了。这都是因为改造，改造，一辈子改造！正当我在诅咒改造的时候，突然又发现明代留下的"土城"的断壁残垣上，站着几个穿着整齐的青年男女，他们不欣赏桃花却向电网高墙内的我眺望。是的，我觉得他们在看我，一个穿花裙子的女青年还伸出手向我指指点点，跟伙伴们说些什么。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是嘲笑我这个戴眼镜的斯文书生竟然成了罪犯，还是嘲笑我囚首垢面，衣服又如此破烂？我自惭形秽，赶紧缩回工棚。

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衣服破烂，所有的人衣服，不但都被弥漫在空气中的酸雾熏成千篇一律的黄褐色，而且大洞连小洞。破烂的衣服上，谁也没有一块补丁。想补衣服吗？针在学习组被当作自杀利器没收了，又没有时间，既不愿牺牲仅有的一点儿睡眠时间，又不敢冒"上班时间干私活儿"的罪名，烂就让它烂去吧。世界上有什么结实的衣服能经受得住这无所不在的酸雾碱水哟！棉衣外面破了，里面的棉花也被熏成棕黄色，棉絮像棉桃开裂似的伸得老长，毛茸茸的一团又一团。远远看去，除了大组长以外，都像一头头棕熊。

酸雾不仅腐蚀了衣服，还配合着怪味臭气刺激神经，弄得我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经常吃不下那粗糙难咽没有多少营养价值的麦麸面窝头。更由于长期缺少睡眠，疲劳过度，我的身体总处于似病非病的状态。一个上午，我浑身发冷，恶心想吐，好在当时有点儿闲空，就挣扎着到了车间医务室，它就设在工棚附近。医生看见我，不等开口就把温度计递过来，量完体温就把装有药品的小纸袋给我，扭头干别的去了。我想开病假证明，可是找他没有用。他是个劳教医生，没有权力开假条，要请假得找大组长转告队长。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谁能请准假，虽然生病是常有的事，工伤更是司空见惯。硬挨到中午吃饭，看见那和队长尊容一样天天不变的麦麸面窝头，我毫无食欲。副食是萝卜汤，小组长把那淡红色的液体舀出来，一人一勺，里面有六七片萝卜。萝卜片儿很薄，像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边有两厘米长。我一口气喝完了那带有酸味的汤，不想吃萝卜片儿，走到废液沟前正想把它倒掉，背后有人小声说："把它吃了吧，在这里面，只有这点儿营养了。"回头一看，认得是在学习组一起呆过的汪家凤。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听见这句带点儿人情味儿的话。我不敢违背队部关于不准交谈与生产无关的事的规定，不敢问他在哪个组，只点了点头，然后勉强地把萝卜片儿吃下去，算是对他的一片善意的报答。

吃饭时间一共二十分钟，一般人都吃不了这么久，饭后可以休息一会儿。我利用这时间找到大组长尹子仓，鼓起勇气向他诉说病情，特别强调吃不下饭这一点，希望他能准我病假，休息一两天。他听了冷笑一声："哼，头晕？全身发冷？多干点儿活儿，出一身汗，就好了！"

看到他那冷漠厌烦的神情，我回忆起以前有个组员向他请假，说自己肚子痛得厉害。他说："肚子疼？少吃点儿就好了。"这种人，为了当组长，人性早就当破烂儿出卖了。我埋怨自己为什么去向这样的人求情，也不想一想他凭什么能当上大组长，向他求情，不是与虎谋皮吗？　　病假请不准，活儿还得干。又煎熬了两天，药片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浑身更加软弱无力，不想吃饭光想喝水，太阳晒着也不觉得热，多想在铺上再躺一会儿啊！正在发愁之际，队长讲话，突然宣布明天放假一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休息，连过五一节都还照常上班呢，只不过中午吃了顿白面馒头，算是过节了。

那时候我上的是白班，下了班搞完卫生，回到窑洞已经天黑。一到门前，所有组员争先恐后蜂拥而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迟了一步，铸成了大错。原来上夜班的人今晚不上班，都继续在行李包的缝隙中睡觉，上白班的回去，都抢占凸出于睡觉人群之上的几个有限的行李包，赶紧躺上去。转瞬间木板铺上人已塞满，再无插针之地，其密度决非学习组可比。今晚又不派人值班，我面对躺下的人群毫无办法，就只好到外面小平房来找小组长。他正坐在床上准备脱衣睡觉，听了我的诉说，冷冰冰地数落我："谁叫你磨蹭，你他妈的干活儿磨蹭，睡觉也磨蹭！"说完了这一句，再也不理我，自顾自睡了。

我只好又回到窑内，茫然四顾，只见不论白班夜班的人都已经熟睡，呼噜声此起彼伏，那声音似乎在嘲笑我：你这个笨蛋！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又仔细地找了一遍，炕上没有一丝儿空隙，炕下地方本来就不大，已经堆满了鞋子。我只好坐在地上，头和肩膀靠着炕沿，闭上眼睛休息。这时药片也起了作用，身上发汗，极度疲倦加上极度软弱，我恍恍惚惚地睡去……

那是谁的微笑？如此天真而善良。……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她又不见了……年老的教授

正在上课……几支小试管并排倒立着……一盘水，水里有影子？谁的？影子散开了，是天上白云的投影……篮球场上，我跑着，满身大汗。球在空中旋转，我跳起来抢球……一个人用脚蹬我，用力地蹬我……我觉得很疼……我被蹬醒了， 原来我一只手臂压在一个人的脚上，他就用脚蹬我。我把手缩回来，又迷迷糊糊地晕过去。以前生活的碎片又一片片浮起，更加模糊，更加漂浮不定，又一片片地隐去，逐渐远了，远了。

新的一天来临，睡足了的人都恢复了生气，只有我仍是昏昏沉沉。饭后尹子仓说：今天休息，统统上车间，队长要训话。于是一如往日地排成长队，在初夏的早上，迎着柔和的阳光，踱着濑洋洋的步伐，向工棚蠕动。

队长常换，除了已经调走的邱队长，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几个队长，怎么分工，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反正人们都说“队长”如何如何，而不说“某队长”如何。但队长对我们却很了解。每个新来的队长，都要让大组长发给我们一张小纸片，叫大家填写姓名、年龄、犯罪类型等等。上下班集合训话的时候，队长就拿出用这些小纸片钉成的本子进行核对，点一个看一眼。今天也许是我神经过敏，这个队长点到我的时候看我似乎比较仔细。点名后他说：“今天休息，你们就在车间里找个地方呆着。有些病人，是不是留在屋里睡觉好些？老睡觉不好，还是在外面活动活动吧。有个头疼脑热的，活动活动就好了。老憋在屋子里，没病也要憋出病来的。所以今天把你们带到车间来，午饭也在车间吃，下午三点钟再回去学习。明天上白班的和上夜班的换一下，现在开始休息，不许几个人凑在一起聊天儿，没事儿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训话之后，我们各自散开。这里面是绝不许相互之间有私人关系的，除了生产上需要以外，根本不许互相交谈来往。队长、大组长一再强调：“你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监督的关系，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监督其它人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政府反映，这才是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互相聊天，彼此拉拢，就是对抗政府、抗拒改造。”今天休息又不搞生产，当然没有必要凑在一起，自找麻烦。

我先痛痛快快地洗脸、漱口，然后找到一个小工棚，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倚着墙，半坐半卧地歪着，尽量放松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全身软软地摊在墙和地面之间，一动也不动。沉重的身躯有了支靠点，不必靠自己的力量站着，不必担心被叫起来值班，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也是劳动教养以来最最舒服的一天。温柔的阳光从门口斜射进来，洒遍了我的大半个身体。它抚摸着我，轻轻地拍着我。多么难得的时光！我眯着眼睛，什么也不想，非睡非醒，头脑里一片空白，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只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存在，其它都是虚幻……

人是多么容易满足呵！只要一片空白，我就满足了。

烧退了，恶心感也没有了。尽管四肢依旧乏力，毕竟觉得轻松些了。到了上夜班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到化工队来头一次上夜班，我生产的是氯化亚铁，后来生产香豆素。而这一次是生产乙酰苯胺，它是最终产品的第一道工序。每个人只知道自己那道工序的产品代号，最终成品只有少数人知道。直火组的组员每个人负责四个大烧瓶，燃料是自制的土煤气。小组长派人统一领料，其余加料、加热和结晶，则每个人一包到底。这道工序的原料只有两种：冰醋酸和苯胺。冰醋酸装在陶瓷坛子里，一坛净重二十五公斤。倾倒前先把塞子取下，左手把住坛口，

右手托住坛底，侧过坛子来，把酸倒在大量杯中。量杯口径不大，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从坛子里往外倒液体，其量多少很难控制。酸液咕咚咕咚地直往外冒，一股强烈的气味扑面而来，鼻腔和喉咙都被刺激得非常难受，身体和手随之抖动，这就更难保证液体顺利地完全流入量杯中。在这里是很难看见胶皮手套之类的劳动保护用品的，酸液一旦滴落到手上，立刻有痛彻肺腑的感觉。从化学本性上说，醋酸是弱酸，但就对人体造成的疼痛而言，我觉得似乎还在几种有名的强酸之上。那种感受，就像一颗带尖儿的螺丝钉正在往肉里钻！

另一种原料是苯胺，装在铁桶里，一桶净重三百市斤。以前从仓库里领料，都是两个人推着铁桶，滚到工棚里；有次被队长看见了，大骂一顿，说这样滚动，会损坏铁桶，是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于是后来改为两个人抬，用钢丝绳拦腰兜着铁桶，一根木杠穿过钢丝绳，抬回车间来。倾倒时两人协作，先抬起一头放在预先垫好的砖块上，旋开盖子，再从后面把铁桶底部抬到适宜的高度，苯胺就咕咚咕咚地流入砖头前的量杯中。这样操作，苯胺难免洒出量杯不少。小组长看见了，不许这样干，让我们先把大铁桶抬到高处，旋开盖子，把细胶管的一头插入桶内，另一头用嘴吸气，用“虹吸”的方法把苯胺引出来。这样苯胺倒是没有多少损失，可是嘴角和拿胶管的手却难免要沾上了苯胺。尽管当时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可苯胺是有毒物质，会通过皮肤接触使人中毒，过一小时以后，就会感到头晕、恶心、不想吃饭。一般说来，过几个小时就会渐渐好转。但中毒的深浅和身体健康状况有关，身体好的中毒不明显，有时竟分辨不出身体不适是中毒呢还是由工棚里各种怪气味所引起；但体弱者就不同了。一般的组员大都没学过化工，不知道皮肤接触中毒的道理，我虽知道但不敢对任何人说，以免被扣上“造谣惑众，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同组有个叫赵瑞珍的，是个四十多岁矮小干瘦的“小老头儿”，人很和气。有一次他中毒反应比较严重，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上。队长恩准叫几个组员把他抬到设在工棚里的医务室去诊治。医生一看问题严重，不敢怠慢，又转送到设在二门外的医院去看。那是干部和就业人员看病的地方，也就是我和曹克强入所那天检查身体的地方。经过简单抢救，赵瑞珍终于睁开了眼睛。组长见他苏醒过来，就叫两个组员把他架回工棚，要他继续干活儿。可是看他那昏昏沉沉歪歪倒倒的样子，又怕他会打坏烧瓶，于是量材施用，将他架到一口大缸前，缸里面稠乎乎的两种物质正缓慢反应。组长指着插在缸里的一根木棒，要他用木棒去搅动那稠厚的液体。

赵瑞珍两手扶着缸沿，大半个身子都压在缸上，只差没有倒下去。他大口大口地喘气，断断续续地说：“组……长，我……我……实在……顶……顶不……住，让我……歇……歇……一会儿……再……”

没等他说完，组长就恶狠狠地说：“老菜帮子，队长叫你干活儿，你装什么蒜？　　快干！“　　“我……难……难受……”

“你他妈的甭给我来这一套，跑这儿消极混泡来了。我看你他妈是想找死！你干不干？你说！你干不干？”

“组……组……长，我……我……我要死……死……了。”

我正在观察烧瓶内的反应情况，突然听见组长厉声喊我的名字，只好过去。

组长拿出一个小本子、一支钢笔，要我把赵瑞珍刚才说的话统统记下来：“这都是反动言论，今儿晚上开他的会，轻饶不了这个老家伙！”

接着他又转过身大吼：“你他妈的敢用死来威胁政府，你真死了又能怎么样？甭说你装死了！”

我想推辞：“我这儿有活儿，离不开。”

“烧瓶你甭管，我找人替你看着，你只管记。按他刚才说的话记，一个字也别落下，这回要好好儿跟他算账！”

我只好接过那支重如千斤的笔，阿 q 临死之前还能在纸上画一个瓜子似的圆圈儿呢，可我手上的笔却只能在纸上徘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从五七年到现在，我由小学到大学所学来的读书写字的技能，全部都用来侮辱自己了。没有一天用于为人民服务，今天还得用人民教育出来的这点儿本领去侮辱一个无辜者。可不写又不行，小组长还在一旁等着呢。

赵瑞珍可能是难受极了，居然不顾一切地继续说：“我……我……有罪，活着，是……是个……教养……人，死，死……了……也……也是个……教养鬼！”

沉重的笔尖终于无可奈何地接触纸面，缓缓移动，留下痕迹：“赵瑞珍……”

组长这一招还真灵。俗语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无论什么内容，不论是大是小，只要一变成“材料”，装进“档案袋子”，就会随你走遍天涯海角，足够你这辈子连本带利慢慢受用的。赵瑞珍看见我动了笔，立刻哀求：“组……组长，别……别……别写，我……我干，我干。”他扶住那根粗木棒，喘着气，矮小的身体缓慢地晃动着，木棒也跟着晃动起来。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和木棒合二为一，成了木棒的一部分，在稠厚的液体中艰难地挣扎翻滚。

我不敢再看赵瑞珍的背影，那个伏在缸上搅动的背影。我把本子还给组长，那一页上只有“赵瑞珍”三个字，其余仍是一片空白，在阳光下，白得耀眼。

从那一天起，我才算真正领悟到“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这个古老比喻的真实含意：要你永远保持洁白，不要让墨点落在它上面。

经历一夜的幸苦，一群疲惫不堪的教养人员低头听训，而训话的队长却正处于早晨刚上班的精神振奋状态。他照例训人，照例分派“打扫环境卫生”的任务。过了两小时，大组长向他汇报已经打扫完毕，他却没有“照例”放我们回去睡觉，却又分配了新任务：分头搬运原料和产品。大家面面相觑，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连小组长也呆呆地站着，好像在期待他改变决定。但他却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队部。

费尔巴哈说：“茅屋中的人所想的，和宫殿中的人所想的不同。”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领导会记得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罪行”，会记得我们现在的种种劣迹，会深入分析我们的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反动心理、反动情绪以及我们之间的反动联系，但他不记得我们天天干十五个小时而只睡四小时，不记得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不记得我们也是血肉之躯而不是机

器人。记得在西郊农场下田劳动，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干部看见右派还在牵牛耕田，就大加申斥："你们咋整的，都啥时候了，还叫牛耕田？把牛累坏了咋办？就不晓得牛要休息？"然后气呼呼地把牛牵走，而右派们则留下来"夜战"。

队长走了，活儿还是得干。任务一层层分下来。分给我的是试剂瓶搬家。那是一间很大的平房，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有点儿像室内的游泳池，不过池里面　　不是碧绿的清水而是饱和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又名火碱，有极强的腐蚀性，每瓶重三公斤。我要搬的是中间的一部分。在摆满试剂瓶的平地和碱池之间，有一个光滑的斜坡，斜坡上当然不能放试剂瓶，那就是留给我的唯一通道。我把这些试剂瓶拎在手里，绕过其它试剂瓶走出门外，有人在那里转运。

我的身体已经疲倦之极，眼皮子直打架，走路偏偏倒倒，像踩在棉花上。可是看到那浮着灰白薄层的火碱液体，不由打了个冷战！这地方，多么像传说中的"化骨池"啊！如果在斜坡上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纵然不"碎骨"，也得粉身。千万注意！千万注意！心里想的，几乎要从嘴里呼喊而出，每走一步，都会冒一层虚汗，每走一步，都要搜刮身上最后的一点儿精力。握着试剂瓶颈的两只手在抖，最后危险的游戏刚一结束，我几乎瘫倒在门口了。等疲倦已极的队伍终于踏上归程时，已经中午十一点，正好和白班去挑中午饭的值日并肩而行。

上夜班的确难受，过了夜半一点钟，倦意不断袭来，时间难熬。我不断去看大钟，想知道时间。这个"大钟"，就是挂在天空的北斗七星，它围绕着微弱的北极星徐徐转动，如果把北极星作为钟面的中心，把北斗七星"底部"指向北极星的那两颗星的连接线当作"时针"，根据"时针"的方向就可以大致估计时间。当我昏沉欲睡的时候，往往会走出工棚，仰望天空，凉气袭来，神志为之一爽。浩渺的太空，何等深邃高远，又那样亲切接近。银河弥漫，星光闪烁，有的光芒四射，有的似隐似现，但好像都在轻声说笑，在低语呼唤！快来吧，快离开那个污浊拥挤、充满各种罪恶的世界！不知何时，我已经置身于群星之间，忘记了充满阴险、狠毒、残忍、冷酷、狡猾的人世。天空多么大！星星那么多！习习的凉风散发着幽香，破烂的垃圾和褴褛的人群都在黑夜中悄然逝去，只留下一片宁静。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没有了我的身体，只剩下一颗心，溶化在深蓝色的太空中。"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要是真有灵药，那该多好！如果有了后羿的灵药，我就能够白日飞升，与群星为伍，从此不会再害怕孤独和寂寞。寂寞是仙境，因为仙境需要寂寞，只有它，才能保护我孤独的心。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而又平淡，平淡而又残酷。可是平淡还是被搅动了。大组长传达队部指示：每个人都可以给在北京的家属写信，告诉他们在指定的时间接见。我的父母远在四川的一座县城里，在北京只有一个叔叔，于是我就写信给他。

这次接见，不是全厂休息，而是利用下午的学习时间。前一天队长在训话的时候就宣布了接见的注意事项：要抓紧时间，每人每次只有十五分钟，见面不许哭，不许要食品；要向亲人汇报自己的改造成绩，但不许透露这里的生活情况，谁要信口胡说，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自己负责。

到了接见时间，大家都忙碌起来：铺上的行李卷儿全都放在地上，因为铺板要抬去作为接见时隔离用的"天河"。准备接见的人纷纷换上干净的衣服。我的皮箱原来放在铺下，有一次我去上班，下了大雨，积水从外面倒灌进来，皮箱让水给泡坏了，衣服倒没有损失，我

就把所有的衣服都卷成包儿，放在铺上。接见前，我取出一件比较像样的衬衣来换上，等候队长的通知。接见分两批，我是第二批。地点在二门和砖窑之间的空地上，各队划分了区域，都支起了铺板。化工队的几个队长都在接见地点来回走动着，叫我们在木板一侧站成一排，又重申纪律："不许哭！谁哭就停止接见，回去检讨！"

一个队长领着家属排成单列从二门外走过来，在铺板搭成的"天河"另一侧停下，各自寻找亲人，互相辨认，然后面对面站好。双方都表情严肃，好像要开什么国际会议似的，几个队长在一旁踱来踱去。

叔叔很不自然，脸上虽有一丝儿笑容，但显然是勉强装出来的。我生怕自己会哭，也在竭力绷着。我想我的表情大概也很不自然。我不敢看他的脸，只好把头稍稍偏移一点儿，正好看见在他背后远处的高墙上，一个哨兵手持冲锋枪走来走去。

短暂的沉寂后，还是叔叔先开口，问了几句。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出来："这里一切都好，我身体也好，请叔叔放心。"叔叔说："本来给你带了些食品，刚才在会议室开会，你们领导说不让送吃的，说是要让你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自己，只许带盐。"我忙说："不用不用，这里的菜，盐放的不少，不用带盐。"下　　面就没有话可说了。不一会儿，我的左右两位芳邻也都没有了声音，很快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队长轻微的咳嗽声。

其实才过了几分钟，可是大家都觉得无话可说，不论是接见的还是被接见的。我有点儿着急了，几个月才见这么一次，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相见，应该抓紧时间多说几句话，可就是想不起该说点儿什么。这绝不是作家们常写的"千言万语在　　心头，不知从何说起"，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像笨学生写作文似的，搜索枯肠也只有把已经说过的"你身体好吧，都要保重身体"再说一遍。

终于有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大家的眼光都转过去，落在一对母子身上。儿子哭声断断续续，明显是在竭力抑制。母亲用手绢儿给儿子擦眼泪，还小声地劝慰，可她自己也在掉泪。在一旁冷眼观察的队长立刻走过来，压低声音喝问："哭什么？你哭什么？"队长声音不大，可是立刻使母子俩的感情服从于理智，哭声一下子停住了。

十五分钟还没有到！又沉默了一阵，还是我先开口："叔叔，你回去吧，以后不用来了。"叔叔迟疑了一下，慢慢儿转身走了。他是一个中型企业的厂长，也算得上是一个中级干部。我望着他略带弯曲的背影逐渐变小，变小，最后隐没在哨兵守卫森严的二门外。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接见家属，不许送吃的，而伙房提供的食品却越来越差，窝头里的玉米面越来越少，麦麸子却越来越多。蒸出来的窝头大体上有个形状，用手却抓不起来，一抓就成粉末。有勺子的人，能用勺子舀着吃，而我的小勺子在进学习组的时候就被当作"自杀利器"给没收了，想买也买不到。这里买东西是按月登记，先公布购货单子，上面写着可购货物的品名和价格，想买什么，在小组长那儿登记，钱从每个人的账上扣除。我干了几个月，还没有领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上所说的工资，带来的几块钱居然没花掉。因为可购买的物品除了邮票、信封、信纸以外，只有黑鞋带、黄鞋带，蛤蜊油等寥寥几种。一般的日用品像毛巾、肥皂、鞋袜、牙膏、牙刷、针线、手帕之类一概没有，碗筷也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两根树枝当做筷子，可以用来刮糊糊和夹菜，至于吃窝头，就只能用双手捧着啃了。

有一阵，突然松软散沙的麦麸子窝头不见了，代之以异常坚硬的多穗儿高粱面窝头。这种紫黑色的食品吃起来固然“筋道”，吃下去也“耐饿”，但是却拉不出大便来。人们在露天的厕所里一蹲至少二十分钟还不能解决问题。大小组长倒不过问，因为他们吃的也一样，队长前来督促也无济于事。厕所里臭哄哄的，谁愿意在那里面蹲着呢，可是肚子却胀痛难忍，又不能不吃饭，结果憋得脸红筋胀，好容易拉出些坚硬的黑色小颗粒来，还不得不以肛门流血为代价。弄急了，人们都盼望泻肚子，但是医务室不开泻药，只好自己想土办法。好在化工队烧开水方便，用于生产降温的冰块也很多，有人就试着先喝滚开水，接着吃冰块，希望人工制造拉稀。说来也怪，不管你喝多少开水再吃多少冰块，鼓胀的肚子偏不拉稀。把顺序倒过来再试试，先吃冰块后喝开水也不行，最后改吃一口冰块喝一口水也还是无济于事，仍要长时间地蹲厕所。气得队长每次集合训话都要斥责一番：“一蹲就是半天，逃避劳动，什么拉不出屎，哪儿来那么多的毛病！”

麦麸也好，多穗儿高粱也好，质量虽然差，数量却不受限制。由于主食粗糙难咽，菜里没有油水，化工厂气味又大，熏得人头昏脑胀，弄得人人食欲不振。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睡眠严重不足。尽管身体日见消瘦，却吃不下多少东西。所以当时因全国性的天灾人祸、粮食减产而在劳动教养所实行的粮食定量制，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感到严重恐慌。但是所长对此倒很重视，专门开了大会。他在会上先说：“目前的形势，是大好的。”然后话题一转，由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所以要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全国都一样，“中央决定：在农村，丰收地区每人吃三百二十斤原粮，一般地区吃三百斤原粮，灾区吃二百八十斤原粮，不够吃就搞瓜菜代，六斤白菜可以当一斤粮食。”又说：“我们北苑早有准备，前一段时间我们向　　团河农场借了一块地种大白菜，成本高着呢。每个队都抽人去种，每天都用大客车接送，算下来，光是汽油费，这一斤白菜就值十几块钱。“最后所长说：”我们不是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全国六亿人，靠你们几个能节约多少？“　　七月八日这一天，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早饭时一个人发给六个小窝头，中午也发六个，仍然是麦麸子窝头，不过没有以前的大。以前吃两三个就够了的人，现在吃六个倒也勉强够了；只有少数几个人似乎吃不饱。可是晚饭却令人目瞪口呆，连麦麸面的小窝头也没有了，一人只发三勺麦麸面糊糊，说它稀得能照见人影远不足以形容。实事求事地说，它像比较稠一点儿的刷锅水。大组长尹子仑这时候特地来“看望”大家，他传达了队部的说明：“晚上反正不干活儿，吃那么多干什么？”

这一夜，饥肠辘辘，难以入眠。不过想到明天早上还可以吃饱，心里还有点儿安慰。第二天早饭，定量突然降为五个窝头，加上头天晚上的欠缺，肚子开始感受到威胁。晚上学习，就是讨论粮食定量问题。小组长首先发言，他完全不提“自然灾害”、“全国都实行定量”一类的话，却大谈以往浪费粮食严重，窝头扔得满地都是，结论是实行定量太应该了，早该这么着了。几个老号也纷纷发言，唱的当然是一个调子，好像实行粮食定量全是劳教人员浪费窝头招出来的。弄得我都不好发言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扔过窝头。

粮食定量降下来了，可是生产定额还得上去。队长号召大干快干，把外面已经不大提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又搬了出来。队长所说的“大干”，倒不是指晚下班、加夜班之类。因为不论白班夜班，正班就得干十二个小时，加上两三个小时搞环境卫生或卸车，还有一个半小时的值班和两个小时的学习，可以挤占的时间早已挤占完，实在也炸不出什么油水了。

问题出在化验室，他们根据书本上的规定，制定了许多操作规程，被队长们看成是“清

规戒律”，早就不想遵守了。例如有一段时间我借调到硝化组，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把容积五千毫升或一万毫升的大烧瓶放在盛有冰块的搪瓷桶里，烧瓶内是反应液体，用分液漏斗向瓶内滴加浓硝酸。化验室规定，必须把温度控制在五摄氏度到零摄氏度之内。每加一滴硝酸，温度就会骤然升到四至五摄氏度，须要慢慢搅拌，在冰块作用下降到零摄氏度以后才能再加硝酸。根据这样的操作规程，往往要一分钟才能加一滴硝酸。这在队长们看来，简直是典型的“少慢差费”，与“多快好省”大唱反调。设计这种操作规程的人，岂不是故意教唆人们磨洋工？于是断然下令加快反应速度。化验室的张世敏、姚天白也是劳教人员，当然不敢说什么。从此操作人员只好提心吊胆又小心翼翼地加快滴加的速度。头一班下来，产量有些增加，居然也没有出什么问题。队长训话，就以此为证，痛斥“违反操作规程就要出安全事故”的“反动谬论”，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大干快上。

这一下可苦了我。因为我是专门负责给几个人供应原料的。速度加快，所用原料增加，我就被搞得手忙脚乱。供料这活儿，说起来挺简单，就是把浓硝酸从坛子里倒入量杯中。坛子上的塞子一打开，一股棕黄色的烟雾弥漫开来，脸上顿时感到微微刺痛，强烈的带刺激的气味还呛得人直咳嗽，周围什么也看不清。往日要等烟雾散尽了才能倾倒，但现在还那样做可就供应不上了，只好略等一下就倾倒。一坛硝酸净重二十五公斤，要用左手托住坛底把它举起来。手一接触坛壁，就火辣辣地痛，原来坛子外面到处都沾上了酸，岂有不“咬手”之理？可是这里是从来没有胶皮手套这玩意儿的，万般无奈，只好自己找些旧麻袋片儿之类包一包手。但是旧麻袋片儿也不是那么好找，找的时间略长，就得挨组长的骂，说我耽误了生产。麻袋片儿今天用过了，下班不能带走，只能藏起来。而下一班又不知道会被谁拿去，第二天还得重找。好容易在组长的叫骂声中找到了，包好手，战战兢兢地举起坛子，在烟雾中估摸着量杯所在之处往下倾倒，随着酸液的涌出，酸雾大量弥漫，一不留神，脚背一阵剧痛，我只知道自己受伤了，却不知道是酸雾的刺激还是酸液溅到了脚背上，也不知道硝酸倒够了没有——倒多了会溢出来，倒少了还得再倒。就这样忍住脚上的伤痛干到中午，趁午饭后有片刻休息的机会去医务室看伤。医生只给我贴药膏裹纱布，只字不提工伤需要休息。这也不能怪同为劳教人员的医生。这里人人都要接触酸雾碱水或怪味儿毒气，除了大小组长，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着些伤。所以极少有因工伤而休息的，除非像下文所说的韩某。

正当队长为几天来生产不断升高感到满意的时候，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故发生了。

那天，我正在倒酸，忽然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接着是连声惨叫。许多人都跑到出事地点去看。我不忍见那血淋淋的场面，没有去。看了的人回来说，一个姓韩的人滴了一滴酸下去，正当他低头注视反应情况，突然发生爆炸。浓硝酸溅了他满脸，有些酸液一直飞越头顶落到后颈上，连他旁边的人也受了轻伤。

后来才知道，这个姓韩的，本是航空学院四年级的高才生，而且少年英俊，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不幸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监督劳动处分，偏又不安生，翻译了一些文章四处投稿，终于在五九年“荣升”；更不幸的是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以后，因表现积极，被化工队“优先录用”，方才有此一难。由于他的伤势十分严重，总算破例地得到工伤休息的特别优待。他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清楚。过了七年，我才有机会在团河农场看见他，已经成了一名就业人员，满脸的伤疤，给他带来了“宋丹萍”的绰号，这恐怕将伴随他终生了。

我虽然没有成了“宋丹萍”，但我两只脚受的伤，面积也相当大。从脚背到脚腕，布满了浓酸和火碱造成的伤痕，脚肿得很大，又缠满了纱布，根本穿不上鞋，只能光着脚行走。

但没有鞋面保护，到处是酸碱，脚更容易受伤。于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疼痛难当。坐着或刚睡醒还好些，一走路或站立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每天出工，走到工棚，忍到听完训话就再也忍不住了，只能坐在地上，想稍稍休息一下，可是小组长非叫马上点火不可。我管理四个大烧瓶，是上一班留下来的，必须依次打开煤气开关点火。这在平日并非难事，但是我受伤的肿脚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每走一步就像几万根钢针在扎！我只有跪在地上，用小腿和膝盖支持全身的重量，慢慢儿爬过去点燃煤气。这一天如果没有受到新的伤害，收工时疼痛稍稍减轻，才能勉强咬牙走回去。有一次在打扫环境卫生的时候在垃圾堆上发现小半只旧麻袋，如获至宝，赶紧撕开，把两只脚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有了这层保护，双脚不再受到新的伤害，疼痛才逐渐减轻了些。

好景不长，这段时间正在开展运动，目标是种种盗窃公物的行为。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扔在垃圾堆里的破麻袋片仍是“公物”，连大组长、小组长也对此熟视无睹。可是却没有逃过队长锐利的眼睛。集合训话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双脚，更准确地说：是注意到那两只用“公家财物”做成的“麻布鞋”。他叫我出列，还让我转过身去面对全队百十号劳教人员，按照这里的说法，这是给我“照相”了。

“把麻袋给我解下来!”队长下达命令，声音低沉而威严。

几秒钟的沉默比几小时还长！我看清了队长的表情神态：那是阔老爷对伸手的乞丐的鄙夷？是债主向穷人逼债时的凶狠？他是否估计到我会哀求他，向他诉说伤痛？　　五七年，我就已经从人格的第一道防线上溃退，然后是一溃千里。我的灵魂已经向强权下跪。现在是人格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再后退一步，我就会从“人”的行列中退出，成为一个只知道求生的动物。如果我曾原谅自己五七年可耻的软弱，那么这一次还能原谅自己吗？　　我弯下腰，解下了麻袋片。从队列回归的路上有一片浅浅的洼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碱水。刚才我是穿着“鞋”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感觉。现在那一片减水就在我布满伤痕的肿脚前面。

咬紧牙关！挺直腰！我从容地、缓缓地走过减水，竟不觉得痛，只听见心在有力地跳动。收工的队伍有气无力地移动着，和往日一样沉寂。我眼前有时浮现出队长的脸，有时又出现苏联电影《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里诗人在坟地上插杨树枝的镜头。它们交替地在我面前出现，似乎在给我引路。我又想起反右中不知是谁的批判发言，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是不同的阶级”这句话。

第三章 饥火炼狱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表现不好的“反改造分子”，少数直接进了禁闭室，享受那每天六小两定量的特殊待遇，大多数不断地打回学习队。据大小组长说，这些被“打”回去的人，大都进了严管组。那是一座通向劳教分子谈虎色变的兴凯湖的桥梁。到了九月份，又成立了车间学习组，表现不好的人，先集中到这里交待问题，再定取舍。首批组员有十几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自己并不认为我是“反改造分子”，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学习组有一个组长，两个值班员。白天我们和上白班的人一起到工棚，但不干活儿，而

是找间空房子或空地，坐在地上学习。粮食定量大为减少，鸡蛋大的麸子面窝头，早上、中午都只有两个，晚上则同样喝三碗“刷锅水”。对此组长传达了队部的指示：“你们不劳动，吃三分之一定量就行了。”这理由似乎和上班的人晚上不干活儿晚饭就应该少吃的理由相似，不过管理车间学习组也算是“劳动”，所以组长和值班员的粮食定量并不变。

学习内容是“老三篇”，——不是“文革”中家喻户晓的“老三篇”，而是在初入所时学过的那三篇文件。值班员读完之后，组长指定我第一个交待问题。进了车间学习组，我自然知道事情不妙，可是仍然不知道原因也想不出办法，只能任其摆布，听其宰割。此刻既被点名，也只得站起来接受批判，连个借鉴的榜样也没有。

组长说：“马上交待你的问题!”

我说：“让我想一想，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问题。”

组长一声冷笑：“没有问题会把你弄到学习组来？”

一个值班员说：“队部早就掌握你的情况了，现在给你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

还有一个姓李的值班员说了些威胁的话，最后两句是：“法律是一把刀，谁碰上了谁倒楣!”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有什么“问题”被领导发现了？难道我有什么反动言论被人家听见了？这几个月来,我可没有和谁说过什么呀!是违反纪律吗？不论上夜班还是在砖窑值班，我都没有偷着打盹儿，至于上班时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既没有干过“私活儿”，生产上也没有出过事故，那么，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经验告诉我：“自己认为没有问题”和“队部认为你没有问题”这二者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那么，队部会认为我有什么“问题”呢？　　组长见我不说话，就对其他组员进行动员：“别看他一天到晚不说话，耷拉个脑袋想心事，其实他脑子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多得很!”

组长的话倒对我有些启发。听他的口气，似乎并没有人捏造我的什么“反动言论”向队部打小报告。可是我“一天到晚不说话”，却是严格按照队部的指示办的呀。队长不是多次宣布不准唱歌、不准聊天吗？尹子仑就常说：“有的人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毫无沉痛悔改的心情，不像个认罪的样子；有的人不言不语愁眉苦脸，这是对政府、对改造有抵触情绪。”这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按照他的说法，我当然属于后一种人无疑，可这又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是否要我主动暴露反动思想呢？我还未理出个头绪来，组长和值班员又一个劲儿地催逼了。

火烧眼睫毛！我沉吟着开始交待：“嗯，这个，劳教以后，这个，我，这个，对前途很悲观……”我一边说一边观颜察色，看清了组长的表情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这次投石问路算是问对了，我小心翼翼地选择用词，既要说明我确实有悲观情绪，又要不让人家抓住“对政府不满”的小辫子。

几分钟后，组长不时插话了：“你要深挖思想根源!”“你这就是一种反动情绪!”肃反运动中我学习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毛泽东写的按语，按语里就有一个名词叫“反

革命情绪”。这顶帽子对现在的我可以说正合适，没有反革命历史，没有反革命活动，没有反革命言论，难道就没有“反革命情绪”？我平日不说话，不像有些人整天吃了枪药似的，把所受大小组长的气都发泄在其他组员的身上，小组会上又从不发言，背后也不向小组长、大组长汇报检举别人，这不是“反革命情绪”是什么？难怪队长要怀疑我，把我送进学习组来了。

在这个环境里，不许唱歌、不许聊天、不许哭、不许笑、不许高兴，甚至不许沉默，似乎叫人“哭笑不得”，但并非“无所适从”。小组长和几个想当小组长的“极级分子”就是榜样：见了大组长、队长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见了其他组员，则恶声恶气，横眉竖眼，这才符合“相互之间只有监督关系”的改造准则，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在特殊环境下的具体运用。

下午我就停止口头检讨，改为写书面交待材料，不参加小组会。交待的主角换了一个天津人。他爱和一个同乡聊天，现在轮到他来交待他们之间那“不可告人”的关系了。

写认罪材料和悔过书对于我按说不应该成为难事。从五七年开始，我已经写了三年。一共写了多少次，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每一次写那些侮辱自己的文字，还是比看别人写的批判大字报要难受得多。那种痛苦的心情，我有一个自以为比较适宜的比喻，我现在把它写出来。曾经写过各种认罪材料的朋友们，如果你当时并非这种心情，请不要见怪。

一个珍惜贞操的女性，如果不幸因某种原故落入妓院或流氓手中，第一次受到蹂躏后，必定是痛不欲生。如果她又因为某些原故包括贪生怕死在内而没有自尽，以后又接着被蹂躏，她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从来没有一个女性描写过这种自己被人蹂躏的心情，就是这种心情极为惨痛没有人愿意回忆它的证明。也许她以后逐渐麻木，反正已失贞操，只好就这么将就着过这种难堪的生活。但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那种埋怨自己为何没有早下决心以自尽保贞操的悔恨，其痛苦程度也不在初次受辱之下。

一切都晚了，身心都打上了耻辱的烙印，每受辱一次，那烙印就加深一次！

被迫写认罪材料，就有点儿类似这种情况，不同的不过那是肉体被强奸而这是灵魂被强奸罢了。经常写这类材料，也就是经常被强奸。我在这样的心情下写了一天，把“材料”交给组长。组长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字迹，好像在欣赏妓女的裸体，露出满意的笑容。那笑容就是嫖客赏给妓女的缠头！

交了认罪材料并没有叫我立刻回生产组，还得“观察”一段时期。本来呆在学习组是件很划算的事：第一，只在白天学习，不上夜班，晚上睡觉也不起来值班，基本上能睡八个小时。第二，脚不踩碱水，手不沾浓酸，我的两脚已经慢慢消肿，能穿上鞋子了。只有一样受不了，就是肚子饿。

许多人都有晚两小时吃饭或少吃一顿饭的经历，常用“前肚皮贴了后脊梁”、“肚子咕咕直叫”、“饥肠辘辘，腹如雷鸣”之类的话来形容。对于农民和六零年的中国居民来说，长期挨饿也是司空见惯。但我还要说，长期挨饿的滋味是很难受的。连续的饥饿，在头一天饥饿的基础上加上新的饥饿，像欠债者加新债，而欠肚子的债绝不会有“债多了不愁”的感受。挨饿是绝对养不成习惯的，肚子里始终燃烧着熊熊不熄的饥饿之火，它吞噬肠胃和五胀六腑。

每顿饭咽下的两个鸡蛋大的麦麸面窝头，根本无济于事，倒像火上浇油，它强烈地刺激食欲，使饥饿之火烧得更旺。边吃边饿，吃了还饿，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不论听别人交待也好，听组长值班批判也好，还是上炕睡那睡不着的觉也好，其实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听，只有一个声音不断地重复着：我饿！我饿！我饿！

怪不得劳教人员最怕关禁闭吃六小两，怕去那个“圆乎脸进去长乎脸出来”的地方！这里队长很少用判刑来吓唬劳教人员，要知道我们曾和正式判刑的劳改犯在同一道大墙电网下劳动过一段时间，知道劳改在某些方面比劳教要“舒服”得多。只有用饥饿才能吓住这些劳教人员，让他们听管服教。从本质上说，只有饥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利剑！

第四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过了国庆节，我又回到了生产组。对于国庆，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无非就是吃了点儿好吃的。我记得中午是三个白面包子，馅儿里有些鸡蛋。另外学习改为听广播，如此而已，还不如过五一节吃白面馒头，菜里还有点儿油水。虽说干活儿，却吃得很饱。其实在劳教所过节完全不能和农村相比。农村的“过节意识”要比城里强些。后来我还在劳教收容所过了元旦、春节，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粗粮换成细粮，还是吃不饱，如此而已。

回到生产组以后，饥饿感并未消失，肚子成了无底洞。窝头里的麦麸在减少，但是窝头的体积也相应地缩小了。最后换成了纯玉米面窝头，小流氓背地里管它叫“牛眼窝头”，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指望靠它恢复体力是不可能的。记得初到直火组，我和别人能抬起一桶净重三百市斤的苯胺来，加上木棒、铁链儿和铁桶本身的重量，差不多有四百斤，但现在连端一个装满液体的一万毫升烧瓶，都晃晃悠悠的，其实也就二十多斤。无怪乎组长经常骂我：“瞧你那副德性！”无怪乎开小组会，我总是作为“消极混泡”的典型而受到批判。

入秋后天气渐凉，分到化工队的新号越来越多，如果继续实行两班制，根本就睡不下，于是改为三班倒，每班八小时。车间学习组在我走后不久就解散，多数人去了学习队，大约因为只吃两个“牛眼”，怕要饿死人的缘故。生产组是早饭五个“牛眼”，午饭六个“牛眼”，晚饭还是三碗“刷锅水”，吃饭纪律却大为增强。以前从小组长手里接过窝头，随便到哪里去吃都行。现在规定必须以小组为单位，在一大片空地上围成一圈儿，不许靠墙倚坐，离墙至少得一米远。白天尚可，夜晚可就惨了，装“刷锅水”的大木桶刚抬回来的时候还冒热气，分到小组的铁桶里已经凉了，再分到组员们的碗里，冷风一吹，变得和夏天的冷饮差不多。再坐在风地里喝完，肠胃仿佛都冻结了。

天气越来越冷，砖窑里不生火，洗脸毛巾冻成了冰棒，墙上结一层似霜似雪的东西，看着都不寒而栗。睡觉的时候不脱衣服就钻进被窝儿里。由于衣服上带有酸雾，没有多久，连被子上都有了小洞和棕黄色的腐蚀痕迹。虽然和衣而卧，全身一夜不会暖和，上身有双臂护在胸前还稍为好些，两腿却一直是僵硬麻木的。父母来信说想给我做一条棉裤，但缺乏布票——当时四川每人每年只发一尺八寸布票。我想起我还有几尺布票在裤子的小口袋里，打算寄去。一摸口袋，糟了，不知何时布票已经不见踪影，方知曹建纯组长说的“小偷儿猖獗”所言非虚，只好硬着头皮回信说我没有布票。家里不知如何东拼西凑，等到做好棉裤寄来，

已是十二月，穿上才几天，就腐蚀得千创百孔。有一次上夜班，往火炉里加煤，谁知这种煤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爆煤”，加进炉膛里就噼哩啪啦一连串小型爆炸，炸完了炉火也熄灭了，碎煤末塞满了炉膛。在组长的责骂声中，我掏出煤末，用刨花劈柴重新生火，红亮的火苗蹿出炉口，在这寒冷的夜晚十分逗人喜爱。我被它吸引，情不自禁地弯下了腰享受温暖。由于棉裤外面早已破烂，棉花伸出老长，一遇火苗立刻燃烧起来。转眼间火势迅速蔓延，整个棉裤都是火，脱都来不及，四周又无水，只有面前一条排放废酸废碱的污水沟，里面有一尺深的废液在慢慢流动。如今虽然不是“火烧眉毛”，也已经是“火烧裤裆”，我顾不得腐蚀，赶紧跳下去撩起废液来浇灭了火焰。从沟里上来，棉裤已经全部烧焦，不能再穿，连里面的棉毛裤也有些地方烧烂了。脱去棉裤，觉得大腿根儿隐隐作痛，原来那里也被烧伤了，有颇大一片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烧伤的痛楚和酸碱腐蚀的痛楚还是小事，难熬的是：刺骨的寒风立刻穿透破烂的棉毛裤，向下肢发起攻击。我冻得打战！向组长求情，请他向队长报告一声，给我发一条棉裤，组长却要我和他一路回砖窑。

我猜错或说误解了组长的用意，以为他叫我先在被窝儿里躺下挡一挡寒气，等候他上队部申请棉裤。一路上我走得飞快——不快也不行，冷得实在受不了，连伤痛都不觉得了。

进了窑洞，组长叫我打开包袱，他翻了一遍，找出一条绒裤来叫我穿上，没再提申请棉裤的事儿。但是大冬天的，只穿一条棉毛裤、一条绒裤，仍冷得我瑟瑟发抖。从那以后，我一空闲就得往火炉跟前凑，惹得组长和“极级分子”们不断责骂：“至于那么冷吗？”“瞧那份德性！”我不敢分辩，只能在饥寒交迫中忍受煎熬。

在这里，由于各人的“家底子”有厚薄，带来的衣服有多少，所以冷暖的程度并不一样；但是吃饭的定量基本相同，所以饥饿却是公平的，只是没有谁敢公开说“吃不饱，肚子饿”而已。饥饿的客观存在，迫使人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以求一饱。可是工棚周围寸草不生，农民度荒的宝贵经验如吃糠、吃野菜，乃至吃树皮草根等等，在这里全然用不上。于是有人就在给家中写信的时候用巧妙的手法暗示要求寄些食品来或接见的时候夹带些食品。但接见一事自从上次举行一次以后再也不举行了。寄食品的人倒不少，有外地寄来的，也有北京城里寄来的。队长对此极为恼火。每次集合训话必大加申斥：“这是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愿意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是丑化改造场所，诬蔑政府的改造政策！”对于这些寄来的食物，队部的对策是一律退回去，并要劳教人员给家里写信，说这里生活条件很好，政府照顾得很周到，家中不必担心等等。但是“狡猾的”家属们根本不听，改为在寄来的衣物中夹带食品如水果糖、小点心之类。这可难坏了队长们：包裹单上写的是衣服，不好原封退回，打开包裹检查出夹带的食品，还得把食品取出，另外包成小包裹，由队部出钱再寄回。队部哪里会干这种傻事！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队部很快改变了对策：把食品扔到厕所里，看你以后还寄不寄！

为了避免有私吞之嫌，更为了使劳教人员看清所夹带的食品的下场，使他们知道此路不通，开始时是由队长带着包裹的收件人一起上厕所，队长扔，劳教人员在一旁看着。不久又改为命令劳教人员自己扔。据他们后来的回忆：下跪求情者有之，哭泣哀求者也有之，那心情似乎和母亲被亲生儿女往火坑里推差不多。当然哭哭啼啼这一套在专政机关是无济于事的，队长们早就炼就了一副无产阶级的铁石心肠，是绝对不会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毒的。后来这件事又改为由大组长代办。原来的大组长尹子仑已继信天太之后解除劳动教养成为就业人员了。新来的大组长姓范，是个转业军人。据他说，队长把一包包的水果糖交给他让他去扔，他每样都检出几块来“尝尝”，其余的都让它们与粪尿为伍了。

寄食品的路子断了，劳教分子们又打开了食盐的主意。自从鸡蛋大的窝头变成“牛眼”以后，菜里就基本上不放盐了，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浮肿。我倒没有什么，反正就那么一小撮干白菜，有盐无盐都吃得下，可是有许多组员却开始偷盐。趁人不备拌在白菜里，用开水一冲就是一大碗“有滋有味”的白菜汤，喝下去肚子可以胀饱一时。化工队并不缺盐，降温冷却这道工序就需要大批的工业用盐。于是它就成了劳教分子们的主要偷窃目标。尽管工业用盐是由小组长从仓库里领回来并亲自保管的，他垄断了这道工序的操作，却照样有“能人”偷得到手。因为装盐的麻袋上写的不是中文名称，而是“氯化钠”的化学式 nacl，上过中学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食盐，苦只苦了文盲和半文盲。谁说读书没有用？就是做贼，也要有点儿文化，不读书，你怎么知道哪袋能偷哪袋不能偷？　　直火组又来了一批新号，由于不准交谈，我连名字也搞不清楚。那时候天气特别冷，队长已经恩准允许教养分子以小组为单位围坐在一起吃饭。大家靠墙而坐细细品尝两个“牛眼”之际，我身边有一个新号以极快的速度从怀里掏出几粒不知什么东西向碗里一撒。我见状急忙转过脸去，他收到我发出的安全信号以后，就舀了满满一碗开水，安然自得地喝起菜汤来。

饭后向例都不说话，抓紧时间闭目养神。哨声一响，在组长的催促下，组员只好慢吞吞地站起来向工棚走去。只有这个人却依然不动，是没有听见？是懒得动？还是新号不懂规矩？出于让他多休息一会儿的愿望，并没有人喊他。

进入工棚，事情不多，两条冻僵的腿又引导我往火炉前凑。组长看见我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就有气，又发现那个人还没有来，就叫我去喊他。我虽舍不得火，也只得奉命前往。进屋一看，他还在倚墙合目而睡，喊他也没有反应。我直觉到事情不妙，急忙上前推他，他还是不理睬。——仔细一看，原来他已经带着喝饱了菜汤的满足神情告别了人间！他的表情安静而祥和，完全不带痛苦的痕迹。像现在小说或电视剧中所描写的那样。

后来查明，他吃的不是食盐而是亚硝酸钠，化学式为 nano2 ，也是白色结晶。据说尝起来也有点儿咸味！

天气越来越冷，高高的围墙完全挡不住刺骨的寒流，几个“牛眼”发出的热量很快就在寒冷的海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牙齿打战，全身缩成一团。尤其是上夜班的时候，穿着薄薄的棉毛裤和绒裤的腿，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不断地瑟瑟发抖。尽管除了三碗“刷锅水”以外我从不喝水，解小便的次数和数量却多得出奇。因为食物所提供的热量根本不足以应付维持身体生存的最低要求，更不必说劳动的消耗，身体只好自动分解皮下脂肪产生热量以供急需，也就是说每一次小便排泄的不仅是新陈代谢的废物，其中还有我身体的一部分。小便不仅次数多而且根本就忍不住，以至有一次队长集合训话的时间稍长了一点儿，我竟尿在裤子里！

离元旦不久，大约是圣诞节刚过吧，组长叫我去搓煤球，就是把散煤末加水和好，像南方人捏汤圆似的把它用手捏成圆球。布满伤痕的手在冷水中一浸，冻得红紫。趁无人之际我停下来搓手取暖，来回走动，发现工棚角落有一台磅称，就想称称体重，看看到底掉了多少斤肉。以往我也常常称体重，夏天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去称，最少是一百二十一市斤；冬天“全副武装”，则有一百三十九市斤。每次称体重，我先放一个一百斤的秤砣，人再往磅秤上一站，秤臂就高高翘起，然后移动游码使它平衡。这次我仍然先放秤砣，然而我站上了磅秤，秤臂仍然无力地低垂着，好像在为我的瘦弱叹息。这就是说：连同棉衣、绒裤、棉鞋、棉帽

在内，我还不足一百市斤！到底体重多少，我也无心再称量了，无情的数字使我寒透了心！

快到年终，学习抓得特别紧，也就是说，快要“算总账”了。表现好坏得有个结果。小组会上，主要批判消极混泡现象，爱往火炉前凑的我，自然又是主角。责难、斥骂、挖苦之后，组长又勒令我表态。我还能说什么呢？天气越来越冷，肚子越来越饿，衣服越来越破，身体越来越瘦，小便越来越频，训斥责骂也越来越多，伤口又不见好，我已经面临绝境，再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难道真的要束手待毙吗？我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不行了，我……我情愿回学习队。”说完我的眼泪就往下掉。是悲伤？是悔恨？是乞求怜悯？我也说不清楚。“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根本就算不上男儿。我的意志已经随着我的身体一齐垮了。在一群麻木不仁的陌生人面前，我暴露出性格中软弱的一环。人生在世是不能没有遗憾的，这次掉泪，也就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组长和极级分子们都愣住了。我的眼泪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记得小组会是如何收场的，似乎他们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我的心情倒平静了许多，回学习队就回学习队，进严管组就进严管组，八个月的改造白费就白费，保住了性命再说。只要不受酸碱侵蚀，不上夜班挨冻，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吧！化工队先后已经走了不少人，虽然不知道他们去向如何，反正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元旦前一天，果然奖罚兑现，开大会宣布。受奖的人主要是几个大组长，他们大都解除了教养。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伙房的组长，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满面红光。看到他站在台上听到宣布减刑提前释放时的表情，我简直恨得牙根儿痒痒。受惩的人中，有车间学习组那个姓李的值班员。他回到车间以后，因为“破坏生产”而关禁闭，这次宣布逮捕了他。他说过“法律是一把刀，谁碰到谁倒楣。这一回算是他碰到法律这把刀上了。

第五章 再进学习组

元旦一过，我又回到了学习队。转了一个圈儿回来，学习队的情况已经大变。收容所的学习组本来一共三个，分别由曹建纯、石盘和顾绍雄当组长。他们三个据说都是右派：石盘本是陆定一的秘书，教养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顾绍雄是商业部部长助理。学习组实际上并没有独立成队，附属于化工队，后来人数渐多，才独立成队的。大约就是我进车间学习组那时候的事儿。我原来在七组，七组原来的组长曹建纯因为“好男风”的恶习不改，又一次出了事儿：他在学习组里，居然还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值班员发泄他的兽欲。也许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有意提拔这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儿当值班员的。事发后看在他是老干部的份儿上没有给他处分，但是他失去了回国家体委工作的机会，只能当一名留场就业人员了。想起我珍爱的好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被这样一个老流氓看过，心里又添了一份恶心。

附设在七组的严管组早就被取消了，最后一批严管组员也去了那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兴凯湖。在化工队经常听到说：某人因表现不好而打入严管组的消息，其实这都是大小组长故意放的风，实际上多数人是直接分到别的工厂或农场去了，还有少数人留在学习队听候分配。另外又成立了许多新的学习组，每组都有几十号乃至上百号人不等。由于人数众多，废砖窑装不下，就在砖窑旁边的空地上支起棉布帐篷作为栖息之地，称为一号篷、二号篷等等。还

成立了轻病号组、重病号组以及专门收留濒危病人的隔离室。我因为有外伤，被分到了轻病号组，住在砖窑内。因为是病号，纪律方面要求不太严格，吃饭前后的空闲时间，互相聊几句，值班员是不大管的。于是有一个病号就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的历史和现状。他也是化工队下来的，但我原来并不认识他。关于曹建纯的事儿，就是他跟我说的。此外，他还讲了现任病号组组长桂海源的一件故事。

这个组原来有个吴仁宜，以前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也就是新都暖气机械厂翻砂车间改造。他是个专门抬铁水包的棒小伙子，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病号组每天上下午各放一次风，出去到空地上坐着晒太阳捉虱子。有一次，这个吴仁宜无论如何动员硬是不肯出去，组长桂海源也无可奈何，就派一个值班员看着他，自己和其他值班员带着全组出去放风。

放风的人刚走，原来坐在木板铺上的吴仁宜“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看守他的值班员吃了一惊，连忙喝问：“你要干什么？”吴仁宜一只手抄起一只大号粗瓷碗，恶狠狠地说：“不许喊！喊就抠（kei ）你丫汀的！”他一面喊，一面用另一只手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条布口袋。口袋的主人是个哑巴，里面装着哑巴的命根子——家里送来的二斤点心（当时的规定：轻病号可以收家属送来的少量食品）。吴仁宜吃着点心，手里依旧托着那只大号粗瓷碗，两眼瞪着值班员，随时准备向扑过来的值班员迎头砸去。值班员被他的凶相镇住了，不敢过去，就想转身逃出去搬救兵。吴仁宜又喊：“不许动！动就打你丫汀的！”值班员动弹不得，只好呆在原地看着吴仁宜像饿狼似的大口大口地吞吃点心。偏偏那天天气好，放风时间也就长了些，等放风的大批人马回来走到门口，吴仁宜已经把两斤点心吃得差不多了。走在前面的值班员和轻病号看见吴仁宜高举大瓷碗瞪着眼睛吃点心的凶狠样子，一时都呆住了。桂海源闻讯赶来，从小平房里取出一条棉被挡在前面，叫众人闪开，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去。吴仁宜猝不及防，大瓷碗还未出手，桂海源及棉被已经扑到，趁势把吴仁宜按倒，值班员们一拥而上，把这头饿狼揍了一顿，送往队部。

哑巴回屋，布口袋里的点心已经荡然无存。哑巴又说不出话，捶胸顿足地揪着桂组长的衣服哇哇直哭，哭得叫人撕心裂肺，但也无可奈何了。后来我在伙房窗口前见过吴仁宜，他一个人由值班员带着打饭。他把碗递进窗口，用柔和得像儿童似的声音说：“打饭，多打点儿。”炊事员接过碗去，也像哄孩子似地说：“好，好，多多地打。”

桂组长办事倒很公平，每天伙房都给轻病号组发少量的机动窝头，他就轮流发给病号们吃，我就吃过两次。他还处分了一个贪污窝头的值班员，撤了他的值班职务。这个贪小便宜的人最后去了兴凯湖。发完窝头，最后总会在桶底剩下一些窝头渣子，他就叫值班员把窝头渣子掏干净，揉碎后放到开水桶里，饭后在发开水的时候用勺子搅几下，然后一人发一勺水。我基本上不喝水，这是五八年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锻炼出来的。那时候正是夏天，我们在农田里大干，农场是从来不送水的，所以我已经养成了“耐渴”的习惯。但是这里有些人争水争得厉害。有一次发开水，最后几个人没有得到，一个头上总是缠着旧毛巾的病号就咕咕哝哝地说：“好、好，下次多给你一勺补上。”

轻病号组的粮食定量和学习组一样，早上三个窝头，比牛眼稍大，和鸡蛋差不多，是纯玉米面做的。中午四个，晚上三碗玉米面粥，也比“刷锅水”稠，一般组员称之为“米汤”，其实并无米。据这里的老号估计，一个窝头有八钱粮食（新秤），一碗粥有五钱粮食，算起来一个月有二十三斤，比化工队的二十五斤低不了多少。但是不干活儿，也不上夜班挨冻，体力消耗较少。虽说肚子仍觉得饿，其程度却比在生产组轻，晚上躺下还能睡着，但早上醒

得很早，人人睁着眼睛默默地等待早饭的到来。

桂海源注意到我身上有伤，就叫值班员带我到医务室去看病。医生叫我把双手伸出来，看见手背上起了一层黑皮，还带着伤疤，连手腕上也布满了伤疤，问明情况后，叹息了一番，给我上药包扎。我又对他说脚背上也有伤，他吃了一惊，叫我脱下鞋袜给他看。他看了后说："关系不大。"也包扎上，然后量血压。我仔细注视着血压计，见收缩压是 80 毫米汞柱，这和我入所时的舒张压倒很接近，而舒张压没有看清，因为他似乎尽量挡住血压计不让我看。我想问他他也不会说实话，就不再问了。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这些伤疤。每天听读报的时候，我用两只手互相轻轻抚摸，又抚摸脚背和脚腕，我不想看它们又想看它们。好像母亲看有病的婴儿，它们长在我身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我的抚摸，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黑皮逐渐脱落，可是伤疤愈合得很慢。桂海源组长发现了，就对我说："你可以写封信向家里要吃的，说你有外伤，让他们寄些食品来。"

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轻病号组虽说准许家属送食品来，但不许向家里索要食品，准我写这样的信，无疑是桂组长主动代我向队部请求的结果。能这样做，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恩惠！劳动教养分子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队部严格检查，刚进来的新号也奉命不准乱说外面的情况，所以我对六〇年全国人民的困难情形并不太了解。虽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形势一派大好"、"农业战线接连取得伟大胜利"之类的宣传，但我猜想社会上尤其是城市里的供应至少要比这里面好些，粮食虽定量，总还能买些副食品之类。何况确实有许多家属把食品寄来呢。于是我给父母写信要食品，但没有提起外伤，以免他们挂念。

结果是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错事！后来我了解到住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的父母，当时在县城里每月才吃十九斤粮食，而且也是经过公共食堂克扣的。我的信是何等地使他们为难，使他们伤透了心！后来父亲来信对这件事只提了一句："此间无物可寄。"队部要检查信件，当然不能详写，但就从这短短的六个字里，可以想象到家庭的窘状，早已到了萧条四壁的程度。几个字写尽了这几年的困难，写尽了父母的无限酸辛！

"物质上的粮食越匮乏，精神上的粮食就应当越丰富。"忘记了这句话是谁最先说出来的，但的确是一条"规律"。受这条规律支配，劳教所放电影的场次逐渐多了起来。放映电影当然是在晚上。全体劳教人员集合在伙房前面的空地上"接受教育"，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准请假借故逃避改造的。影片是清一色的国产战斗片，如《战上海》、《沙漠追杀记》等；外国战斗片，如《攻克柏林》以及本国的《渡江侦察记》等等是不放映的。因为那里面有女演员，还有家庭、爱情的场面，会不利于思想改造。也不演一般的阶级斗争片子，更不演《上饶集中营》之类，免得有人站在反动立场上去模仿。所以只有国产战斗片最稳当，你再反动，总不能组织起一支正规军和解放军作战吧。

看电影对劳教人员来说是一件苦事。在北京，一月份的夜晚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广场上寒风肆虐，人虽稠密，却感受不到一点儿热气。寒气从地下冒出来，通过脚传遍了全身。我坐在地上，用一条旧毛毯裹住只穿棉毛裤和绒裤的双腿，头尽可能低垂，脖子尽量缩进，恨不能缩进肚子里。偶尔四下张望，其他人差不多也都是低头作认罪状，只有队长裹着长可及膝的棉大衣坐在椅子上专心看银幕上那被风吹得不断变形的英雄形象，也不管下面的劳教分子接受了教育没有。等电影放映完毕，我的双脚已冻得麻木不仁，一整夜也甭想暖和过来。

手上黑皮全部退尽，伤疤也有所平复的时候，传来一件喜讯：延庆钢铁厂来挑　　人了。组长介绍说："延庆离北京不远，归北京市管辖，又是工业单位，每个月吃五十二斤粮食，还有两斤肉。"说得我们这些连过元旦也没有吃上肉的劳教人员们　　直咽口水。最后桂组长说：要在学习队挑二十个人，明天你们都要拿出点儿精气神儿来，准能挑上！我心里暗暗活动开了，我能挑上吗？如果到了那里，吃上五十二斤粮食，我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那该多好！可是组长介绍的情况可靠吗？是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而故意说得那么好，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呢？北苑不也是个工业单位吗？可是又怎么样？当然，北苑化工厂不是正规的工业单位，而是附设于教养收容所的，不能简单类比，但延庆至少没有酸碱腐蚀吧。想来想去还是挑上的好。总不能在病号组呆上一辈子。这次挑不上，将来就得去农场，农场无论如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真能挑上吗？这么瘦弱，又带副眼镜，怕没有多少希望吧？唉，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次日上午，轻病号组除老残外都在窑洞前面的空地上恭候，其他学习组也在帐篷前排起了队伍。每个人都尽量把身体挺得笔直，显示出一副不怕冷的样子来。队长和钢铁厂派来挑人的干部在各支队伍中来回走动着，谈论着，整个场面活像古罗马奴隶市场的再现。一个中年干部来到我们这个组的前面。他挑人的标准很低也很简单：让某人走出队列，蹲下去，站起来，再蹲下去，再站起来，能反复做三次的人就算合格，另外站一行。但这么简单的事，有的人硬是做不到，头两次还行，第三次蹲下去就站起不来了，还得由值班员把他扶起来。轮到我出列，我有点儿慌张，定了定神，暗下决心：决定命运在此一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集中体力和意志，顺利地通过了这奇特的考试。且慢，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那个中年干部立刻握住我的手腕，像老中医似的给我号了号脉搏，然后失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退回原来的行列。

这该死的脉搏！可是我能控制自己的脉搏吗？

第六章 学习组大篷

只要有资格参加挑选，尽管没有挑上，也说明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起码从外表上看，伤疤逐渐痊愈了。

不久，我被调到了老八组。这是个一般的学习组，住在棉布帐篷里。桂海源叫一个值班员带我前往。走到帐篷门口，正好碰上大组长张瑞。他在学习队的身份有点儿特殊，可以说简直相当于"队长助理"，有时候晚上居然能够代替队长到各组去点名。相比之下，曹建纯、桂海源虽然管着几十号乃至几百号人，不过是小组长而已，身份比他低多了。他和我原来是一个学校的，他在中文系当助教，划右派后留校观察中，因偷窃被送来劳动教养。这是我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听中文系的右派说的。他长得很帅，在精明强干的外表下还透着几分文雅的气质。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右派，又在同一个学校呆过的原故吧，他看见我只穿一条绒裤，就主动问明我的情况，叫一个值班员去拿来一条棉裤给我。一穿上棉裤，身上暖和了许多，内心也暖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场合，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句感谢的话才好。

进了帐篷，第一件事是交出棉被和脸盆。值班员说：这里是集体化生活，某些个人物品，

必须实行“私有公用”制，一律交出来，由全组统一支配使用。因为有不少新号，刚一进来的时候，除了身上穿的以外，一无所有，晚上没有盖的，所以必须用这个办法解决。干净点儿的脸盆，则是给病号打稀饭用的。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我虽然不太愿意，但也不敢不交出来。

到了晚上，要睡觉了，我方才领略到“私有公用”制的确有其好处。值班员一声令下，大家都穿着衣服齐刷刷地躺倒在铺上。所谓的“铺”，并不像窑洞里那样是用铺板支在砖垛上的，这里的铺，不过是在地上铺一层铺草而已。大家躺倒，经过组长巡视，几个值班员各抱着厚厚一叠棉被分头给组员们盖上，两三个人共盖一床，平铺在身上，不许掖被角。各种花色的棉被互相衔接，形成一片花花绿绿的海洋，颇为壮观。剩下的棉被，值班员又给铺上一层。两层棉被一盖，顿觉身上暖暖和和的，再不受双腿冻僵夜不能眠之苦了。

在学习组里，除了听读报以外，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捉虱子。刚进收容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虱子是什么东西。学习组里有虱子的人也是极个别的。而现在，虱子已经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连单独有铺板可睡的值班员身上也偶有发现，一般的组员则几乎人人都有。尽管天天捉、天天查，然而依旧捉不胜捉。后来队部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用化工车间的反应罐消灭虱子：只需将大家的衣服放进罐内，通入蒸气，大约经过二十分钟后，取出衣服，虱子就全部死掉，而衣服好像经过熨烫似的，变得温暖而软和。蒸衣服的时候，全组人分成两半，一半人和平日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另一半人把内外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地用棉被裹着光身子坐在铺草上，活像披袈裟的和尚在打坐，等候值班员把衣服抱回来。

方法倒是不错，但再好的方法也得有人去执行，而这个“人”就可能出问题。轮到另一个帐篷学习组去蒸衣服了，两个值班员出于对虱子的极端仇恨，以为蒸的时间越长虱子消灭得越彻底，就一口气蒸了两个小时。打开反应罐的盖子一看，全傻了眼：里面的衣服都变成碎渣子了！“恶耗”传来，脱得精光的“和尚”们其悲痛嚎啕之状比起哑巴的点心被吃还要胜而过之，简直是痛不欲生！队长大发脾气，把组长痛骂了一顿，又给一丝不挂的“和尚”们各发了一套棉衣棉裤，光着身子穿了起来。不然，他们就连白天上厕所都有困难了。可是许多人还不“感恩知足”，纷纷向值班员哭诉自己的毛衣、绒衣、单衣、衬衣、内裤、棉毛裤等等全部损失，现在没有内衣穿，没有衣服可以换洗等等。值班员开始还敷衍两句，后来听得不耐烦了，就回答说：“连人都教养了，还说衣服！”这句话后来流传开来，使用率极高。有些组员东西被盗，请求值班员查找，值班员就用这句话作为答复。更有甚者，答之曰“开会解决”，可是一开起会来，矛头却指向失主。批判者说：“你不把东西看管好，促使别人犯错误！”甚至于还有的发言者说失主是故意报假案，转移斗争视线，干扰正常的改造秩序云云。这样一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报案了。

小偷在社会上作案，抓了进来，说明公安局有抓小偷的能力。但是抓进来的小偷在公安局里面继续偷，却极少有破案的。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以开斗争会的方式对嫌疑犯乱斗一气，结果是制造了冤假错案。无怪乎小偷在这里面特别猖狂，也无怪乎惯偷通过这样的改造而极少有能够改邪归正的。

我在八组，开会斗失主之类的事都由值班员主持，组长石盘是不管这些事情的。他只是偶而处理一下值班员感到棘手的事。

石盘此人，颇值得特别介绍一下。他和我及张瑞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在校的时候我就知

道他的大名，只是无缘相识。他原来在中宣部工作，据说当过陆定一的秘书。五三年他以“性格自由散漫，受不了严格纪律约束”为由要求退党。批准以后转到政史系当教授。五七年大鸣大放初期，他也有些言论，不知为什么很快就沉默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一吹响，一般教师尤其教授们还在犹疑观望，他已经奋起反击，冲锋陷阵，十分活跃。批判大会他是每会必到，每到必用他那高八度的嗓门痛斥右派的谬论，成了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好景不长，五八年的交心运动中他成了重点，大会套小会，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更难办的是不断有学生和助教成群结队“登门拜访”轮番疲劳轰炸，使他“假交心，交假心，就是不交退党真正原因”的拙劣手法统统破产，难以蒙混过天。五八年六月，他被迫交出真心：“我认为中国和苏联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和苏共也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结局是划成全校最后一名极右分子，在教授中也只有他一人享受到劳动教养的最高荣誉 .——据说他后来通过陆定一的关系回到了北师大，在图书馆工作，“文革”中被揪斗而跳楼自杀了。

闻名不如见面，我在这里才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很失望。他个子矮小，相貌猥琐，毫无学者风度。平日一事不管，一天到晚拿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以为大概像曹建纯一样，看没收来的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看的原来是《西洋哲学史》。于是对这位身处逆境仍不忘做学问的教授顿生敬意。然而敬意只维持了一天就破灭了。那天下午来了个十几岁的新号，一来就向值班员诉说他的请求：他是由分局送来的，在分局时一天吃两顿，早上九点半，下午四点，数量自然不够，而这天早上分局的“雷子”对他说：“今天要送你上北苑，现在要忙着办手续，就不吃早饭了，到了北苑，那里不定量，可以随便吃。”然而到了北苑，仍要办一大堆手续，大约还是按手印、照相、检查、登记之类，午饭也没有吃上，所以从清早起来饿到下午三点还没有吃饭，希望能给解决。他态度恭顺之极，言词也颇为谦卑，弄得几个值班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石盘放下手中的《西洋哲学史》，瞟了瞟这个倒楣蛋，用他那特有的高八度腔调，拉长了声音反问：“政府，嗯，该你的饭吗？”

新号顿时茫然。

石盘穷追不舍：“这儿是开饭馆的吗？你带粮票了吗？”三句话，胜过程咬金的三板斧！新号顿时无言以对，彻底被打垮了。石盘大获全胜，重新拿起了《西洋哲学史》。

有时候他掌握会场，让小流氓交代问题，他那高八度的嗓音，满口说的是流氓黑话，什么“拍”（指性交）呀，“浮”（指偷窃）哇的，要是不知道他的底细，还会以为他是天桥来的老流氓呢！

时间不知不觉一天一天地过去，这里的人是没有谁珍惜光阴的，只嫌时间过得慢，日子不好熬，绝没有谁嫌时间过得快，发出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感叹的。我精神上麻木不仁，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脑子里一片空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已经满足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甚至幻想不久之后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根本不知道病魔已经悄悄儿靠近了我。在轻病号组里面，各种疾病的患者都有，我周围就有不少肺结核病患者。而我当时只注意手上和脚上的伤疤，对此却毫无警觉。

进入四月份，天气明显地转暖，入所已经一年，也算得上是个“老号”了。队部安排我们洗澡，却还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值班员把我们带出戒备森严的二门，来到专门为职工、

干部准备的浴室，分批入内洗澡。浴室内没有淋浴，更没有盆塘，只有一个热气腾腾的方形大水池。我以前从来没有洗过大池子，看到一大堆赤身露体、骨瘦如柴、奇形怪状的男人挤在一起，类似入所第一夜挤在统铺上一起睡觉的那种厌恶感不禁油然而生。我勉强控制住感情，尽量低头不看周围，以最快的速度脱光了衣服。出乎我意料的是，虽然一年没有洗澡，但身体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比街头的乞丐还赃。稍一想，也就悟出了其中的缘故：长期饥饿，食物几乎全部吸收，使分泌物大为减少，哪里会有多少污垢留下来呢？　　池里站满了人，热气包围，分不清身影，只觉得一具具骷髅在晃动，它们逐渐混成一片，像一团光怪陆离的东西。嘈杂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特别响亮，却分辨不出内容。声音逐渐远去，好像遁入到另一个世界。光怪陆离的一团越来越模糊。我想睁大眼睛看个清楚，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胸口好像被什么堵着，却又没有呕吐的意思。头脑倒很清醒：“哦，原来人晕倒了，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挣扎着走到池边，那不过一米多远，我伸出手去摸池子的边缘，却没有摸到，只有热呼呼的赃水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淹没了我的脸。水不但是暖和的，还带着一股男人身上特有的难闻气味，同时耳朵里也灌满了“嗡嗡……”的声音，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一片沉寂，没有阳光，我离开了这个世界。